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 簡帛研究

二〇一二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 簡帛研究 二〇一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12 / 卜憲群, 楊振紅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95-4431-8

I. ①簡… II. ①卜…②楊… III. ①竹簡—中國—文集  
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4040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廣西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20 字數：40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 001～1 200 冊 定價：10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 顧問

田余慶 [日]永田英正 林甘泉 裘錫圭 [英]邁克爾·魯惟一 饒宗頤

## 編輯委員會主任

李學勤 李均明

## 主編

卜憲群\* 楊振紅\*

## 編輯委員

卜憲群\* 邢文 李學勤 李均明 宋艷萍\* 汪桂海  
馬怡\* [日] 初山明 侯旭東 莊小霞\* 凌文超\*  
孫曉 [日] 富谷至 陳松長 梁滿倉 鄔文玲\* 楊英  
楊振紅\* 蔡萬進 趙凱\* 劉馳 劉樂賢 戴衛紅\*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排列，加“\*”者爲本輯執行編輯)

# 目 錄

讀清華簡札記(五則) .....	李 銳/1
由郭店簡所見異文看“強自取柱”諸說 .....	黃甜甜/8
上博藏簡《緇衣》篇“替”字考釋 .....	禰健聰/14
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 .....	鄔可晶/20
談談放馬灘簡的一組時稱 .....	程少軒/34
嶽麓書院藏秦簡校讀二則 .....	何有祖/45
《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洞庭郡、南郡屬縣考 .....	莊小霞/51
再論里耶秦牘 8—157 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 .....	游逸飛/64
里耶秦簡債務文書初探 .....	張燕蕊/70
秦漢時期桑蠶業、禽畜養殖及狩獵活動中的信仰習俗 .....	汪桂海/78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 .....	郭洪伯/90
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	
——從張家山漢簡《蓋廬》看先秦時代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 .....	王啓發/94
新莽職方補考 .....	黃東洋 鄔文玲/114
“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考釋 .....	謝桂華/136

長沙吳簡所見的“市布” .....	[日]阿部幸信/151
試論吳簡名籍的製作周期及相關問題 .....	鄧瑋光/165
漢代的更卒	
——試論徭役、兵役制度 .....	[日]鷲尾祐子/182
2006 年以來敦煌懸泉漢簡研究述評 .....	韓 華/206
簡帛文字編編纂的現狀與展望 .....	張顯成/213
日本的中國出土簡帛研究論著目錄(二)(1910—2011 年) .....	[日]柿沼陽平/223

## 讀清華簡札記(五則)<sup>①</sup>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李 銳

**內容提要** 本文討論《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冊中《金縢》、《保訓》、《尹誥》等篇中的一些文字和相關傳世本文字的釋讀問題,共五則。清華簡《金縢》的“邦人【□□□□】弁,大夫繹”,當讀為“邦人【大恐,王甚】弁,大夫懌”,“弁”之義為“恐懼”,今傳本“弁”字同;由清華簡《金縢》的“爾之許我,我則瘞壁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壁與珪歸”,可知今傳本《金縢》當讀為“爾之許我,我其以壁與珪饋,祠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保訓》的“三降之德”,當讀為“三諭之德”;《保訓》的“日不足,惟宿不萊”,當讀為“日不足,惟夙不祥”;清華簡《尹誥》的“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衆”,當讀為“夏自倦其有民,亦惟厥終”,對應今傳本《緇衣》所引《咸有一德》的“自周〈害(竭)〉有終(衆),相(胥)亦惟終”。

**關鍵詞** 清華簡 金縢 保訓 尹誥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冊內容豐富,自公布之日起,就吸引了許多學者的關注,研究者眾多。筆者在研讀時賢著作之餘,偶有所思,作為札記數則,今不揣淺陋,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sup>①</sup> 本文寫作得到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2—2013年度項目“新出簡帛與《尚書》研究”(24291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國家起源研究的理論與方法”(12&ZD133)的資助。

《金縢》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史記·魯世家》釋“弁”為“朝服”，這和今文家用皮弁之說相應，古文家則用爵弁降服之說，這都涉及到了冠服制度。<sup>①</sup> 今人如顧頡剛雖說要不信經師的曲解，但是也釋為“皮弁（祭天的禮帽）”<sup>②</sup>。這些解釋恐怕和《禮記·玉藻》的話有關：“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但實際上姑不論這些與變禮相關的冠服制度在周初是否實行過（《尚書·顧命》有“二人雀弁”等，但所記乃成王將崩時事），單是由弁而至於朝服或爵弁，我們就有理由疑問：君臣正式相見有不冠帶整齊的麼？需要這樣增字解經麼？假如這些解釋正確，那麼清華簡《金縢》（《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這裏作“邦人【□□□□】弁，大夫縶”<sup>③</sup>，不難補字為“邦人【大恐，王□】弁，大夫縶”。如果是講冠服的話，這裏王與大夫穿戴不同，與今傳本《金縢》大不相同。

但是在一個“邦人大恐”的環境中，似沒有必要講這些穿戴。因此筆者不能同意將“縶”讀為“端”或某種服飾的意見。《金縢》這裏“弁”應該訓為恐懼，《漢書·王莽傳下》有一段話可與本文對勘：“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今傳本“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是說看到異常天象，邦人、王、大臣都很恐懼。至於清華簡《金縢》，“縶”當讀為“愒”，是憂愁之義，《逸周書·嘗麥》：“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愒”，朱右曾《校釋》：“愒，憂也。”我們可以將清華簡《金縢》補字為“邦人【大恐，王甚】弁，大夫愒”。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論語·鄉黨》的“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禮記·玉藻》的：“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說皆是對於異常天相的態度（顯然我們不必將“必變”的“變”讀作“弁”），并未特別強調要變服衣冠。

① 參見顧頡剛、劉起鈺《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1241頁）。

② 顧頡剛著：《〈金縢篇〉今譯》，《古史辨》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0頁。

③ 參見陳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原釋文將“縶”隸定為“縶”或“縶”，不確；復旦大學讀書會改隸為“縶”（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年1月5日），陳劍讀為“端”。



## 二

《金縢》的“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或讀為“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以與《史記·魯世家》相應：“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清華簡《金縢》作“爾之許我，我則瘞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sup>①</sup>

簡本說得比較清楚，得到先王的許可之後，就實行瘞埋珪璧的方法，否則便罷，“以璧與珪歸”。今傳本則似乎有些含糊，怎麼得到先王的許可之後，要拿着珪璧回去（“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這倒像是簡本所說的不得命後的措施：“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等着先王的命令。看來今傳本《金縢》有一些問題，它本來應該和簡本的意思是一致的。因此宋華強指出：今本兩句話蓋屬誤倒，原本可能是：“爾之許我，我其屏璧與圭。爾不許我，我乃以璧與圭歸俟爾命。”<sup>②</sup>

按：若求二者對應，疑今傳本《金縢》的“歸”可能要屬上，讀為“饋”。<sup>③</sup> 二字古通，這才對應簡本的“瘞”<sup>④</sup>。“俟”可能要讀為“祠”，二字古通。<sup>⑤</sup> 求福為禱，得福報賽為祠。即是“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饋，祠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史記·魯世家》也當讀為“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饋，以祠爾命”）。

## 三

《保訓》的“三降之德”，李學勤先生認為：“‘三降’疑即指堯的‘三從’，意思是舜有德感動堯三次降從。”<sup>⑥</sup>《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則解釋為：三降之德，傳世文獻多云“三德”，如《書·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sup>⑦</sup>李均明讀“降”為“隆”，認為是重、大的意思。<sup>⑧</sup>林志鵬認為“三降之德”指天、地、人三德。<sup>⑨</sup>黃人二認為“三降”者，“伯夷降”、

① “瘞”字的釋讀參見陳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瘞”字的釋讀還有學者表示懷疑，今且從陳說。

② 宋華強著：《清華簡〈金縢〉校讀》，簡帛網，2011年1月8日。

③ 參見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874頁）。

④ “瘞”字原作“瘞”，陳劍在考釋時已經指出“瘞”字性質與“饋”、“犒”相近。

⑤ 參見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30頁）。

⑥ 李學勤著：《清華簡〈保訓〉釋讀補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⑦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146頁。

⑧ 李均明著：《周文王遺囑之中道觀》，《光明日報》2009年4月20日。

⑨ 林志鵬著：《清華大學所藏楚竹書〈保訓〉管窺——兼論儒家“中”之內涵》，簡帛網，2009年4月21日。

“禹降”、“稷降”是也。<sup>①</sup> 廖名春先生認為“降”當讀為“愉”，“三降之德”即“三樂之德”。此是言在舜的治理下，百姓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sup>②</sup> 子居認為“三降之德”，即是指舜舉伯夷、伯禹、后稷三人而降以治民。<sup>③</sup> 倪木蘭認為“三降”蓋“三代以降”的簡稱。<sup>④</sup> 王連成認為：“三降之德”不等於經典所謂的“三德”；“降”通“隆”，尊崇的意思；“三”當指“天、地、人”；故“三降之德”即“天地人共同尊崇的道德”。<sup>⑤</sup> 周鳳五讀“降”為“陟”<sup>⑥</sup>。黃懷信以為：“降”，下也，謂下到民間；“三降之德”，即下到民間之三德；三德，如各家所言，指《尚書·洪范》之“正直”、“剛克”、“柔克”。<sup>⑦</sup>

按：簡文“三降之德”，乃指“舜”之德，而且“帝堯嘉之”。因疑“降”讀為“諭”，二字古通。《容成氏》說：“堯於是乎為車十又五乘，以三從舜於畎畝之中……舜於是乎始語堯天地人民之道。與之言政，率簡以行；與之言樂，率和以長；與之言禮，率博以不逆。堯乃悅。”<sup>⑧</sup>（《尸子》佚文載：“舜一徙成邑，再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看來堯曾三次親臨舜所，聽舜言政、言樂、言禮。《說文》：“諭，告也。”《容成氏》的“堯乃悅”，對應《保訓》的“帝堯嘉之”。

#### 四

《保訓》的“日不足，惟宿不𡈼”，簡文大意很明顯，是說要珍惜時間，討論者已多，然所作解釋似仍不能通達。近來張世超將“宿”讀為“夙”<sup>⑨</sup>，鄙意這個方向可取，惟解釋仍當再進一步討論。

按：疑“宿不𡈼”當讀為“夙不祥”<sup>⑩</sup>，祥有善義，《淮南子·繆稱》有“文王聞善如不及，宿

① 黃人二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寶訓〉校讀》，《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6期。

② 廖名春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孔子2000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9年6月17日。又見廖名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出土文獻》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68頁）。

③ 子居著：《清華簡〈保訓〉解析（修訂版）》，《學燈》第十二期，孔子2000網，2009年11月1日。

④ 倪木蘭著：《清華楚簡〈保訓〉篇新解——兼論“中”之含義》，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1月4日。

⑤ 王連成著：《清華簡〈保訓〉釋譯》，簡帛研究網，2010年4月26日。

⑥ 周鳳五著：《清華簡〈保訓〉重探》，“國學前沿問題研究暨馮其庸先生從教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10月16-17日。

⑦ 黃懷信著：《清華簡〈保訓〉補釋》，簡帛網，2011年3月25日。

⑧ 參見陳劍《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說》，中研院史語所主辦“中國南方文明研討會”會議論文，2003年12月。

⑨ 張世超著：《占畢陞說（三、四）》，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2年2月23日。按：李零在文章中提及：西周金文常說“虔夙夕”、“恪夙夕”、“夙夜用事”、“夙夜用享”、“夙夜不懈”、“夙夜無怠”，都是勉人勤奮的話（見所著《讀清華簡〈保訓〉釋文》，《中國文物報》2009年8月21日），但是沒有明確地將“宿”和“夙”對應。

⑩ “𡈼”讀為“祥”，參見趙平安《〈保訓〉的性質和結構》（《光明日報》2009年4月13日）。

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論者多謂“宿不善如不祥”當讀爲“宿善如不祥”。<sup>①</sup> 鄙意《淮南子》言及“日不足”,其“宿不善如不祥”當讀爲“夙不善如不祥”,與一般解釋不同,可資解釋簡文。“宿不善”即是夙不善,是說早晨不善。“日不足,惟夙不祥”,日不足,是因爲早晨不善——其意思是說一日之計在於晨,當慎其始。如果早晨未能樹立端正的態度,那麼一整天也很難有端正的態度,因此會日不足。這一解釋和“敬哉毋淫”的意思也是相合的。《逸周書·大開》的“維宿不悉(業),日不足”,《小開》的《小開》:“宿不悉日不足”,即是“維夙不悉(業),日不足”<sup>②</sup>,因爲早晨不善,所以日不足。

## 五

清華簡第一冊中公布的幾篇《尚書》類文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李學勤先生指出,《尹誥》的出土,可以說明傳世的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并不是真正的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這對於我們認識今傳所謂古文《尚書》非常有意義。但是仍然有學者相信古文《尚書》,其理由不過是根據傳世本《禮記·緇衣》所引《尹誥》有“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而清華簡《尹誥》祇有“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曰: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衆……”,沒有“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一句,因此不可信。<sup>③</sup> 關於“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與“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根據鄭玄注所引《緇衣》異文“‘見’或爲‘敗’”,以及“躬”與“念”爲通假字(當讀爲“念”),可知兩句話大同小異。<sup>④</sup>

至於清華簡《尹誥》沒有“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一句,這是根據整理者的意見。或疑《緇衣》此八字當爲錯簡,本來就非《尹誥》篇的文字,因錯簡混入《尹誥》篇引文“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之後。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爲根據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我們可以知道,這幾句話並不見於古本《緇衣》之中。但是即便是錯簡,也有可能是來自於某一上下文相連的整簡,很難說這一簡在“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後斷開,況且當時人或可能還有《尹誥》可以對照。

馬楠指出,終、衆古音全同,又根據于省吾曾指出的《緇衣》引《君奭》中有“周田觀文王之德”,傳本則爲“割申勸寧王之德”,“周”、“割”爲異文,因此認爲《緇衣》所引《尹誥》當爲“惟尹念天敗於西邑夏,[夏]自害(割)[其]有衆,相亦惟衆”,句謂尹念天敗西邑之夏,夏自

① 參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727—728頁)。

② “悉”爲“業”之譌,參見孟蓬生《〈保訓〉釋文商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6月23日。

③ 房德鄰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錄的〈尹誥〉是一篇僞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網,2011年3月。

④ 廖名春著:《清華簡與〈尚書〉研究》,“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揚州大學,2010年6月16日;《文史哲》2010年第6期。按:下引馬楠文也討論了此一問題,結論相近。

割害其衆，則其衆亦助成其敗。<sup>①</sup>

鄙意這個研究思路是對的，下面對之作一些補充。

傳本《禮記·緇衣》的“周田觀文王之德”，鄭玄注指出：“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這一處異文表明，今本《緇衣》的“自周有終”，很可能可以讀爲“自害（割）有衆”，于省吾指出了“周”、“害”形近之例（金履祥《書經注》卷一〇已經指出：“‘周’字似‘害’，必‘害’字也”<sup>②</sup>），因此馬楠的這一意見可信。另外，《尚書·湯誓》、清華簡《尹至》均有“有衆”之語。不過馬楠依違於“害”、“割”之間，訓爲割害，則或不可信。似不如直接讀爲“害”，《湯誓》中的“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的“割”當作“害”、“禍害”講。<sup>③</sup>簡單說來，《緇衣》此處可以讀爲“自害有衆，喪亦惟衆”<sup>④</sup>。

不過從《緇衣》所引《尹誥》、簡本《尹誥》以及與之相關的《湯誓》等篇的對應來考慮，筆者懷疑這裏《緇衣》所引《尹誥》的“害”似應該進一步讀爲“竭”。《湯誓》講夏的罪狀首先是“遏衆力”，楊筠如指出“遏”當讀作“竭”，作竭盡講。<sup>⑤</sup>夏桀竭盡民力是夏敗亡的根本原因，這導致民衆疲憊痛苦不堪。可是從《湯誓》來看，商湯滅夏，也消耗了不少民力，民有怨言。所以《尹誥》中伊尹就有鑒於夏，建議商湯要將夏桀收刮來的金玉散於民。“害”古音匣紐月部，“竭”古音群紐月部，音近可通。

清華簡的“絕”字，原釋文隸定爲“慙”，張新俊以爲有可能從“弦”得聲；蘇建洲則進一步隸定爲“慙”，訓爲“虔”，爲殺、剪除、滅絕的意思。<sup>⑥</sup>馬楠謂弦、害聲紐相同，韻部相鄰。但此二字古音還不够嚴格的音轉條件，可能是有鑒於此，馬楠說“字似當讀爲害”。此字若從“弦”（古音匣紐真部），疑讀爲“倦”（群紐元部），音近可通。簡本的“夏自倦其有民”，與《湯誓》“有衆率怠弗協”相應，與《緇衣》所引《尹誥》的“自竭有衆”文義接近。或以爲“有衆率怠弗協”之“怠”通“殆”<sup>⑦</sup>，指危殆，恐非是；當是倦怠之義。簡本的“亦惟厥衆”，則應讀爲“亦惟厥終”，是說因“夏自倦其有民”而終。

《緇衣》的“害”字，清華簡相應的字若讀爲“虔”，意思太過於有針對性了。而從《容成

① 馬楠著：《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金履祥著：《書經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2冊602頁B。

③ 顧頡剛、劉起鈇著：《尚書校釋譯論》，883頁。

④ 此意見爲廖名春先生看過本文初稿後的意見。郭永秉來信告知裘錫圭先生也有此意見。蘇建洲看過本文初稿後說他亦有此意見。

⑤ 楊筠如著：《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138—139頁。

⑥ 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0年1月5日）的文後評論。

⑦ 顧頡剛、劉起鈇著：《尚書校釋譯論》，883頁。

氏》來看“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爲[己爲]<sub>35A</sub>，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師以伐岷山氏，取其兩女琰、琬，□北去其邦，□爲丹宮，築爲璿室，飾爲瑤臺，立爲玉門，其驕<sub>38</sub>泰如是狀”<sup>①</sup>，這是勞民傷財，竭民力的事情。真正的“虐”其民，有歷史記載的是說桀殺關龍逢。《史記》說“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還有一些子書的記載，恐怕多屬於附會。而且伊尹在此句後說“今后胡不監”，而湯應該不會濫殺無辜，參照《湯誓》裏面所說“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當時是耗費了不少民力。因此筆者纔考慮伊尹所說應該是“夏自竭其有衆”。《尹誥》裏的遠邦之民，應該主要是湯的子民，《尹誥》後面說的是如何召賚民衆，伊尹建議用散金玉的方法，這實際上就是與民休息。總之，簡文此處的釋讀，應該從相關文獻的總體以及簡文的上下文來通盤考慮，而不能祇關注某一處文字的解讀。

關於“相亦惟終”，廖名春先生認爲：“惟”，表原因，相當於“因而”。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惟，猶以也。”并舉《書·盤庚中》的“亦惟汝故”、《左傳·僖公二年》的“亦唯君故”、《詩·狡童》的“維子之故”爲證。《荀子·子道》：“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說苑·雜言》“維”作“唯”。“非維下流水多邪”即“非因下流水多邪”。<sup>②</sup>

廖先生的意見可從，“惟”可訓爲“因”、“以”。這裏“自周〈害(竭)〉有終(衆)，相亦惟終”的後一個“終”字不當改讀爲“衆”。“相”當讀爲“胥”，二字古通<sup>③</sup>。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指出，“胥”之義爲“是”<sup>④</sup>，“相(胥)亦惟終”的“胥”，與簡本的“亦惟厥衆(終)”中的“厥”同爲指代之辭，因此二句所說一致。“自周〈害(竭)〉有終(衆)，相(胥)亦惟終”，“夏自倦其有民，亦惟厥衆(終)”，是說夏竭民力，因此而終結了統治。

① 參見陳劍《上博簡〈容成氏〉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9日)。“己爲”參見李銳《商朝的帝王數》(《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廖名春著：《清華簡〈尹誥〉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參見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374頁)。

④ 謝紀鋒編：《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436頁。蘇建洲來信指出：“此義項可議。裴氏說：‘胥訓是，猶斯訓是，胥、斯古字通。’但是胥(心魚)、斯(心支)音遠。”鄙意裴氏通假不可信，但觀其解釋詩意，似可。蘇建洲覆信說：“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指出：‘胥猶是也’，所舉例證有《大雅·瞻印》：‘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以及《閟宮》：‘黃發臺背，壽胥與試’。其中前一例‘胥’理解爲‘是’文意妥帖。我以前的《詩經》老師也贊同此意見。”

## 由郭店簡所見異文看“强自取柱”諸說

清華大學歷史系 黃甜甜

**內容提要** 《荀子·勸學篇》“强自取柱，柔自取束”歷來注說中，楊倞解“柱”為“柱子”，王引之破讀“柱”為“祝”，訓為“折斷”。學界自此多從王說。郭店簡相關異文的出現使注家重拾楊說。本文平議楊倞、王引之、劉師培乃至今人的說法，補充并申論劉師培說法，認為“柱”字無須破讀，訓為“支柱”，引申為“直立”義，足以疏通文意。傳世與出土文獻所見異文皆不出“剛則折/剛而不折”的框架。

**關鍵詞** 《荀子》 郭店竹簡 字詞考釋

《荀子·勸學篇》有云：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sup>①</sup>

自來注家對“强自取柱，柔自取束”的解釋莫衷一是。郭店竹簡出土後，我們再次發現了兩處異文材料，學界相關看法也爭訟不一。在此我們希望平議衆說，試為其中優勝之說提供旁證。

<sup>①</sup>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6—7頁。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楊倞注曰：

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sup>①</sup>

楊說將“柱”解釋為名詞性的柱子，“見”在此處當表示被動，“見束”意謂被捆束起來，整句大體在說“堅固的東西，被人們拿來用作柱子，而任其勞累；柔軟的東西則被人們緊緊地捆束起來，這些都是自己導致的”，這樣的解釋勉強順暢，但存在明顯問題：“強自取柱”與“柔自取束”相對成文，對它們的解釋也當相對，但楊說前邊把“柱”作為名詞，後面却把“束”看作動詞，而且，語義也明顯不相對。

王引之在此問題上主張破讀，讀“柱”為“祝”。《讀書雜誌·荀子雜誌》云：

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成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并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sup>②</sup>

王氏也許也意識到了楊說前後不相稱，因而借助《大戴禮記》異文，讀“柱”為“祝”，“祝”有折斷之義，語義由此暢通。但遺憾的是沒有解釋“柔自取束”，大概王氏認為“強自取柱”與“柔自取束”相對成文，解釋了“強自取柱”，“柔自取束”也就不難理解了。

劉師培不主張破讀，劉氏《荀子補釋》道：

楊說固非，王說亦失。《荀子·勸學》篇首節大抵以自強勉人。觀青藍、冰水之喻，可以知矣。且貴直曲惡，故一則曰“木直中繩”，再則曰“木受繩則直”，三則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此文亦強柔對文，則以強為直，以柔為曲，即柱字亦取直立之意矣。《廣雅·釋器》：“柱，距也。”《倉頡》篇：“柱，枝也。”柱通作拄，《漢書·西域傳》以道當為拄置，注云：“支柱也。”強自取柱者，言強則直立不撓，可與外物相支距也。柔自取束，凡物之束者必曲，故與柱義為相反。上言“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蓋強則致榮，柔則致辱，此文之“強”、“弱”，正與“榮”、“辱”相應也。若《大戴記》作折，亦拄字之訛文。<sup>③</sup>

①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6頁。

② [清]王念孫撰：《讀書雜誌·荀子雜誌》卷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631頁。

③ 劉師培著：《劉申叔遺書·荀子補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943頁。

劉氏所謂“《荀子·勸學》篇首節大抵以自強勉人”未必符合《荀子》原意，這裏存而不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強自取柱”意謂“強則直立不撓”，“柔自取束”意謂“物之束者必曲”，一強一弱，語義相反，正與“榮辱之來”中的“榮”與“辱”相應。訓“柱”為距、支柱，引申為直立的意思，訓“束”為曲，前後語義相對，這些實在是超凡之見。至於說“折”乃“拄”字形之訛，至少古文字中兩字字形差異不小，形誤之說未必正確。

我們還可以為劉說補充的是，《集韻·嘆韻》：“拄，撐也。通作柱。<sup>①</sup>”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云：

柱，極也。柱之言主也。屋之主也。從木，主聲。直主切。古音在四部。按柱引伸為支柱柱塞。不計縱橫也。凡經注皆用柱。俗乃別造從手拄字。音株主切。<sup>②</sup>

《集韻》明言“拄，撐也”，“拄”通“柱”。段玉裁更進一步分析了“柱”字的兩個義項，一為名詞性，一為動詞性，後者為前者之引申。《廣雅·釋器》“柱，距也”；《倉頡》篇“柱，枝也”，此二條皆屬動詞性義項。劉師培訓“柱（拄）”為“直立”，義近乎“撐”、“距”。

其次，“束”字有“曲”、“約”的意思。《漢書·食貨志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顏師古注引李奇曰：“束，聚也。”《戰國策·齊策二》：“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鮑彪注：“束作束，束猶斂。”<sup>③</sup>“束”字在這兩句中可訓為斂、縮，語義與“曲、縮”之義相近。《淮南子·兵略》“旗不解卷”，高誘注：“卷，束也。”<sup>④</sup>這些辭例可證“束”與“卷”、“曲”義近。

細讀《勸學》這段話，我們發現，這段話的句式多表因果關係。這些因果關係句中，或講人事，或講自然現象。古人往往在自然萬物上賦予感情色彩，認為自然現象如同人事一樣，也有人倫敦化的意義。“強自取柱”意謂物之剛強導致自我樹立不折，“柔自取束”意謂物之柔弱則導致自我曲縮。“自取”強調後果由自身性質所導致。而且，如劉師培所說“強自取柱”，“柔自取束”，一強一弱，語義相反，正與“榮辱之來”中的“榮”與“辱”相應。

行文至此，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但我們必須面對古書中相關異文的檢驗。

## 二

首先看郭店簡提供的兩處相關異文。《性自命出》篇第8、9號簡云：

①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五，宋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98頁。

②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六篇上，經韻樓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53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073頁。

④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287頁。

凡物無不異也者。剛之桷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sup>①</sup>

裘錫圭先生在按語中指出，這段話與《語叢三》篇第46號簡“強之鼓（對），強取之也”語義相近。<sup>②</sup>

劉昕嵐、馮勝君等先生都指出這兩段話都與《荀子·勸學篇》“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有關。<sup>③</sup>馮先生認為簡文中的“桷”、“樹”和《勸學篇》的“柱”都當從王氏之說，破讀為“祝”，訓為斷。陳偉先生也以王氏的說法為基礎，讀“桷”為“祝”，訓“祝”為“斷絕”，並且指出“取”有“引發、匯出、起作用”的意思，“約”字與“桷”字相對應，有“彎曲”之義。<sup>④</sup>劉昕嵐、陳劍等先生重拾楊倞的說法。<sup>⑤</sup>

陳劍先生主張盡量依本字來作解釋，楚簡“桷”字用作“樹”。<sup>⑥</sup>郝士宏先生亦指出，《語叢》的“鼓”為《說文》中“樹”字籀文，從豆、從主、從對之字古音多可通。<sup>⑦</sup>

我們認為，“柱”可訓為支柱，引申為直立的意思。“柱”、“桷”、“樹”三字音義皆近，郭店簡中出現的“桷”、“樹”與“強自取柱”之“柱”，以及“約”與“束”屬於義近關係，而非通假關係。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懷疑，“強自取柱”這裏確實不需要破讀，李天虹先生正是考慮到了簡文的“樹”這一異文，而主張“強自取柱”之“柱”讀本字，訓為“直立”。<sup>⑧</sup>這也近乎劉師培的訓釋。

因此，郭店簡兩處相關說法，似乎也可以從劉師培之說。

此外，古書中相關的說法還有不少，我們摘要羅列於下：

1. 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

①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79頁。按，“異”字原字形不清，裘錫圭先生按語依照文義釋為“異”，見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182頁，注釋五），陳偉先生疑當釋為“其”，讀為“期”，有“預知”、“料想”之義（見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82頁），李銳先生引《廣雅·釋言》“期，卒也”，王念孫《疏證》“期之言極也”，“凡物無不期也者”，認為系指物各至其極（見李銳《孔孟之間性論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32頁），此處暫從裘按。

②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182頁。

③ 劉昕嵐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333頁；馮勝君著：《讀〈郭店楚墓竹簡〉割記四則》，《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210頁。

④ 陳偉著：《郭店竹書別釋》，182—183頁。

⑤ 劉昕嵐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333頁；陳劍著：《郭店簡補釋三篇》，郭店楚簡（國際）研究中心編：《古墓新知——紀念郭店竹簡出土十周年論文專輯》，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8，119—120頁。

⑥ 陳劍著：《郭店簡補釋三篇》，120、129頁。

⑦ 郝士宏著：《郭店楚墓竹簡考釋一則》，《古文字研究》第23輯，北京：中華書局，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143頁。

⑧ 李天虹著：《〈性自命出〉集釋》，收入所著《郭店簡〈性自命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43頁。

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sup>①</sup>

2. 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鏹，堅則折。劍折且鏹，焉得爲利劍？”<sup>②</sup>

3.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sup>③</sup>

4. 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sup>④</sup>

5. 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sup>⑤</sup>

6. 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sup>⑥</sup>

面對如此多的異文，陳劍先生主張將這些異文分爲兩類，“太剛則折”一類在語義上是說“某物自身具有的性質決定了它在遭受外力作用時容易產生的後果，太堅硬則遭受外力容易折斷，太柔軟則遭受外力容易自己卷起來。”“強自取柱”以及郭店簡一類則是說“某物自身的性質導致人們要拿它來幹什麼，太堅硬則容易被用作柱子，或被樹立起來（承受重量），太柔軟則容易被用來捆束其他東西。”<sup>⑦</sup>陳劍先生上述兩種解釋稍顯複雜，而且“遭受外力作用”、“被用來捆束其他東西”之說，顯得“增字爲訓”。

仔細分析上述每一條異文，我們不難發現“剛則折/剛而不折、柔則曲/柔而不曲”這類話在先秦兩漢的文獻中是多次出現的，尤其是在《語叢三》這樣的“格言語錄集”中單獨作爲一句出現，說明這是當時流行的話語，也是古人著述經常採用的一個語料。<sup>⑧</sup>古人在不同語境中會賦予不同的意思，如《說苑·至公》“柔而不撓；剛而不折”是在講執法者剛正不阿的品質；《漢書·雋不疑傳》“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則是在講爲官的中庸之道，不能太剛也不能太柔。

上述相類的說法都隱含兩個基本語義結構：“剛則折/剛而不折、柔則曲/柔而不曲”。雖然不同語境中這類話含義不同，但“剛則折/剛而不折”、“柔則曲/柔而不曲”兩個基本語義結構始終存在。“剛則折/剛而不折、柔則曲/柔而不曲”顯示了古人一種辯證的理解和應用。

① 方向東著：《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8，766頁。

② 王利器著：《呂氏春秋注疏》卷二五，成都：巴蜀書社，2002，2962—2963頁。

③ 王利器著：《鹽鐵論校注》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2，284頁。

④ 《漢書》卷七一《雋不疑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3035頁。

⑤ 劉文典著：《淮南鴻烈集解》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89，515頁。

⑥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359頁。

⑦ 陳劍著：《郭店簡補釋三篇》，120—121頁。

⑧ 論者多認爲《語叢》，尤其是前三篇《語叢》多是格言類短句，參見陳偉等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244頁）。

“強自取柱/折,柔自取束”和“剛之桷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都不脫離“剛則折/剛而不折、柔則曲/柔而不曲”這種辯證的語義結構。也就是說,沒有必要像陳劍先生那樣把這些異文分為語義不同的兩類,“強自取柱”和“強自取折”語義相反辯證,但仍屬一類,祇是不同語境,取意不同而已。

《大戴禮記·勸學》中“強自取折”在語義結構上也没有脫離“剛則折/剛而不折”、“柔則曲/柔而不曲”,在語義上與“強自取柱”相反,這很可能是《大戴禮記》的編撰者誤解了《荀子》原義,又受到其他文獻中多處出現的“剛則折”的影響,因而改“柱”為“折”。

《性自命出》“凡物無不異也者。剛之桷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意在說明各物性質不同。剛強之物直立不撓,這是由剛強之性所致;柔軟之物卷曲,這是由柔軟之性所致。此處所舉的“剛”“柔”性質相反,“桷”與“約”采用“直立”與“卷曲”的訓釋纔顯得相對。劉昕嵐先生解釋句意為“物強則立而為柱”,可從。<sup>①</sup> 李零先生認為此處以“樹”為直,以“約”為曲,正是顧及了“剛”“柔”性質相反。<sup>②</sup>

① 劉昕嵐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333頁。

② 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2頁。

## 上博藏簡《緇衣》篇“替”字考釋<sup>①</sup>

廣州大學人文學院 禰健聰

**內容提要** 上博楚竹書《緇衣》篇簡 22 與傳世本“鄉”、郭店本“向”對應的“替”字，與《殷周金文集成》1799 號的“莠”字爲一字異體，也即《說文》新附的“薌”字。“鄉”、“向”、“薌”音近相通。

**關鍵詞** 楚竹書 緇衣 替 莠 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緇衣》篇簡 22 有以下文句：

故君子之友也有替，其惡也有方。

其中“替”字作：



前所未見。上述文句郭店《緇衣》和今本《緇衣》分別作：

故君子之友也有咎，其惡有方。（郭店《緇衣》簡 42-43）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今本《禮記·緇衣》）

“咎”字楚簡屢見，本篇作, 別處又作（郭店《魯穆公問子思》簡 3）、（郭店《老子》乙簡

<sup>①</sup>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戰國楚係簡帛用字習慣研究”（09CYY028）的階段性成果。



17)等形,一般讀爲“向”,據田煒先生考證,實爲金文“卿(卿)”字的訛變。<sup>①</sup>“向”、“鄉”同源分化,音近義通,從異文角度看,“替”或音或義應與上述二字相關。

“替”字整理者無說,李零先生疑是“𣎵”字“抄寫錯誤(把‘向’字的上部繁化)”<sup>②</sup>。趙平安先生則認爲看不出“替”“和向、鄉之間形體上有什麼直接聯繫”,他提出另一種解釋:

𣎵很有可能是“香”字的異體。《說文·香部》:“香,芳也。从黍、从甘。”𣎵上部爲林。“香”字漢印每从禾(《漢印證》7.12),華山廟碑从兩禾,古文字中木與禾往往通用(如兩周金文穌、和或从木作),因此林可以理解爲兩禾,𣎵可以理解爲“香”的異寫。《玉篇·艸部》:“薌,穀氣,亦作香。”《儀禮·士虞禮》“香合嘉薦”,《釋文》:“香本又作薌。”是“香”可以讀作鄉。<sup>③</sup>

上博《緇衣》同篇即有讀爲“卿”的“𣎵”字作𣎵,可見“抄寫錯誤”之說不可從。古文字“木”與“禾”、“林”與“秝”確有通用之例,前者如上引趙文所列,後者如甲骨文的“歷”和“曆”,既可从林,也可从秝。<sup>④</sup>但“香”字《說文》小篆明是从黍,變从禾當是隸變造成的省略。<sup>⑤</sup>“林”與“黍”義不近,“木”在“穀物馨香”這一語境下也與“禾”意義不協,而由“黍”變“禾”,由“禾”變“秝”,再由“秝”變“林”,稍嫌迂曲。同時,“香”字《說文》小篆下半从甘,雖然戰國文字本从甘的字如“魯”、“皆”等在《說文》小篆中均从𠂔,趙平安先生也補充說“替”“下部和《汗簡》所引碧落碑香字所从相同”,<sup>⑥</sup>但“甘”旁戰國文字多見,皆作“口”中增筆指事,罕有寫作𠂔形者。<sup>⑦</sup>故釋“替”爲“香”之說似可再討論。

《殷周金文集成》1799 號所收𣎵鼎蓋有一字作:



① 田煒著:《古璽探研》,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06—211 頁。

② 李零著:《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415 頁。

③ 趙平安著:《上博藏〈緇衣〉簡字詁四篇》,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442 頁(同文又載《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3期,2002,8—9 頁,有所增補,詳下)。徐在國、黃德寬先生說同(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年第2期)。

④ 參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335 頁)。

⑤ 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83 頁)。




⑥ 趙平安著:《上博藏〈緇衣〉簡字詁四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3期,2002。此句爲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同文所無。

⑦ 作爲偏旁的“甘”,有些祇是“口”旁增飾筆變來,如上舉的“魯”、“皆”等字,在甲骨文中本皆从口。參劉釗等《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226—227 頁)。“魯”字金文有下从𠂔者,是“魚”旁尾部與“口”旁相交所致(參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載《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168 頁),戰國文字則未見其例。




容庚先生曾隸定爲“𣎵”，何琳儀先生釋爲“𣎵”，可從。<sup>①</sup>











我們認爲，“𣎵”當是“𣎵”的異寫。

“屮”、“艸”與“木”、“林”是義近形符，作爲偏旁在古文字中可通用，如甲骨文的“莫”、“春”等字，既可从諸屮，也可从諸木；<sup>②</sup>“囿”字甲骨文从諸屮<sup>③</sup>，石鼓文《吳人》从諸木；“离”字《說文》小篆从屮，貨幣文則从木或从林<sup>④</sup>。“屮”與“艸”本爲一字。郢王職戈“萃”（《殷周金文集成》11219），下庫少萃戈作“𣎵”，是戰國文字“艸”、“林”互易之例。<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上博《緇衣》篇“木”旁的屮豎常上下斷開分寫，如：

𣎵	木	磨
		
簡 9	簡 10	簡 18

“𣎵”字所从之“林”亦然，按筆劃可分解爲兩部分：

上半即與“艸”旁全同。楚簡“木”旁還有屮豎不下穿的寫法，如上博《魯邦大旱》簡4“木”作，上博《孔子詩論》簡17“菜(采)”作。這類形體常與“屮”旁互作，如“喜”上博《性情論》簡1作，上博《孔子詩論》則作（簡18）或（簡22）；“斲”包山簡或作（簡6），又或作（簡202）；“奈(崇)”包山簡作（簡245）若（簡239），新蔡簡則作（甲三112）<sup>⑥</sup>。雖然我們暫未見到楚簡“艸”旁換作“林”旁的例子，但根據上述情況，“𣎵”所从之“林”訛變自“艸”是完全有可能的。

① 何琳儀著：《薊箕解》，《農業考古》1992年第1期。《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第2冊第111頁隸定爲“𣎵”；《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2冊第1025頁隸定爲“𣎵”，釋爲“𣎵”。

② 參劉釗等《新甲骨文編》（33—35頁）；又劉釗《古文字構形學》（44—45頁）。

③ 參劉釗等《新甲骨文編》（372頁）。

④ 參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89—90頁）。

⑤ 黃德寬著：《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860頁。“萃”指戎車部隊，“少萃”是與主將所率中軍相對的協同軍隊，即所謂“偏師”。新城徒卒戈，“卒”字寫作“𣎵”，亦从林（《文物》2004年第10期，84頁）。

⑥ 參禰健聰《楚簡文字與〈說文〉互證舉例》（王蘊智等主編：《許慎文化研究》，北京：中國文藝出版社，2006，310—311頁）。

前人已經指出，“𠂔”是“簋”的象形初文。<sup>①</sup> 𠂔鼎蓋“𠂔”字所从的“𠂔”作：



下半的乚爲表示簋座的筆劃之變，上半表示簋身部分的𠂔與一般作𠂔者略異，與“替”所从的𠂔則十分相似，𠂔上部中間是一豎一橫，𠂔則連筆分寫作“人”形。戰國文字“𠂔”旁下部表示簋座的筆劃時有省變，除作上述乚形外，有時變作“口”旁，如：



郭店·老子丙 1



郭店·老子甲 20



郭店·語叢三 56



大府蓋(集成 4634)

有時甚或省去，如<sup>②</sup>：



璽彙 0811



璽彙 0812



璽彙 2352



七年宅陽令矛(集成 11546)

齊系文字中有一個過去隸定爲“𠂔”的字，作如下之形：



璽彙 0035



陶彙 3. 672



陶彙 3. 14



陶彙 3. 27

朱德熙先生釋爲“𠂔”，認爲上列諸形左半即“𠂔”旁之省，是一般“𠂔”旁下半先訛作“口”再脫去的結果。<sup>③</sup> 雖然朱文所據的有此字从口不省寫法的陶印(《季木藏陶》33 上著錄)裘錫圭、高明先生皆疑僞<sup>④</sup>，或不可據，但從上列“食”旁簡省之例看，朱德熙先生釋此字爲“𠂔”應該

① 戴家祥著：《釋𠂔》，清華研究院學報《國學叢論》第一卷第4期，1928，轉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二、第三)，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1011—1022頁。

② 參見湯餘惠等《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328—330頁)。

③ 朱德熙著：《戰國文字中所見有關𠂔的資料》，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古文字學論集》，香港中文大學，1983(同文又見《戰國文字資料裏所見的𠂔》，《出土文獻研究》第1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又以前一篇名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157—165頁)。

④ 裘錫圭著：《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高明著：《說“𠂔”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96年第3期。

還是可信的。<sup>①</sup>

既然“𣎵”旁可省去下半的筆劃，而𣎵鼎蓋“𣎵”字所从的“𣎵”旁去掉下半筆劃後的𣎵與上博《緇衣》“替”字所从的𣎵同形，“艸”、“林”作為形旁又可義近互作，故將“𣎵”、“替”視為一字異體當可成立。或疑𣎵、𣎵與“食”、“簋”、“即”、“卿”等字所从的一般“𣎵”旁上半作𣎵者形異，兩種“𣎵”旁何得同時存在？前引“𣎵”本由“卿（卿）”演變，但“𣎵”、“卿”二字在楚簡中形、義皆已分化，與此同理，故知並無可疑。

《說文》解釋“𣎵”字說：“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𣎵，一粒也……又讀若香。”形體分析殊不可據，但“又讀若香”的音注則值得留意。《說文》析“卿”、“鄉”（“卿”字分化）二字，皆以為“𣎵聲”。何琳儀先生解釋說：

“卿”與“鄉”為古今字，本从“卯”从“𣎵”會意（二人於簋旁就食），而“𣎵”也是“鄉”的音符，所謂“會意兼形聲字”。或雖然承認“鄉”是會意字，但是否認“𣎵”是“鄉”的音符，則忽視了會意字往往有“聲化”的趨勢，即“以主動為形，受動為聲”。“𣎵”的名稱用“簋”字表示（“𣎵”从“𣎵”會意），“𣎵”的馨香以“香”音讀之，二者並不矛盾。“𣎵”既然是从“艸”从“𣎵”得聲的形聲字，據《說文》所載古音，自應讀“香”。“𣎵”，字書未見，其實就是“薌”字，見《說文新附》“薌，穀氣也，从艸鄉聲”。<sup>②</sup>

李家浩先生認為：“有很多漢字在充當合體字的組成部分時，既可以用作聲符，也可以用作意符，很不好區分……結果導致一些人把合體的表意字也當成形聲字來看待，把它的一半偏旁作為聲符來讀；即使是形聲字，也誤把它的意符當作聲符來讀。”<sup>③</sup>我們曾討論過《說文》釋為“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的“禾”字，“禾”本是“禾”字異寫，作為“稽”的表意偏旁而存在，但經過變形、附會、聲化，戰國秦漢文字“稽”字所从已由“禾”旁專任，“禾”也因此有了獨立的形、音，可獨立使用。<sup>④</sup>“𣎵”雖然象簋之形，但兩周金文其實是以“𣎵”這個合體字表示“簋”這個詞的，“𣎵”一般不以獨體字出現，後世“𣎵”旁未必同於“簋”音，或因“卿”字而有“香”音。《說文》析字形常有訛誤，但標字音則多有所據。退一步說，即使不從《說文》“𣎵”或音“香”之說，也可將“𣎵”所从的“𣎵”視為“卿（鄉）”的簡省，仍可讀“𣎵”為“薌”。<sup>⑤</sup>

總之，何琳儀先生釋𣎵鼎蓋的“𣎵”為“薌”當可信從。“替”是“𣎵”的簡省訛變，故亦是

① 上博《緇衣》篇簡 24“既”字作𣎵，“𣎵”旁上部橫出一筆，與此類“𣎵”字的寫法類似，而上博《緇衣》篇一般認為具有齊魯一系的文字風格。

② 何琳儀著：《薌簋解》，167 頁。

③ 李家浩著：《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1987 年第 2 期，17 頁。

④ 欄健聰著：《上博竹書釋讀劄記》，載《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 5 輯，成都：巴蜀書社，2010，56—57 頁。

⑤ 何琳儀先生後來亦說“𣎵”“疑薌之省文”，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620 頁）。

“薌”的異體。《說文》訓“香”爲“穀之馨香”，《說文》新附又訓“薌”爲“穀氣”，疑兩形實爲同字，前者爲會意，後者爲形聲。<sup>①</sup>

《緇衣》篇今本作“鄉”，與“薌”自然音近相通，故與“替”亦可相通。而“卿”、“鄉”本是一字分化，“𡇗”又是“卿(卿)”字變體。故“鄉”、“𡇗”、“替”可得爲異文。

如果以上對“替”字的分析不誤，也可印證朱德熙先生對齊系“殷”字的分析可信。

附帶一提，𡇗鼎蓋首字作：



或隸作“𡇗”或“𡇗”，不可信。<sup>②</sup> 何琳儀先生認爲下从“來”，疑爲“嘗”之異體。<sup>③</sup> 但“來”字一般在豎筆最上加一短橫(短橫橫穿豎筆，或在右側與豎筆相接成“乚”形)，未有連豎筆頂部作下垂之形者。按，此字上从“尚”省甚清楚，下當从“年”，參楚簡以下諸形：

年	年	季	季
上博·仲弓 23	郭店·唐虞之道 18	上博·仲弓 2	上博·弟子問 2

上博《仲弓》篇“年”字，其下所从的“人”旁與“禾”連作一筆而上加飾筆，可參郭店《唐虞之道》的“年”字；其上所从之“禾”可參同篇“季”字的寫法。陳劍先生說：“《仲弓》篇的抄手，習慣於將‘禾’旁上方寫得跟‘來’字頭等形相近，左右斜筆旁多出兩垂筆。”<sup>④</sup>與上博《仲弓》篇的這個“年”字相比，𡇗鼎蓋首字所从的𡇗僅是正反朝向不同。金文“年”字反作者不乏其例。<sup>⑤</sup> 故此字可隸定爲“𡇗”。然限於文例，如何釋讀，未敢遽定。

(本文蒙匿名審稿專家審閱并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① “香”字甲骨文本从黍、从口(參劉釗等《新甲骨文編》，422頁)，“口”泛指受物之器，可包括烹飪器具，故字形或是會黍蒸煮而馨香之氣出之意。“𡇗”即簋，爲盛食之器，故“𡇗”也可能表示簋中盛食而香氣上出之義。若如是，則从林之“替”便應視爲是“𡇗”因義近形符非近義置換而產生的訛體。

② 前者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2冊，111頁)，後者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冊，1025頁)。

③ 何琳儀著：《薌簋解》，167頁。

④ 見陳劍《〈上博(三)·仲弓〉賸義》(載《簡帛》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5—88頁)，我們曾經認爲此字是“求”，有誤。

⑤ 參容庚等《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505頁)。

## 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鄔可晶

**內容提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季庚子問於孔子》中各有一個據形當隸定為“逐”之字，通過考察該字在簡文中的用法及其他情況，並吸收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實非追逐之“逐”字，而是“邇”之異體，當析分為从“辵”、“豕”聲。本文還對戰國楚竹書中的其他幾例“逐”字作了討論。

**關鍵詞** 逐 邇 邇

追逐之“逐”寫作从“豕”从“止”（“止”或變為“辵”），最早見於殷墟甲骨文<sup>①</sup>，為西周春秋金文、秦漢文字、《說文》小篆所繼承。<sup>②</sup> 但是，近年陸續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出現了幾例據形當隸定為“逐”的字；從它們在簡文中的用法和其他情況來看，上博楚簡中的“逐”究竟是不是追逐之“逐”字，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收有《容成氏》篇，其中 19 號簡說（釋文中已有確釋的古字，逕以學者們所括注的通行字寫出）：

（禹）乃因邇以知遠，去苛而行簡，因民之欲，會天地之利，夫是以△者悅怡，而遠者

① 劉釗等著：《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95—97 頁。

② 容庚等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103 頁；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116 頁。




自至。<sup>①</sup>

用△代表的字原作如下之形：




因字形有些漫漶不清，學者們對△的釋讀意見不一，但均有可疑。如整理者李零先生釋為“逮(近)”<sup>②</sup>，單育辰先生從之<sup>③</sup>。李承律先生隸定為“遞”，讀為“暱”。<sup>④</sup>

孫飛燕先生指出，《容成氏》49號簡已有“逮”字，作,與△所从有所差別；<sup>⑤</sup>它們不可能是同一個字。退一步講，即使△可釋為“逮”，也祇能讀為“進”而不能讀為“近”；因為“逮”、“近”韻雖近，聲母則一屬精母，一屬群母，相隔較遠。“遞”字雖見於包山簡240、243等號<sup>⑥</sup>，但△所从聲旁與上博楚簡屢見的“弟”字不似<sup>⑦</sup>。釋“逮(近)”、釋“遞”之說恐皆不可信。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所收《季庚子問於孔子》篇19號簡有如下一字(為便省覽，我們把△列在其後，外加括號)：<sup>⑧</sup>



祇要把此字跟△對比一下，便可看出二者應為一字。前者舊釋為“移”，自季旭昇、陳劍先生改釋為“逐”後，已獲公認。<sup>⑨</sup>《容成氏》28號簡“豢”字作,所从“豕”旁(尤其上半部分)與

① 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圖版111頁,釋文考釋264頁),釋文已吸收了學者們的合理見解,為避免繁瑣,不一一出注,下同。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考釋,264—265頁。

③ 單育辰著:《〈容成氏〉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新出楚簡《容成氏》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研究項目,吉林大學“985工程”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項目號:20081203),2008,121頁。

④ 李承律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譯注(上)》,曹峰、李承律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昔者君老〉〈容成氏〉譯注(上)》,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2005(其文未見,轉引自單育辰《〈容成氏〉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120頁)。

⑤ 孫飛燕著:《〈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廖名春),2010,62頁。

⑥ 李守奎著:《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112頁。按,該書注引《玉篇》謂包山簡“遞”同“遞”,從簡文用“遞”為病遲瘥之“遲”來看,此說恐不確。此承陳劍先生指出。

⑦ 參見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84、289、375頁)。

⑧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圖版61頁。

⑨ 季旭昇著:《上博簡芻議(上)》,簡帛網,2006年2月18日;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網,2006年2月19日。

△除去“辵”旁的形體很接近。所以△也應該隸定爲“逐”。《季庚子問於孔子》“逐”字所在辭例如下：

慎小以合大，疏言而密守之。毋欽遠，毋逐。

其文皆兩兩對言。“逐”、“遠”處於對文位置，跟《容成氏》“△者”、“遠者”處於對文位置同例，也可證明釋△爲“逐”是合理的。

我們雖然不贊同各家對《容成氏》△字的具體釋讀意見，但他們都把△讀爲與“遠”義相反的詞，思路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逐”並沒有“近”、“邇”一類的意思；根據“逐”的讀音，也找不到一個跟“遠”反義的詞。施謝捷、周波先生認爲△係“邇(邇)”之稍譌<sup>①</sup>，從字形上看似頗有距離。但是，如果把《容成氏》和《季庚子問於孔子》這兩例“逐”都換成“邇”，文義的確很順。<sup>②</sup> 學者們多已指出，《容成氏》“逐者悅怡，而遠者自至”與《韓非子·難三》“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家語·辨政》同)、《說苑·政理》“政在附近來遠”近似。此句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作“政在來遠附邇”，正以“邇”與“遠”相對，可證《容成氏》的“逐”讀爲“邇”是合適的。

不過，“逐”、“邇”古音相差甚遠，無由相通；它們的字形也不相近，不可能發生譌混。要溝通“逐”、“邇”之間的關係，必須另想辦法。

楊澤生先生對《季庚子問於孔子》的“逐”字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值得重視：

根據上文“疏”與“密”、下文“惡人”與“好人”(引者按：指“惡人勿韞(陷)，好人勿貴”)等相對爲文，此處之“逐”當用作“邇”。大徐本《說文·犬部》：“𤝵，秋田也。從犬，𤝵聲。𤝵，獵或從豕，宗廟之田也，故從豕、示。”此爲從“爾”與從“豕”相通之例。<sup>③</sup>

① 周波著：《讀〈容成氏〉、〈君子爲禮〉劄記(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331頁，注2(施謝捷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楚簡釋文》，未刊稿，見周文引)。

② 《季庚子問於孔子》的這兩句話很不好懂，這裏姑且提出一種解釋，以備參考。“逐”上一字原作𤝵，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釋爲“詣”(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釋文考釋228、230頁)。許愍慧先生曾引包山簡“詣”字作𤝵(156號簡)，以證成其說(《〈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季旭昇)，2008，123頁)。按，包山簡“詣”所从“旨”，“匕”的下部尚有飾筆，《上博(一)·緇衣》17號簡“旨”所从“匕”未加飾筆，似與《季庚子問於孔子》的“詣”更合。如此字確是“詣”，則楊澤生先生讀爲指斥之“指”的說法較爲可取(《〈上博五〉零釋十二則》，簡帛網，2006年3月20日。參見上引許愍慧文，123—124頁)。季旭昇先生讀“欽”爲“飲”，解釋爲羨慕(《上博簡芻議(上)》，簡帛網，2006年2月18日)，大體可從。《上博(六)·天子建州》甲本8號簡“天子飲氣”之“飲”即寫作“欽”。唯此“飲”與其講成羨慕，不如講成貪求更爲貼切(《國語·楚語上》“楚必飲之”韋昭注：“飲，貪也。”)。這兩句話大概是說，“不要貪求遠的，不要指斥近的”。下文將會提到《國語·晉語四》有“驥邇逐遠”之語(“逐”訓“求”)，“驥邇”似與“指邇”反義，“逐遠”則與“飲遠”義近。《管子·侈靡》說“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大戴禮記·曾子疾病》說“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孔子家語·六本》作“比近不安，無務求遠”)，皆可與“毋飲遠，毋指邇”相參看。

③ 楊澤生著：《〈上博五〉零釋十二則》，簡帛網，2006年3月20日。

楊先生顯然是把這個“逐”看作从“辵”、“豕”聲的，所以纔可“用作‘邇’”。我認爲，《容成氏》“逐者悅怡，而遠者自至”的“逐”也可以據此讀爲“邇”。

過去有學者曾釋上引《容成氏》“因遲以知遠”的“遲”爲“迕(邇)”，蘇建洲、李承律、周波等先生指出其聲旁與“尔”形不近，李、周二先生進而改釋爲“迟”，後者并有詳細考釋。<sup>①</sup>說皆可信。除了上引“逐”之外，《季庚子問於孔子》一篇也沒有使用過“邇”這個詞。所以，把此二例“逐”釋讀爲“邇”，跟這兩篇竹書本身的用字習慣沒有衝突。

楊澤生先生所舉“豕”聲與“爾”聲相通的音韻方面的證據，有必要加以補充。張富海先生近年撰文指出，根據中古音韻地位和古文字的諧聲通用關係，“豕”的上古韻部應歸入歌部。<sup>②</sup>其說可信。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稍加說明。張先生之所以主張把“豕”歸爲歌部，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是“戰國文字中，‘地’或以‘豕’爲聲旁，見於行氣玉銘、侯馬盟書、中山王圓壺等（何琳儀 1998:1223）<sup>③</sup>，郭店簡《忠信之道》4、5 號簡中兩個‘地’字也是从‘豕’聲。戰國三晉璽印文字中有从阜从豕从它的字，‘豕’、‘它’皆聲，是兩聲字，可能就是‘地’字的異體（參何琳儀 1998:1224）”。<sup>④</sup>而上古音“地”歸於歌部，這是現在大家公認的。《說文·十三下·土部》“地”字籀文作“墜”，“墜”字實已見於西周晚期的銅器銘文上。<sup>⑤</sup>根據不少學者所舉“豕”、“豕”混用的現象（詳下文），六國文字从“豕”的“地”字異體中，“豕”會不會就是“豕”之省呢？

從中古音韻地位看，“豕”是合口一等字，“地”是開口三等字，上古韻部雖爲陰陽對轉，但開合口等呼却頗有出入。上古漢語諧聲偏旁中“開合兩呼的界限頗嚴”，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三部的“開合兩呼至少在非唇音部分有嚴格的界限”。<sup>⑥</sup>可能到了戰國時代，“豕”、“地”由於開合口等呼的差異，在當時人看來，前者作爲後者的聲旁已與實際語音不太密合，於是換用了一個與“豕”形近的、同屬開口三等字的“豕”，作爲“地”字異體的聲旁（楚文字多用从“阜”从“土”、“它”聲之字爲“地”，包山簡 149 號、清華簡《繫年》16 號有寫作“坵”的“地”，“它”是開口一等字——但从“它”聲的“施”、“池”等都是開口三等字——，也比“豕”更接近於“地”的實際語音）。本从“豕”聲的“蠡”，有異體作“蠡”，張富海先生指出

① 蘇建洲著：《上博楚竹書〈容成氏〉、〈昔者君老〉考釋四則》，簡帛研究網，2003 年 1 月 15 日；李承律說轉引自單育辰：《〈容成氏〉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120 頁；周波著：《讀〈容成氏〉、〈君子爲禮〉劉記（二則）》，331—337 頁。

② 張富海著：《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漢字文化》2007 年第 2 期。

③ 引者按，指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1223 頁），下同。

④ 張富海著：《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

⑤ 張政烺著：《周厲王胡簋釋文》，《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248 頁。

⑥ 程少軒著：《試說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韻現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41—160 頁。

“豕”也是聲旁。<sup>①</sup>“蠡”跟“地”一樣都是開口三等字，它們都曾用“豕”替代“豕”標注讀音，恐怕不是偶然的。總之，戰國文字“墜(地)”或从“豕”聲，可以從音韻學上得到合理的解釋，不必看作“豕”之省譌。

古文字中遠邇之“邇”常用“執”或从“執”聲之字表示，“執”屬於歌部的入聲韻，所以趙彤先生有“邇”當歸歌部入聲月部之說。<sup>②</sup>“豕”是書母字，“邇”是日母字，發音部位相同。从“豕”聲的“𪔐”（“𪔐”的聲旁）是日母字；从“爾”聲的从“鳥”和从“黽”之字都是書母字。<sup>③</sup>假借為“邇”的“執”或从“執”聲之字，還可以讀為“勢”和“設”<sup>④</sup>，“勢”、“設”也都是書母字。所以從音理上說，“豕”、“邇”聲母相近，韻部陰入對轉，可以相通。

後有从“豕”聲的異體的“墜”字，已見於西周晚期的猷簋；<sup>⑤</sup>在西周早期的保員簋和晚期的縣改簋中又有“隊”字<sup>⑥</sup>。銘文“墜”、“隊”當從張政烺先生說讀為“施”<sup>⑦</sup>。《詩·邶風·新臺》“得此戚施”，《說文·十三下·黽部》“𪔐”字條下引作“得此𪔐𪔐”，“施”、“𪔐”通用，“𪔐”即从“爾”聲。上引楊澤生先生文中所舉“𪔐”、“𪔐”二字，見於《說文·十上·犬部》。訓“秋田也”的“𪔐”字異體“𪔐”，《說文》分析為从“豕”从“示”會意。朱駿聲早就指出，從《說文》訓為“宗廟之田也”來看，“𪔐”當是从“示”、“豕”聲之字。<sup>⑧</sup>“𪔐”的聲符“𪔐”即从“爾”得聲。齊璽“𪔐關”（《古璽彙編》0172）的“𪔐”為“𪔐”之異體，李家浩先生指出當讀為《詩·邶風·泉水》“飲餞于𪔐”之“𪔐”。<sup>⑨</sup>易“犬”為“豕”，也許就有使之兼起表音的作用。這些都是“豕”聲與“爾”聲相通的證據。

“逐”是追逐之“逐”的本字，要確定“逐”能否用為“邇”，還應該考察一下“逐”這個詞在

① 張富海著：《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

② 趙彤：《釋“邇”》，簡帛研究網，2004年2月6日。

③ 參見裘錫圭《雙公盃銘文考釋》（收入所著《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61頁）。

④ 裘錫圭著：《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執”（邇）及有關諸字》，收入所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7、9頁，注14、15；裘錫圭著：《古文獻中讀為“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譌之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東方文化》1998年（實際出版年份為2002年）36卷1、2號合刊，39—45頁；裘錫圭：《再談古文獻以“執”表“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編，何志華、沈培等編：《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13頁。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2688—2689頁04317號。

⑥ 劉雨、盧岩著：《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368頁484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4冊，2600頁，04269號。

⑦ 見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248頁）。保員簋是上世紀90年代公布的，張先生的文章自然無法論及。保員簋此字讀為“施”係從馬承源先生說（見《新獲西周青銅器研究二則》，《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9頁），但馬先生不認為西周金文這些字是“墜”，而釋為“墜”、“隊”，則不確（參見陳劍《金文“豕”字考釋》，收入所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07，250—251頁）。

⑧ [清]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古籍書店，1983，615頁。

⑨ 李家浩著：《南越王墓車駟虎節銘文考釋——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四》，《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670頁。

楚文字中的用字情況。

楚文字中目前可以肯定的表示追逐及其引申義的“逐”，絕大多數都不寫作“逐”。今本《周易》的“良馬逐”、“亡馬勿逐”等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所收《周易》作“良馬由”（22 號簡），“亡馬勿由”（32 號簡），“由”、“逐”音近可通。此外，25 號簡“其欲攸攸”的“攸攸”，今本作“逐逐”。<sup>①</sup>《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所收《彭祖》8 號簡“毋以富”的“以”字<sup>②</sup>，陳斯鵬先生認為從“由”得聲，當讀為“逐”。<sup>③</sup>其說若確，則此“逐”亦不以“逐”字為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所收《競建內之》10 號簡“驅逐畋弋，無期度”的“逐”寫作“达”。<sup>④</sup>“达”又見於齊器陳曼珣<sup>⑤</sup>，在上博竹書尚未公布之前，吳振武先生已經根據《汗簡》“逐”作“达”，論定陳曼珣“达”字當從高田忠周說釋為“逐”。<sup>⑥</sup>楚璽也有“达”字，用作人名“追（此字原作从‘豕’聲）逐”之“逐”，見於《古璽彙編》0263，亦為吳先生所釋出。<sup>⑦</sup>《上博（三）·周易》43 號簡“曰达悔有悔”的“达”<sup>⑧</sup>，今本《周易》作“動”，“動”、“逐”雙聲，韻為陽入對轉，此“达”無疑也是“逐”。後來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所收《繫年》中，6 號簡、122 號簡各有一個“达”字，從文義看皆用為“逐”，整理者已正確釋出。<sup>⑨</sup>由此可見，在楚文字和齊文字（傳抄古文大概屬於齊魯文字）中，追逐之“逐”以“达”為其本字。

在這裏還想對“达”字的來源作些推測。吳振武先生認為“在戰國文字資料中，屢見‘豕’、‘犬’二旁互替之例”，所以“达”可視為“逐”之異體。<sup>⑩</sup>這似乎有點把問題簡單化了。黃錫全先生在為《汗簡》“达”字作注時，引甲骨金文“逐”字或從“犬”，大概認為戰國文字“达”的字形即來源於此。<sup>⑪</sup>黃先生所引早期古文字中從“犬”的“逐”有《甲》3339 和逐簋兩例。《甲》3339 即《甲骨文合集》10299 正，從《合集》拓片看，“逐”字所從獸形的尾巴的確向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圖版 34、44、37 頁，釋文考釋 167—168、180、171 頁。按“其欲逐逐”的“逐逐”之義，說頗紛紜，但大概不會用為追逐之“逐”。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圖版 128 頁。

③ 陳斯鵬著：《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90 頁。

④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圖版 27 頁，釋文考釋 176 頁。整理者釋讀此句多誤，釋文從學者們的正確意見改。“达”，整理者已作此隸定，但誤以為是從“犬”聲之字。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4 冊，2963、2964 頁 04595、04596 號。

⑥ 吳振武著：《陳曼珣“逐”字新證》，《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46—47 頁。

⑦ 吳振武著：《陳曼珣“逐”字新證》，《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47 頁。

⑧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圖版 55 頁，釋文考釋 195 頁。

⑨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釋文注釋 138、192 頁。

⑩ 吳振武著：《陳曼珣“逐”字新證》，《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47 頁。

⑪ 黃錫全著：《汗簡注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341 頁。

右衝出，但這衝出的一畫與其下垂的尾巴的筆畫似非一筆寫成，也有可能并非筆畫而是泐痕。此例宜存疑。逐簋爲西周早期器，<sup>①</sup>其銘文上的“逐”字，所从獸形的尾巴明顯上翹，確當釋“达”。可見至遲在西周早期已有从“辵”从“犬”的“达”字了（殷墟甲骨文之例另詳下）。从“止”（或變爲“辵”）从“豕”的“逐”，字形所表示的是追逐野豬（豕）之意；但“犬”顯然不是田獵追逐的對象，“达”的字形如何表“逐”意呢？

《合集》20715 卜骨上有一从“兔”从“犬”之字，裘錫圭先生釋爲“逐”，并說此字“原來也應該可以用來表示‘犬逐兔’或‘以犬逐兔’一類意思的”。<sup>②</sup>何組田獵卜辭裏屢見“卒犬亡災”之語。裘錫圭先生指出，跟黃組卜辭常見的“卒逐亡災”之語對照起來看，此“犬”字當從李學勤先生說釋讀爲“逐”（但李先生釋此字爲“豕”，視爲“逐”之省），“犬能逐獸，何組卜辭會不會竟是用‘犬’字來表‘逐’的呢？”<sup>③</sup>結合裘先生所釋《合集》20715“以犬逐兔”的“逐”字來看，何組卜辭以“犬”爲“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sup>④</sup>“獸”字本作从“單”从“犬”之形，“單”、“犬”都是狩獵的工具（或獵人的助手），以此會“狩獵”之意；“禽”本象捕鳥獸用的網，以此表擒獲之意（“禽”爲“擒”之本字）。<sup>⑤</sup>何組卜辭以狩獵工具或獵人助手“犬”表逐獸之“逐”，構思正與此同。“达”這種字形說不定就是由“犬（逐）”增从“辵”旁而成的，其表意方式與象人追逐野豬的“逐”有別。

不過，何組卜辭并非沒有“逐”字（但都不出現在“卒逐亡災”辭例之中），而且所从獸形有的更近於“犬”（歷組卜辭中也有這樣寫法的“逐”）。<sup>⑥</sup>我們知道，在有些類組的卜辭裏，“犬”、“豕”二字往往不易區分。所以，那種所从獸形近於“犬”的“逐”，究竟應該看作“达”字，還是應該看作“豕”、“犬”形近而混的“逐”字，尚有待研究。如前說可信，則“卒犬（逐）亡災”的“犬（逐）”似也有可能是“达”之形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所收《凡物流形》甲本 7 號簡有字（乙本 6 號簡作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3 冊，1700 頁 02972 號。

② 裘錫圭著：《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韓國淑明女子大學中國學研究所《中國學研究》第 10 輯，1996；又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 年 1 月 28 日。

③ 裘錫圭著：《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肆”》，《中原文物》1990 年第 3 期。

④ 《合集》27146 中以“甲申卜”開頭的那條卜辭，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328 頁）釋作“甲申卜，貞：王田逐麋”，釋“逐”之字摹作“豕”（北京：中華書局，1989）。按，《合集》所收拓片此辭模糊不清，但確無“止”形，而所謂“豕”的尾巴不可見，故也可能當釋“犬”。卜辭屢見“逐麋”之語（參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328 頁“逐麋”條），此字若真是“犬”，則可作爲何組卜辭以“犬”爲“逐”的一個例證。

⑤ 參見裘錫圭《談談〈同源字典〉》（收入所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194—195 頁）。

⑥ 劉釗等著：《新甲骨文編》，96—97 頁。（按，此書所收从尾巴上翹的似“犬”形的“逐”字，有個別恐不可靠。如《屯南》663 一例，從拓片看應从“豕”，被誤當作上翹的尾巴的一筆當是泐痕。）



𡗗), 8 號簡有𡗗字(乙本 7 號簡作𡗗), 整理者曹錦炎先生皆釋爲“𡗗(升)”。<sup>①</sup> (以下用“~”代替)有學者認爲“~”除去“𡗗”的部分, 與天星觀簡“豕”、“豬”、“豢”等字所从“豕”的寫法一致(《楚文字編》546、564 頁), 故當改釋爲“逐”。<sup>②</sup> 此說似可商。

甲本 7 號簡的辭例爲“𡗗祭員奚~”, 文義不明。甲本 8—9 號簡的辭例爲“~高從卑, 至遠從邇(邇)”。主張釋“~”爲“逐”的學者, 認爲“逐高從卑”的“逐”當訓“求”, 引《國語·晉語四》“𡗗邇逐遠”爲例。蔣文先生指出, “𡗗邇逐遠”的“逐”“是對於橫向平面的‘邇’、‘遠’而言, 與縱向的‘高’、‘卑’略有不同”, 已點出了“逐高”說的不當之處。<sup>③</sup>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堯遭洪水, 人民氾濫, 遂高而居。”徐天祐注: “遂疑當作逐。”此“逐高而居”的“逐”是“依隨”的意思, 跟古書中常見的“逐水草遷徙”、“逐草隨畜”的“逐”同例, 也不能證明“逐高從卑”的講法可通。若從整理者釋“~”爲“𡗗(升)”, “升”、“登”音義皆近, 在自古至今的漢語中, “登高”的說法則相當普遍; 李銳先生最先舉出的《禮記·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 辟如登高必自卑”之語, 正可與簡文“登高從卑, 至遠從邇”相印證。<sup>④</sup>

從字形上說, 釋“~”所从聲旁(即除去“𡗗”旁的形體)爲“升”, 也并非沒有道理。“~”聲旁的上部作“乂”形, 確與天星觀簡“豕”、“豬”、“豢”等字所从“豕”的上部一致, 但其下部與天星觀簡諸字所从的“豕”有別, 而與“升”完全同形。“陞”字在《容成氏》中寫作𡗗、𡗗、𡗗(31、39 號簡。或釋楚簡“陞”的聲旁爲“𡗗”, 不確), 所从“升”的上部爲“✓”, “~”聲旁上部的“乂”或即由此類筆畫分解、穿插而成。楚簡“此”字或作𠄎(《上博(四)·曹沫之陣》10 號簡)、𠄎(《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13 號簡)等形, 在《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中, “此”則被寫成𠄎(27 號簡)、𠄎(13 號簡); “莪”字在《上博(五)·三德》中寫作𠄎(3 號簡), 在包山簡中或寫作𠄎(12 號簡)。這些都是“✓”形、“乂”形互作的例子。上博簡《周易》33 號簡“陞”作𡗗、48 號簡作𡗗, “升”的下部與“~”所从幾乎全同, 上部的“✓”却被分解爲兩斜筆書寫, 可與“~”的情況類比。

總之, 從文義和字形兩方面來看, 《凡物流形》此字以釋“𡗗(升)”爲妥, 其中一例可以肯定應讀爲“登”(《上博(五)·三德》11—12 號簡“登丘毋歌”的“登”作“陞”; 包山簡屢見“陞門有敗”之語, 一般認爲“陞門”當讀“登聞”, 是其比); 它們既不是“逐”這個字, 也不表示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圖版 84、116、85、117 頁, 釋文考釋 236—237、238、239 頁。

② 見郭永秉先生在《〈上博(七)·凡物流形〉重編釋文》一文下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2009 年 1 月 2 日)。蘇建洲著:《〈上博七·凡物流形〉“一”、“逐”二字小考》,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2009 年 1 月 2 日。

③ 蔣文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凡物流形〉集釋》, 復旦大學本科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陳劍), 2009, 50 頁。

④ 李銳著:《〈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 簡帛研究網, 2008 年 12 月 31 日。

“逐”這個詞。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從政(甲)》篇的3號簡,有一個應隸定為“逐”之字,但在簡文中肯定不用為追逐之“逐”;上面提到的清華簡《繫年》裏,也有一個被整理者釋為“逐”的字,見於93號簡。關於這兩例“逐”,下文將加以討論。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在數量不算太少的楚文字資料中,表示追逐及其引申義的“逐”這個詞時,通常不用“逐”字,而“逐”這個字也少見用來表示追逐之“逐”的;這對於把《容成氏》、《季庚子問於孔子》中的“逐”分析為从“辵”、“豕”聲,而不認為是追逐之“逐”字的想法是有利的。古文字中的“蚤”,在殷墟甲骨文和秦漢文字中是从“虫”、从“又”的會意字,即“搔”之初文;<sup>①</sup>在戰國楚文字中則是从“虫”、“又”聲的形聲字,讀為“郵”、“尤”等,情況跟這裏所說的“逐”字極為相似。<sup>②</sup>

楚文字中既有從甲骨金文傳承下來的以“𡗗(執)”表“邇”,也有就以“迕”、“邇”表“邇”的,這些字在表示“邇”這個詞時占了很大的比例。結合楚文字中“逐”字較為少見(目前所見僅上舉四例)的現象,頗疑這個从“辵”、“豕”聲的“逐”其實就是遠邇之“邇”的異體。

戰國時代的楚人,似乎很喜歡把本是表意字的字認作或改造成形聲字。所以楚文字中的“逐”、“蚤”,有可能是楚人把已有的會意結構的“逐”、“蚤”誤分析為形聲結構,從而變成了“邇”字異體和从“虫”、“又”聲之字,并非新造之字而與已有的表意字偶然同形。

總之,按照楊澤生先生和我們對楚簡“逐”字結構的分析,它無疑可以在《容成氏》19號簡和《季庚子問於孔子》19號簡中用為“邇”。這一解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事實,需要將來發現更多的材料加以檢驗。

下面討論戰國楚竹書中另二例“逐”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從政(甲)》篇的3號簡有如下一句話(“禮”前數字已缺,此據文義補):

[教之以]禮則顧而為仁,教之以刑則逐。<sup>③</sup>

整理者原誤釋“逐”為“述”<sup>④</sup>,此從陳偉、徐在國、李守奎等先生改釋<sup>⑤</sup>。李守奎先生認為

① 裘錫圭著:《殷墟甲骨文字考釋(七篇)·釋“蚤”》,《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

② 讀為“郵”(見郭店簡《尊德義》28號簡,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57頁,釋文注釋175頁)。“裘按”,讀為“尤”(見上博簡《景公瘞》10號簡,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圖版27頁,釋文考釋185頁)。

③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圖版61頁。

④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考釋217頁。

⑤ 陳偉著:《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從政〉校讀》,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10日;徐在國著:《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14日;李守奎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釋讀一則》,《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91—95頁。



“逐”、“遯”音近可通；<sup>①</sup>李家浩、范常喜等先生認為，此“逐”當係“遂”之形省，“遂”即“古遯字”（《漢書·敘傳》顏師古注）。<sup>②</sup>

《從政》的“逐”當釋讀為“遯”，在文義方面，已有各家所舉《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記·緇衣》“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以及《從政》同篇8號簡“罰則民逃”等語可與簡文相對照（《緇衣》“民有遯心”之“遯”，舊注解釋為“苟逃刑罰而已”。<sup>③</sup>《從政》的“遯”亦應從此解），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在解釋“逐”何以能用為“遯”的問題上，却頗費斟酌。

各家論證《從政》的“逐”為“遂”之形省，主要根據的是“豕”、“豕”存在混用的現象。但在大家所舉出來的“豕”（“豕”有時也寫作“豕”，為圖簡便，本文以“豕”形代替）、“豕”相混之例中，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真正靠得住的似乎祇有“豕”寫作“豕”的例子[如孔龢碑、馬王堆三號墓竹簡和木牌、孔家坡漢簡《日書》以“豕”為“豕”，馬王堆帛書“剝（剝）”寫作“剝”，孔宙碑、居延漢簡“家”所从“豕”作“豕”等，此外尚有字典韻書中“豚”或作“豚”、“遯”或作“遯”]<sup>④</sup>；“豕”寫作“豕”之例恐怕都很可疑，如六國文字“墜”或从“豕”聲的問題，上文已加說明（至於古書中“逐”或用為“豚”，其原因詳下文）。秦陶文（《古陶文彙編》9.7）和漢印（《漢印文字徵》2.15）中各有一個“遂”字，表面上看似即各家認為的《從政》“逐”之所從出者，仔細考察却未必可靠。施謝捷先生指出，由於“秦漢文字中作為偏旁的‘豕’往往混同於‘豕’”，而古有“遂”氏，故漢印中用作姓氏的“遂”，很可能是“‘遂’字異構”。<sup>⑤</sup>據此，見於秦陶文的人名之字“遂”，大概也應是“遂”字。我們不敢保證戰國文字中一定沒有“遂”字、一定不存在“豕”省作“豕”的可能性，但如果把上面所說的兩點情況結合起來考慮，這種可能性當然就非常小了。

由於“豕”常繁化為“豕”，所以在漢印（《漢印文字徵》2.14）和漢碑（《隸辨》上聲混韻“遯”字條引《巴郡太守都亭侯張納功德敘》）中，有的“遯”字就寫作“遯”；陳劍先生指出，“遂”即由“遯”省“肉”而成。<sup>⑥</sup>此說可信。所以，古書中所謂“古遯字”“遂”其來源不古，似不宜作為考釋《從政》“逐（遯）”字的依據。

① 李守奎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釋讀一則》，《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91—95頁。

② 李家浩說見李守奎文引（范常喜著：《上博（二）〈從政（甲）〉簡三補說》，《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227—230頁）。

③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1323頁。

④ 有關例子詳參陳劍《金文“豕”字考釋》，收入所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68—270頁）。

⑤ 施謝捷著：《〈漢印文字徵〉及其〈補遺〉校讀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311頁。

⑥ 陳劍著：《金文“豕”字考釋》，收入所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68頁。

但是,由“遯”變來的“遂”也可視作从“辵”、“豕”聲之字,“豕”作為“遯”的聲符却可以在出土文字資料中得到支持。《周易》“遯卦”之“遯”,馬王堆帛書本寫作“掾”。<sup>①</sup> 阜陽漢簡本寫作“椽”(見164號簡。160號簡僅存“豕”旁的部分筆畫)。<sup>②</sup> “豕”、“豚”音近,古書中“循”與“緣”通,“腠”與“豚”通,“遯”、“遁”古通或為一字異體。<sup>③</sup>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所收《周易》的30、31號簡上,遯卦之“遯”皆寫作“豚”(原作上下結構)。<sup>④</sup> “豕”、“豚”聲母相近(从“豕”聲的“隊”與“遯”聲母相同),韻部陽入對轉,中古皆為合口字。楚簡“豚”變為“豚”,大概屬於把表意字的一部分改成形近之字以起表音的作用。字典韻書中“豚”或作“豚”、“遯”或作“遯”,可能也兼有使“豕”表音的意圖,與“豚(豚)”字同例。為“遯”所通的“掾”、“椽”,與其分析為从“豚”省聲、“豕”又變為“豕”,似不如就看作“豕”聲字與“遯”相通直接。

上文說過,从“豕”聲的“墜”在六國文字中換用“豕”為聲符,“豕”、“豕”的古音當不遠。既知从“豕”聲之字或用為“遯”,《從政(甲)》3號簡的這個“逐”,就可以采用上文對楚文字用作“邇”的“逐”字的分析,視為从“辵”、“豕”聲,而讀為“遯”。

如果楚文字中確有“遯”字,比照上文所舉“遯”省作“遂”之例,《從政》的“逐”似乎也可能是“遯”之形省。

陳劍先生告訴我,就文義來說,《從政》“教之以刑則逐”的“逐”有可能表示的是另一個與“豕”、“邇”音近之詞,其義或近於“偷”,而未必讀為“遯”。真相究竟如何,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清華簡《繫年》93號簡有一個整理者釋為“逐”之字,其文如下:

齊莊公光率師以逐樂盈,樂盈襲(原作从“宀”、“嘉”聲)絳而不果,奔入於曲沃。

整理者注“逐”為“跟從”,并引《史記·晉世家》相關之文作“齊莊公微遣樂逞於曲沃,以兵隨之”。<sup>⑤</sup>

此“逐”字作如下之形:



① 陳松長等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89頁。此字在馬王堆1、3號墓所出遺策中又用作“緣”。

② 韓自強著:《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頁。

③ 高亨、董治安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132頁。

④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圖版42—43頁。

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釋文注釋178頁。

魏宜輝先生認為所从聲旁當是“彖”而非“豕”，此字既从“彖”聲，便可讀為“隨”（引陳劍先生說金文“彖”多讀“惰”為證），與《史記·晉世家》“以兵隨之”之“隨”相合。<sup>①</sup>

蘇建洲先生在魏文下面的評論裏，已舉出楚文字“豕”旁與《繫年》此字聲旁相合之例；<sup>②</sup>而六國文字中還沒發現明確的“彖”字<sup>③</sup>，所以從字形來看，此字祇能從整理者釋為“逐”。上文已指出，《從政》的“逐”視為“遂”形之省在文字學上恐有困難，《繫年》的這個“逐”大概也不可能是“遂”之省譌。而且，楚文字中的“隨”以“墮”之初文“隆”或其省體為之，从“隋”之字亦多以此為聲旁。<sup>④</sup>說“遂”假借為“隨”，還會碰到用字習慣方面的障礙。

訓為“從”、“隨”的“逐”，一般具有“跟隨進而趕上”的意味，但古書中也有僅僅講跟隨、跟從而用“逐”的。蘇建洲、孟蓬生等先生曾引《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司馬貞《索隱》“逐，謂隨逐也”、《楚辭·九歌·河伯》“乘白鼃兮逐文魚”王逸注“逐，從也”等例為證，孟先生還指出“逐”、“從”是一對音義皆近的同源詞，“從”也既有追逐義，又有追隨、跟從義。<sup>⑤</sup>按《九歌·河伯》言河伯出行“乘白鼃兮逐文魚”，與《九歌·山鬼》言山鬼“乘赤豹兮從文狸”文例相同，一用“逐”、一用“從”，可為“逐”、“從”音義皆近的明證。《史記·晉世家》記齊莊公率兵逐從樂盈事用“隨”字，當係義近換用。所以，整理者釋此字為“跟從”義的“逐”，字形既合，放在《繫年》原文裏也文從字順，似不必另求他解。

《繫年》中有追逐之“逐”字，可作如下三種可能的解釋：1. “逐”為追逐之“逐”字，是自殷商以來固有的用字傳統，在戰國楚竹書中偶存這一用法，並不奇怪。2. 清華簡《繫年》所從出的底本也許有較古的來源，抄手在轉寫為楚文字時改之未盡，偶爾保留了一個“逐”字（同篇6、122號簡的兩個“逐”已改為楚文字習用的“逌”）。3. 《程訓義古璽印集存》1—138收有一方三晉人名璽“鄧逐”，“逐”字从“豕”。<sup>⑥</sup>燕璽有人名印“長逐”（《古璽彙編》0850）、漢有人名印“臣逐”（《漢印文字徵》2.14），《古璽彙編》5592所收三晉人名璽“長生逐”。<sup>⑦</sup>“逐”實寫作“逌”<sup>⑧</sup>，可知古人喜以“逐”取名。看來，晉系的“逐”當是追逐之“逐”而非从“辵”、“豕”聲之字，且三晉文字有可能“逐”、“逌”并用。《繫年》此章說的是晉國的事，其底本來自於三晉的可能性也無法排除。93號簡用“逐”字，或許與三晉文字的底本用字有關。

如果上述第一種解釋符合事實，即楚文字以“逐”為“邇”之異體的同時，也沿用為追逐

① 魏宜輝著：《釋清華簡〈繫年〉簡93之“遂”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年12月22日。

② 見海天（蘇建洲網名）在上舉魏宜輝文下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2年12月22日）。

③ 參見陳劍《金文“彖”字考釋》（收入所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63—264頁）。

④ 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415、824頁）；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626—627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字形表》，264頁。

⑤ 孟說見魏文下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2年12月22日）。

⑥ 湯志彪著：《三晉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馮勝君），2009，93頁。

⑦ 參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216頁）。

⑧ 此承郭永秉先生指出。

之“逐”，那末，李守奎先生所說《從政（甲）》3號簡之字就是追逐之“逐”，以音近讀為“遯”的可能性，似亦難以完全否定。“逐”、“遯”皆屬定母，聲母相同；韻部一屬覺部，一屬文部。上古漢語存在“幽微通轉”的現象，這一點經過音韻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反復論證，已為大家所熟知。<sup>①</sup> 覺部為幽部的入聲，文部為微部的陽聲，所以它們也可以相通。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66—67行有“言者以臣□賤而遯於王矣”之語。郭永秉先生在重新整理此篇時發現，“遯”實為“遯”之誤釋；從文義看，“‘遯’字似當是‘逐’的誤字，意思是為王所弃逐”。<sup>②</sup> 帛書“遯”也未嘗不可以看作“逐”的音近誤字。

最後談一下古書“逐”用為“遯”之事。各家在論證《從政》的“逐”釋讀為“遯”時，皆提到了《山海經·中山東經》“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的“逐”用為“豚”，當視為“遯”字之省。前面說過“豕”省作“豕”缺乏確鑿的例證，此用為“豚”之“逐”的來歷，可以另有解釋，無須牽扯上“遯”。清人畢沅說此“豚”“借‘遯’字為之，‘逐’又‘遯’省文”，郝懿行也有類似看法。<sup>③</sup> 這顯然是很合理的。

我們在《莊子》一書中也發現了一個以“逐”為“遯”的例子，附述於此。《莊子·天運》：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這是黃帝描述所張“咸池之樂”的一段話，實以“樂”喻“道”。

“故若混逐叢生”一句，郭象注：“混然無繫，隨叢而生。”成玄英疏：“混，同也。生，出也。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按照郭、成訓“逐”為“隨”的說法，此句似當讀作“故若混，逐叢生”，而不當“混逐”連讀，但“故若混”殊嫌不辭。吳汝綸提出“故若混”為句、“逐叢生林”為句之說，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贊同。<sup>④</sup> 王叔岷先生指出此句仍以讀作“故若混逐叢生”為長，並說“‘混逐’與‘叢生’義近，即象五音繁會也”。<sup>⑤</sup>

《天運》此段有韻，“聲”、“命”、“形”、“生”、“聲”為耕部字，皆在韻脚。且“林樂而無形”與“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對文。若按吳汝綸等人以“故若混”為句、“逐叢生林”為句則失韻，此說絕不可信。上引各家關於“混”或“混逐”的解釋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即無論“混然無繫”，還是“象五音繁會”，都是直接描寫“咸池之樂”本身的狀態的，其前的“若”字似嫌多餘。

① 有關情況可參見李家浩《楚簡所記楚人祖先“毓（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兼說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文史》2010年3輯，5—44頁），以及劉釗《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2輯，中西書局，2011，177頁）。

② 郭永秉著：《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整理瑣記（三題）》，《文史》2012年第2輯，25頁。

③ 袁珂著：《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172—173頁。

④ 王叔岷著：《莊子校註》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517頁。

⑤ 王叔岷著：《莊子校註》上冊，517頁。

從文義看,“叢生”應是描寫“咸池之樂”亦即“道”的形態的,“若”字管“混逐”,用來比喻樂之叢聚而生。馬敘倫曾懷疑“逐”爲“遯”之形省,“混遯”即“混沌”。<sup>①</sup>這本是十分精闢的見解,可惜馬氏沒有對此展開論證,其說並未得到大家的重視。現在我們參照上引《山海經》的例子,對於“混逐”之“逐”係“遯”之省譌這一點,已完全可以接受。《天運》下文云:“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蘇輿說:“以混沌爲道,故由怠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此章注重在此。”已經指明此段係圍繞“混沌而愚”的“道”的形態加以鋪陳的用意。《莊子·應帝王》“中央之帝爲渾沌”句下簡文帝注云:“渾沌以合和爲貌。”《莊子》屢以“渾沌”喻“道”、以“渾沌”爲至道;古書又多以“渾沌(混沌)”爲“太一”的特性(看《淮南子·詮言》、同書《要略》、《鶡冠子·泰鴻》等,道家所說的“太一”大體相當於“道”),而音樂實“本於太一”(《呂氏春秋·大樂》:“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故此處以合和之渾沌比喻咸池之樂(即“道”)自然聚生,文義上也是合適的。

(附識:本文蒙陳劍先生審閱指正,修改過程中又與郭永秉先生反復討論,審稿專家也給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見,作者對他們十分感謝!)

2009年10月24日初稿

2012年7月6日改定

追記:蒙郭永秉先生相告,西周金文中用爲“邇”的“𠂔”,所从“犬”旁已有變作“豕”之例(如大克鼎、番生簋蓋等,見《集成》02836、04326),當是聲化的結果。本文沒有提到,是不應有的疏失。楚文字“邇”或作“𠂔”增从“辵”旁之形(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104頁),本文所論用爲“邇”的“逐”,不知有没有可能是由从“辵”从“豕”之形省變而成的。

2012年7月9日

<sup>①</sup> 馬敘倫著:《莊子義證》卷一四,《民國叢書》第5輯第6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談談放馬灘簡的一組時稱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程少軒

**內容提要** 放馬灘簡乙種《日書》簡 179—191 存在一組時稱，共有二十多個。這些時稱與式占相關，皆應與特定的五行、五音、數字、方向對應。由於在放馬灘簡式占中時稱和星宿關係極為密切，可推測這套時稱共有二十八個。參照周家臺秦簡式圖等材料，可復原出這套時稱，它們依次是：1. 平旦、2. 日出、3. 蚤（早）食、4. 食時、5. 安（晏）食、6. 莫食、7. 東中、8. 日中、9. 西中、10. 日失（昃）、11. 【鋪食】、12. 市日、13. 夕時、14. 夕市、15. 日入、16. 昏時、17. 昏市、18. 莫（暮）食、19. 暮市、20. 人莫（定）、21. 【夜未中】、22. 夜半、23. 過中、24. 大辰（晨）、25. 前鳴、26. 中鳴、27. 後鳴、28. 【龜旦】（其中鋪食、夜未中、龜旦為擬補）。

**關鍵詞** 放馬灘簡 時稱 式占 《日書》

放馬灘簡乙種《日書》簡 179—191 第四欄、第五欄有一組將時稱與數字、五音、五行搭配抄寫的文字，釋文如下：<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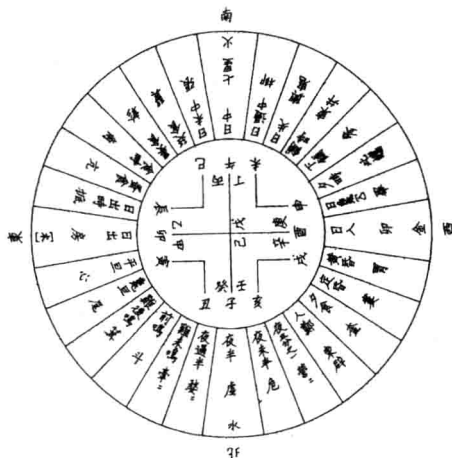
第四欄：平旦九徵木；179d 日出八□□；180d 蚤（早）食七羽（羽）火；181d 莫食六角火；182d 東中五【□】土；183d 日中五宮土；184d 西中九徵土；185d 昏市八商金；186d 莫（暮）市（？）七羽金；187d 夕市六角水；188d 日入五□□；189d 昏時九徵□。191d

① 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9）為底本，據程少軒、蔣文《放馬灘簡〈式圖〉初探（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 年 11 月 6 日）、陳劍《放馬灘簡釋文校讀筆記》（未刊稿）、趙岩《放馬灘秦簡日書割記二則》（簡帛網，2009 年 10 月 10 日）、程少軒《放馬灘簡所見式占古佚書的初步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83 本第 2 分，2012）校讀，有所修訂。

第五欄:安(晏)食大辰(晨)八;179e□食食□七;180e人奠(定)中鳴六;181e夜半後鳴五;182e日出日失(昃)八;183e食時市日七;184e過中夕時六;185e日中[日]入五;186e□□□□□;187e安(晏)食大晨八;188e夜半後鳴五;189e莫(暮)食前(?)鳴七。190d

其中第四欄抄寫的平旦等十二個時稱，配以數字、五音、五行；第五欄是將兩個配數相同的時稱抄在一起并標明所配數字（簡 190 第五欄內容誤抄入第四欄）。兩欄共出現了二十多個時稱，與其他文獻中所見時稱組合不完全相同。藉助其他與時稱有關的材料，我們嘗試將這些時稱按時間順序排列，并討論其性質。爲方便討論，我們將這段文字稱爲《時稱表》。

周家臺秦簡《二十八宿占》中繪有一幅抄寫了一圈時稱的式圖，如下所示：



周家臺秦簡《二十八宿占》式圖<sup>①</sup>

圖中時稱是 28 個,且與二十八宿一一對應,它們從平旦起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1 平坦、2 日出、3 日出時、4 蚤食、5 食時、6 晏食、7 廷食、8 日未中、9 日中、10 日過中、11 日失、12 鋪食、13 下鋪、14 夕時、15 日寢<sup>②</sup>、16 日入、17 黃昏、18 定昏、19 夕食、20 人鄭、21 夜三分之一、22 夜未半、23 夜半、24 夜過半、25 雞未鳴、26 前鳴、27 雞後鳴、28 寢旦。

懸泉遺址中發現一枚編號為“懸泉 VI92DXT1222②:19”的木牘,該牘書寫了三十二時稱,它們從平旦起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sup>③</sup>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綫圖一（簡156—181），107頁。

② 周家臺秦簡整理者已經指出這是“日龔(才)入”的省寫或漏抄(見《關沮秦漢墓簡牘》,109頁)。

③ 郝樹聲、張德芳著：《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71 頁（圖版），69 頁（釋文）。



1 平旦、2 日出、3 二千、4 蚤食、5 食時、6 食坐、7 日未中、8 日中、9 日失、10 蚤鋪、11 鋪時、12 鋪坐、13 下鋪、14 夕時、15 日未入、16 日入、17 昏時、18 定昏、19 夜食、20 人定、21 幾少半、22 夜少半、23 夜過少半、24 夜幾半、25 夜半、26 過半、27 夜大半、28 大晨、29 雞前鳴、30 中鳴、31 後鳴、32 幾旦。

放馬灘簡中有 15 個時稱與以上兩批材料一致，可以按順序排列如下：

平旦、日出、蚤(早)食、食時、安(晏)食、日中、日失、夕時、日入、昏時、人奠(定)、夜半、大辰(晨)、前鳴、中鳴、後鳴。

餘下的時稱我們逐一討論。

“東中”、“西中”兩時稱頻見於西北地區所出簡牘，如居延簡、肩水金關簡等，又作“日東中”、“日西中”。這兩個時稱意思比較明顯，分別表示太陽在日中略偏東和日中略偏西的時候，應該排在日中前後。

“莫食”在放馬灘簡中有兩種含義，它們所配之數也不相同。一種是與“朝食”相對的“莫(暮)食”，指吃晚飯。這種“暮食”亦見於傳世文獻，如《說苑·尊賢》：

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sup>①</sup>

周家臺秦簡式圖中有“夕食”，懸泉木牘上有“夜食”，與放馬灘簡中這種意義的“莫(暮)食”可以對應。

另一種“莫食”則是排在日中前面的時稱，例如睡虎地秦簡乙種《日書》簡 156：

【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莫食巳，日中午，暴(日失)未，下市申，春日酉，牛羊入戌，黃昏亥，人定【子】。<sup>②</sup>

據上引睡虎地秦簡中“莫食”的位置，可知“莫食”在食時之後、日中之前。這種“莫食”又見於馬王堆帛書《出行占》(寫作“暮食”)以及放馬灘簡乙種《日書》簡 142 等處。睡虎地秦簡原整理者讀為“暮食”，學者多從其說。<sup>③</sup> 劉樂賢先生認為“莫(暮)食”與“晏食”皆指食時之後的時段。<sup>④</sup> 程少軒、蔣文《放馬灘簡〈式圖〉初探(稿)》一文認為日中之前不應有“暮食”，而周家臺秦簡式圖中朝食與日中之間的時稱有“廷食”，據此疑“莫食”恐是“廷食”或是

① 向宗魯著：《說苑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7，189 頁。

② 校讀據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365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44 頁。

④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華學》第 6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114—121 頁，收入所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97 頁。



與“廷食”相當的其他時稱的誤抄。<sup>①</sup>按,《放馬灘簡〈式圖〉初探(稿)》關於“莫食”爲“廷食”之誤抄的論斷殊誤,因爲放馬灘簡原文該處之“莫食”,已見於前引睡虎地簡材料,的確在“日中”之前。不過該文認爲“莫食”與“廷食”相當則不是沒有可能——蘇建洲先生據此認爲上引這些排在“日中”前的“莫食”應理解爲“不食”,同時將周家臺秦簡式圖的“廷食”讀爲“停食”,並認爲這兩種時稱與懸泉遺址出土的載有三十二個時稱的木牘中的“食坐”類似,是指早飯過後到日中之前一段不吃飯的時間。<sup>②</sup>此亦可備一說。

文獻中有“夕市”,指傍晚或晚間的集市。《周禮·地官·司市》: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sup>③</sup>

文獻中也有“暮市”,與“朝市”相對,指晚上的集市。《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曰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貨香花。<sup>④</sup>

“昏市”不見於先秦秦漢文獻,不過據其名可知應和黃昏時的集市有關,當與文獻所見“夕市”、“暮市”等類似。

我們可以根據相關材料,推定“夕市”、“暮市”、“昏市”、“市日”等時稱的順序。

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禹須臾”篇:

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庚戌、庚辰、莫(暮)市以行有九喜。

97 背 1

癸亥、癸巳、丙子、丙午、丁丑、丁未、乙酉、乙卯、甲寅、甲申、壬戌、壬辰,日中以行有五喜。98 背 1

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以行有七喜。

99 背 1

丙寅、丙申、丁酉、丁卯、甲戌、甲辰、乙亥、乙巳、戊午、己丑、己未,莫(暮)食以行有三喜。100 背 1

戊申、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旦以行有二

① 程少軒、蔣文著:《放馬灘簡〈式圖〉初探(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1月6日。

② 蘇建洲著:《試論〈放馬灘秦簡〉的“莫食”時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5月11日,收入《中國文字》新36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27—32頁。

③ 《周禮》,《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734頁。

④ [宋]李昉等編纂:《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上海書店,1985,4頁。

喜。101 背 1<sup>①</sup>

馬王堆帛書《出行占》：

- 戊寅申、己卯酉、丙辰戌、丁巳亥、庚子午、辛丑未，宮也，平旦行，【二】喜。28 上
- 己巳亥、庚寅申、辛卯酉、戊辰戌、壬子午、癸丑未，角也，食時行，七喜。29 上
- 丙寅申、丁卯酉、甲辰戌、乙巳亥、戊子午、己丑未，徵也，晏食行，三喜。30 上
- 癸巳亥、丙子午、丁丑未、乙酉卯、甲寅申、壬辰戌，羽也，日中行，五喜。31 上
- 辛巳亥、壬寅申、甲子午、乙丑未、癸卯酉、庚辰戌，商也，蓼(暮)市行，九喜。32 上<sup>②</sup>

馬王堆帛書《出行占》還有如下一段文字：

· 甲乙，平旦、日出自如，食時、蓼食大吉，東【中、西中大凶，日(眚)、下(眚)】有獄，春日=(日、日)入有得。33 上

· 丙丁，食時、蓼食自如，東中、西中大吉，日失(眚)、下失(眚)大凶，春日=(日、日)入有獄，平旦、日出有得。33 下

· 戊己，東中、西中自如，日失(眚)、下失(眚)大吉，【春日=(日、日)入大凶，平旦、日出有】獄，食時、蓼食【有得】。34 上

· 庚辛，日【失(眚)、下失(眚)自如，春日=(日、日)入大吉】，平旦、日出大凶，食時、蓼食有獄，東中、西中有得。34 下

· 壬癸，春日=(日、日)入自如，平旦、日出大吉，【食時、蓼食大凶，東中、西中】有獄，日失(眚)、下【失(眚)有得】。35 上<sup>③</sup>

類似的材料還有馬王堆帛書《日月風雨雲氣占》<sup>④</sup>、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簡 157 正—166 正<sup>⑤</sup>、放馬灘簡甲種《日書》簡 54—65、乙種《日書》簡 78—82、周家臺秦簡《日書》<sup>⑥</sup>等。劉

①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62—163 頁。同樣屬於“禹須臾”篇的還有簡 135 正、簡 134 正 2，文字較此五支簡稍簡略。

② 陳松長著：《馬王堆帛書藝術》，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130—137 頁。《出行占》原被歸入《隸書陰陽五行》，後被整理者分出。

③ 陳松長著：《馬王堆帛書藝術》，130—137 頁。

④ 《日月風雨雲氣占》又稱《星占書》（載帛書圖版載傳舉有、陳松長編《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140—141 頁，帛書 76—77 行），該篇文字抄於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兩本。所引釋文據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81 頁）。

⑤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99—200 頁。

⑥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118 頁。

樂賢先生指出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將一天分成五個時段進行占測。<sup>①</sup> 其中馬王堆帛書《出行占》33—35 行這段文字略不同,其每一時段有兩個時間十分相近的時稱。

我們選擇其中幾種文獻列表如下:

出土文獻五時段時稱對照表

馬王堆 《出行占》A	馬王堆《出行占》B		馬王堆《日月 風雨雲氣占》	睡虎地 《日書》A	睡虎地 《日書》B	放馬灘 甲種《日書》	周家臺 《日書》
平旦	平旦	日出	朝日	平旦	朝	旦	朝
晏食	食時	蓐食	食時	莫食	晏	安(晏)食	莫食
日中	東中	西中	行中	日中	晝	日中	日中
食時	日失	下失	日兒 (睨)	市日	日虎 (睨)	日失 (眈)	日失 (眈)
(暮)市	春日	日入	夕	莫市	夕	夕日	日夕時

據表可知,“莫(暮)市”大致相當於“夕時”、“日入”這個時段,因此可知“夕市”和“昏市”應該也在“夕時”、“日入”等時稱附近。比較周家臺秦簡和懸泉木牘,夕時、日入之間,尚有“日未入”、“日寃【入】”。頗疑“夕市”與此二時稱類似,當排在“夕時”、“日入”之間。又參考周家臺秦簡、懸泉木牘中“夕時”與“昏時”的位置關係,我們暫將“昏市”排在“昏時”之後——這樣在《時稱表》中,“夕市”緊接“夕時”,而“昏市”緊接“昏時”,“夕時”和“昏時”的位置的排列完全參照周家臺秦簡和懸泉木牘,是一套較為合理的方案。

在上表睡虎地《日書》A 中,還出現了“市日”。“市日”大致相當於“日失(眈)”。劉樂賢先生據此推斷“市日”可能是從“日昃而市”為“大市”而得名。而表中與“市日”相應的食時,劉樂賢先生則懷疑是“舖時”的訛寫。<sup>②</sup> 這些說法當可信從。如此,則《時稱表》中的“市日”也當排在日失附近。周家臺秦簡中,“日失”、“舖食”先後為序;懸泉漢簡中時稱排列則作“日失”、“蚤(早)舖”、“舖食”。據此可推斷,《時稱表》中當以“日失”、“市日”、“夕時”為序。

我們認為“過中”作為時稱有兩種意思,一指“日過中”,一指“夜過中”,在《時稱表》中指“夜過中”。“夜過中”見於《漢書·五行志》: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sup>③</sup>

放馬灘簡甲乙種《日書》均有“生男生女”篇,“日過中”、“夜過中”同出。以甲種《日書》

①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華學》第6輯,114—121頁,收入所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95—99頁。

②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華學》第6輯,114—121頁,收入所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98頁。

③ 《漢書》卷二七,1510頁。

爲例：

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過中男；16b 旦〈日〉則（昃）女，日下則（昃）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 17b 未中女，夜中男；夜過中女，雞鳴男。19b

上引周家臺秦簡中有“夜過半”，懸泉木牘中有“過半”，“夜”字可省去。因此，“夜過中”的“夜”無疑也可以省去，徑作“過中”。《時稱表》中已經有了與“日過中”表同一時間的“西中”，因此文中的“過中”係指“夜過中”無疑，當排在“夜半”之後。

綜上，《時稱表》中已知時稱排列順序如下：

平旦、日出、蚤（早）食、食時、安（晏）食、莫食、東中、日中、西中、日失（昃）、市日、夕時、夕市、日入、昏時、昏市、莫（暮）食、莫（暮）市、人奠（定）、夜半、過中、大辰（晨）、前鳴、中鳴、後鳴。

以上共計 25 個時稱。由於有兩支簡的圖版看不清楚，加上原文抄寫存在錯訛，這段文字所含的時稱應該略多於 25 之數。

各種文獻中所見計時法差異頗大，有十二時、十六時、二十八時、三十二時等多種類型。十六時、三十二時和十二時是秦漢時期民間實際應用的時稱系統，學者論之甚詳，本文不再贅述。<sup>①</sup> 二十八時見於周家臺秦簡式圖，是爲了與二十八宿相配而湊成二十八數的特殊情況，僅見於占卜<sup>②</sup>。在前引《放馬灘簡〈式圖〉初探（稿）》一文中，我們曾認爲《時稱表》體現的是一個二十四時稱的系統。然而，在已知秦漢文獻中從未出現過“二十四時”。況且經過重新校讀簡文，目前已經有了 25 個時稱，實際的時稱數還要更多一些。因此我們原來的方案肯定是不妥當的。

裘錫圭先生審閱過我們“二十四時”的舊方案後提示說，不能排除放馬灘簡的這組時稱是個多於二十四之數的系統的可能性，例如也可能存在二十八個時稱。我們重新考慮後認爲，裘先生的看法是正確的。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二十八時”的確是最優方案。

經研究，我們發現放馬灘簡乙種《日書》中存在一部自成系統的、可獨立存在的式占文獻。這部式占古佚書全篇可分爲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圍繞式圖的一系列表單和說明；第二部分是各種卦辭和占辭；第三部分是對占卜方法的說明。<sup>③</sup>《時稱表》正是屬於第一部分的一

① 可參看于豪亮《秦簡〈日書〉記時記月諸問題》（收入所著《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157—162 頁），李解民《秦漢時期的一日十六時制》（《簡帛研究》第 2 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80—88 頁），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68—105 頁）等。

②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107—119 頁。

③ 程少軒著：《放馬灘簡所見式占古佚書的初步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83 本第 2 分。

份表單。而在該古佚書的第三部分,可以看到很多占卜是依據“日”(天干)、“辰”(地支)、“時”(時稱)所對應的數字來貞測吉凶的,例如:

入舞投黃鐘,投日、投辰、投時而三并之。241

【投】日,上,父毆。投辰,下,母毆。投時,其中,子毆。243

凡卜來問病者,以來時投日辰時數并之。345

占疾,投其病日辰時。338

占病者,以其來視事直(值)日辰時。355

在相關簡文中,除了使用“日”、“辰”、“時”外,還出現了用“日”、“辰”、“星”的例子:

凡日者天毆,辰者地毆,星者旂(游)變毆。志6

爻(投)者(諸)參合日辰~~星~~星321

日爲夫,晨(辰)爲妻,星爲子。344

婦有壬(妊)者而欲智(知)其男女,投日、辰、星而參(三)合之。293

占亡道,以亡而求問之【時】,并日辰時婁(數)。90

從簡文內容看,很難說占“日辰時”者與占“日辰星”者有本質區別。換言之,“時”(時稱)和“星”(星宿)在占卜中的地位很可能是相近甚至是一致的。在各種占卜中,但凡地位相近或者一致的元素,往往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例如,後世的六壬式占中,十二神將有時會用十二地支來代替,這是因爲神將與地支嚴格對應;又如,季節有時用顏色或者天干來表示,這是因爲季節與顏色、天干也有嚴格的對應關係。通過簡文我們已經知道,時稱對應的數字最小是五,最大是九。而簡321云:

爻(投)者(諸)參(三)合日辰~~星~~星,從〈近〉期三而一,中期如參(三)合之數,遠數有(又)參(三)之,即以鐘音之數矣。321

這段簡文是說,將占卜所據日(天干)、辰(地支)、星(星宿)三者對應的數字相加,直接得到的數對應的是“中期”;除以三得到的數對應“近期”;乘以三得到的數對應“遠數”。而這個“遠數”,即是鐘律對應的數。在放馬灘簡中,天干、地支、鐘律所配之數與其他文獻是一樣的,如下三表所示:

天干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9	8	7	6	5	9	8	7	6	5

地支表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9	8	7	6	5	4	9	8	7	6	5	4

鐘律表

黃鐘	大呂	大簇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81	76	72	68	64	60	57	54	51	48	45	42

天干是5—9,地支是4—9。天干、地支、星宿三者相加,乘以三,所得數在42—81之間。據此,可推算出占卜時所用星宿的數字是5—9,這和時稱是完全一致的。既然時稱和星宿在占卜時關係密切、地位相近,所配數字也一致,可以推測《時稱表》中時稱的數目應該與二十八宿一致,也是二十八個。前引周家臺秦簡《二十八宿占》正是一個以二十八宿與二十八時相配的系統,且恰好用於以式盤操作的占卜。與之時代相距不遠的放馬灘簡中存在類似的系統,完全是合理的推測。<sup>①</sup>

頗疑在簡180e和簡187e殘缺的文字中,有三個已知簡文中未見的時稱。結合前引周家臺秦簡和懸泉木牘的時稱名來看,如果要補三個時稱,最佳的選擇是“舖食”、“夜未中”和“寯旦”。<sup>②</sup>之所以考慮補這三個時稱,主要考慮到這些時稱在式圖中的排布。

在我們整理出的式占古佚書中,有一段闡述式占所用各種要素在式圖中排布及其意義的文字:

日分甲以到戌;己以到癸。辰分子以到巳;午以到亥。167b 時分旦以到東中;西中以到日入;174b【……】168b 缺投日辰時數,并而三之以爲母。173b 下八而生者,三而爲二。上六而生者,三而爲四。169b

文中“時分旦以到東中;西中以到日入”是說,“平旦”和“日入”應對應正東和正西兩個方向。另外,結合周家臺秦簡《二十八宿占》式圖來看,“日中”和“夜半”顯然應該對應正南與正北。如此,則在四個正方向對應的時稱之間,應該都平均分布着六個時稱。“平旦”和“日中”之間已經有了六個時稱,“日中”至“日入”、“日入”至“夜半”、“夜半”至“平旦”則各缺一個時稱。

在“日中”至“日入”之間衆多屬於下午的時稱之中,“舖食”無疑是戰國秦漢出土文獻中

① 詳參程少軒《放馬灘簡所見式占古佚書的初步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3本第2分。

② 也可以是與它們意義相同的時稱,如“夜未中”可以換成“夜幾半”、“未中”、“夜未半”等,“寯旦”可以換成“幾旦”等。

最爲常見的時稱之一，周家臺秦簡式圖中便有“舖食”，懸泉木牘中也有與之類似的“舖時”。簡 180e 殘缺的簡文中有“□食”，不能排除就是“舖食”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優先選擇該時稱補在這一時段。

在“日入”至“夜半”之間，我們選擇了“夜未中”。一則是因爲，參考周家臺秦簡和懸泉木牘，它們在“人定”和“夜半”之間，均有數個時稱，而《時稱表》中暫未見到“人莫(定)”和“夜半”之間的時稱。二則是因爲，“日中”前後分別有“東中”和“西中”，“夜半”後面有了“過中”，前面應有一個相應的時稱。結合這兩點，“夜未中”這類時稱是最合適的。之所以選擇“夜未中”，主要考慮到放馬灘簡甲乙種《日書》中有這個詞(見前引“生男生女”篇)。當然，如果考慮到“過中”省略了“夜”字，且《時稱表》的已知時稱均爲兩字的情況，這裏的“夜未中”也完全可能省作“未中”。

在“夜半”至“平旦”之間，我們選擇了“覓旦”，主要是考慮到在周家臺秦簡和懸泉木牘中，“後鳴”與“平旦”之間，均夾有一時稱。需要承認，我們選擇周家臺秦簡“平旦”之前的“覓旦”，理由並沒有前面補“舖食”和“夜未中”那麼充分。這裏完全可以補“夜大半”或別的相關時稱。

簡 187e 殘去的竹簡，很可能就寫着“日入”至“夜半”之間和“夜半”至“平旦”之間缺少的兩個時稱。

我們按照上述整理方案，將二十八時稱相關信息列表如下：

二十八時稱信息表

方向	時稱	數字	五音	五行	備注
正東	平旦	9	徵	木	
	日出	8			
	蚤(早)食	7	羽	火	
	食時	7			
	安(晏)食	8			
	莫食	6	角	火	
	東中	5		土	
正南	日中	5	宮	土	
	西中	9	徵	土	
	日失(昃)	8			
	【舖食】				擬補
	市日	7			
	夕時	6			

续表

方向	時稱	數字	五音	五行	備注
	夕市	6	角	水	
正西	日入	5			
	昏時	9	徵		
	昏市	8	商	金	
	莫(暮)食	7			
	暮市	7	羽	金	
	人莫(定)	6			
	【夜未中】				擬補
正北	夜半	5			
	過中	6			
	大辰(晨)	8			
	前鳴	7			原簡“前”字不清
	中鳴	6			
	後鳴	5			
	【寢旦】				擬補

需要強調的是,上表祇是我們以二十八時稱系統為基礎所作的推測,目的是粗略復原出這套時稱系統的總體形態,並不是說原簡信息一定如上表所示。我們擬補的時稱未必合乎事實。

據上表,時稱對應的數字,很可能存在 9—5 依次循環排列的規律。從簡文抄寫存在漏字、串行等情況來看,簡文的抄寫可能有錯誤,加之相關簡文殘損、模糊,我們一時無法徹底恢復時稱系統的原貌,也暫時找不到這段文字中五行與五音等要素相配的規律。

或許這套時稱系統本來就不是盡善盡美的。該系統中出現了不少時間非常接近、在其他一些文獻中區別不大、甚至沒有區別的時稱,例如“安(晏)食”和“莫食”、“日失(昃)”和“市日”、“夕時”和“昏時”、“夕市”和“昏市”等。有些時稱很可能是為了湊數而在原本已經很完善的十二時或十六時之類的時稱系統之上强行添加的,所以有的時稱安排才會顯得不太合理。



## 嶽麓書院藏秦簡校讀二則<sup>①</sup>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何有祖

**內容提要** 本文對嶽麓秦簡《奏讞書》、《為吏治官及黔首》斷句和釋字提出新的意見。《為吏治官及黔首》是自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後發現的又一個版本。在現有編連的基礎上，我們認為 1531 正面二次出現的“此”應另有所指，可以接在 0072 後。這樣，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可以與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相對應。

**關鍵詞** 秦簡 嶽麓簡 奏讞書 為吏之道

《文物》2009 年第 3 期所公布的多枚嶽麓書院藏秦簡<sup>②</sup>，為學界廣泛關注，近日閱讀簡文後有一些想法，茲試作考證如下，敬請方家指教。

嶽麓書院藏秦簡《奏讞書》的所謂的“馮將軍毋擇子”詐騙案，備受學者們的關注。<sup>③</sup> 不

① 【基金項目】本文寫作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秦簡牘的綜合整理與研究”(08JZD0036)、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戰國竹簡《國語》類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2YJC770021)”、2012 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戰國秦漢簡帛所見《國語》類文獻整理與研究(12CZS008)”的資助。

② 陳松長著：《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 年第 3 期。

③ 陳偉著：《嶽麓書院秦簡考校》，《文物》2009 年第 10 期；曹旅寧著：《嶽麓書院新藏秦簡叢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 年第 6 期；王偉著：《嶽麓書院藏秦簡所見秦郡名稱補正》，《考古與文物》2010 年第 5 期。

過,第 1650 號簡仍然有一些問題。關於 1650 號簡,有如下釋讀意見:

1. 盜去,邦亡,未得,得審□,敢讞之。·史議:耐學隸臣,或令贖耐。<sup>①</sup>
2. 盜去邦,亡未得,得審□,敢讞之。·史議:耐學隸臣,或令贖耐。<sup>②</sup>

以上意見中,對開頭六字的理解分歧較大。按:1650 號簡前面的文句作:

鞠之,學矯自以爲五大夫將軍馮毋擇子,以名爲僞私書詣贈,以欲 1044  
盜去邦,亡未得,得審□,敢讞之。·史議:耐學隸臣,或令贖耐。1650

從 1044 號簡到 1650 號簡的開頭,是“鞠”的部分,這一程序多見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如 5-7 號簡:

鞠之:毋憂蠻夷大男子,歲出實錢,以當徭賦,寃遣爲屯,去亡,得,皆審。·疑毋憂罪,它縣論,敢讞之。

“鞠之”後面一般用冒號。“鞠之”所引導的內容一般是對犯罪行爲的確認性陳述。嶽麓簡 1044 號簡至 1650 號簡開頭的部分,是對“學”犯罪行爲的陳述,從現有記載看,這一部分並不完整。1650 號簡開頭一字“盜”屬對犯罪行爲的陳述,疑屬上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多見“去亡”,如:

已受致書,行未到,去亡。1-2

故點婢,楚時去亡,降爲漢,不書名數,點得媚,占數復婢媚,賣祿所,自當不當復受婢,即去亡,它如祿。9-10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多見“邦亡”,如:

邦亡來通錢過萬,已復,後來盜而得,何以論之? 以通錢。181

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賣,把錢偕邦亡,出徼,得,論各何也? 當城旦黥之,各畀主。5

“去邦”當往下與“亡”連讀作“去邦亡”,可以看作是“去亡”與“邦亡”的合并表述。“未得”二字,參考張家山漢簡《奏讞書》6 號簡“寃遣爲屯,去亡,得,皆審”,可自成一小句,陳松長先生意見當可從。“得審”後一字,疑是“者”。“得審者”語意不明。一般來說,有定罪之辭,便有被告之人。既然簡文對“學”定罪,“學”被捕得的可能性很大。這裏的“得審者”,疑指就“學”而言。

① 陳松長著:《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

② 陳偉著:《嶽麓書院秦簡考校》;曹旅寧:《嶽麓書院新藏秦簡叢考》。

1650 號簡末尾的“或令贖耐”，第 2 種意見作“或今贖耐”，當是筆誤。“或”後一字確是“令”字。

茲將該案例現有簡文釋寫如下：

廿二年八月癸卯朔辛亥，胡陽丞唐敢讞之，四月乙丑，丞 1647+1649

贈曰：君子子癸詣私 2168

書贈所，自謂馮將軍毋擇子，與舍人來田南陽。毋擇 0473

鞠之：學橋自以爲五大夫將軍馮毋擇子，以名爲僞私書詣贈，以欲 1044

盜，去邦亡，未得，得審者，敢讞之。·史議：耐學隸臣，或令贖耐。1650

綜觀現有簡文，多有內容不連貫之處，而王偉先生將簡文連貫書寫，如<sup>①</sup>：

1647+2168+0473+1044+1650 號簡文：廿二年八月癸卯朔辛亥，胡陽丞唐敢讞之，四月乙丑，丞贈曰：君子子癸詣，私書贈所，自謂馮將軍毋擇子，與舍人來田南陽，毋擇鞠之：學橋自以五大夫將軍毋擇子，以名爲僞私書詣贈，以欲盜去，邦亡，未得，得審□，敢讞之。·史議：耐學隸臣，或令贖耐。（按：這是《綜述》一文公布的《奏讞書》中冒充“馮將軍毋擇子”的詐騙案的木簡內容。）

這恐有不妥。其中 0473 號簡下殘，與 1044 不能連讀，這是可以確定的。且“鞠之”前面一般不書寫人名，何況案件主角是“毋擇子”，而非“毋擇”。其間宜用“□”或“……”隔開。

最後，對“學”的定罪做一些討論。“學”的犯罪行爲有“爲僞私書”、“盜”、“去邦亡”，與之相應的處罰標準可參考《二年律令》如下簡文：

### 1. 亡律

吏民亡，盈卒歲，耐；不盈卒歲，繫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償亡日。其自出也，笞五十。給逋事，皆籍亡日，輸數盈卒歲而得，亦耐之。157

女子已坐亡贖耐，後復亡當贖耐者，耐以爲隸妾。司寇、隱官坐亡罪隸臣以上，輸作所官。158

### 2. 盜律<sup>②</sup>

盜賊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爲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完爲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錢，耐爲隸臣妾。不 55 盈百一十錢到廿二錢，罰金四兩。不盈廿二錢到一錢罰金一兩。56

① 王偉著：《嶽麓書院藏秦簡所見秦郡名稱補正》。

②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散見的簡文，量刑標準與之相同，如 35-36：“士伍甲盜，以得時值贓，贓值百一十，吏弗值，獄鞠乃值贓，贓值過六百六十，黥甲爲城旦，問甲及吏何論？甲當耐爲隸臣，吏爲失刑罪。”

### 3. 賊律

爲僞書者，黥爲城旦舂。<sup>13</sup>

☐諸詐增減券書，及爲書故詐弗副，其以避負償，若受賞賜財物，皆坐贓爲盜。其以避論，及所不當<sup>14</sup>【得爲】，以所避罪罪之。所避毋罪名，罪名不盈四兩，及毋避也，皆罰金四兩。<sup>15</sup>

先看“吏議”階段，對於“學”來說有兩種處罰方案，即耐爲隸臣或贖耐。其中“耐爲隸臣”對應的律文，有《亡律》157“吏民亡，盈卒歲，耐”，以及《盜律》55“盜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錢，耐爲隸臣妾。”爲僞書，依《賊律》會“黥爲城旦舂”，可能由於“爲僞私書”情節輕於“爲僞書”，所以在量刑上採用低一等的“耐爲隸臣”。可見，“學”爲僞私書、盜、去邦亡，都有可能“耐爲隸臣”。“吏議”階段把“耐爲隸臣”定爲方案之一，這裏採用的是數罪并罰取其重的原則，大致與秦及漢初的律文相合。至於“贖耐”處罰輕於“耐爲隸臣”，是否因爲“學”未出關而得，所以減罪，簡文中似沒看到明顯可以減罪的理由，爲何也作爲一種方案，有待簡文全部公布纔可知了。

## 二

陳松長先生《嶽麓書院藏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sup>①</sup>，公布了 1531、1541、0072 這三枚簡正面的簡文以及寫在 1531 背面的篇題，並討論篇題的含義、篇首所在以及相關簡文的解讀。在竹簡的排序上，陳松長先生所給出的順序是 1531（背面）、1531（正面）、1541、0072，即：

1531（背面）：爲吏治官及黔首

1531（正面）：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它官課，有式令能最，欲毋殿、欲毋罪，皆不可得。欲最之道，把此

1541：爲人君則惠，爲人臣忠，爲人父則茲（慈），爲人子則孝，爲人上則明，爲人下則聖，爲人友則不爭。能行此，終

0072：日視之，箋毋舍，風庸爲首，精正守事，勸毋失時，攻成爲保，審用律令，興利除害，終身毋咎。

此種編聯方式中“把此”於下文在文意上似不好連接，所以陳偉老師對竹簡調整作：1531、0072：<sup>②</sup>

①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

② 陳偉著：《〈爲吏治官及黔首〉1531、0072 號簡試讀》，簡帛網，2010 年 1 月 22 日。

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它官課有式，令能最，欲毋殿，欲毋罪，皆不可得。欲最之道，把此 1531 日視之，簠(樓)勿舍，風庸爲首，精正守事，勸毋失時，攻(功)成爲保，審用律令，興利除害，終身毋咎。0072

在討論編聯之前，我們先對相關詞句作疏通。

簠，陳老師疑讀爲“樓”，當是。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所記載的“吏有五失”中有“受令不樓”。

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與”從陳老師屬上讀。

陳松長先生指出：篇題“爲吏治官及黔首”，包含爲吏、治官、治黔首三部分；1531 正“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其中“官”、“黔首”、“身”爲“治”的并列賓語。這無疑是正確的。不過陳先生懷疑“爲吏”、“治官”在語義上有重複。我們認爲，篇題“爲吏”、“治官”、“治黔首”三者并列，與 1531 正“官”、“黔首”、“身”爲“治”的并列賓語，是密切對應的。既然篇題及 1531 正同時出現此種并列關係，可知語義上應有側重，析言有別。爲吏，似側重於修養，與“治身”意義相當。治身，修身。《孔子家語·六本》：“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而治官則偏重於考核。從這個意義上說，篇題和 1531 正“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在內容上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有總結全篇正文的作用。

現在看已有的二種編聯方式，有一個共同點，即 1531“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皆編在靠前的位置。而 1531 最前面的內容是“此……也”句式，“此”在這裏起到指代作用，顯示前面應該有文句存在，與同簡中的“把此”之“此”所指相同。一般來說，如果 1531 居首，“此”似可指篇題；如果接近篇末，則指通篇正文。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討論過的，篇題“爲吏治官及黔首”其實與 1531“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在內容上基本相同，都是提要性質的語句，二者不好互相指代。

我們懷疑，1531 正面二次出現的“此”應另有所指。考察 1531，首端殘去部分相當於 1541 第一道編繩以上的部分，這與 0072 在尾端殘去第三道編繩以下部分的情形是相似的，都不影響內容上的完整性。已有編聯意見把 1531 當作整簡，大概也是這種考慮。我們認爲 1531 正面可以直接接在 0072 後，即：

#### 爲吏治官及黔首 1531 背

爲人君則惠，爲人臣忠，爲人父則茲(慈)，爲人子則孝，爲人上則明，爲人下則聖，爲人友則不爭。能行此，終 1541 日視之，簠(樓)勿舍，風(諷)庸(誦)爲首，精(精)正守事，勸毋失時，攻(功)成爲保，審用律令，興利除害，終身毋咎。0072 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它官課有式令能最、欲毋殿、欲毋罪，皆不可得。欲最之道，把此。1531 正

這樣移動之後，1531 的第一個“此”指的是它前面的內容。陳松長先生已經指出這段文字與

睡虎地《爲吏之道》部分文句相似<sup>①</sup>：

戒之戒之，材(財)不可歸；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賞(償)。術(怵)愁(惕)之心，不可【不】長。以此爲人君則鬼(惠)，爲人臣則忠；爲人父則茲(慈)，爲人子則孝；能審行此，無官不治，無志不微，爲人上則明，爲人下則聖。君鬼(惠)臣忠，父茲(慈)子孝，政之本毆(也)；志微官治，上明下聖，治之紀毆(也)。

上引文句在敘述完“宦學”之道後，也有“政之本毆(也)”、“治之紀毆(也)”這樣的文句，與“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屬類似表述。這與我們所調整後的文句在形式上隱然相合。當然上引文字在《爲吏之道》中占有的篇幅有限，這也說明嶽麓簡相似的這部分祇能看成一個內容相對完整的短文。

最後提一下，從文意看，“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與緊接著的“它官課”、“式令”處於對立的位置。<sup>②</sup>“它”所限定的部分除了“課”，應該還有“式令”。“有”在句中當用作連詞，疑讀作或。上古音“有”屬之部匣紐，“或”屬職部匣紐，音近可通。典籍也多見有、或通作之例。《易·比·初六》：“終來有它，吉。”漢帛書本有作或。《禮記·月令》：“毋或不良。”《淮南子·時則》或作有。<sup>③</sup>“它官課或式令”即它官課與它式令，與“此治官、黔首及身之要也與”相區別。能、欲，皆用作情態動詞。最、毆，秦漢簡中常見，官吏考核成績中的首名和最後一名。官吏若經考核失職，則有可能獲罪。“它官課有(或)式令能最、欲毋毆、欲毋罪，皆不可得。欲最之道，把此”的大意是其他官課或式令不容易使官吏績效達到首名，却難逃末名及獲罪；要想得首名，就要把握住此種要略。

(本文得到陳偉老師審閱、修改，謹致謝忱！)

① 釋文參看《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69—170頁)。

② 式令，從陳松長先生意見，看作一詞，指程序條令。“式令”一詞出現較晚，如《舊唐書·禮儀》“仍并條附式令，永垂後則。”嶽麓簡所見“式令”當是較早的文例。

③ 高亨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370頁。

## 《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洞庭郡、南郡屬縣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莊小霞

**內容提要** 根據對《里耶秦簡〔壹〕》的初步統計，其中出現的縣名以洞庭郡和南郡屬縣最多。本文收集《里耶秦簡〔壹〕》出現的秦代洞庭郡、南郡屬縣，結合史籍、其他出土秦漢考古資料，分別進行考辨，並對門淺、上衍、孱陵、醴陽等縣的歸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再作進一步分析判斷。本文同意秦代洞庭郡的屬縣可能還包括了史籍未載的門淺、上衍縣，並認為孱陵、醴陽屬於南郡。

**關鍵詞** 里耶秦簡 秦縣 洞庭郡 南郡

2002年6月湖南里耶出土大批秦代簡牘，內容極其豐富，自公布以來，研究者對里耶秦簡展開了包括政令文書、戶口、祭祀等各方面的研究，其中，對里耶秦簡中記載的秦代郡縣的地理研究也是里耶秦簡研究的一個熱點，特別是圍繞秦代洞庭郡等郡縣的考察。<sup>①</sup> 2012年1月《里耶秦簡〔壹〕》<sup>②</sup>正式出版，公布了大批簡文，僅《里耶秦簡〔壹〕》中出現的秦縣據筆者初步統計就將近百數，其中尤以秦的洞庭郡、南郡屬縣出現次數最多。本文試圖收集羅列《里耶秦簡〔壹〕》所見洞庭郡、南郡屬縣，並結合出土秦漢考古資料，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其進行考辨，或有疏漏，敬請方家指正。

① 詳參伍成泉《近年來湘西里耶秦簡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7年第6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洞庭郡

隨着里耶秦簡和嶽麓秦簡的陸續公布,秦代洞庭郡的存在已是不爭之事實,一般都認為漢代武陵郡是漢高祖五年(前202)從秦洞庭郡分置,《漢書·地理志》所載漢代武陵郡屬縣從歷史沿革上來講,大部份即秦洞庭郡屬縣。<sup>①</sup> 筆者不揣簡陋,將主要依據《里耶秦簡[壹]》,並參考《漢書·地理志》,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考辨洞庭郡的屬縣。

1. 遷陵和西陽,均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此前根據已公布的里耶秦簡<sup>②</sup>,被明確判定為洞庭郡屬縣者如下:遷陵、西陽。<sup>③</sup> 本文不再贅述,而且研究者還指出:

據《漢志》記載,遷陵、西陽并屬武陵郡,同屬武陵郡的還有:零陽、孱陵、臨沅、索,這4縣均為里耶秦簡所見;不見簡文的有:沅陵、鐔成、無陽、辰陽、義陵、佷山、充縣,其中有些縣淵源甚早,相信隨里耶秦簡的陸續公布,會發現越來越多的秦縣,可能與洞庭郡、武陵郡有關。<sup>④</sup>

上文引述中提到的同屬武陵郡的零陽、孱陵、臨沅、索4縣<sup>⑤</sup>,以及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此前未見於簡文的沅陵、鐔成、無陽、辰陽、充等縣在《里耶秦簡[壹]》中也都出現了,就筆者目力所及,上文中提到的目前還有義陵、佷山二縣未見,下文將逐一舉例說明。(各個屬縣在《里耶秦簡[壹]》中出現的簡號參見文末附表。)

2. 零陽,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相關簡文如下:

司空曹書一封丞印詣零陽 七月壬申□□(8-375)

□零陽□

□過充傳舍□(背)(8-2430)

① 參見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周宏偉《傳世文獻中沒有記載過洞庭郡嗎?》(《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3期),陳偉《秦蒼梧、洞庭二郡芻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趙炳清《秦洞庭郡略論》(《江漢考古》2005年第2期),鍾煒《楚秦黔中郡與洞庭郡關係初探》(《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周振鶴《秦代洞庭、蒼梧兩郡懸想》(《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徐少華、李海勇《從出土文獻析楚秦洞庭、黔中、蒼梧諸郡縣的建置與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鍾煒《秦洞庭、蒼梧兩郡源流及地望新探》(簡帛網,2005年12月18日),鍾煒《洞庭與蒼梧郡新探》(《南方論刊》2006年第10期),周宏偉《釋“洞庭”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10期),等等。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撰:《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編:《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③ 鍾煒認為里耶秦簡中所見洞庭郡屬縣至少有三:遷陵、西陽和益陽。(參見《秦洞庭、蒼梧兩郡源流及地望新探》)但是,考慮到益陽據《漢書·地理志》屬長沙國,所以筆者傾向於益陽屬秦蒼梧郡。又,嶽麓書院藏秦簡《三十五年質日》有“丙辰騰之益陽具事”簡文(參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④ 鍾煒著:《秦洞庭、蒼梧兩郡源流及地望新探》。

⑤ 孱陵,《漢書·地理志》歸屬武陵郡。但筆者懷疑秦代孱陵歸屬南郡,此處不贅言,詳參見本文“南郡”部份考述。



3. 臨沅，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相關簡文如下：

☐倉☐建☐☐☐畜官適☐  
☐☐謁告過所縣鄉以次續食雨☐  
☐騰=遷陵田☐能自食敢言之☐  
☐☐☐☐丞遷移酉陽臨沅ノ得☐ (8-50+8-422)<sup>①</sup>

簡文中提到“謁告過所縣鄉以次續食”，其中提到的遷陵和酉陽被認為屬洞庭郡，此處臨沅也應屬“以次續食”的“以次”之縣洞庭郡。

4. 索，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相關簡文如下：

令☐☐☐索(索)ノ門淺上行零陽☐☐☐☐以次傳☐☐☐☐☐ (8-159 背)  
 廿九年索(索)令及☐☐☐☐具此☐ (8-1775)

《校釋》指出“及”下二字似是“遷陵”<sup>②</sup>，或可為索亦是洞庭郡屬縣的旁證。

5. 沅陵，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相關簡文如下：

☐☐沅陵獄史治所(8-186)  
 覆獄沅陵獄佐已治在所洞庭(8-492)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106 簡“唯謁屬所二千石官者”、116 簡“氣(乞)鞫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氣(乞)鞫，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二年律令·興律》396 簡：“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sup>③</sup>都說明縣級官吏審判案件，需要向其所屬郡的長官報告。根據簡 8—492，洞庭郡為沅陵上級，沅陵縣屬洞庭郡。

6. 鐔成，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里耶秦簡〔壹〕》中現僅見一例，簡文明確，應即見於《漢書·地理志》的武陵郡屬縣“鐔成”：

鐔成(8-1373)<sup>④</sup>

7. 無陽，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里耶秦簡〔壹〕》相關簡文如下：

獄東曹書一封丞印詣無陽·九月己亥水下三刻☐☐以來(5-22)  
 為無陽衆陽鄉佐三月十二日(8-1555)

① 《里耶秦簡牘校釋》亦指出當為縣名(參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以下簡稱《校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40—41頁)。

② 參見《校釋》(389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④ 《校釋》亦指出當為縣名(參見《校釋》，317頁)。

8. 辰陽,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里耶秦簡[壹]》相關簡文如下:

☐一辰陽一胸忍廿八年九月辛丑走起以來ノ(8-373)

9. 充,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里耶秦簡[壹]》相關簡文如下<sup>①</sup>:

十一月辛亥充☐敢告酉陽丞騰真

十一月丙辰酉陽守丞扶如敢告尉主問☐(正)

十一月庚戌尉佗敢言之以卒簪☐之☐人☐(背)(8-201)

☐過充☐郵☐(8-468)

御史覆獄治充☐(8-632)

以上簡文還不能明確判定充是洞庭郡屬縣的話,那麼下面這枚簡應當可以幫助我們確定歸屬關係:

充·洞☐(8-903)

8-903 簡末殘斷,疑為洞庭郡,相似例子如“遷陵·洞庭郡(8-469)”,遷陵為洞庭郡屬縣,此例顯然也是“縣名+·+洞庭郡”的格式。

10. 門淺和上衍。《里耶秦簡[壹]》中的“門淺”相關簡文:

八月乙巳朔己未門淺輓丞敢告臨

主ノ定手(正)

十月丁卯水十一刻下九都郵士五續(背)(8-66)

門淺☐(8-1184)

《里耶秦簡[壹]》中的“上衍”相關簡文:

冗佐八歲上造陽陵西就曰駟廿五年二月辛巳初視事上衍病署所二日

·凡盡九月不視事二日·已視事二百一十一日(正)

廿九年後九月辛未

☐計即有論上衍卅年

☐不視事未來(背)(8-1450)

☐衍計廿☐(8-2351)<sup>②</sup>

☐上衍守☐(8-2414)

門淺、上衍還同見於《里耶秦簡[壹]》簡8-159。門淺,史籍中未見,現祇見於考古出土文物。

<sup>①</sup> 《校釋》指出:充,疑是縣名(參見《校釋》,121頁)。按:充,為縣名,當無誤。

<sup>②</sup> 此簡上殘,但疑亦為“上衍”簡。

長沙斬犯山 7 號西漢墓出土漢初石印“門淺”，陳松長先生認為是基層官吏印。<sup>①</sup>長沙穀山盜發漢墓漆器文字有“門淺長”、“門淺庫”，何旭紅先生認為門淺為秦縣，漢初可能屬長沙國。<sup>②</sup>《校釋》認為“在 8-159 中，與索、上衍、零陽三縣并列，當是秦縣名。”<sup>③</sup>上衍，亦為史籍未見，《校釋》認為“上衍，洞庭郡屬縣。”<sup>④</sup>筆者認為門淺和上衍雖都不見於正史，但此二縣應該都屬秦洞庭郡。《里耶秦簡〔壹〕》保存的“御史問直絡裙程書”文書，其主要內容如下：

制書曰舉事可為恒程者上丞相上洞庭絡帛書有□□□(正、側)

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舉事可為恒

程者□上帛直即應(應)令弗應(應)謹案……

……庭□ノ□手(正)

三月丁丑朔壬辰洞庭□□□□□□□□□□□□

令□□□索(索)ノ門淺上衍零陽□□□以次傳□□□□□

書到相報□□□□門淺上衍零陽言書到署□□發

□□□□一書以洞庭發弩印行事□□恒署

□陽報□報□署令發ノ四月□丑水十一刻=下五□□□□

遷陵□酉陽署令發(背)

□□□□布令□(8-159)

于洪濤考察里耶秦簡的“御史問直絡裙程書”，并復原“御史問直絡帛程書”傳遞的整個綫路，其認為洞庭郡內傳遞(零陽方向)是：臨沅→索→(門淺)→(上衍)→零陽……<sup>⑤</sup>簡 8-159 雖然殘斷，但幸運的是“索、門淺、上衍、零陽”這四個地名連續且未殘斷，索、零陽屬漢代武陵郡，從歷史沿革角度來看都屬於洞庭郡，那麼夾在中間的門淺、上衍也應當屬於洞庭郡，否則何來文書的“以次傳”？

此外，里耶秦簡中出現的陽陵是否屬於秦代洞庭郡？自最早一批里耶秦簡公布以來，陽陵的地望以及歸屬，學界一直有爭論，主要有如下幾說：張春龍、龍京沙先生疑為洞庭郡屬縣，后曉榮也認為陽陵屬秦代洞庭郡；晏昌貴、鐘煒先生認為是楚陽陵；王輝、王偉先生等人認為是秦莊襄王葬地“芷陽陵”省稱，二者實為一地。<sup>⑥</sup>限於所見資料有限，陽陵是否屬於洞庭郡還有待研究。但可以指出的是，《里耶秦簡〔壹〕》簡 8-1450 提到：

① 陳松長著：《湖南古代璽印》，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60 頁。

② 何旭紅著：《對長沙穀山被盜漢墓漆器銘文的初步認識》，《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 6 輯，長沙：嶽麓書社，2009。

③ 參見《校釋》(52 頁)。

④ 參見《校釋》(329 頁)。

⑤ 于洪濤：《試析里耶簡“御史問直絡裙程書”》，簡帛網，2012 年 5 月 30 日。

⑥ 張春龍、龍京沙著：《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李學勤著：《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 年第 1 期；晏昌貴、鐘煒著：《里耶秦簡所見的陽陵與遷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 年第 4 期；王偉著：《里耶秦簡賁讀文書所見陽陵地望考》，《考古與文物》2007 年第 4 期。

佐八歲上造陽陵西就曰駟廿五年二月辛巳初視事上衍病署所二日

《校釋》此處注解：

陽陵，縣名。《漢書·地理志》屬左馮翊，治所在今陝西咸陽市東北。班固原注云：“故弋陽，景帝更名。”<sup>①</sup>

而《里耶秦簡〔壹〕》新公布一枚簡文：

弋陽須却□(6-11)

此處“弋陽”應即是后改名爲陽陵的秦內史屬縣弋陽。

《里耶秦簡〔壹〕》中可見到《漢書·地理志》武陵郡屬縣：遷陵、酉陽、零陽、臨沅、索、沅陵、鐔成、無陽、辰陽、充。以上屬縣，如遷陵、充等可通過簡文明證其爲洞庭郡屬縣，但其他更多屬縣主要根據《漢書·地理志》屬漢代武陵郡，而從歷史沿革角度來看屬於洞庭郡。此外秦代洞庭郡的屬縣，可能還包括了史籍未載的門淺、上衍縣。<sup>②</sup>

## 南郡

公元前 278 年秦攻取楚都郢及其周圍地區，《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載：“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中就出現過“南郡”的記載，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亦數見南郡及其屬縣的記載。<sup>③</sup> 另外，《里耶秦簡〔壹〕》新公布的簡 8-772 也有“南郡太守”的簡文。漢代沿革秦代制度，《漢書·地理志》所載漢代南郡屬縣從歷史沿革上來講，大部份即原秦南郡屬縣。今僅收集散見於新出《里耶秦簡〔壹〕》中的南郡屬縣，考述如下。

1. 江陵，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和《奏讞書》中都有記載，出土年代爲漢初的松柏一號墓 47 號木牘記載了南郡屬縣和侯國的用卒數量，其中也提到了江陵。<sup>④</sup> 除了早已公布的里耶秦簡簡 16-52 里程表中記載了“江陵”<sup>⑤</sup>，新出《里

① 參見《校釋》(329 頁)。

② 《里耶秦簡〔壹〕》中還出現數枚寫著完整的“新武陵”的簡(簡 8-649、8-657、8-994、8-1349、8-1677)，《校釋》認爲新武陵應是洞庭郡郡治所在(參見《校釋》前言 6 頁、190-191 頁)。黃展岳先生撰文介紹里耶秦簡時提到“從簡文中尚有未見於史籍的‘武陵’、‘新武陵’、‘武陵太守’看，里耶簡揭示的秦郡縣要比史籍所載的秦郡縣多得多。”(黃展岳：《秦漢簡牘述略(附帛書、骨簽)》，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64 頁)。考慮到里耶秦簡內容尚未完全公布，現在所見資料仍然有限，新武陵是否屬於洞庭郡仍可存疑，故本文對新武陵的歸屬暫時擱議。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198—199 頁。

耶秦簡〔壹〕》中還有兩枚包含“江陵”的簡文，茲不贅述，簡號參見附表。

2. 孱陵，見於《漢書·地理志》，屬武陵郡。關於孱陵的歸屬，學界有不同意見，后曉榮先生將孱陵歸屬洞庭郡，周振鶴先生將孱陵歸屬南郡。<sup>①</sup> 里耶秦簡以及松柏漢墓木牘的公布，進一步證明孱陵歸屬南郡。松柏一號墓 47 號木牘中提到了孱陵：

孱陵百八人參更更百四十六十人不足五十一人受宜成五十八人臨沮三十五人<sup>②</sup>

彭浩先生早已指出：《漢書·地理志》記南郡轄區與此有些不同，如孱陵歸武陵郡。<sup>③</sup> 松柏漢墓的年代從已公布的資料看，形成年代在漢文帝至武帝之間，屬西漢早期<sup>④</sup>，可知當時孱陵確實歸屬南郡，那麼考慮到歷史沿革，更早的時候秦代，孱陵極有可能就早已屬南郡，而不是一般認為的漢代武陵郡之前身的秦代洞庭郡。再者，《里耶秦簡〔壹〕》中有枚簡文：

江陵慎里大女子可思(正)

孱陵江陵孱陵江陵(背)(8-1444)<sup>⑤</sup>

簡 8-1444 背面雖疑似習字簡，然江陵為確定無疑的南郡屬縣，此處孱陵與江陵并列，雖不能完全肯定孱陵必為南郡屬縣，但聯繫已出松柏漢墓等資料，孱陵秦代為南郡屬縣的可能性極大，希望將來能有更多相關資料公布，可以一解疑竇。

3. 競陵。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新公布相關簡文如：

守丞配上造居競陵陽處免歸□(8-896)

后曉榮先生根據此前公布的簡(8)134<sup>⑥</sup>，認為競陵和遷陵山水重障，相隔千里，所以遷陵公船無法發往至競陵，因此將競陵推論認為與遷陵同屬洞庭郡。<sup>⑦</sup> 筆者以為此處競陵應是借遷陵公船者的籍貫，即借公船者狼是“競陵蘆陰”人，簡文并未顯示狼是借船到了競陵，因此根據《漢志》，考察歷史歸屬，競陵似更應歸屬南郡。

4. 臨沮，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簡 8-140 記載：

臨沮丞禿敢告遷陵丞主令史可以律令從事敢告主ノ胥手

松柏一號墓 47 號木牘中也可見臨沮縣名：

① 后曉榮著：《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427 頁；周振鶴著：《〈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 年第 1 期。

②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

③ 彭浩著：《讀松柏出土的西漢木牘（四）》，簡帛網，2009 年 4 月 12 日。

④ 彭浩著：《讀松柏出土的西漢木牘（一）》，簡帛網，2009 年 3 月 31 日。

⑤ 釋文參見《校釋》（327 頁）。

⑥ 即 8-135 簡（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

⑦ 后曉榮著：《秦代政區地理》，428 頁。

臨沮八百三十一人五更更百六十二人其三十五人助孱陵二十九人便侯余三十一人<sup>①</sup>

此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中也見記載，可知秦代臨沮亦已置縣，漢初仍屬南郡。

5. 巫，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簡8-764 記載：

徑詹粟＝一石九斗少半斗卅一年正月甲寅朔丙辰田官守敬佐壬  
粟人顯出粟貲貲士五巫中陵免將  
令史扁視平 壬手

《二年律令·秩律》中也見記載，可知秦代巫亦已置縣，漢初仍屬南郡。

6. 秭歸，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簡8-1516 記載：

丙寅水下三刻啓陵乘城卒秭歸□里士五順行旁 壬手(背)<sup>②</sup>

《二年律令·秩律》中也見記載。松柏一號墓47 號木牘中“秭歸”出現二處<sup>③</sup>：

秭歸千五十二人九更更百一十六人其十七人助醴陽余八人  
醴陽八十七人參更更四十二人受秭歸月十七人余十二人

可知秦代秭歸已置縣，漢初仍屬南郡。

7. 夷陵，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中公布了三枚相關簡文，其中一枚爲：

□舍夷陵□

□治所□(8-160)

松柏一號墓47 號木牘中亦出現“夷陵”簡文：

夷陵百二十五人參更更三十六人余十七人<sup>④</sup>

《二年律令·秩律》中也見記載，可知秦代夷陵亦已置縣，漢初仍屬南郡。

8. 當陽，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中現僅看到二枚簡：

粟＝一石九斗少半斗 · 卅……

當陽□□□(8-2235)

□□當陽□

①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4 期。

② 釋文參見《校釋》(343 頁)。

③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4 期。

④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4 期。

□□□□(正)(8-2430)<sup>①</sup>

嶽麓書院藏秦簡《三十五年質日》記載“己未宿當陽”。<sup>②</sup>可知秦代當陽已置縣，漢代屬南郡。

9. 鄢，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漢書·地理志》：“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校釋》指出“亦見於睡虎地秦簡《編年紀》。”<sup>③</sup>《里耶秦簡〔壹〕》中簡文為：

鄢江里孱 □□(8-807)

嶽麓書院藏秦簡《二十七年質日》記載“癸亥之鄢具事”<sup>④</sup>，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中有“宜城”，屬南郡。松柏一號墓 47 號木牘中亦出現“宜城”簡文：

宜成千六百九十七人六更更二百六十一人其五十八人助孱陵余八十九人<sup>⑤</sup>

與《漢書·地理志》互證可知，睡虎地秦簡《編年紀》、里耶秦簡、嶽麓秦簡所記載的“鄢”反映的是還沒改名前的情況，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和松柏漢墓木牘的“宜城”，則反映了改名後的情況。

10. 若，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中簡文舉例如：

丞主移捕罪人及徒故囚符左四 丩符到為報書主符 丩令若丞

發它如律令敢告主內官丞印行事□

卅五年三月庚子泰山木功右□守丞勛追ノ□8-462+8-685

……ノ□發(8-462 背+8-685 背)<sup>⑥</sup>

□史若獄□(8-911)

《里耶秦簡牘校釋》一書在涉及“若”相關簡文時未對“若”進行注解。筆者以為，可增補“若”的注解：若，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縣名。由簡文可知，秦代若已置縣，漢代屬南郡。

11. 高成，見於《漢書·地理志》，屬南郡。《里耶秦簡〔壹〕》中簡文僅見一例：

卅年五月戊午朔辛巳司空守敞敢言之冗戌士五(伍)□歸高成免衣用當傳謁遣吏傳謁報敢言之(正)

辛巳旦食時食時隸臣殷行 武(背)(8-666+8-2006)<sup>⑦</sup>

① 此處簡文依據《校釋》改，原釋文未釋出“當”（參見《校釋》，467 頁）。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

③ 參見《校釋》（230 頁）。《編年紀》：“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獄鄢。”

④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

⑤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

⑥ 釋文參見《校釋》（160 頁）。

⑦ 釋文參見《校釋》（197 頁）。



《校釋》指出:《漢書·地理志》南郡、渤海郡屬縣皆有高成。<sup>①</sup> 所以雖然本文仍將此例作為南郡屬縣之例,但必須指出高成有二地,此處並不能完全確定就是南郡的屬縣。

12. 醴陽,不見於《漢書·地理志》。《里耶秦簡[壹]》新公布兩枚相關簡文:

粟=一石九斗少半斗 卅三年十月甲辰朔壬戌發弩繹尉史過出

賁罰戍士五醴陽同□祿

令史兼視平 過手(8-761)<sup>②</sup>

□已醴陽丞□

□勅令史佗□□

□□疵誠不□

□□□□(8-2319)

研究者已經指出醴陽地名此前已三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五、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河堤簡”與荊州松柏一號墓 47 號木牘。<sup>③</sup> 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注釋云:“醴陽,縣名,不見於《漢書·地理志》,‘醴’疑為‘澧’,縣當在澧水之陽,屬南郡。”<sup>④</sup> 彭浩先生認為:“醴陽應位於長江之南,故有江堤。”<sup>⑤</sup> 此前后曉榮先生對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五進行考辨,將醴陽歸屬洞庭郡,認為“醴陽應為秦時漢初置縣”,<sup>⑥</sup> 根據新出里耶秦簡和松柏漢墓西漢簡可知,醴陽確實在秦代就已置縣,並應屬南郡。

13. 銷,未見於傳世文獻,但數見於秦漢簡牘:里耶秦簡 16-52 簡、沙市關沮周家臺秦墓 364 簡、嶽麓書院藏秦簡《三十五年質日》中多枚簡文以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456 簡都出現。<sup>⑦</sup> 這一點已被一些學者指出。<sup>⑧</sup> 《里耶秦簡[壹]》中又新公布了一枚有關“銷”的

① 參見《校釋》(198 頁)。

② 釋文據《校釋》改(參見《校釋》,218 頁)。

③ 參見《校釋》(218—219 頁)。三處出處參見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荊州博物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98 頁。

⑤ 彭浩著:《〈河堤簡〉校讀》,《考古》2005 年第 11 期。

⑥ 后曉榮著:《秦代政區地理》,429 頁。

⑦ 詳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198—189 頁),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等。

⑧ 后曉榮著:《秦代政區地理》,401—402 頁;周振鶴著:《〈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 年第 1 期;周振鶴著:《秦代漢初的銷縣——里耶秦簡小識之一》,簡帛網,2003 年 12 月 11 日;王煥林著:《里耶秦簡釋地》,《社會科學戰線》2004 年第 3 期;晏昌貴著:《張家山漢簡釋地六則》,《江漢考古》2005 年第 2 期;陳偉著:《秦至漢初銷縣地望補說》,簡帛網,2011 年 4 月 5 日。

簡文：

尉曹書三封令印

其一詣銷

一丹陽

一□陵

廿八年九月庚子水下二刻走祿以來(8-453)

前引里耶秦簡 16-52 的里程表記載：“鄢到銷百八十四里，銷到江陵二百四十六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索)二百九十五里，索(索)到臨沅六十里，臨沅到遷陵九百一十里，【凡四】千四百四十四里。”其中，“鄢”和“江陵”都屬南郡，那麼夾在其中的“銷”也極為可能屬南郡，此前周振鶴先生根據這條里耶秦簡，以及《二年律令·秩律》456 簡中“銷”被放置於諸多南郡屬縣之中，亦將“銷”歸入南郡屬縣。<sup>①</sup>

秦代南郡所屬各縣應該不只上面所述各縣，但僅就《里耶秦簡〔壹〕》所見到的秦代南郡的屬縣而言，可知其中包括了《漢書·地理志》所載部份南郡屬縣：江陵、競陵、臨沮、巫、秭歸、夷陵、當陽、鄢、若、高成。《漢書·地理志》孱陵屬武陵郡，秦代當屬南郡。此外，南郡屬縣還應包括史籍未見的醴陽、銷縣。

## 結言

根據對《里耶秦簡〔壹〕》的初步統計，其中出現的縣名以洞庭郡和南郡屬縣最多，并且此二郡屬縣出現最頻繁。至於出現這些屬縣名的文書，內容性質極其豐富複雜，并不像《里耶秦簡〔壹〕》中的很多地名僅僅祇是作為籍貫名出現，考慮到里耶秦簡的出土地即秦代遷陵縣，其與上級郡洞庭郡以及旁郡南郡關係密切，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況，也因此給我們創造了更多考察二郡屬縣的條件。本文考述了《里耶秦簡〔壹〕》中所見到的秦代洞庭郡、南郡的屬縣，主要根據簡文自證以及歷史沿革羅列《里耶秦簡〔壹〕》中所見的秦代洞庭郡、南郡屬縣，因此，以上所舉秦代洞庭郡、南郡的屬縣可能未能詳盡，并且存有紕漏，希望將來有更多資料可以逐一落實各個縣的歸屬。

附記：本文寫作中得到鄔文玲先生的幫助，特此感謝。

<sup>①</sup> 周振鶴著：《〈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 年第 1 期。

附表：

郡名	《里耶秦簡〔壹〕》 所見屬縣	簡號	《漢書·地理志》 中相关记载
洞庭郡	遷陵	5-1;5-35;6-2;6-4;6-18;6-19;8-12;8-29;8-32;8-60;8-61;8-62;8-63;8-71;8-74;8-78;8-80;8-84;8-85;8-90;8-99;8-106;8-133;8-134;8-135;8-136;8-137;8-138;8-139;8-140;8-143;8-144;8-146;8-151;8-155;8-157;8-158;8-159;8-165;8-166;8-176;8-178;8-181;8-182;8-183;(8-185;8-188;8-189;8-195;8-197;8-202;8-203;8-209;8-210;8-230;8-245;8-255;8-264;8-272;8-288;8-289;8-303;8-304;8-305;8-309;8-311;8-319;8-320;8-321;8-333;8-338;8-352;8-354;8-360;8-362;8-368;8-372;8-377;8-378;8-382;8-406;8-410;8-413;8-416;8-417;8-422;8-429;8-433;8-438;8-443;8-458;8-469;8-475;8-494;8-504;8-505;8-507……(注:遷陵在簡文中出現數量極多,恕不一一列舉)	屬武陵郡
	酉陽	5-34;8-50;8-65;8-133;8-145;8-158;8-159;8-167;8-226;8-543;8-647;8-713;8-747;8-1011;8-1130;8-1131;8-1174;8-1295;8-1432;8-1448;8-1462;8-1465;8-1565;8-1669;8-1886;8-2120;8-2443	屬武陵郡
	零陽	5-1;8-159;8-375;8-519;8-1886;8-2430	屬武陵郡
	臨沅	8-50;8-57;8-66+8-208(注:此簡據《校釋》綴合,參見《校釋》,52頁);8-151;8-547;8-560;8-695;8-855;8-970;8-1032;8-1432;8-1445;8-1460;8-1722;8-1911;8-2412	屬武陵郡
	索	8-159;8-1775;8-1841;8-1931	屬武陵郡
	沅陵	6-24;8-145;8-186;8-244;8-255;8-265;8-472;8-492;8-647;8-940;8-1058;8-1426;8-1618;8-1729;8-1897;8-2221;8-2436	屬武陵郡
	鐔成	8-1373	屬武陵郡
	無陽	5-22;8-1555	屬武陵郡
	辰陽	8-373	屬武陵郡
	充	8-201;8-242;8-468;8-632;8-903;8-987;8-1624;8-2430	屬武陵郡
	門淺	8-159;8-66;;8-1184	未見
	上行	8-159;8-1450;8-2351;8-2414	未見

续表

郡名	《里耶秦簡〔壹〕》 所見屬縣	簡號	《漢書·地理志》 中相关记载
南郡	江陵	8-1328;8-1444	屬南郡
	孱陵	8-467;8-1444;8-1545;8-1754	屬武陵郡
	競陵	8-135;8-896;8-146;8-1533	屬南郡
	臨沮	8-140	屬南郡
	巫	8-793;8-1014;8-1083;8-1547;8-1563;8-2336(注:此簡“巫” 字后殘斷)	屬南郡
	秭歸	8-1516	屬南郡
	夷陵	8-160;8-1250;8-1452	屬南郡
	當陽	8-2235;8-2430	屬南郡
	鄢	8-807	屬南郡
	若	8-84;8-462+8-685;8-911;8-1915;8-2346	屬南郡
	高成	8-666+8-2006	屬南郡(存疑)
	醴陽	8-761;8-2319	未見
	銷	8-453	未見

## 再論里耶秦牘 8-157 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游逸飛

**內容提要** 本文重新探討里耶秦牘 8-157 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同意書手壬為啓陵鄉吏的觀點，進而指出該牘原為啓陵鄉上呈的正本，由壬書寫；送到遷陵縣後，由欣拆封并記錄於背面左側；最後又由第三位書手抄錄對啓陵鄉的回覆，成為遷陵縣的副本。該牘既是正本，又是副本，反映文書在流動過程中的轉化現象，為公文書抄寫制度與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啓發。

**關鍵詞** 里耶秦簡 書手 正本 副本

里耶秦牘 8-157 記載了啓陵鄉郵人的任命及遷陵縣的批示，自 2003 年公布以來<sup>①</sup>，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sup>②</sup> 然而該牘的抄寫者是啓陵鄉吏還是遷陵縣吏？是文書正本還是副本？學界至今仍無共識。為了討論便利，先完整徵引該牘內容如下。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4—35 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9 頁；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94—95 頁。

② 主要研究見下，下文引用時不再詳列出處。李學勤著：《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 年第 1 期，73—81 頁；劉瑞著：《里耶秦代木牘零拾》，《中國文物報》2003 年 5 月 30 日第 5 版；胡平生著：《讀里耶秦簡劄記》，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編：《簡牘學研究》第 4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6—16 頁；于振波著：《秦漢時期的郵人》，《簡牘學研究》第 4 輯，34—41 頁；[日]里耶秦簡講讀會：《里耶秦簡譯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8 號（2004），88—137 頁；邢義田著：《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75—296 頁，後修改收入所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473—498 頁；馬怡著：《里耶秦簡選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4 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33—186 頁；王煥林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黎明釗、馬增榮著：《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簡帛》第 5 輯，2010，55—76 頁；胡平生著：《里耶簡所見秦朝行政文書的製作與傳送》，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30—54 頁；呂靜著：《秦代行政文書管理形態之考察——以里耶秦牘性質的討論為中心》，簡帛網，2010 年 2 月 22 日；張樂著：《里耶簡牘“某手”考——從告地策入手考察》，簡帛網，2011 年 4 月 18 日；單育辰著：《談談里耶秦公文書的流轉》，簡帛網，2012 年 5 月 25 日。

正面：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啓陵鄉夫敢言之：成里典、啓陵  
郵人缺，除士五成里句<sup>4</sup>成<sup>5</sup>爲典，句爲郵人。謁令、  
尉以從事，敢言之。

背面：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郤之啓陵：廿七戶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爲典，何律  
令？

應（應）尉已除成、句爲啓陵郵人，其以律令。／氣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  
正月丁酉旦食時，隸妾冉以來／欣發 壬手。

胡平生《讀里耶秦簡劄記》首先較全面地探討該牘的內容與閱讀次序：正面三行是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啓陵鄉上呈遷陵縣的公文內容；背面左側第一行是正月二十日縣吏欣的文書拆封記錄；背面右側第一行與第二行上半（至“氣手”爲止）是正月二十日遷陵縣的質問與批覆；背面右側第二行下半（從“正月”至“快行”）與左下角的“壬手”是正月二十一日遷陵縣批覆的發出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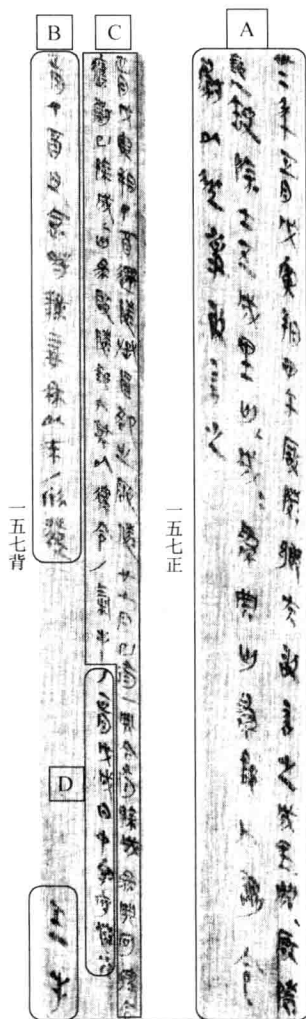
邢義田則指出該牘上有三種筆迹，分別對應三名書手：正面三行與背面左下角的“壬手”是第一種筆迹，書手是“壬”，可見“壬”絕非遷陵縣批覆的發出記錄的書手；背面左側第一行是第二種筆迹，可能是拆封者“欣”所書；背面右側第一行與第二行上半是第三種筆迹，可根據文中的“氣手”推測是“氣”所書。“壬”、“欣”、“氣”都是遷陵縣吏，該牘是遷陵縣抄存的底本，不存在任何啓陵鄉吏的筆迹。

黎明釗、馬增榮全面研究里耶秦牘裏“某手”的筆迹與身份，指出“某手”是指文書經手人，要對文書負責任，但“某手”二字不一定爲“某”親筆簽署，可由他人代書。“某手”書於文書背面左下角是秦代正式的文書格式，書手抄寫副本時不按照原件格式，常將“某手”直接抄於文書內容之後，用一斜綫區隔。<sup>①</sup> 根據文書格式，8-157 應是遷陵縣的副本，但正面三行與背面左下角的“壬手”應是發文官署啓陵鄉的屬吏所書。<sup>②</sup>

① 黎明釗對里耶秦牘文書格式的理解繼承了劉瑞的意見，但劉瑞認爲“某手”就是抄寫者，黎不同意。後來張樂認爲“某手”不是抄寫者，而是佐史，亦嫌絕對。目前還是黎明釗的意見最具彈性，較爲可取。最近單育辰根據《里耶秦簡（壹）》公布的新材料，重新探討里耶秦牘的文書格式，對“某手”的分析近似黎明釗。

② 黎明釗進而考察 J1(9)981 背面左下角的“壬手”，指出筆迹與 J1(8)157 的“壬手”不同，非一人所書；而 J1(9)981 是田官守敬發出的文書，該牘的“壬”是田官屬吏，非啓陵鄉吏；既然筆迹與任職官署都不同，二牘的壬應非一人。然而黎明釗該文的重點即是指出“某手”可以由他人代書，因此筆迹的不同並不足以證明壬非同一人。而學者又指出走馬樓吳簡常見的伍訓、殷連、潘琬、烝若等人的吏職常在短短數年內有所更動，是同一人擔任不同職務的反映（參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與“鄉吏”》，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1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87—113 頁）。因此職務的不同亦不足以證明壬非同一人。J1(9)981 的紀年爲三十年九月，J1(8)157 則爲三十二年正月，兩牘相隔雖僅一年多，仍不能排除“壬”的職務可能從田官調至啓陵鄉，兩牘的壬爲同一人。

上述三位學者均在前人的基礎上力求突破、層層推進，不斷增益我們對 8-157 的理解。<sup>①</sup>將 8-157 的“壬”視為啓陵鄉吏，而非遷陵縣吏，確實較為合理。但 8-157 出土於里耶古城，也就是遷陵縣治，其為遷陵縣文書副本的判斷亦難以動搖。倘若 8-157 是遷陵縣的副本，正面三行與背面左下角的“壬手”為何是由啓陵鄉吏所書呢？鄉吏說與副本說之間，產生了必須調和的矛盾。我認為根據時間、空間、人員重新探討 8-157 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有助於解決上述矛盾。下文以胡平生對該牘內容的分類為基礎，唯將背面左下角的“壬手”與正面三行歸為一組，將該牘內容分成 ABCD 四組（附圖），加以討論。



① 胡平生後來在《里耶簡所見秦朝行政文書的製作與傳送》同意“壬”是啓陵鄉吏，而非遷陵縣批覆的發出記錄的書手，但不同意邢義田提出的三種筆迹之別，認為該牘內容可能全由“氣”所書寫，是遷陵縣抄存的副本。胡平生不同意透過筆迹差異推測書手不同的研究方法，認為其忽視了同一人可以有不同筆迹。我認為僅從筆迹差異出發，確實很難推导出書手不同的結論。但秦漢文書制度確實存在不同書手在同一簡冊、木牘上書寫，而里耶秦牘上確實也存在不同的筆迹。若忽視筆迹，便容易把簡牘文書的構成看得過於簡單。若綜合文書內容、格式等不同因素，“筆迹學”仍不失為一種分析秦漢簡牘文書的有效方法，本文的討論即奠基於邢義田與黎明鈞的筆迹研究之上。

邢義田與黎明釗均認為 B 組的筆迹與他者有別,可能出自“欣”手,是該文書的拆封記錄。如果以上對筆迹與內容的判斷準確,那便有力證明了 8-157 是啓陵鄉的上呈文書正本。因為欣拆封時所作的記錄(B 組)應寫於文書正本之上,而非拆封時尚未製作的副本。我們無法想像欣會將拆封記錄寫在一塊正反面均無字迹的空白木牘上,之後再謄錄文書正本內容,使之成為副本。欣的拆封記錄必須寫在正本上,才能有效檢驗文書傳遞是否有所拖延、不合規定。換言之,欣必定是 8-157 的第二位書手。在欣書寫之前,該牘內容只有 A 組(正面三行與背面左下角的“壬手”)。啓陵鄉吏壬是“始作牘者”,8-157 是啓陵鄉的上呈文書正本。

但 8-157 不僅僅是啓陵鄉的上呈文書正本,否則我們無法理解它的背面為何會有 C 組(遷陵縣的回覆內容)及 D 組(發出記錄)。8-157 也不會是遷陵縣回覆的正本,因為正本應已送至啓陵鄉,該牘出土於遷陵縣治,應當只是遷陵縣回覆的副本。正本與副本同在一塊木牘的情形似乎只宜如此理解:遷陵縣吏某抄寫回覆啓陵鄉的副本(C 組)時,並未使用新牘,而是直接抄在原先啓陵鄉上呈正本的背面。

邢義田與胡平生均根據 C 組的“氣手”推測氣是抄寫副本的書手。然而根據黎明釗對“某手”的分析,“氣手”原應見於遷陵縣回覆啓陵鄉公文正本的背面左下角,遷陵縣吏某抄寫副本時,在回覆公文內容與“氣手”之間用斜綫標示。氣是遷陵縣回覆啓陵鄉公文正本的經手人,沒有證據證明氣也是副本的經手人。本文的匿名審查人曾推測 8-157:





應該是遷陵縣長官在啓陵鄉所呈文書上進行批覆處理的底本及發文記錄,並非專門抄錄的副本。回覆文書的正本當是照此底本作成,而非相反。在來函原件上進行批覆處理,當是沿用至今的一種習慣做法。當然,批覆意見可以是長官手書,亦可由長官口授、書手錄寫。該木牘當屬於後者。

其意見值得重視。唯正本的“氣手”被副本抄錄這一現象,顯示正本的製作早於副本,8-157C 組應當是專門抄錄的副本。除非遷陵縣回覆啓陵鄉公文的正本與副本都是“氣”所抄寫。因此氣在 8-157 上錄寫遷陵縣丞口授命令(C 組)時,可以預知正本背面左下角也會寫上“氣手”,故在 8-157 上預先寫下“氣手”。無論如何,C 組是 8-157 第三位書手所留下的記錄。

最後分析 D 組(發出記錄)的內容與筆迹。C 組與 D 組的墨迹濃淡有別,顯非一氣呵成之作,D 組應當是在 C 組抄寫後方補上。C 組紀日為正月丁酉(二十日),D 組紀日為正月戊戌(二十一日),遷陵縣回覆啓陵鄉的公文內容雖抄寫於二十日,直至第二天(二十一日)才送出。故 C 組應抄寫於二十日,D 組應抄寫於二十一日,兩者的抄寫時間隔了一天。邢義田之前分析筆迹差異時,未曾討論 D 組,大抵因其內容較短,不易分析之故。唯整理 ABCD 四





組所書的“正月”：

A	B	C	D
			

A 組的“正”字的第四筆豎劃疑似省略；B、C、D 組的“正”字下部大抵保留金文(𠄎)以來的書風，第四筆豎劃與最後一筆橫劃連成一筆書寫。A、B、D 組的“月”字第一筆豎劃微向左撇；C 組“月”字第一筆豎劃明顯往右撇，且向下長度超過第二筆的末勾。綜合“正”“月”二字的筆迹特徵，可將 B、D 歸為一類，A、C 各自獨立為一類。只有 A 組作者是啓陵鄉吏，A 組筆迹自成一類并不令人意外。BCD 三組的作者都是遷陵縣吏，但遷陵縣吏為數不少，C 組筆迹與 B、D 有別，亦在情理之中，副本內容(C)與發出記錄(D)應非一人所書。B、D 筆迹相似，是否說明 B、D 為一人所書，作者都是“欣”呢？上表的樣本太少，僅有“正”“月”二字，此推論過於大膽。唯 B 組是收文記錄、D 組是發文記錄，兩者皆是遷陵縣文書的收發記錄，書寫時間又僅隔一天；如果遷陵縣的文書收發在同一時段內由一人負責，那 B、D 的作者就很有可能均為欣。

最後指出里耶秦簡 8-158 正面內容為秦始皇三十二年四月的遷陵縣文書，背面左下角的“欣手”說明該文書可能由欣抄寫，可能與 8-157 的欣是同一人。但 8-158 背面左上的發出記錄筆迹與正面筆迹大相逕庭，作者應不是欣。

D(8-157 背)	8-158 背
	

既然 8-158 發出記錄的“守府快行”不是欣的筆迹；那該筆迹與 D 組的“守府快行”有別，就無法證明 D 組并非欣的筆迹。D 組的作者仍可能是欣。事實上 8-158 進一步證實抄寫文書的縣吏與收發文書的縣吏不同，收發文書應有專人負責。8-157 的文書收發者確實

可能都是欣。欣可能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專門負責遷陵縣的文書收發，并在木牘上書寫記錄。欣既是 8-157 第二位書手，也是第四位（最後一位）書手，他“完成”了我們現今所見的里耶秦牘 8-157。

至此我們比較完整地恢復了里耶秦牘 8-157 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它“曾經”是啓陵鄉上呈的正本，由壬書寫；送到遷陵縣後，由欣拆封并記錄於背面左側；再由第三位書手抄錄遷陵縣丞對啓陵鄉的回覆，最後由欣寫下正本的發出記錄，始成為遷陵縣的完整副本。正如邢義田所言：“同一份文件在收、發、留底再轉送的流程中，會因為在流程中所處的位置和發生的作用而有正副角色重疊或轉換的現象。”<sup>①</sup>

為何秦遷陵縣吏會在原先的正本上抄寫回覆的副本內容呢？本文揣測其原因不外兩種：一是提高文書處理的效率。里耶秦簡、西北漢簡、走馬樓吳簡等文書簡內容之豐富，在提醒我們須正視當時地方小吏所面對的高強度文書行政工作。在正本上抄寫副本，可以將既有的正本轉化為副本，大量減少抄寫的負擔。遷陵縣於正月二十日收到啓陵鄉的文書，並於正月二十日，也就是當天即批覆公文、製作副本。其文書處理效率之高，應當與將正本轉化為副本的做法有關。同時也減省副本文書的儲藏空間，甚至降低新簡牘的製作量。有效利用正本文書行政在不使用紙、沒有影印機的秦代，或許是必然發展出來的作法。

一是減少抄寫文書的錯誤。戰國秦漢沒有絕對可靠的復寫紙、影印機，無論書手如何謹慎，都無法保證抄寫副本時百分之百正確。戰國秦漢簡牘所見的抄寫訛誤，即使在公文書上也屢見不鮮。為了減少抄寫錯誤所帶來的行政困擾，保存、使用所收到的正本，在其基礎上製作副本，是必然且必須的作法。隨着包山楚簡、西北漢簡等舊材料的重新發掘，以及里耶秦簡、走馬樓吳簡等新材料的刊布，我們或許可進一步探索秦漢公文書的抄寫制度與抄寫文化。<sup>②</sup>

（本文初稿為“漢簡研究專題”的課堂報告，得到邢義田老師、同學高震寰指正，修訂稿得到方令光學長、劉欣寧學姊指正，唯一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① 見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82 本第 4 分，2011，601—676 頁）。呂靜亦有類似的見解，但在她的分類中，J1(8)157 屬於“‘一事多文一牘’的多件文書”，並認為“其中的每一件文書都是具備獨立意義的行政公函”。我認為用正本、副本的概念理解 J1(8)157，會比“多件文書”、“每件文書都是獨立公函”更加精確。

② 出土簡帛典籍的研究者，已經開始探討“寫本文化”等課題。但出土簡牘文書的研究者，目前似乎仍偏於制度史層面的研討。參[美]夏含夷《〈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結論》（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09—514 頁），來國龍《論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與固定》（《簡帛》第 2 輯，515—527 頁），馮勝君《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簡帛》第 4 輯，2009，411—424 頁），[美]李孟濤《試探書寫者的識字能力及其對流傳文本的影響》（杜恒譯，《簡帛》第 4 輯，395—402 頁）。

## 里耶秦簡債務文書初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張燕蕊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針對里耶秦簡中與債務相關的文書，將其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進行初步分類和研究，認為債務類型相似的文書也具有相對固定的格式，其在地地方政府之間的往來有一定規律，文書發出之前都需留檔并定期核查是否已收到回覆，此外，無論是政府與官吏或民衆之間的債務，還是民衆之間的私人債務，均與政府有一定關聯。由此可以反映出政府對大至財政收支、小至文書往來等各方面的管理都是非常嚴格和細密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政府的財政管理狀況和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先進性。

**關鍵詞** 債務 文書 管理

已公布的里耶秦簡中有很多與債務相關的官文書，其類型各不相同，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對它們進行分類研究，能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瞭解當時政府的財政政策和經濟管理狀況。本文嘗試對里耶秦簡中與債務直接相關的文書進行分類探討，研究對象暫不包含間接涉及債務問題的文書。

里耶秦簡中的債務文書，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劃分成不同的類型。

首先，根據標的物的性質可分為貨幣債務和實物債務兩大類：

### （一）貨幣債務文書

迄今所公布的里耶秦簡中，以貨幣衡量還款數額的債務文書數量較多。此類文書內容極為相似，應是以一定格式為基準的公文。如：

例 1.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陽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貲餘錢八

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今爲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縣責以受(授)陽陵司空。[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年爲報。已訾其家，[家]貧弗能入，乃移戍所。報署主責發。敢言之。ノ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廚敢言之：寫上，謁報，[報]署金布發。敢言之。ノ僭手。(J1⑨1 正)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陽陵守慶敢言之：未報，謁追，敢言之。ノ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假)尉鱣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報之。當騰[騰]。ノ嘉手。·以洞庭司馬印行事。敬手。(J1⑨1 背)<sup>①</sup>

目前所見，編號爲 J1⑨1—12 的木牘文書內容和格式基本相似，<sup>②</sup>因其發布較早且數量較多，引起了學界的較大關注，相關研究成果較多。本文僅就其中爭議較大的問題做進一步討論。

關於文書的斷句及釋義，學界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處：一是“問何縣官計年爲報”句，<sup>③</sup>目前的斷句有“問何縣官，計年爲報”<sup>④</sup>和“問何縣官計，年爲報”<sup>⑤</sup>兩種。對句意理解產生分歧的關鍵是對其中“計”字的理解不同。有作“計算、記帳、勞績登記”解，認爲是以勞績爲依據結算報酬<sup>⑥</sup>；有作“官府計帳”解<sup>⑦</sup>。筆者更傾向於後者，因爲此文書所涉及的債務是名叫“毋死”的士伍所欠官府的貲錢，與毋死根據勞績計算得到多少報酬并無太大關係，反而由於其所屬地變化導致計帳由何地官府負責成爲需要討論的問題。從內容來看，牘文應與官府計帳如何進行有關，“計”作“官府計帳”解更恰當。該句斷爲“問何縣官計，年爲報”文意更順暢，意思是“問由哪方官府計帳，按年給予回覆”。

二是“洞庭段(假)尉鱣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句，其斷句有“洞庭段

① 此木牘文書在不同學者的文章中，斷句各有不同。本文斷句主要參考以下各文中所討論的相同木牘文書，如：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1 頁)。同時也參考了以下各文中所討論的相似木牘文書，如：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 年第 1 期)，張俊民《秦代的討債方式——讀〈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0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編：《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③ 參考其他木牘文書可知，此句有奪文，全文應爲“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但對斷句無太大影響，因此不予詳述。

④ 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編：《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⑤ 王煥林著：《里耶秦簡校詁》；馬怡著：《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1 頁。

⑥ 王煥林著：《里耶秦簡校詁》。

⑦ 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編：《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馬怡著：《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1 頁。

(假)尉觸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sup>①</sup>和“洞庭段(假)尉觸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sup>②</sup>兩種，前者將遷陵丞與陽陵卒署并列，無論是從語義還是從用法上來說，都不太合適，後者斷句後釋為“洞庭代理郡尉告訴遷陵丞，來自陽陵的戍卒在遷陵服役，請你按照相關律令處理”(“洞庭段(假)尉觸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顯然更為通順。

該木牘文書所述的主要內容是：一位名叫“毋死”的陽陵人欠了貲錢，陽陵縣司空負責追討，由於毋死已到洞庭郡去做戍卒，不知其戍所屬何縣，因此，陽陵司空呈文至洞庭郡，隨附錢校券以示證明，請負責官吏查出其所屬縣，並負責債務的追討，同時與該縣商討由何方計帳。由於此前當地官府已到毋死的家裏去追討，但未果，故祇好將債務移至其戍所，由毋死所在官署的負責人繼續追討。由此而產生的四份公文往來共同構成了此木牘文書。

關於此類文書的一些問題學界已有基本一致的結論，如從結構看，此類文書共包括四個子文書，其中前三個子文書是錄文，它們按照時序疊加起來，為記錄在此之前該事件的來龍去脈，最後一份子文書是主文書，是對此事件的處理要求。從內容看，是關於貲、贖之罰的清償結算問題。<sup>③</sup>

與此同時，仍有一些觀點存在爭議。如債務人最初的身份到底是“居貲贖債”者，<sup>④</sup>還是“戍卒”，<sup>⑤</sup>目前還沒有定論。筆者更傾向於“戍卒”說，如果債務人最初的身份是“居貲贖債”者，成為戍卒是為了抵債，那麼其在本縣產生的債務，不應到遠離陽陵縣的洞庭郡去服役，而應在本縣服役。且在其成為戍卒的時候，因服役的同時債務也在不斷減少，暫時應該無法核算債務。若其最初身份是“戍卒”，在服役期內由於某些原因出現需要居貲贖債的情況，則上述債務文書的內容可以解釋得更加通順。

無論債務人最初的身份為何，其內容都涉及居貲贖債，因此至少可以確定，這類文書反映的是居貲贖債者的債務償還問題，而居貲贖債，正是政府與民衆之間債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類木牘文書的內容可從側面反映政府對於居貲贖債者追討債務的基本流程、賬務處理、文書範式等一系列問題。從此文書至少可以推斷一些問題，例如：

(1) 負責追討債務的是該債務人籍貫所屬縣的司空；(2) 用以追討債務的“錢校券”，其

① 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編：《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② 王煥林著：《里耶秦簡校詁》；馬怡著：《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1頁。

③ 參見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1頁），張金光《秦貲、贖之罰的清償與結算問題——里耶秦簡 JI(9)1-12 簡小記》（《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0年第7期），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

④ 馬怡著：《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9頁。

⑤ 王煥林著：《里耶秦簡校詁》，199頁；張金光著：《秦貲、贖之罰的清償與結算問題——里耶秦簡 JI(9)1-12 簡小記》，《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0年第7期；朱紅林著：《里耶秦簡債務文書研究》，《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內容至少包括債務人的名字、籍貫、身份、債務標的物的具體形式、數量；(3)其債務追討的基本流程是，由於該債務人已至他郡戍守，因此先由該債務人籍貫所屬縣的負責人至該債務人家中索取，如無法償還，則由該債務人所屬縣的司空寫文書，由縣丞簽發，并附校券至該債務人現居郡，由郡負責人查找其所屬縣，再由其現居縣所在署負責人繼續追討債務，并回覆給原籍貫所屬縣負責人，商討該由哪方計帳的問題；(4)其文書往來的大致程序是，由債務人籍貫所屬縣司空擬文書及校券，并由縣丞簽發，發至債務人現居郡，如未收到回覆，則由縣守再次發文催問，最終由債務人現居郡尉回文給債務人籍貫所屬縣丞，告知該債務人現居縣，由該縣負責追討。根據文書內容，這份文書最終應由遷陵縣負責，而里耶秦簡的出土地即為秦代的遷陵縣，也就是說，此文書確實被送到了遷陵縣，是給遷陵縣負責人用以說明該事件完整過程的文書。此外，該文書第一次發出是在二十三年四月，到二十四年六月時發現未收到回覆，因此再次發出，至二十五年四月最終收到回覆，才被轉至最終應負責此事的縣，其間隔有兩年之久，如此長的時段中，如沒有較為完整的留檔是不可能發現未收到回覆的。由此可以猜想，文書發出前應有留檔，後續文書均需交代前文，以便明瞭前因後果，且留檔文書應該會定期檢查清理，如在一段時期內未收到回覆，才能及時發現，并根據留檔文書重新書寫後再次發出，直至收到最終回覆。

## (二) 實物債務文書

例2.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穆敢言：前日言競陵漢陰狼假遷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以求故荆積瓦。未歸船。狼屬司馬昌官。謁告昌官，令狼歸船。報曰：狼有逮在覆獄已卒史衰、義所。今寫校券一牒上，謁言已卒史衰、義所，問狼船存所。其亡之，為責券移遷陵，弗□□屬。謁報。敢言之。ノ【九】月庚辰，遷陵守丞敦狐却之：司空自以二月段（假）狼船，何故弗蚤辟□，今而誦（甫）曰謁問覆卒史衰、義。衰、義事已，不智（知）所居，其聽書從事。ノ應手。即令走□行司空。（8-135 正）

□月戊寅走己巳以來。ノ應半 □手。（8-135 背）<sup>①</sup>

從此木牘文書裏我們能看到，在秦代，政府與民衆之間發生債務關係時，有時會出現一些因各種原因導致無法歸還所借財物的情況。出現這種狀況時，如能全面瞭解政府對此類問題的處理過程，則不但能反映出當時政府對自身財務的管理狀況，又能從側面反映政府的一些經濟政策和管理手段。

此木牘文書所述的主要內容是：一個叫“狼”的人借用了遷陵縣的公船，一直未能歸還，

<sup>①</sup> 木牘文書內容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對簡文進行斷句和部分文字的修改系依據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下同，不另出注。



後來遷陵縣司空發文詢問其原屬機構官員，回覆稱其有獄事，於是將其所欠書於校券上，發文書并附校券至負責其獄事的官吏處，責成其追討，如果已經丟失，就做責（債）券，交回遷陵縣，之後遷陵守丞針對此文書回覆說，現在狼獄事已結束，不知現在居作之所，要求按照文書指示辦理。此枚木牘文書就是對此事件經過所做的記錄。<sup>①</sup>

從此木牘文書可看到當時對此類事件的大致管理流程。從文書內容上看：（1）具體負責管理債務問題的官員是司空；（2）船隻在出借時，必然會進行登記，其記錄內容至少包括債務人名字、籍貫、債務標的物的名稱、具體形制和數量、標的物所屬地、出借標的物的具體用途、出借的時間等；（3）其債務追討和文書往來的大致程序是，在逾期未還時，由債務人所屬縣司空首先發文至該債務人原屬機構官員處詢問，責成其負責追討，得到回覆得知該債務人現屬機構，然後向其發出文書并附校券，要求直接對該債務人有管轄權的官吏去督辦歸還，如果出現異常情況還是不能歸還，如此木牘中為船隻丟失或有其他原因，則會填寫責（債）券交給當時出借的地方政府，其內容除了標的物借出時所登記的文書內容之外，還要注意此標的物尚未歸還，以責券作為存檔或是繼續追還的憑證。自二月“狼”借船開始，至八月司空開始責成相關人員追討，再至九月縣丞回覆，最後至十月進行最終的完整記錄，歷經八個月左右，才暫告一段落。這期間經歷的各種周折，都詳盡地記錄在木牘文書中，使看到此文書的人能夠最大程度地瞭解到此事件的來龍去脈。觀其文書形式及往來均與前例有相似之處，可見無論債務標的物的性質為何，當時政府對此類債務問題的管理都是比較重視的，對其相關文件的記錄和收存也是相當嚴密周全的，其文書往來的程式和檔案管理也都是很規範的。

其次，根據債務雙方的身份可以分為政府與民衆之間、政府與官吏之間、民衆私人之間等幾類。上引兩例均為政府與民衆之間發生的債務。除此之外，里耶秦簡中還有一些政府與官吏之間由於工作等原因而產生的具有負債或賠償關係的木牘文書，如：

例3. 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煩故為公田吏，徒屬。事荅不備，分負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錢三百一十四。煩冗佐署遷陵。今上責校券二，謁告遷陵令官計者定，以錢三百一十四受旬陽左公田錢計，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為報。<sup>②</sup> 敢言之。ノ三月辛亥，旬陽丞滂敢告遷陵丞主：寫移，移券，可為報。敢告主。ノ兼手。ノ廿七年十月庚子，遷陵守丞敬告司空主，以律令從事言。ノ應手。即走申行司空。（8-63 正）

十月辛卯旦，胸忍索秦士五（伍）狀以來。ノ慶半。 兵手。（8-63 背）

① 關於此木牘文書的內容討論可參看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1 頁）。

② 此句依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斷句為“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為報”，筆者認為此處“計”字亦應釋為“官府計帳”，因而“付署”一詞應連用，“署”為戍卒的管理機構，在漢簡中多見“在署”、“居署”、“見署”、“去署”、“離署”等記載（如居延漢簡 127·27、194·17 等），此斷句應為“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為報”更為通順。參見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簡帛》第三輯，191 頁）。

此木牘文書的主要內容是：一個名為“煩”的官吏因為在旬陽縣任公田吏時，沒有按要求備足所需要的糧食，導致要分擔賠償部分糧食，其賠償部份要換算成貨幣，數額為三百一十四錢，而此吏已經調任遷陵縣，所以名為“丁”的旬陽左公田將責券與校券移至遷陵，並與遷陵縣負責官府計帳的吏員商討該由何方計帳的問題，由此而產生了四份文書往來，最終形成此木牘文書。在這一事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此事件中是將實物換算為貨幣作為還款依據，體現了在秦代的政府公文中涉及經濟內容時，已經開始出現以貨幣作為價值衡量手段的趨勢。其次，該名為“煩”的官吏，現在已經調離原任，此木牘文書的內容是問其賠償的金額要由何方計帳，並要將記錄這一債務的責券和校券轉移到其現居縣去，而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往來公文，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例3。

這一規定，在其他秦簡中也可以找到類似內容，如《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中有規定：

例4. 有責(債)於公及賞、贖者居它縣，輒移居縣責之。<sup>①</sup>

由例2、例3、例4可見，在秦代，不論是負債還是賞、贖等情況，也不論是涉及貨幣還是實物，祇要是與政府之間產生的債務關係，都是跟隨債務人移動的，債務人移居到哪裏，就由哪裏的地方政府負責追討該債務，如需計帳，則由兩地政府商議決定計入何方，並且有專用的具有固定格式的券書來證明這一轉移過程。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財政收支政策，也就是說，與政府相關的債務，必須由對債務人具有現行管轄權的地方政府負責追討，但是在記錄債務的出入及狀況時，並不一定要由居縣計帳，祇要最終帳目平衡即可。這一原則，即使是在今天，由於各地方政府的經濟割據，也並不容易實現，而在秦代之所以能夠實現，應是與其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其便於管理的郡縣二級制以及政府對財政問題的重視和細緻管理等原因密不可分的。

在里耶秦簡中，除了政府直接參與的債務關係外，還包含了一些民衆個人之間債務的文書：

例5. 粟米一石九斗少半斗。卅三年十月甲辰朔壬戌，發弩繹、尉史過出資罰戍士五(伍)醴陽同□祿。廿令史兼視平。 過手(8-761)

【說明】左側刻齒為“一石九斗少半斗”。

此木牘文書是名為“繹”和“過”的兩個人貸米給名為“祿”的士伍的記錄，其中記錄了債務開始的時間、債權人的姓名、身份、債務人的姓名、身份、籍貫、債務標的物的種類、數量、見證人的姓名、身份、記錄人的姓名，根據木牘上有刻齒可以判斷此券書應是一式兩份或三份，此木牘為幾份券書之一。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60頁。



此木牘文書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該債務人的身份是士伍，同時還標明為“罰戍”，里耶秦簡中還有幾處出現了罰戍一詞，除“罰戍士五(伍)”之外還有“罰戍公卒”(簡8-2227)，可見“罰戍”并非指代一種固定身份，而是用於修飾其本來身份的限制詞，從其詞義來看，應是被罰戍邊之義，但保留其原有身份，應是與普通的罪犯有差別，除此之外，里耶秦簡中還有“居貲士五(伍)”的債務記錄(如簡8-985、8-1014、8-1328)，結合前引例1，筆者猜想“居貲士五(伍)”有可能是指居貲贖債者，由於欠債而被罰戍邊，“罰戍士五(伍)”可能是由於一些過錯而被罰戍邊，但過錯并不大，因此并未真正淪為罪犯，由於其身份特殊，但與罪犯又有所不同，祇要懲罰期結束就可以恢復原有身份，因此在其身份之前加上“居貲”或“罰戍”等字以示區別。這些人的身份雖然有些特殊，但仍然可以自由地和其他人建立債務關係，但這些身份限制詞基本上都出現在債務記錄中，說明在債務關係這類特殊情況中，還是要對他們與普通人加以區別。其二，此木牘文書看起來似乎祇涉及了民衆之間的債務關係，其債權似乎并不直接屬於官府，但是由於里耶秦簡基本上都是政府的檔案文書<sup>①</sup>，因此這些民間的債務關係也應與政府有一定關聯。從文書的內容上看，債權人一方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吏，因此可能需要政府在整個債務關係中做為見證方或監督方，並立檔存據，例如此木牘文書中見證人即為令史，且里耶秦簡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債務記錄以令史為證的例子，如簡8-762、簡8-763、簡8-764、簡8-766等，可見由令史做見證，很有可能是有意為之或規定如此，可能是為了使債務的償還能夠順利地進行，這大概也是它得以在政府檔案中保存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政府還有可能直接參與民衆間債務糾紛的解決，如：

例6. 令佐華自言：故為尉史，養大隸臣豎負華補錢五百，有約券。豎捕戍卒□□□事贖耐罪賜，購千百五十二。華謁出五百以自償。ノ卅五年六月戊午朔戊寅，遷陵守丞衙告少內問：如辭(辭)，次豎購當初畀華，及告豎令智(知)之。ノ華手(8-1008+8-1461+8-1532)

華□(8-1461 背)

此木牘文書的大致內容是，一個名為“華”的官吏向遷陵縣政府負責人上書，稱與名為“豎”的有債務關係，且有“約券”即契約為證，豎在抓捕逃犯時得到了一些賞金，因此華要求其償付所借債務，於是遷陵守丞要求負責支付賞金的少內部門負責人，在給付賞金之前應該先將豎所負債務償還給華，並要告知豎。

由此木牘文書可見，對於與政府無直接關係的債務，或因其債務人是官府官吏，或因其

<sup>①</sup> 此說法詳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

中涉及到官府購賞,官府也會參與其中,起監督的作用,並且在必要時,可能會采取強迫性的手段使償還能夠順利進行。

除了上述各類明確記錄債務關係的木牘文書之外,里耶秦簡中還有一些間接或部分涉及債務關係的木牘文書,如其中包含與居貨贖債相關的各種記錄的簿籍(簡 8-145、簡 8-149、簡 8-284、簡 8-454、簡 8-480)等,這些簿籍所記內容各有不同,但都部分涉及了債務問題,說明政府對債務問題的管理是嚴密且全面的。

綜上所述,秦代政府文書中與債務相關的內容很多,且涉及多種對象,其中的債務標的物既有貨幣也有實物,債務雙方的身份既有政府與官吏或民衆之間的債務,又有民衆之間的私人債務,但政府也在其中起到一定的干預作用。債務類型相似的文書也具有相對固定的格式,其在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往來有一定規律,文書發出之前都需留檔並定期核查是否已收到回覆,由此可以反映出政府對大至財政收支、小至文書往來等各方面的管理都是非常嚴格和細密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政府的財政管理狀況和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先進性。

## 秦漢時期桑蠶業、禽畜養殖 及狩獵活動中的信仰習俗<sup>①</sup>

國家圖書館研究院 汪桂海

**內容提要** 本文綜合傳世典籍、簡牘以及民族調查資料，對秦漢時期的桑蠶業、家禽家畜飼養宜忌和狩獵等經濟活動中的信仰習俗進行探討，指出這一時期的經濟領域不僅存在神靈崇拜，很多經濟活動也受到當時普遍流行的擇日習俗的影響，還有不少禁忌、祝禱等巫術行為。

**關鍵詞** 秦漢 經濟活動 民間信仰 擇日 禁忌 祝禱

古代社會很長的一個時期，因為對客觀世界的認知程度存在一定局限，對自然規律沒有足夠的把握，對自然現象的認識很容易產生神秘化的傾向。突出的表現，就是在經濟活動的諸多方面存在濃厚的巫術信仰。以前，學術界對這一現象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一是傳世史料比較少，難以給人以完整的認識；二是在現代科學觀念的影響下，對這方面的記載往往有意無意之間以毫無價值的迷信視之，遑論研究。事實上，古人在經濟領域的信仰生活不僅貫穿了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成為當時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是研究古代民間信仰的重要對象。

本文擬根據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結合民族調查資料，對秦漢時期的桑蠶業、家禽家畜飼養宜忌和狩獵等經濟活動中的信仰習俗做一些探討。

<sup>①</sup>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簡帛文獻與漢代民間信仰研究》（批准號：10BZS012）的階段成果。

## 一、桑蠶業中的信仰習俗

從文獻記載和地下出土的大量絲綢製品來看，秦漢時期的桑蠶業比較發達，積累了豐富的技術經驗。同時，桑蠶業也存在很多信仰習俗。首先是先蠶崇拜。《續漢書·禮儀志上》：春二月<sup>①</sup>，“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在春天準備養蠶之前，先祭祀先蠶。如何祭祀，漢代史書沒有記載。《晉書·禮志上》說晉代祭祀先蠶時，設祭壇，“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把黃帝妃嫫祖奉爲先蠶，最早始自北周，漢代尚非如此。

漢代的蠶神還有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衛宏《漢舊儀》卷下：“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纁三盆繭，示群臣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群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采桑者樂。皇后自行。”祭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在開始采桑餵養蠶之時，應是四月。祭祀地點在蠶室，則此二神與先蠶應無直接關聯。<sup>②</sup> 祭祀的規格是用“中牢羊豕”，《晉書·禮志上》說“用少牢”，與此不同。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如何成爲蠶神的，已經不可究知，推測其情形應如後來的紫姑神。《御覽》卷八八四引宋劉敬叔《異苑》：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妒誣，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氏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自躍穿帳頂而去，永失所在也。

古代民間奉祀的許多神靈，往往是悲戚而死的平民，因爲某種偶然緣故而被世人尊奉爲神靈。南朝人奉祀的蠶神紫姑就是一個生前遭遇不幸的女子。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很有可能也是這樣的女子。有趣的是，在男耕女織社會，從事桑蠶養殖者主要是婦女，她們崇拜的蠶神也是女性。

秦漢時期，桑蠶養殖還有許多巫術禁忌。

養蠶的過程中，最需要防止鳥雀、老鼠、蚊子等帶來的禍害。《天工開物》卷上《乃服》

<sup>①</sup> 劉昭《注補》：“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按，《續漢書·禮儀志上》所說的是在春二月祭祀先蠶之儀，谷永說的是四月采桑，即開始采桑喂蠶，二者并非一事。“皇后蠶桑之日”是皇后舉行采桑的儀式，類似皇帝的籍田禮。

<sup>②</sup> 《搜神記》卷一四說“苑窳婦人，先蠶者也”，已把先蠶與苑窳婦人合二爲一。

“物害”條總結說：“凡害蠶者有雀、鼠、蚊三種。雀害不及繭，蚊害不及早蠶，鼠害則與之相終始。防驅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雀屎粘葉，蠶食之立刻死爛。）”足見鼠害對養蠶的危害最大。故而當時對鼠害的防治很重視。崔寔《四民月令》說：“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杵、箔、籠。”整治蠶室，堵塞塗抹蠶室的洞穴、裂縫等容易使老鼠進入蠶室之處。周家臺秦簡中也有一條簡文是關於防治老鼠之方。

· 已鼠方：取大白礬，大如母（拇）指，置晉斧（釜）中，塗而燔之，毋下九日，治之，以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簡 372<sup>①</sup>

這條材料是湖北荊州周家臺秦墓竹簡中的一枚簡，其後原應還有至少一枚簡，現在簡文缺少下文，意思不完整。據殘存的簡文推測，這種防治老鼠方法主要使用白礬。礬石也稱毒砂，即硫砒鐵礦，白色，煨之成末，可用於殺鼠，也可入藥。《說文》：“礬，毒石也，出漢中。從石與聲。”段玉裁注：

疑本作“礬石也”，三字為句，後人改之。礬石，石名。《周禮》注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堊，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本草經》曰：“礬石，味辛有毒。”《西山經》曰：“礬可以毒鼠。”郭曰：“蠶食之而肥。”按今世無此物。

按，《山海經·西山經》：“有白石焉，其名曰礬，可以毒鼠。”郭璞注：“今礬石殺鼠，音豫；蠶食之而肥。”可見，白礬作為滅殺老鼠的毒藥，到晉代依然在使用。周家臺秦簡中的這一防治老鼠的藥方則說明，古人很早就認識到用礬石滅鼠的方法了，而且與該條簡文同出的還有“浴蠶”簡，則此“已鼠方”很可能與養蠶防鼠有關。

秦漢時期，人們為了杜絕老鼠對蠶的危害，還經常采用一些巫術祝禱手段。例如《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引《雜五行書》也說：“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雜五行書》應該是漢代的文獻，所記這種習俗明顯帶有巫術色彩，很有可能是對鼠害的一種巫術，期望以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預防和減少鼠害的作用。類似的巫術還有：

冬以臘月鼠斷尾。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斬鼠，著屋中。祝云：“付敕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sup>②</sup>

取亭部地中土塗灶，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簞，鼠不食稻；以塞坎，百日鼠種絕。<sup>③</sup>

①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135 頁。

② 《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引《龍魚河圖》。

③ 《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引《雜五行書》。

這兩條材料都是與蠶室的鼠害防治有關的巫術，見於《齊民要術》引《龍魚河圖》、《雜五行書》，《龍魚河圖》也應是漢代的文獻。其中第一條講在臘月捉取老鼠并斷其尾，等到正月初一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由家長斬殺老鼠，擺放在蠶室，然後口中念祝禱之辭，命令“屋吏”控制并殺死老鼠，使老鼠不敢進入蠶室。第二條講取來亭部地中的泥土，用這種泥土塗屋子的四角，老鼠就不敢吃或破壞屋子裏養的蠶。古人相信灰土具有驅鬼的功效，尤其是某些特殊地方的灰土，更具有特別的神秘力量，因此在巫術中經常會使用灰土。<sup>①</sup> 本條防止老鼠食蠶的方法明顯屬於巫術性質。

養蠶需要注意蠶種的選擇，即淘汰劣質蠶種，選取優質蠶種，以保障蠶健康生長，吐絲率高，結繭大。蠶種選擇一般采用浴蠶的方法。《天工開物》卷上《乃服》“浴蠶”條：

凡蠶用浴法，唯嘉湖兩郡。湖多用天露、石灰，嘉多用鹽鹵水。每蠶紙一張，用鹽鹵走出鹵水二升，摻水，浸於盂內，紙浮於其面。（石灰仿此。）逢臘月十二即浸浴，至二十四日，計十二日，周即漉起，用微火烘乾。從此珍重箱匣中，半點風濕不受，直待清明抱產。其天露浴者，時日相同，以篋盤盛紙，攤開屋上，四隅小石鎮壓，任從霜雪、風雨、雷電，滿十二日方收。珍重待時日如前法。蓋低種經浴，則自死不出，不費葉故，且得絲亦多也。晚種不用浴。

用浴種之法選擇蠶種，可以淘汰劣種，又有消毒作用，是人工選擇蠶種的常用方法。其中，石灰水、鹽鹵水都有消毒作用；蠶種放在露天，用露水浴種，是采用適度的低溫處理，既可消毒，也可殺死劣種。浴蠶技術在先秦時期已經為人所採用。《禮記·祭義》說：“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在農曆三月朔日的早晨，從蠶室取出蠶種，到河邊，用河水浴種消毒，挑選出優質蠶種。

河水浴種的方法在秦漢時期有可能仍被繼續採用。不過，不同地域、不同時代，浴蠶的具體方法可能會有一定差別。據出土簡牘，秦漢時期還有用另外一種混合液體浴蠶的，浴蠶時向神靈祝禱：

“今日庚午利浴𧈧（蠶），女毋辟（避）□暮暮（瞋瞋）者，目毋辟（避）胡者，腹毋辟（避）男女牝牡者。”以脩（滌）清—栢（杯），饗赤叔（菽）各二七，并之，用水多少，次（恣）毆（也）。浴𧈧（蠶）必以日冕（纓）始出時浴之，十五日乃已。《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簡 368-370<sup>②</sup>

這是一種浴蠶的祝禱方。前四句是浴蠶時口頌的祝禱之辭，後面幾句浴蠶使用的配方和時

① 見胡新生《中國古代巫術》“灰土驅鬼”條（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212—218頁）。

② 《關沮秦漢墓簡牘》（134頁）。

間。“脩(滌)清”即澄清的泔水。礪即“礪”，應指白石。赤叔(菽)即赤小豆。<sup>①</sup> 浴蠶者將澄清的泔水與白石、赤小豆混合攪拌，用來浴蠶。不知這種混合物對於蠶種的選擇是否確有效果，但浴蠶時的祝禱方明顯屬於巫術的範疇。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有一條“蠶良日”的簡文：

蠶良[日]，庚午、庚子、甲午、五辰，可以入。五丑、五酉、庚午，可以出。（簡 94 正貳）

這是有關蠶事良日的一條簡文。“可以入”、“可以出”似乎應該指可以從蠶室取出蠶種和將蠶種送入蠶室。在這裏，秦漢人把養蠶過程中的一些活動也置於擇日的習俗中，接受其影響。

秦漢人養蠶還有其他的信仰習俗。比如《齊民要術》卷五《種榆》引《淮南萬畢術》曰：“北方種榆九根，宜蠶桑，田穀好。”這並沒有什麼科學道理。同書卷五《種桑柘》引《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這是預測蠶繭收成的習俗。同書引《五行書》又曰：“馬牙齒於槌下，令宜蠶。”《御覽》卷七六五引《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這是兩種祈求蠶繭高產的方術，說明人們對桑蠶豐收的渴望，從一個角度反映了桑蠶業對秦漢時期人們生活的影響程度，以及當時人對桑蠶業的重視。

## 二、家禽家畜飼養

家禽家畜飼養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可提供家庭必須的肉蛋類食品，又可通過市場交換，變換成貨幣來補貼家用。秦漢時期特別重視對家禽家畜的飼養，這既見諸文獻，又為考古發現的陶豬圈、陶雞舍以及陶雞、陶鴨、陶豬等明器所證實。而出土簡牘則表明，當時人在家禽、家畜的飼養、買賣、宰殺，以及畜舍的修建等方面，也同樣十分注意選擇良日，避開忌日。當時通行的《日書》告訴人們什麼日子適合買賣禽畜，什麼日子適合宰殺禽畜，什麼日子適合修造或改建畜舍，又有什麼日子不適合做這些事。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諸良日篇》：

馬良日，乙丑、乙酉、乙巳、乙亥、己丑、己酉、己亥、己巳、辛丑酉、辛巳、辛亥、癸丑、癸酉、癸巳、庚辰。·其忌，丙子、丙午、丙寅、丁巳、丁未、戊寅、戊戌、戊子、庚寅、辛卯。

牛良日，庚辰、庚申、庚午、辛酉、壬戌、壬申、壬午、癸酉、甲辰、甲申、甲寅。·其忌，

<sup>①</sup> 參見《關沮秦漢墓簡牘》整理者注釋（134 頁）。



己丑、己未、己巳、己卯、戊寅、戊戌、戊子、己巳。·戊午不可殺牛。

羊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酉、己丑、己巳、辛酉、辛丑、辛巳、庚辰、庚寅。其忌，壬戌、癸亥、癸酉。春三月庚辰可以築（築）羊卷（圈），即入之，羊必千。

豬良日，庚申、庚辰、壬辰、壬申、甲申、甲辰、己丑、己酉、己巳。·其忌乙亥、乙巳、乙未、丁巳、丁未。·市良日，戊寅、戊辰、戊申戌，利初市，吉。

犬良日，癸酉、癸未、甲申、甲辰、甲午、庚辰、庚午、辛酉、壬辰。·其忌，己丑、己巳、己未、己卯、乙巳、戊子、戊寅、戊戌。·有妻子，毋以己巳、壬寅殺犬，有央（殃）。

雞良日，甲辰、乙巳、丙午、戊辰、丙辰，可以出入雞。雞忌日，辛未、庚寅、辛巳，勿以出入雞。

簡 82 正貳—簡 92 正貳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諸良日篇》：

馬日：

馬良日，甲申、乙丑、亥、己丑、酉、亥、未、庚辰、申、壬辰、戌辰，未□□□乘之。·其忌，甲寅、午、丙辰、丁壬、辰、丁巳、未，戌□。

牛日：

牛良日，甲午、寅、戌午、庚午、寅、丙寅、壬寅、丁酉、未。甲辰，可以出入牛、服之。·其忌乙巳，□□□□未，辛丑，戌辰，壬午。

羊日：

羊良日，辛巳、未、庚寅、申、辰、戌辰、癸未。·忌日，甲子、辰、乙亥、酉、丙寅、丁酉，己巳。

豬日：

豬良日，壬午、□，戊子、寅、己亥、庚寅、辰、午、辛丑、壬辰、癸未。·其忌，壬午，戌午、戌，丁□。

犬日：

犬良日，丁丑、丁未、丙辰、己巳、己亥。·忌，壬戌、癸未、辛巳，□□□□□□戌，癸未。·忌，丁丑、丁未、丙辰、丙申。

雞日：

雞良日，甲辰、乙巳、丙午、丙辰、庚辰。·忌，辛巳、卯、庚寅、丁未。

簡 68—簡 73，簡 74 壹—簡 76 壹

上面這兩篇文字都詳細羅列了馬牛羊豬犬雞六種禽畜的良日、忌日，它們出自兩個不同版本的《日書》，整理者分別命名為“甲篇”、“乙篇”，內容大同小異。雖然沒有逐一標明是做什麼事的良日或忌日，但從個別地方出現的“可以出入雞”、“可以出入牛”之類的語詞來看，這裏



所說的良日、忌日應主要指買賣這些家養禽畜而言。類似的擇日規定還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秦篇》：

正月、二月，子采(穗)，丑戌【正】陽，寅酉危陽，卯敦，【辰】申憂，巳未陰，午微，丑結。

三月、四月，寅采(穗)，卯【子】正陽，辰【亥】危陽，巳敦，午戌憂，未酉陰，申微，丑結。

五月、六月，辰采(穗)，巳寅正陽，午丑危陽，未敦，申子憂，酉亥陰，戌微，卯結。

七月、八月，午采(穗)，未辰正陽，【申】未危陽，酉敦，戌寅憂，亥丑陰，子微，巳結。

九月、十月，申采(穗)，【酉午正陽，戌巳危】陽，亥敦，巳辰憂，丑卯陰，寅微，未結。

【十一月、十二月，戌采(穗)，亥申正】陽，戌〈子〉【未危陽，丑】敦，寅午憂，巳卯陰，辰微，酉結。

簡 47 壹—簡 52 壹

【采(穗)】，□□□車，見【人】，入人民、畜生，取妻、嫁女，□□□□□□□不可復(覆)室。

簡 53

敦，有細喪，□□央(殃)，利以穿井、蓋屋，不可取妻、嫁女，祠，出入人民、畜生。

簡 57

陰，先辱後慶。利居室，入貨、人民、畜生……

簡 60

微，大微，利單(戰)伐，不可以見人、取妻、嫁女，出入人民、畜生……

簡 62

《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

· 建日，良日矣，可爲嗇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六生，不可入黔首。

簡 13

· 收，可以民、馬牛畜生，盡可及人禾稼，可以居處。

簡 21

《日書》還說在“離日”、望日(每月十五日)、“剽日”也不可買入牲畜：

此所胃(謂)艮山，禹之離日也。從上右方數朔之初日及枳(支)各一日，數之而復從上數。□與枳(支)刺艮山之胃(謂)離日。離日不可以家(嫁)女、取婦及入人民畜生，唯利以分異。離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艮山篇》簡 47 正三—簡 53 正三  
凡月望，不可取婦、家(嫁)女、入畜生。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朔望篇》簡 118

剽日，不可以使人及畜六畜，它毋有爲也。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除篇》簡 44 壹

“離日”是一種根據每月反支日推算出來的日子。<sup>①</sup> 在這樣的日子裏，不可以從事嫁娶、購入物品、外出之類事情，祇有分異之類的事適合在此日去做。這也可能是“離日”命名的原因。可能在“離日”購入牲畜，有丟失之虞，難以保有。“剋日”也屬於古代建除家所說的一種忌日，其來歷不清楚。《日書甲種·畜篇》也有“剋日”，但與此有別。<sup>②</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星篇》還有下面的禁忌：

卯(昴)……不可食六畜……

簡 85 正壹

畢……不可食六畜……

簡 86 正壹

《星篇》是以二十八宿為占的一種占卜方法。同樣的占卜內容又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官篇》。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二十八宿并非天文學意義上的星宿概念。學者認為，篇中以二十八宿記日，有可能祇是干支記日法的另一種表現形式。<sup>③</sup> 簡文中的“食”字，應理解作餵養的意思。按照該禁忌，在昴日、畢日是不可以餵養六畜的。這很奇怪，不知道當時的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禁忌。

宰殺六畜也有忌日，這見於睡虎地秦簡和居延漢簡：

· 殺日，勿以殺六畜……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畜篇》簡 100 正～簡 101 正壹

三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八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八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不可以殺六畜見血（以上為第一欄）

九月三日十九日廿四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月朔日廿日廿二日廿九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一月四日廿六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二月二日十一日廿四日卅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以上為第二欄）

《居延新簡》簡 E. P. T58:21

“殺日”是指春三月的辰日、夏三月的未日、秋三月的戌日、冬三月的丑日，在這些日子，不可

① 李學勤著：《睡虎地秦簡中的〈艮山圖〉》，《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91—97頁。

②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29頁。

③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13—115頁。

以宰殺六畜。漢簡中則把這樣的忌日固定作一年十二個月中的某些具體的日子。

養馬者崇拜馬祿等神靈。《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馬祿》：

馬祿：祝曰：“先牧日丙，馬祿合神。”·東鄉(嚮)南鄉(嚮)各一馬□□□□□中土，以爲馬祿，穿壁直中，中三股，四廄行：“大夫先牧咒席，今日良日，肥豚清酒美白梁，到主君所。主君筭屏詞馬，毆(驅)其央(殃)，去其不羊(祥)，令其□耆(嗜)□，□耆(嗜)飲，律律弗御自行，弗毆(驅)自出，令其鼻能嗅(嗅)鄉(香)，令耳息(聰)目明，令頭爲身衡，勑爲身剛，脚爲身□，尾善毆(驅)□，腹爲百草囊，四足善行。主君勉飲勉食，吾歲不敢忘。”

簡 156 背—簡 160 背

祿是古代求子之祭，也指求子所祭之神。整理者注說“馬祿爲祈禱馬匹繁殖的祭祀”。這一解釋大體應該不錯，秦人應該有向馬神祈求馬匹多加繁育的祭祀。不過，從本篇祝辭似乎看不出祈禱馬匹繁殖的意思，通篇的主要旨意是祈禱神(祝辭又稱“主君”)驅除災殃和不祥，使馬匹飲食旺盛，耳目聰明，身體健壯，奔跑如飛。這裏的馬祿應指所祭祀的馬神。祭神者反復向神提出希望和要求，也向神允諾不會忘記定時祭祀。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竹簡記錄了一個使馬匹奔跑更快的方術：

·馬心：禹步三，鄉(向)馬祝曰：“高山高郭，某馬心天，某爲我已之，并□侍之。”即午畫地，而最(撮)其土，以靡(摩)其鼻中。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竹簡》簡 346<sup>①</sup>

整理者注：“‘馬心’，疑指馬的某種疾病。‘心’字或讀爲‘駮’，《說文》：‘馬行疾也。’則此爲使馬疾行的方術。”使用這種方術，先口中說著固定的祝辭，然後在地上畫縱橫交叉地直綫，撮起地上的泥土，在馬的鼻孔之間塗抹。當時的人認爲這樣就能使自己的馬匹奔跑更快。

《齊民要術》卷六《養馬》引《淮南萬畢術》則記錄了另外一種給馬匹避邪的方術：“常繫獼猴於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看來古人很早就認爲獼猴能够辟除馬瘟疫，使馬匹不生病。

周家臺秦簡還有一條關於養牛的方術：

·肥牛，善食之，而飲以銖，一月已。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竹簡》簡 373<sup>②</sup>

這是一種使牛肥壯的方術，施用方術的人認爲，祇要好好餵養，并給牛飲用雨潦之水，牛就能够肥壯起來。似乎雨潦水有特別的效用。

<sup>①</sup> 《關沮秦漢墓簡牘》(132 頁)。

<sup>②</sup> 《關沮秦漢墓簡牘》(135 頁)。

### 三、狩獵活動中的信仰習俗

狩獵是古代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時代，狩獵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很多民族在狩獵之前舉行一些巫術活動，或占卜是否可以出獵，或祈求神賜予更多的獵物。例如，傈僳族在正月初五開始生產之前，必在房前供上肉或粑粑（餅）祭禱神靈，并以弩射肉或粑粑，如果射中肉，就象徵今年狩獵豐收，常有肉吃。<sup>①</sup> 獨龍族出獵時，先用麵粉做成各種獵物，然後對之開弓射擊，射中為吉，不中為凶，以此決定是否出獵。<sup>②</sup> 納西族認為獵神掌管著山上所有的飛禽走獸，獵人如果好好供了它，它就會佐助獵人在山裏獲取野物，也保護獵人的獵犬、弓箭等。如果不好好祭祀它，它會作怪，傷害獵人。因此，納西族獵人出獵前要燒香祭獵神，獵到野獸後，又要燒天香除掉身上的穢，并用所獵取的野物的肉祭獵神。<sup>③</sup> 鄂溫克人把獵獲的多寡看成是神的意志所決定的，獵人長期打不著野獸時，就請薩滿跳神祈求豐收，準備兩隻野獸或飛龍獻祭給神，并用取下箭頭的箭，對著柳條製作的鹿或犴作象徵性的射擊，旁邊看的人齊喊“打中了！打中了！”表示以後就能百發百中了。<sup>④</sup> 這是運用比擬巫術。國外民族也有類似的習俗。大洋洲的巴布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打獵之前，要舉行一個儀式，在地面上畫一隻大袋鼠，獵手們各持長矛對準袋鼠畫像刺去，以此比擬出獵時會得到更多的獵物。<sup>⑤</sup> 非洲黑人“在出發去打獵或者打仗以前，他用一種巫術的東西來擦自己的武器，以便使那些被關在武器裏的神靈更強壯。同時，他跟它們談話，他提醒它們，他是多麼關心它們，他列舉他給它們送的禮物，指出這些禮物的價值，他祈求它們不要在危險的時刻扔下他”。<sup>⑥</sup>

先秦時期集體狩獵前也要祭神。《周禮·春官·宗伯》“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師甸（田）即農村公社時期每年的集體狩獵活動，同時起到練兵的作用。鄭玄注：“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即祭神時祈禱神助祐，希望獵取十倍百倍的禽獸。鄭玄注引杜子春又云：“禡，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禡，是狩獵前禱請馬祖（主

① 宋兆麟著：《巫與巫術》，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222—223 頁。

② 游修齡主編：《中國農業通史·原始社會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377 頁。

③ 和志武等主編：《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納西族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0—281 頁。

④ 秋浦等著：《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北京：中華書局，1962，99 頁。

⑤ 轉引自李仰松《秦安大地灣遺址仰韶晚期地畫研究》（《考古》1986 年第 11 期）。

⑥ Mary Kingsley（金斯黎）：West African Studies, P. 330（轉引自[法]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59 頁）。

管馬匹的神),使馬更強健,能駕車載人馳逐、捕獵禽獸。甸(田)祝負責在狩獵之前祭神時,口念祝禱之辭。

秦漢時,狩獵在經濟生活中仍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漢畫像中也常可見到狩獵的場面。出土秦簡《日書》規定了什麼日子宜於做哪些事,什麼日子不宜於做哪些事,其中也有關於狩獵的吉凶日期。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除篇》:

【外】陽日,利以建野外,可以田獵(獵)……

簡 8 正貳

夾光日,利以登高、飲食、獵(獵)四方野外……

簡 12 正貳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稷辰篇》:

雩,是胃(謂)其群不揀,以辭不合(答),私公必閉,有為不成。亡者,得。利弋獵(獵)……簡 40 正<sup>①</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星篇》:

卯(昴),獵(獵)、賈市,吉……

簡 85 正壹

畢,以獵(獵)置罔(網)及為門,吉……

簡 86 正壹

【柳】,百事吉……可田獵(獵)。

簡 91 正壹<sup>②</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召日敎日篇》:

夏三月丑敎。春三月戌敎。秋三月辰敎。冬三月未敎……凡敎日,利以漁獵(獵)、請謁、責人、摯(執)盜賊,不可祠祀、殺生(牲)。

簡 136 正七—簡 139 正捌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除乙篇》:

平達之日……罔(網)獵(獵),獲……

簡 19 壹

《日書》為人們提供了在哪些日子適合外出打獵或放置捕捉鳥獸的網。當時的人就是在這種擇日觀念指導下,確定外出打獵日期的。

## 結 語

秦漢時期社會經濟活動中許多擇日宜忌的信仰,來源於當時盛行的陰陽五行思想。關於此類信仰習俗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意義,古人中的明智之士很早就有評價,《齊民要術》卷一

<sup>①</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秦》簡 59,內容與此基本相同。

<sup>②</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官篇》的簡 85 壹、簡 86 壹、簡 91 正壹,與此三簡基本相同。

《種穀》引《汜勝之書》“九穀忌日”之後，說：“《史記》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爲上策’也。”《齊民要術》所說《史記》，疑爲《漢書》之誤。《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小序評論說：“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指出了應如何看待古代經濟活動中信仰習俗的問題。當時有識之士能够看透此類數術信仰因爲“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而帶來的弊端，但普通民衆認識不到這一點，或者說他們不可能擺脫術數禁忌的影響、束縛，故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此類選擇術能够大行其道。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郭洪伯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442、443、444、468 號簡的編連存在問題。本文依據《秩律》固有體例，並參照傳世文獻，重新編連了四支簡的順序：442 號應在 443 號之後，二者為同一條款的首尾；468 號應接在 444 號之後，二者的內容又與 442 號的內容相接。

**關鍵詞**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 編連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中，整理者將 443、444 號簡先後排列，釋文如下（因內容需要本文採用武大釋文本）：<sup>①</sup>

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陽、鄴、雲中、□、高(?)□□□、新豐、槐里、雍、好畤、沛、郃陽、郎中 443 司馬、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長史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444

然而這種編排方式導致內容上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千石的“郎中司馬”於史無徵，按《漢書·百官公卿表》：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

<sup>①</sup>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60 頁。（按，“二千石□丞六百石”，武大本將“□”補釋為“尉”，亦未安，今仍從 06 年釋文修訂本留“□”）。



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sup>①</sup>

與“郎中”有關的高級官員此處皆有明確記載，沒有“郎中司馬”的迹象。其次，根據《秩律》450 號簡和 464 號簡來看：<sup>②</sup>

（縣道、都官）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司空、田、鄉部二百石。450

（縣道、都官）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田、鄉部二百石。464

令秩八百石和六百石的縣道“有丞、尉者半之”，令秩千石的縣道也應如此。而 444 號簡只提到“丞四百石”，却未提“尉”，不合體例，更不合史實：長安作爲京縣，必定設縣尉，比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就提到了“長安尉”。<sup>③</sup>

諸如長安、成都、雒陽皆爲大縣，其縣令秩千石自不待言。按照既有體例，443 號簡上記錄的縣（令）後面應該有“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這見於 442 號簡<sup>④</sup>：

□□、長信將行、中傅、長信謁者令、□大僕，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442

長信將行、中傅、長信謁者、中太僕等皆在宮中服務，不設尉，設尉的應是 443 號簡記錄的各縣。鑒於出土《秩律》簡的 F 區錯亂較嚴重，443 號簡與 442 號簡之間是否還有它簡，暫不可考。但不論如何，442 號簡“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指的應是 443、442 等簡所記錄的機構（包括櫟陽、長安等縣）長吏的秩級，即 443、442 號簡是《秩律》的一條。

如此一來，444 號簡就被排除在外了。那麼 444 號簡又該如何編連？注意到 444 號簡的開頭是兩個秩千石的“司馬”，而原先被單列的 468 號簡上也有“司馬”<sup>⑤</sup>：

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中司馬□□關司□468

以郡司馬一職爲例，漢武帝時田廣明“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sup>⑥</sup>，“功次”通常只

①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727 頁。

②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64、270 頁。

③ 《史記》卷四四《淮南衡山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3077 頁。

④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59 頁。

⑤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58 頁。

⑥ 《漢書》卷九〇《酷吏傳》，3663 頁。

遷一級；都尉秩比二千石，則郡司馬秩千石，因此 468 號簡之後的簡應有“秩各千石”字樣。這就和 444 號簡開頭的內容連上了。

最後的問題是 468 號簡開頭的“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如何處理。按《秩律》450 號簡和 464 號簡在“有丞、尉者半之”之後接有“田、鄉部二百石”云云，442 號簡既然以“有丞、尉者半之”結尾，其後也應如此。鄒水傑認為 468 號簡的“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是千石縣的情況<sup>①</sup>，其說可從。那麼就內容而言，468 號簡是 442 號簡的後續。不過根據圖版，442 號簡殘，下部有留空，468 號簡的“田、鄉部二百石”則是另外提行書寫，此中原因尚不明晰。

綜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可重排如下：

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陽、鄴、雲中、□、高(?)□□□、新豐、槐里、雍、好畤、沛、郃陽、郎中 443(……中間或缺簡……)□□、長信將行、中傳、長信謁者令、□大僕，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442

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中司馬□□關司馬 468 司馬、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長史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444

重新編連之後，有兩個地方值得說明：一是 443 號簡結尾的“郎中”某某，《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將秩比千石，從秩級上看與此最接近，也是史籍中唯一能對得上號的。其次是 468 號簡結尾和 444 號簡開頭的“關司馬”，按《秩律》440 至 441 號簡：<sup>②</sup>

·御史大夫、廷尉、內史、典客、中尉、車騎尉、太僕、長信詹事、少府令、備塞都尉、郡守、尉、衛將軍、衛尉、漢中大夫令、漢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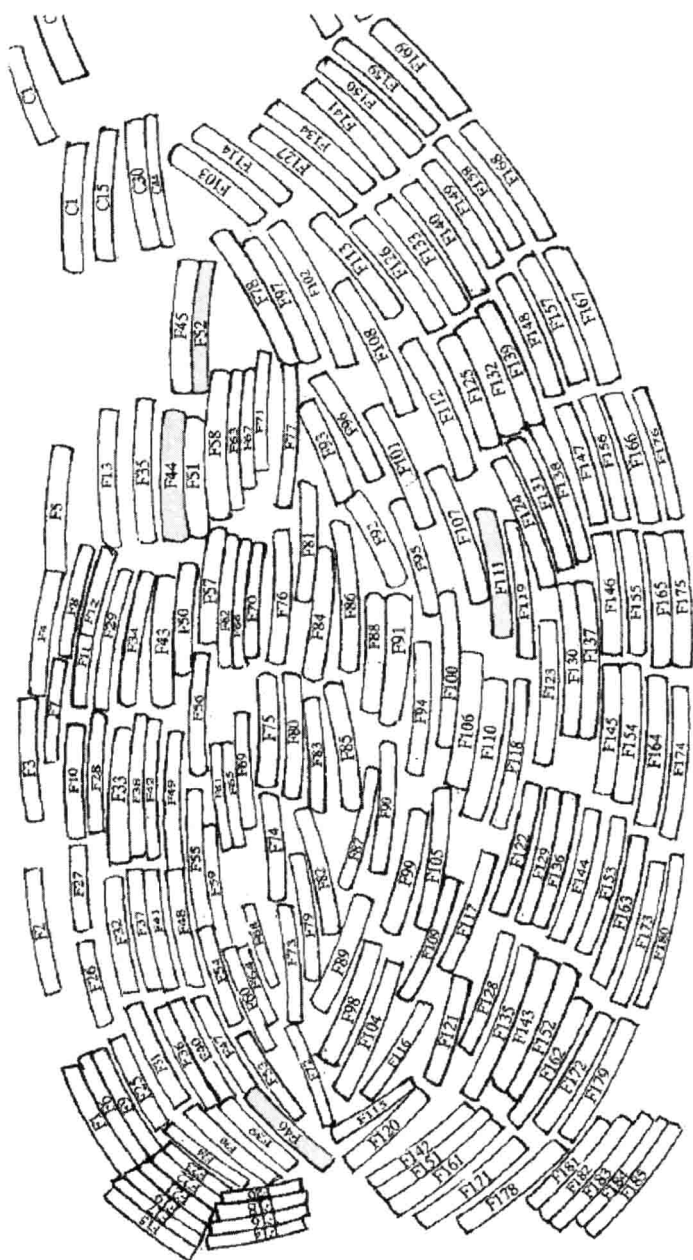
司馬可以和軍事二千石機構對應：中司馬對應中尉，郡司馬對應郡守尉，中輕車司馬和騎司馬對應車騎尉（車騎尉或可讀為“車、騎尉”，即車尉與騎尉），關中司馬對應備塞都尉，衛尉司馬對應衛尉。照此規則，還應存在與二千石衛將軍對應的司馬。“關司馬”可推定為“關司馬衛將軍司馬”：關司馬仍對應備塞都尉。<sup>③</sup> 衛將軍司馬對應衛將軍。

442、443、444、468 諸簡出土位置及相互關係詳見下圖：

① 鄒水傑著：《秦漢“長吏”考》，《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②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58 頁。

③ 勞幹推論秦漢時期的“中”表示京師，與郡國相對，見勞幹《秦漢九卿考》（《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866 頁）。閻步克根據《二年律令》確認了“中”與“郡”的相對性關係（見閻步克《也談“真二千石”》，《史學月刊》2003 年第 12 期）。關中司馬和關司馬的差別應該是京師和外地的差別。



左為“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F區)

443 號簡出土位置為 F111, 442 號簡出土位置為 F46, 二者仍有些距離, 故暫時無法判定二者之間是否缺簡。

468 號簡出土位置為 F44, 444 號簡出土位置為 F52, 基本相鄰, 故二者前後直接編連應無問題。

## 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

### ——從張家山漢簡《蓋廬》看先秦時代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王啓發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蓋廬》第八章、第九章分別就蓋廬(闔廬)所問“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和“以德攻何如”,在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中列出了多項其认为必須加以“攻之”的行爲對象,而這些行爲對象應該說都是有違當時的通行道德的事情,涉及到日常生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諸多方面。其中體現出一種正義原則和標準的確定問題,這個標準首先是道德層面的判斷,進而延伸到政治層面的“救民之道”和“救亂之道”的判斷。本論結合這兩章的具體文句內容及與第一章的聯繫性的解讀和分析,輔以其他多種先秦文獻材料的比較考察,以及以《蓋廬》作爲先秦兵家代表之一的《伍子胥》的佚篇,將這些內容與《司馬法》、《吳子》等兵家文獻的相關內容作比較,從而得出結論:一種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的思想原則和主張構成了先秦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這樣的原則和主張也是先秦思想史上其他如儒、墨、道、法諸家有所關注和討論的,由此就可以引出更廣泛的研究。

**關鍵詞** 《蓋廬》 第八章、第九章 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所發現的竹簡《蓋廬》,被學界視爲與早已失傳的先秦兵家之一伍子胥的著述有關的文獻再現。至今,學界也有一些多角度的相關研究。

通覽《蓋廬》,筆者認爲其第八章、第九章的內容很值得關注,這兩章分別就蓋廬(闔廬)所問的“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和“以德攻何如”,在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中列出了多項必須加以“攻之”的行爲對象,而這些行爲對象都是有違當時通行道德的事情,涉及到日常生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諸多方面。其中體現出一種正義原則和標準的確定問題,這個標

準首先是道德層面的判斷,進而延伸到政治層面的“救民之道”和“救亂之道”的判斷。

古來兵刑不分,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用甲兵,小用鞭撻,却有著一定的正義原則和標準,這就是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的原則和標準。《蓋廬》第八章、第九章中的所謂“攻”,也就是針對各種不道德行為所採取的多種打擊和制裁手段的體現。本文試圖通過對《蓋廬》第八章、第九章內容的解讀和分析,從而引出對於先秦兵家思想中有關正義的原則及標準作對比性考察,以此來認識先秦時代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以及其與諸子百家思想上在道德正義和政治正義原則與標準方面,相互融通和異曲同工的共通性特點。

人類社會首先是道德社會。道德成為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標準。道德正義則成為人類法制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歷史上,無論是思想家,還是政治家,都在如何從道德正義走向政治正義的道路上跋涉,盡管有時候會出現道德形而上意義上的思想背離和目標背離,但是道德理想主義和政治理想主義的天然使命,促使歷史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能不去面對道德與政治相統一的問題。有什麼樣的道德,就有什麼樣的政治。這也是中國古代兵家思想中的一個側面。

何謂“道德正義”?當人們講到“道”、“德”、“義”、“禮”、“信”等傳統的德目時,就已經出現了道德正義的價值判斷,換言之,以“有道”、“有德”、“有義”、“有禮”、“有信”來表述的話,所代表的道德正義就更加明確了;相應地,“無道”、“無德”、“無義”、“無禮”、“無信”就是不道德的非正義了。其他的還有不仁、不義、不慈、不孝、不忠、不信、不敬、不悌、非仁、非義、非禮等等。那麼,祇要是對道德的否定(不、非)和缺失(無),就是道德正義的反面即非正義。

## 一 張家山漢簡《蓋廬》第八章、第九章內容解析和比較考察

為了具體地判斷《蓋廬》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與本論命題的直接關係何在,我的考察就先從對其內容的解析開始<sup>①</sup>,並且結合《蓋廬》第一章的內容進行比較,來討論和說明這三章內容的聯繫性以及在所謂家族倫理、社會倫理、政治倫理方面所體現的正義原則的問題。還有就是通過盡可能廣泛地搜尋與《蓋廬》第八章、第九章諸條目內容有關的先秦及後世文獻,目的不是在於字句上的為解析而解析的論證,而是要集中體現和說明與之類同、契合或者相異的價值標準、原則根據和出發點所在,以及在思想性和時代性方面的聯繫和差異。

<sup>①</sup> 這裏主要的參考文獻就是《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所作的《蓋廬釋文注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2期),還有邵鴻《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一)《蓋廬》第八章內容解析和比較考察

《蓋廬》第八章開始所記蓋廬曰：“天之生民，無有恒親<sup>①</sup>，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這裏，作為執政者的蓋廬<sup>②</sup>，關注到其統治下的民衆的社會生活，意識到民衆生活的好壞取決於民衆相互間的利害關係，於是他想要通過殺伐<sup>③</sup>的手段來為民除害，以保障民衆的社會生活安定和諧。這當然是一個關乎政治的目的的問題，也就是說以“欲殺其害民者”作為執政的目標之一。然而，關鍵在於應該以什麼標準來判定害民者，所以就向臣下申胥（伍子胥）提出詢問。

有關“天之生民”<sup>④</sup>的思考，墨子有云：“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是以分國建諸侯……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墨子·尚同下》）荀子有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大略》<sup>⑤</sup>）這兩段似乎正可以作為理解上述蓋廬發問前一句話的很好的注腳。<sup>⑥</sup>

有關“相利則吉，相害則滅”，與《墨子·法儀》中的說法有所聯繫。“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這與蓋廬所言的意思也相吻合。

說到“相利”，墨子有“兼相愛，交相利”的說法，並且以商湯、周文時代的政治為例來證明。《墨子·非命上》有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說到“相害”，墨子也有言說，《墨子·魯問》有云：“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也。”在墨子的法天思想中也有相關表述，《墨子·法儀》有云：“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針對蓋廬的提問，申胥（伍子胥）有關“救民之道”的回答，便充滿了一系列的道德標準和判斷，也為後人展現了春秋時代的通行道德。

申胥曰：“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攻之。不孝父兄，不敬長俊者，攻之。不茲（慈）穉

① 對於“無有恒親”，前述邵鴻《蓋廬研究》解釋為“上指天不會永遠眷顧百姓，要視其所為而降以吉凶”。

② 歷史上的闔廬是春秋末期吳國國王闔閭，又名闔廬，姓姬，名光，吳王諸樊之子，故又稱“公子光”，公元前514至前496年在位。

③ 有關“殺”字，《爾雅·釋詁》：“勝、肩、戡、劉、殺、克也。”又有：“劉、彌、斬、刺，殺也。”《公羊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許慎《說文》：“殺，戮也。”

④ 《詩·大雅·蕩之什》：“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⑤ 唐楊倞注云：“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

⑥ “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然皆一脈相傳。”（[清]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四九）



弟(悌),不入倫雉者,攻之。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攻之。居里不正直,強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攻之。公耳公孫,與耳□門,暴敖(驚)不鄰者,攻之。爲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難必得者,攻之。不喜田作,出入甚吝者,攻之。常以奪人,衆以無親,喜反人者,攻之。此十者,救民道也。”

對於以上“申胥曰”的內容,我們不妨參考《張家山漢簡》注釋者的注釋,以及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一文中的考述,<sup>①</sup>並結合本論文的主題,以先秦及後世的相關文獻來比較,做進一步的解讀和分析考察,以顯這些內容的時代性和思想基礎。

(1)“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這是指作爲富貴人家而“不義不施”的不道德行爲;相關的道德要求則是貴而有義,富而好(樂)施。

從社會階層意義上講,何爲“富貴”呢?孔夫子曾言:“吾少也賤。”(《論語·子罕》)那麼,貴富之家當出於官吏和商人。貴賤在於身份地位的高下,貧富則是財富擁有量的多少。《易傳》中有言:“崇高莫大乎富貴。”(《繫辭上》)

說到“富貴”,墨子也有相關的話語。他說:“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墨子·尚賢上》)“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墨子·尚賢中》)<sup>②</sup>

所謂“毋義”就是“無義”,如《尚書·周書·康誥》有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不施”,就是無所施予。如《左傳·昭公十三年》所記叔向有言:“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無施於民,無援於外……何以冀國?”在這個意義上,都應該是有地位勢力者的德行表現。對富貴者的道德要求如何,應該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尺度。

還可以參考的是,《論語·學而》有云:“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傳·定公十三年》記載:“史鯀曰:‘富而能臣,必免於

① 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2期。

②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曾以吳國從稱霸到滅亡的歷史來說明其“非攻”的道理:“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仇,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墨子·非攻中》)



難……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sup>①</sup>《左傳·昭公元年》有云：“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此外，從國家政治意義上來說，國家富足而不見施於下民，也是不好的，如《管子·法法》所說：“足而不施，殆。”唐房玄齡注：“足而不施，怨疾必生。”

(2)“不孝父兄，不敬長叟者”，“不茲(慈)釋弟，不入倫雉者”。這兩條的內容相關，對前一條中的“叟”，《漢簡》整理注釋者稱：“《方言》六：‘長老也。’與‘叟’字通。”對後一條，《漢簡》整理注釋者認為，“釋”同“稚”，“雉”讀作“第”。

這裏指的是不遵守家族倫理、破壞家族秩序、違背人倫道德的行為。《左傳·隱公三年》有石碻之言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為“順德”，以“少陵長，遠間親”為逆德。而《尚書·康誥》有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sup>②</sup>由此可知，對不孝不友不慈不悌的行為，在刑罰上有所懲戒，作為一個傳統早在西周文王武王時代就是如此了。在後來的歷史上，“不孝不睦”更被列為所謂“十惡”重罪當中。

(3)“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對這裏的“約”字，《漢簡》整理注釋者稱引《淮南子·主術》高誘注：“少也。”那麼，這就是指壓低商品價格，破壞商品買賣市場秩序的行為。

我們知道，《周禮·天官冢宰》中的“大宰之職”就有“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而且《周禮·地官司徒》中還有相應的職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以量度成賈而征價……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誅而去盜……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對“以量度成賈(價)而征價”，鄭玄注云：“征，召也。價，買也。物有定賈(價)則買者來也。”此外，在《周禮·地官司徒》中，還有“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還有“賈師”，

① 《左傳·定公十三年》記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

② 還有《尚書·康誥》在談到這種“不孝父兄”和“不茲(慈)釋弟”的現象時說：“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有關這一段文字的內容，清代康熙十九年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卷八有比較淺顯的解說，值得參考。“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用罰以嚴之民也。字，愛也。天顯，天倫顯然之序。鞠，養也。弔茲者，至此之謂。政人，為政之人也。民彝，民之常道。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如寇攘奸宄之大惡，固大可痛恨矣，然劫奪人之財貨，猶未至滅絕人之大倫也，其罪已不容緩，況夫不孝不友之人乎？蓋孝友乃天倫之樂事，人性之自然，固油然而動於中而不容自己者也。若為子者不能敬盡其事父之事，大傷其父之心，以致為父者亦不能愛惜其子，乃惡疾其子，是父子之倫幾滅也。若為弟者弗念天倫顯然之序，竟不能恭敬其兄，以致為兄者亦不念父母鞠養其弟之哀勞，大不友愛其弟，是兄弟之倫幾滅也。夫廢棄人倫，滅絕天理至於如此，較之寇攘奸宄其惡尤甚。使我為政之人視為固然不加之以罪，則人心無從勸懲，風俗何由丕變，將天所與我民之常性不大泯滅而紊亂乎！夫此不孝不友之人，即在文王當日，亦所深惡而必刑者。汝速用文王所作之義刑，將此不孝不友之人刑之無赦，庶足以維人心而移風俗乎。夫刑者所以輔教之不逮者也，教莫大於孝弟，則五刑之屬，罪亦莫大於不孝不弟。教以勸之而刑以防之，所以扶植倫紀者深矣。”（《四庫全書》本）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辦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賈”；還有“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還有“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特別是吳國，是否有如上述《周禮》中那樣完備的商品市場管理制度，無法確定。但是有一定的市場價格規範應該是没有問題的，違反了這個規範，就會有所懲罰，就是《蓋廬》此條給我們的認識。

(4)“居里不正直，強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这里的“□”的缺字，《漢簡》整理注釋者認為當為“里”字。里正就是里長。而王貴元則認為可以看出是“灋”字，與後面“狂(枉)灋式”中的“灋”字寫法相同，且稱“灋正”就是禮法規矩的意思；并引述《荀子·性惡》“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灋正”，還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高柴，……字子羔，……為人篤孝而有灋正”兩段來證明。邵鴻亦從王說。

這條是指在鄉里的居處生活中，蠻橫而不遵從里正指揮(或禮法規矩)，不做請示就隨意出入的人。

“正直”是一種為人的品德。《尚書·洪範》有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對此“正直”，漢孔安國《尚書傳》解釋說：“能正人之曲直。”《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小明》中也有兩處說到“正直”：“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韓詩外傳》卷七第二十一章有云：“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那麼，《蓋廬》此條所講的“不正直”也就是指自私、不公正、不講道理的行為，“強而不聽”、“出入不請”也同樣屬於不講道理、不守規矩的不道德行為。

(5)“公耳公孫，與耳□門，暴敖(驚)不鄰者”。“耳”，《漢簡》注釋者稱“即耳孫”，并引述《漢書·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句下顏師古注引李斐說為曾孫。

其實，顏師古注引述有諸家說法。其中，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王侯内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

顏師古本人則說：“内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鄰”，《漢簡》注釋者引述《左傳·昭公十二年》“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一句的杜佑注說“鄰，猶親也”。

此外，《周禮·遂人》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之說。鄭玄引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

這一條，正如連劭名所解釋的那樣，就是指貴族豪門子弟橫行鄉里的行爲。當然，這也是屬於不道德的行爲，是要予以譴責和處罰的。

(6)“爲吏不直，枉(枉)灋式，留難必得者”。這裏就是指爲官的不公正、貪贓枉法、敲詐勒索的行爲。

這裏的“不直”，如連劭名解說的那樣，秦時已經是一種法律術語。《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

“枉(枉)灋式”，就是枉法的意思。就“直”和“枉”的關係，《論語·爲政》有言：“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留難”的第一種意思，是指顛沛流連之艱難的狀況，漢焦贛《易林》卷一《屯之渙》有云：“震慄恐懼，多所畏惡，行道留難，不可以涉。”同書卷二《觀之震》有云：“盤紆九回，行道留難，止須千丘，乃睹所歡。”同書卷二《頤之困》有云：“遠視目盼，臨深苦眩，不離越都，旅人留難。”

“留難”的第二種意思，是指無理阻止，故意刁難、挑剔的態度或行爲，漢桓寬《鹽鐵論·本議》：“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這裏應該是後者，連劭名也持此說。那麼“留難必得”，也就是敲詐勒索、從中牟利的意思。

《蓋廬》這一句正面的意思，《孔子家語·辨政》中所記孔子的一段話似乎全都包括了：“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7)“不喜田作，出入甚客”。“客”，《漢簡》整理注釋者稱“疑讀爲‘路’”。而連劭名稱讀爲“格”，并引《史記·李斯列傳》“而嚴家無格虜者”一句的《索隱》所云“格，強扞也”來說明。這裏姑從連氏之說。

這一條，確實和連氏所引述的《睡虎地秦簡·封軫式》中的“丙，甲臣，不田作”，還有連氏所引述的《六韜·上賢》中的“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法曆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在內容上是很相近的，反映了兩處文獻所關注的是相同的行爲。

我們知道，《周禮·遂人》有云：“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作爲農業社會，田作耕種稼穡之事是主業。《呂氏春秋·上農》有云：“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可見，這裏所講的意思和《蓋廬》所關注的問題也是一樣的。那麼，《蓋廬》此條，指的就是不事田作，游手好閑，出入強悍，無事生非的行爲。

(8)“常以奪人，衆以無親，喜反人者”。這一條，指的是經常以強搶、強取損害他人利益<sup>①</sup>，衆叛親離，喜與他人作對的行爲。而這些行爲，顯然與孔子所講的“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論語·學而》)的行爲品德背道而馳，也與墨子所主張的“兼相愛，交相利”的行爲品德相違背。

(9)“此十者，救民道也。”《蓋廬》第八章中，申胥在列舉了每一種不道德行爲之後，都發出“攻之”的決斷，并在最後說：“此十者，救民道也。”細繹數來，申胥祇列出了九種應該“攻之”的行爲對象，這個“十”字，或是“九”字之誤，或是如邵鴻所言，抄寫時脫漏了一句。還有如邵鴻所說，“救民道也”的“民”後脫一“之”字。

《蓋廬》通篇九章 3000 多字，出現有 50 個“攻”字，多數是從兵家軍事戰略戰術所講的“攻擊”。而這裏的“攻”字意思有所不同，應該是指對不道德行爲施行懲戒、處罰的意思。<sup>②</sup>

## (二)《蓋廬》第九章內容解析和比較考察

如果說，《蓋廬》第八章諸條所顯示的祇是在一國之內對官吏的職業道德和民衆的日常道德的約束的話，那麼，第九章則是更多關涉到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道德判斷了。具體而言，《蓋廬》第九章主要講的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德”與“不德”和以“有德攻無德”的問題，也就是，這裏所涉及的道德屬於政治道德，體現出的是從政治道德到政治正義的原則。而且，第八章關注的是關乎民衆生活保障的“救民”之道，第九章關注的則是關乎國家政治安危的“救亂”之道。

蓋廬曰：“以德【攻何如】？”

【申胥曰】：“□(以)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爲君，自立爲王者，攻之。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攻之。賦斂重，強奪人者，攻之。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緩令而急徵，使務勝者，攻之。□(外)有虎狼之心，內有盜賊之智者，攻之。暴亂毋親而喜相誑者，攻之。衆勞卒罷，慮衆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無親□□者，攻之。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無守備，城衆而無合者，攻之。國□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國大而德衰，天旱【而】數饑者，攻之。此十者，救亂之道也。”

① 此“奪”字，連劭名《考述》稱：“強取曰奪。”邵鴻《蓋廬研究》認爲：“指放貸取息、買賣土地等兼并他人的行爲。”似乎前一種說法比較簡明。

② 這裏的“攻”，邵鴻《蓋廬研究》認爲非軍事上的攻擊，而是聲討、排斥、打擊之意，并引述《論語·先進》“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以及鄭玄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等來說明。

《蓋廬》第九章中，蓋廬提出的問題是“以德【攻何如】”，而從後面申胥回答的“(以)德攻者”的內容來看，這裏的“攻”比第八章的程度要重，而有討伐、攻伐的意思。那麼，我們就結合春秋時代的一些政治歷史背景和思想意識來逐條解析一下《蓋廬》第九章的內容，並判斷其中的取向所在。

(1)“其毋德者，自置爲君，自立爲王者，攻之。”這一條很清楚，就是針對當時諸侯國內部政治上經常出現的攻襲、弑殺在位君主或當立爲君主者而自立，甚至是“自立爲王”的現象。而其重點又在於“其毋德者”的這一道德判斷上。

《墨子·三辯》中講到：“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這裏提到商湯、周武“環天下自立以爲王”的情況，然而在當時湯、武都是人們心目中的政治上的有德者。那麼，作爲一種從道德判斷到政治判斷的原則就是，“有德者得在其位，無德者不得在其位”；而《蓋廬》中所要採取的現實態度就是“以有德攻無德”。

有關春秋時期政治史上的“自置爲君，自立爲王”的現象，史書上有不少記載，特別以司馬遷《史記》的記載最爲詳細。

這裏，我們就集中來看一下《史記》中與本論的主角人物“蓋廬”有關的記載。

首先，《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述了發生在公元前514年，在闔廬(公子光)本人與吳王僚之間的，具有“弑君代立”性質的更代事件。

二十五年<sup>①</sup>，王壽夢卒。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吳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十三年<sup>②</sup>，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十七年<sup>③</sup>，王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sup>④</sup>，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

① 吳王壽夢在位(前585—前561)第二十五年。

② 吳王諸樊在位(前560—前548)第十三年。

③ 吳王餘祭在位(前547—前531)第十七年。

④ 吳王餘昧在位(前530—前527)第四年。

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

王僚<sup>①</sup>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

（王僚）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

其次，《史記·楚世家》則記述了發生在吳王闔廬的弟弟夫概身上的自立爲王的事件<sup>②</sup>。

（楚昭王）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sup>③</sup>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

前面的《吳世家》中的記述，涉及到一個古老的，是“兄終弟及”還是“父死子繼”，以及“立長”或者“立賢”的多種王位繼承規則與制度在實際的遵從和執行與否方面的問題。吊詭，或者說充滿悖論的是，歷史上，遵從者與不從者總是各有各的邏輯，而對不同形式或性質的“自置爲君，自立爲王”的現象也就有了不同的道德判斷。因此，《蓋廬》篇中所言“其毋德者”的限定辭，就成了與其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和是否應該取而代之的合理性方面有關的通則標準。

還有，從《史記》所記春秋時期列國政治史上的“自置爲君，自立爲王”的現象和事件來看，“弑君”、“殺父”充斥其間。那麼，古人對於“弑君”、“殺父”之仇應該態度如何，我們還可以參考以下的一些文獻記載，可以看到，在復仇的意識和觀念之下，也體現出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的意思出來。

《禮記·檀弓上》記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鬥。”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

① 吳王僚在位時間爲公元前526—前515年。

② 有關《史記》所記發生在其他諸侯國的類似事件的情況，請參看附表。

③ 《史記集解》云：“《春秋》云十一月庚辰。”



執兵而陪其後。”

《禮記·檀弓下》有記載說：“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逾月而後舉爵。’”

《春秋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引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仇，非子也。”

《白虎通義·誅伐》記云：“《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

《白虎通義·誅伐》在講到“復仇意識”的時候還說：“故曰：父之讐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讐不與共國，朋友之讐不與同朝，族人之讐不共鄰。”

(2)“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攻之。”就此句的內容，可以參考的先秦文獻有以下幾段：

《左傳·隱公九年》記載：“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呂氏春秋·至忠》記云：“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高誘注：“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

《墨子·尚同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天下必治矣。”

這些材料的內容似乎都證明一個道理，對於“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進行攻伐或處罰，是合乎政治道德的，也是合乎政治正義原則的。

(3)“賦斂重，強奪人者，攻之。”相類似的提法，可見《呂氏春秋·似順》的記載：“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這裏，楚莊王伐陳的理由與此條記述所要“攻之”的對像是完全一致的。兩條材料似乎有著微妙的時代性聯繫。

(4)“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連劭名《考述》引述《六韜·文韜》佚文：“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這兩條材料，一個講的是反面，一個講的是正面，而關注的則是同一個治國理政方面的問題。

(5)“緩令而急徵，使務勝者，攻之。”邵鴻在解釋此句時，引述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中的“興事不時，緩令急徵。”而且引述了下面兩段文獻中的“緩令急誅是謂之暴”的話。

具體地來看，《新序·雜事》記晉文公時欒武子有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孔子家語·辨政》有記載說：“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



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

這裡也就是說，在政令方面的急於求成，是為政治國和為官為吏方面的大忌，違反者必會給為政治國招來大麻煩，不可不禁止。

(6)“□(外)有虎狼之心，內有盜賊之智者，攻之。”《管子·禁藏》中有可以與此句相對比的話：“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還有《戰國策》卷二十四有記載：“魏將與秦攻韓，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無所施厚積德也。’”此段內容也見於《史記·魏世家》。其中的“朱己”，《史記》作“無忌”。《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所記伍子胥入諫吳王而有言曰：“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

(7)“暴亂毋親而喜相誑者，攻之。”從訓詁上說，可參考的文獻有，《廣雅》云：“誑，欺也。”《史記·吳王濞列傳》有云：“誑亂天下，欲危社稷。”又《說文》云：“誑，誤也。”《漢書·文帝紀》記云：“誑誤吏民。”

《焦氏易林》卷一有云：“革，譌言妄語，傳相誑誤，道左失迹，不知戶處。”同書卷二有云：“屯，譌言妄語，傳相誑誤，道左失迹，不知郎處。”同書卷三有云：“謙，暗昧冥語，傳相誑誤，鬼魅所居，誰知臥處。”

(8)“衆勞卒罷，慮衆患多者，攻之。”《史記·淮陰侯列傳》記云：“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顏師古曰：“罷讀曰疲。”可以參考。

(9)“中空守疏而無親□□者，攻之。”邵鴻引述《墨子·守備》有云：“城大人少，一不守也。”

(10)“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連劭名將“群臣申”解釋為“群臣人人自危”，又引述《吳子·圖國》中兵名有五，其四曰“暴兵”，還有“弃禮貪利曰暴”的說法。

(11)“地大而無守備，城衆而無合者，攻之。”《戰國策》卷三十三《昭王既息民繕兵》記載，武安君白起講到拔郢的事情說：“是時，楚王<sup>①</sup>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12)“國□(宮)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在古代，大興宮室，建築臺榭，加重征賦，往往成為國家實力微弱的重要原因。比如《管子·四稱》有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荀子·成相》也有云：“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還有《呂氏春秋·聽言》有云：“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觀)樂，大其鍾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

不過，上述這種情況是否就可以成為遭受別國攻擊的正當理由，這在後來別的有關文獻

① 楚頃襄王。

中，則是提出了疑問的。

比如，在《呂氏春秋·聽言》就有說：“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也就是說，當有說“某人家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這樣的人家就可以占據了”的話時，一定會遭到非議和譴責。那麼，當有說“某國饑饉，城郭破敗，守備缺乏，可以乘機攻襲篡奪之”的話時，對此却不加以非議和譴責。實際上這兩種說法不是十分類似的嗎？這或許可以說是與“竊鉤竊國”之喻相類似的說法。如果結合此一段前所說的“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一句，那麼這裏預設的“今人”所講的兩句，應該都屬於不善的，也就是不道德的。間接地可以看作是對蓋廬的上述所謂“攻之”說法之“不善”與正當性有所質疑，或者說是反對這樣的判斷的。

有意思的是，似乎是從正面的角度對《蓋廬》此句進行證明一樣，《左傳·哀公元年》中的一段記載，記述了以楚國人的認識將吳王闔廬和夫差進行的對比：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禦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13)“國大而德衰，天旱【而】數饑者，攻之。”前引《戰國策》卷三三所講的“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正可以作為“國大而德衰”而遭受攻擊一說的注腳。

(14)“此十者，救亂之道也。”如邵鴻所言，這裏所說的“十”應該是“十三”之誤。所謂“救亂之道”，《吳子·圖國》有云：“禁暴救亂曰義。”可作為對上述“攻之”行動的正義性的說明。此外，《管子·禁藏》有云：“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在“帝”、“王”、“霸”三句之下，唐房玄齡分別注云：“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這也為我們理解春秋戰國時代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種不同層次和境界的政治目標實現上的道德正義即政治正義，提供了很好的啟發。

如果讓我們來再回顧一下上述第八章、第九章諸條材料的話，可以看到，其中所涉及的都是關乎為君之德、為官（包括軍事官員）之德和為吏之道，以及百姓日常倫理方面的內容，

從國家大政方針到吏治原則，再到日用倫常，以反面之可以攻伐和處罰的對象列舉的形式，提出了其所認為最值得引起關注的治國理政、為君為吏、君道臣道等政治道德方面和百姓道德生活方面的問題。作為日常生活約束規範也好，作為官方的法律法規也罷，文本形式和話語形式的不同，並不影響其提出者的道德意識及政治主張的清晰和明確。這就是《蓋廬》第八章、第九章的內容給我們解讀上的啟示。

### (三)《蓋廬》第八章、第九章與第一章內容上的相互關聯

從上面兩節的考察可知，《蓋廬》第八章、第九章所指出的行為內容，呈現出一種具有從個體倫理到家族倫理，再到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的多層面的道德正義上的限制和訴求。實際上，《蓋廬》第八章、第九章的內容與其第一章中的一段內容是有著直接關聯的。也就是說，申胥在第八章、第九章的回答都是與第一章的回答有內在的關聯，或者說是具體的引申和細化而已。

蓋廬問申胥曰：“凡有天下，何[□]（毀）何舉，何上何下？治民之道，何慎何守？使民之方，何短何長？盾（循）天之則，何去何服？行地之德，何範何極？用兵之極何服？”

申胥曰：“凡有天下，無道則[□]（毀），有道則舉；行義則上，廢義則下。治民之道，食為大葆，刑罰為末，德正（政）為首。使民之方，安之則昌，危之則亡，利之則富，害之有央（殃）。循天之時，逆之有禍（禍），順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時則歲年孰（熟），百生（姓）飽食；失時則危其國家，頃（傾）其社稷。”

這裏，蓋廬所問的重點在於尋求“治民之道”和“使民之方”，而他所提到的“循天之則”和“行地之德”則是在天地人之間確定一種天然的道德正義原則。

申胥的回答就很明確了，除了將“無道”與“有道”、“行義”與“廢義”的不同政治結果做了對比之外，其他有關民食、刑罰、德政的本末問題，有關安民、利民，還是危民、害民，與國家政治經濟昌盛、富強，還是衰敗、滅亡的關係問題，有關在天時（天道、天意）上的順逆，在地德（地利、歲時）上的得失方面，與政治的禍福、年成的豐歉、民生的饑飽、社稷的禍福、國家的存亡等等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先秦諸子思想學說當中普遍涉及到的問題。歸根到底，講的就是“天道”、“地道”、“人道”，還有“君德”、“吏德”、“民德”，這裏的“道”和“德”是可以互換，或者并提的。那麼，《蓋廬》第八章、第九章的內容就是建立在上述第一章的原則基礎上的，如同原則綱領與具體條文的關係。從思想傾向上來說，無疑是以“德”為先，以“德”為本的。

我們知道，在討論張家山漢簡《蓋廬》的學派屬性的研究中<sup>①</sup>，邵鴻曾對張家山漢簡《蓋

① 參考蔡萬進、張小鋒《2002、2003年張家山漢簡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10期）。

廬》與《伍子胥兵法》二者的關係作了探討，認為張家山漢簡《蓋廬》不可能是伍子胥的作品或伍子胥與闔閭對話的實錄，而是後人託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sup>①</sup> 還有曹錦炎認為《蓋廬》祇是篇題，內容既有兵家特點，也有陰陽數術特點，已兼有儒、墨、名、法各家色彩，可歸入“雜家類”，即《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伍子胥》。<sup>②</sup> 田旭東認為，從張家山漢簡《蓋廬》中所記伍子胥的對話中仍多有“天之時”、陰陽、刑德、“用日月之道”、“用五行之道”等明顯屬於兵陰陽家的內容，可見在當時伍子胥是以兵陰陽家著稱的。<sup>③</sup>

那麼就本文所關注的問題而論，作為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學說，在政治道德乃至軍事等很多方面都是彼此借鑒相互融通的，不惟《蓋廬》有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這樣的一個原則邏輯。在先秦其他兵家流派的思想學說中，也同樣可以找到這樣的原則邏輯。以下我們就做些具體的考察。

## 二 《蓋廬》第八章、第九章與先秦兵家相關思想表述的比較

說到先秦思想史上的兵家，《漢書·藝文志》有言：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

《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

《漢書·藝文志》對兵家的分類有如下：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書·藝文志》中，春秋戰國時期的兵家吳孫子、齊孫子、公孫鞅、吳起等<sup>④</sup>，均在兵權謀家之列。而且班固又說：“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

① 邵鴻著：《張家山漢墓古竹書〈蓋廬〉與〈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② 曹錦炎著：《論張家山漢簡〈蓋廬〉》，《東南文化》2002年第9期。

③ 田旭東著：《新公布的竹簡兵書——〈蓋廬〉》，《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4期。

④ 兵家在當時的傳播和影響也是令人關注的。比如《韓非子·五蠹》中說：“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

子》……，出《司馬法》入禮也。”在兵形勢家中，列有《尉繚》；在兵技巧家中，列有“《五子胥》十篇”，而省《墨子》。

誠然，除了在兵技巧家中有“《五子胥》十篇”之外，又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漢書·藝文志》的雜家類中還列有《五子胥》八篇，且班固注云：“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那麼，竹簡《蓋廬》篇是否屬於上述哪一家固然是我們所關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同屬兵家的《司馬法》、《吳起》（《吳子》）等著述中，也有和《蓋廬》相近而有關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的思想表達所體現出的一種原則性的邏輯關係和理論訴求，這可以說是反映著先秦時代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

### （一）《司馬法》中的相關思想

有關《司馬法》，《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又說：“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司馬）穰苴能申明之。”《漢書·藝文志》則說：“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而且在《漢書·藝文志》中，班固將《司馬法》直接列入禮類。

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前356—前320）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而且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到漢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見荀悅《申鑒·時事篇》）

對於《司馬法》一書的來源、著者、成書年代、學派歸屬等問題，以及《司馬兵法》和《軍禮司馬法》的關係問題，歷史上多有爭論，當代學術界也多有考察研究。<sup>①</sup>筆者在此不作深述，祇是認同一個比較通行的說法就是，今存《司馬法》五篇為成書於戰國中期的《司馬穰苴兵法》的佚篇，其中既保留有早於戰國的古代軍禮亦即古代兵法的内容，也是經過了戰國齊將司馬穰苴整理的，是在吳孫子兵法、齊孫子（孫臏）兵法、吳起（吳子）之外的又一先秦兵家文獻。

現存《司馬法·仁本》中的幾段内容與《蓋廬》篇第八章、第九章和第一章的内容比較接近，具有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或者軍事上的正義的原則性意義。比如《司馬法·仁本》有云：

<sup>①</sup> 比如張文儒《中國兵學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趙國華《中國兵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田旭東《古代兵學文化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都有相關考察和論述。解文超《先秦兵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四章《司馬法》文獻研究”，則比較全面地考述論證了有關世傳本《司馬法》的真偽問題、成書年代問題、作者問題、學派歸屬問題等，可以參考。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司馬法·仁本》還說：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

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遍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征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聖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那麼，上述所謂“憑弱犯寡”、“賊賢害民”、“暴內陵外”、“野荒民散”、“負固不服”、“賊殺其親”、“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外內亂，禽獸行”等情况，正和《蓋廬》第九章所列舉的十三種行爲有所相類。而所謂“眚之”、“伐之”、“壇之”、“削之”、“侵之”、“正之”、“殘之”、“杜之”、“滅之”等各種方式和手段，在《蓋廬》中均以“攻之”來概括了。

此外，從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六三六《刑法部二》所引《司馬法》還可以看到一些作爲“王法”之征討、處罰對象的具體行爲和相應的處罰措施：

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僻；乃興甲兵，以討不義。制瑞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曆，名文章、車服、比德逆天之時，乃征師於諸侯征之。

不會朝，過聘，則劉；廢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娶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粟畜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宮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有關《司馬法》的性質，北宋以後學者多有議論，比如北宋陳師道（1053—1102）說：“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sup>①</sup>南宋王應麟（1223—1296）也說：“古者《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sup>②</sup>清人孫詒讓則言：“是《司馬法》實古軍禮逸文，故足與《禮經》相證明。”<sup>③</sup>

顧炎武曾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sup>④</sup>有學者以此作為先秦兵家思想變化的歷史依據。

## （二）《吳子》中的相關思想

在先秦兵家當中，吳起兵法中也有重德重禮的思想表述。戰國初期的吳起（前440—前381）作為儒者出身的兵家人物，又有被當時人稱道“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的贊譽。<sup>⑤</sup>面對戰國時代列國爭雄的形勢，吳起一方面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另一方面強調德治，即在其思想學說中首先關注的就是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充分體現出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思想理路。

吳起主張以史為鑒，關注到國之存亡就在於“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所以他說：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吳子·圖國》）

吳起進一步談論到在國家政治中，百姓萬民的地位和作用，主張君主以採取和實行教化百姓與親和萬民的政策原則為先，纔能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為。所以他說：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吳子·圖國》）

對於具體的道德原則的實施及其效果，吳起也有所引申，同樣有著以史為鑒的證明。所以他說：

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遠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

① 《後山集》卷一四《策問·擬御試武舉策》。

② 《漢藝文志考證》卷二《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③ 孫詒讓著：《周禮正義》，中華書局本，第3冊，802頁。

④ 《日知錄》卷一三《周末風俗》。

⑤ 《史記·吳起列傳》引李克語。



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故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吳子·圖國》）

在吳起看來，之所以“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就是因為湯武奉行了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也就是獲得了天意和民意的支持即“舉順天人”，纔能够取得成功。這和《司馬法》中所表述的“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的說法是一致的。

在談到“兵”，亦即有關軍事方面問題的時候，吳起對“兵之所起”的原因有所總結歸納，對“兵之名”有所區分，特別強調“義”字而言“義兵”，並且說“禁暴救亂曰義”，主張“義必以禮服”。其文如下：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弃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吳子·圖國》）

不僅如此，吳起還主張將德治原則貫徹到底，所以他強調說：

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吳子·圖國》）

此外，《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也有關於吳起與魏武侯談論“君主之德”的記載：

吳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在吳起看來，在三苗、夏桀、殷紂的“德義不修”、“修政不仁”、“修政不德”的“道德非正義”的情況下，那麼“禹滅之”、“湯放之”、“武王殺之”，就是從道德正義走向政治正義（軍事正義）的體現。更何況在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那裏，還有著“天道”、“天命”的指引和“天討”、“天罰”的道理。

通過以上的簡要考察可知，僅就先秦兵家中的《伍子胥》、《司馬法》、《吳子》等文獻，在對待攻戰的態度和在運用攻戰手段懲戒非道德行爲的價值取向方面有很強的一致性。這種具有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意義上的思想表述，在先秦其他諸子議兵、議戰或其他的政治學

說中也有體現,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各種政治現實和思想家理想政治理念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協調與交匯,以及“正義原則”所體現的道德文明和政治文明歷史的發展進程,從而構成了先秦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方面。那麼,先秦儒家、墨家、道家則以不同的關注點和不同的表述方式,思考著和回答著同樣的問題,也是我們繼續進行比較考察的思想內容。

(本文發表前得到了審讀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在此深表謝忱。)

## 新莽職方補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黃東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鄔文玲

**內容提要** 本文結合史書記載和出土文獻，對新莽時期敦德、輔平、設屏、居成、延亭、樂平諸郡的建置及名稱改易予以補考。指出：(1)敦煌郡及所轄敦煌縣均曾先後改名為文德、敦德，而玉門都尉則一直隸屬於該郡。(2)酒泉郡在始建國元年仍沿用舊名，改稱輔平的明確紀年為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漢制酒泉郡的玉門縣和敦煌郡的玉門關兩個地名同時并存；作為軍事系統的居成部（非行政系統的居成縣）曾一度劃歸輔平郡管轄。(3)饒宗頤、李均明關於設屏郡並未取代張掖郡而很可能是從張掖郡分置的看法是可信的，張掖郡在始建國四年仍沿用舊名；新莽時期並未將行政系統的居延縣改為居成縣；但對作為軍事系統的居延部則有二度改名：起初，沿用漢制居延部舊名；到始建國三年、四年，改稱延城部；天鳳、地皇年間，改稱居成部；居成部至少在地皇三年劃歸輔平郡管轄；該部雖然經過多次改名，但其與甲渠（甲溝）侯官的轄屬關係始終未變。(4)新莽時期很可能在居延一帶短時增設過“居成郡”和“延亭郡”。(5)武都郡縣在新莽初年仍沿用漢制舊名；《漢志》所載武都郡所領的“河池”縣應是“何池”之誤，“循成道”實係“脩成道”之誤，應予校正。

**關鍵詞** 新莽 職方 改易 簡牘

王莽代漢以後，對漢制多所更革，尤其在行政區劃建置和郡縣名稱方面的變動甚巨，乃至出現連年變更，一郡五易其名，“吏民不能紀”的情況，在下達詔書之時，不得不一再於新名稱之後標注舊名，使得事項原本十分簡單的詔書呈現出繁複的情形：

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

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sup>①</sup>

對於王莽時期的行政區劃建置情況，史書中沒有專門的記載。主要散見於《漢志》<sup>②</sup>、《後漢書》、《水經注》等文獻之中。比較集中的是《漢志》，其在著錄時對王莽時期的政區地理狀況多有追溯，凡是王莽時期有更改的郡國縣邑之下，皆以“莽曰”的形式加以標注。前輩學者譚其驤曾廣泛搜求資料，主要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撰寫《新莽職方考》一文，對王莽時期的郡國建置作了詳細考證。<sup>③</sup> 後來隨著簡牘、封泥、官印、器物銘文等出土資料的陸續面世和公布，傳世文獻和出土資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漸成治史的重要路徑之一。這也使得王莽時期的職方研究呈現出新的局面，許多具體的細節因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而得以再現。比如，早年法國漢學家沙畹根據漢簡資料指出，簡文中的“文德”為王莽所改敦煌郡之初名。王國維進一步證成其說。<sup>④</sup> 後來吳榮曾、饒宗頤、李均明、閻步克、辛德勇、後曉榮等學者結合出土文獻資料，對新莽時期的職官、地理制度展開了進一步的探討，取得了重要進展。<sup>⑤</sup> 不過以往關於新莽職方的研究仍有未盡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某些行政區劃及名稱的探討，未充分考慮年代因素；二是對某些簡文資料的解讀不夠準確；三是對基層的里的關注不夠。

因此，本文擬在充分利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結合出土資料和傳世文獻，對新莽時期的職方問題再作考論，主要探討敦德、輔平、設屏、居成、延亭、樂平諸郡的建置及名稱改易情況。

## 一、敦德郡：敦煌、文德、敦德

### 1. 文德郡與敦德郡

據《漢志》記載，王莽改敦煌郡為敦德郡。但從簡牘資料和官印文字來看，敦煌郡在王莽時期至少經歷了文德、敦德兩次改名。

① 《漢書》卷九九《王莽傳中》，4137 頁。

② 《漢書·地理志》，本文省稱《漢志》。

③ 見譚其驤《新莽職方考》（原載《燕京學報》第 15 期，1934。後收入其所著《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④ 王國維著：《流沙墜簡·屯戍叢殘》“簿書類”六十至六十二。

⑤ 吳榮曾著：《新莽郡縣官印考略》，《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閻步克著：《文窮圖現：王莽保災令所見十二卿及州、部辨疑》，《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閻步克著：《詩國：王莽庸部、曹部探源》，《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辛德勇著：《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後曉榮著：《戰國秦漢地理研究——以考古出土資料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師範大學，2006。

敦煌漢簡中出現的地名“文德”，最早引起法國漢學家沙畹的注意和研究，他認為簡文中的“文德”為王莽所改敦煌郡之初名。王國維進一步證成其說：“文德，地名，不見《漢志》，據上簡文德有大尹、有長史，則為邊郡矣。他簡舉西北邊郡有文德、酒泉、張掖、武威、天水、隴西、西海、北地八郡，舉文德而無敦煌，故沙氏釋彼簡文德為王莽所改敦煌郡之初名，以此簡證之，沙說是也。此簡稱文德為始建國元年事，至地皇元年一簡又稱敦德，與《漢志》合，然則《漢志》所載乃再改之名也。”<sup>①</sup>

譚其驤贊同王國維的觀點，並指出古符牌有敦德郡。王莽時期的一件銅虎符背有銘文曰：“新與敦德廣恒連率為虎符，敦德郡左二”。不過他對虎符銘文中連率之前並綴郡名和縣名的現象感到疑惑，對於王國維之說似乎也并不信服。其文云：“郡名下綴縣名，殊不可解，豈郡守兼縣令之職乎？王國維曰：蓋莽以古之連率所統非一國，故於郡下復舉一縣，始若統二郡者，實則仍領一郡而已。”<sup>②</sup>對於郡名下綴縣名的問題，吳榮曾認為，郡名後所附的縣名，可能是治所所在。不過其與《漢志》所記郡治不合。原因或許是各郡經過新莽分割之後，治所也隨之而改易。比如《漢志》記載蜀郡治成都，王莽改蜀郡為導江，而《後漢書·公孫述傳》說公孫述在王莽時曾作“導江卒正”，“治臨邛”。又如《東觀漢記·邳彤傳》說王莽時從鉅鹿郡分出一個和成郡，“居下曲陽”，而西漢的鉅鹿郡則是以鉅鹿為郡治。<sup>③</sup>

饒宗頤、李均明二位贊成王國維之說，並作了進一步的考證。指出：文德既是新莽時期的郡名，亦作縣名。至遲始建國元年敦煌郡已改名文德，其改名早於西北其他郡。敦德同樣既是郡名，又作縣名，並加亭字作“敦德亭”以與郡名相區別。至遲天鳳三年，文德已改名為敦德。同時還舉新莽官印“文德左千人”印、“敦德尹曲後候”印、“敦德步廣曲候”印以及前引敦德郡銅虎符銘文為據。<sup>④</sup>後曉榮亦認同敦煌郡在王莽時期經歷文德、敦德二度改名之說。<sup>⑤</sup>

為了進一步呈現王莽時期對敦煌郡進行兩次改名的情況，茲將新莽簡中涉及敦煌、文德、敦德的簡文羅列如下：

首先，關於敦煌的簡文。

[簡1]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兩，粟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ㄣ居攝三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欽、隧長張博受就人敦煌高昌里滑護字君房。

《敦煌漢簡》<sup>⑥</sup>282

① 見王國維《流沙墜簡·屯戍叢殘》“簿書類”六十至六十二。

② 譚其驤著：《新莽職方考》。

③ 吳榮曾著：《新莽郡縣官印考略》，《先秦兩漢史研究》，315頁。

④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169—170頁。

⑤ 后曉榮著：《戰國秦漢地理研究——以考古出土資料為中心》，245頁。

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

[簡2]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半兩,粟小石卅五十六石二斗五升。〰居攝三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欽、燧長張博受就人敦煌利成里張賀字少平。

《敦煌漢簡》283

其次,關於文德的簡文。

[簡3]〰移偏將軍文德尹乃戌部〰 《敦煌漢簡》131

[簡4]戌卒故道平鄉里蔡育二十九 廣昌在文德 蔡中 萬育代 《敦煌漢簡》264

[簡5]大煎都候長文德安世里庶更李鳳,年三十五,馬一 《敦煌漢簡》278

[簡6]入西蒲書二封:其一封文德大尹章,詣大使五威將莫府;一封文德長史印,詣大使五威將莫府。始建國元年十月辛未日食時,關嗇夫〰受〰〰卒趙彭。

《敦煌漢簡》1893

[簡7]〰丁丑,尚書大夫武威男并下張掖、酒泉、文德〰〰,張掖屬國大尉下當用者

《敦煌漢簡》2053

[簡8]德侯,西域、東域、北域將尉,雍州、冀州牧,西部、北部監,文德、酒泉、張掖、武威、天水、隴西、西海、北地

《敦煌漢簡》2062

第三,關於敦德的簡文。

[簡9]王少昕 敦德 《敦煌漢簡》1827

[簡10]敦德步廣尉曲平望塞有秩候長敦德亭間田東武里五士王參秩庶士,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十月乙未迹盡二年九月晦,積三百六十日,除月小五日,定三百五十五,以令二日當三日,增勞百黍十黍日半日,爲五月二十黍日半日。 《敦煌漢簡》1854

[簡11]〰歲,長黍尺五寸,應令,敦德亭間田平定里,去官二百二十五里。·屬敦德郡

《敦煌漢簡》5

[簡12]里廣遠,臣謹便下詔書敦德郡以從事。臣〰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臣〰騎

《敦煌漢簡》75

[簡13]乏,故將吏士詣敦德。今車師諸國空,黠虜久獲獄,三輩兵宜 《敦煌漢簡》79

[簡14]假敦德庫兵弩矢五萬枚,雜驅三千匹,令敦德廩食吏士,當休馬審處

《敦煌漢簡》80

[簡15]正月丙辰移書敦德 草

《敦煌漢簡》89B

[簡16]候郵,願降歸德。臣〰竊見大都護崇檄與敦德尹,亡已得乘姑墨城,孤處西

《敦煌漢簡》91

[簡17]沒校妻子皆爲敦德還出,妻計八、九十口,宜遣吏將護續食 《敦煌漢簡》116

[簡 18] 皇帝陛下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二月壬戌書,敦德玉門千秋隧

《敦煌漢簡》180

[簡 19] 皇帝陛下 始建國天鳳三年正月甲戌上,敦德大煎都候郵 《敦煌漢簡》181

[簡 20] 皇帝陛下:臣𠂇叩頭叩頭,十二月壬辰敦德玉門行大尉事試守

《敦煌漢簡》182

[簡 21]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二月壬辰,敦德玉門行大尉事試守千人輔、試守丞況謂  
大前都尹西曹聊掾行塞,蓬

《敦煌漢簡》193A

[簡 22] 以移偏將軍敦德尹臣丁卯戌部左率□□□

《敦煌漢簡》196

[簡 23] 敦德尹書草

《敦煌漢簡》208A

[簡 24] 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穀,日聞如公之蜀中軍試士 《敦煌漢簡》226

[簡 25] 藥,竊聞循母、循弟家盡病在田,田在敦德魚離邑東,循不及候,母病篤

《敦煌漢簡》230A

[簡 26] 六月十三日關書,玉門哀叩頭言腋君里田主人:穀書至郡 《敦煌漢簡》230B

[簡 27] 酒三斛,黍米二斛,白稗米二斛,牛肉百斤,□□□,醬二斗,醢三斗。敦德  
尹遣史汜遷奉到。

《敦煌漢簡》246

[簡 28] □敦德詣關,二十六日夜到邠部監從事。

《敦煌漢簡》288

[簡 29] 敦德糒糗十二月八日食百八十六人 □□□月十六日

《敦煌漢簡》395

上述 29 枚簡文中,有幾枚有明確的紀年,比較清楚地反映了敦煌、文德、敦德三個名稱在新莽時期的變遷過程。[簡 1]、[簡 2] 表明“敦煌”在居攝三年仍沿用舊名。[簡 6] 表明,至遲到始建國元年敦煌已改為“文德”。[簡 18]、[簡 21] 表明至遲到始建國天鳳三年,文德已改為“敦德”。[簡 10] 表明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仍用“敦德”之名。

## 2. 敦德郡所領縣邑及縣下可考的里

據《漢志》,該郡舊領六個縣,其中冥安、效穀、淵泉、龍勒四個縣未改名,兩個改名:一是敦煌先改為文德,再改為敦德亭;二是廣至改為廣桓。<sup>①</sup> 敦德郡有魚離邑。

### (1) 敦煌、文德、敦德亭

敦煌:敦煌既作郡名,也作縣名。至少在居攝年間仍用敦煌之名,見上引[簡 1]、[簡 2]。簡文所見居攝年間敦煌縣所領之里有:高昌里(見[簡 1])、利成里(見[簡 2])。

文德:既作郡名,如上引[簡 6]“文德大尹”,亦作縣名,如上引[簡 5]“文德安世里”。簡文所見文德縣所領之里有:安世里(見[簡 5])。

<sup>①</sup>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下》,1614 頁。



敦德亭：敦德既作郡名，如上引[簡11]、[簡12]“敦德郡”，亦作縣名，并加亭字以與郡名相區別，如上引[簡10]“敦德亭間田東武里”、[簡11]“敦德亭間田平定里”等。簡文所見敦德亭所領之里有：東武里（見[簡10]）、平定里（見[簡11]）。

如果王莽時期只是將敦煌縣名先後改為文德、敦德亭，而沒有對縣下所領之里進行調整的話，那麼該縣所領的里即可檢出上述五個：高昌里、利成里、安世里、東武里、平定里。

## (2) 廣桓

王莽時期將西漢的廣至改為廣桓。上引新莽銅虎符銘文中有“敦德廣桓連率”。按照吳榮曾的看法，敦德郡的治所可能有一段時間設在廣桓縣。<sup>①</sup>

## (3) 效穀

效穀沿用舊名未改。新莽簡中亦有關於效穀的記錄。

[簡30] 隧長效穀間田常利里上牛康，年三十五□ 《敦煌漢簡》25

[簡31] 大煎都候長效穀常利里上造張陽，年三十六。劍一，弓二，犢丸各一，箭十二，馬一匹，鞍勒各一。 《敦煌漢簡》279

[簡32] 戌卒效穀常利里張詡，年三十。 《敦煌漢簡》252

[簡33] 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麥小石卅七石五斗。ㄣ居攝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欽受就人效穀益壽里鄧尊。 《敦煌漢簡》284

[簡34] 入麥小石十三石五升。ㄣ居攝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欽受就人效穀益壽里鄧尊，少不滿車兩，未泰 《敦煌漢簡》285

上述涉及效穀縣的簡文書寫具有明顯的新莽簡時代特徵，表明王莽時期的確沿用效穀舊名，與《漢志》所載相合。

簡文所見效穀所領之里包括：常利里（見簡[30]、簡[31]、簡[32]），益壽里（見簡[33]、簡[34]）。

## (4) 龍勒

龍勒沿用舊名未改。新莽簡中亦有關於龍勒的記錄。

[簡35] 出南校檄一，玉門關候詣龍勒，居攝元年九月庚戌日□ 《敦煌漢簡》624A

[簡36] 入粟糜黍十八斛：其二十黍斛粟；五十一斛糜。正月癸亥，掾田褒受龍勒三官掾周生期。 《敦煌漢簡》311

[簡37] 玉門候造史龍勒周生萌 伉健，可為官士吏。 《敦煌漢簡》1898

上述簡文書寫具有明顯的新莽簡時代特徵，表明王莽時期的確沿用龍勒舊名，與《漢志》

① 吳榮曾著：《新莽郡縣官印考略》，《先秦兩漢史研究》。

所載相合。

### (5) 玉門關

漢代有玉門關和玉門縣,有時均省稱為玉門,不易區分。實際上二者的範圍和歸屬均不同,需加辨別。玉門關在敦煌郡龍勒縣,係都尉治,故玉門部都尉系統歸屬於敦煌郡。新莽時期改敦煌為敦德之後,玉門部都尉系統仍歸入敦德郡轄境。上引[簡 18]“敦德玉門千秋隧”和[簡 20]、[簡 21]“敦德玉門行大尉事”,以及《敦煌漢簡》1925:“始建國天鳳元年玉門大煎都兵完堅折傷簿”等,表明玉門部都尉系統在新莽時期仍歸屬於敦德郡的事實。玉門縣則屬於酒泉郡,王莽時期改酒泉為輔平,同時將玉門縣改為輔平亭(詳見後文)。<sup>①</sup>

## 二、輔平郡

### 1. 輔平郡與酒泉郡

《漢志》記載,王莽時期改酒泉郡為輔平郡。相關簡牘資料也可以證實此點。

[簡 38] 輔平居成甲溝候官塞庶士候□  
為輔平屬居成三十井候官塞庶士□  
為輔平居成殄北候官塞庶士候□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sup>②</sup>156.4

[簡 39] 大凡勞 □  
□輔平居成甲溝候官□

《居延新簡》<sup>③</sup>E. P. T26:25

[簡 40] 北書一封,輔平連率章□

《居延新簡》E. P. T40:192

[簡 41]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五月丙辰朔乙巳,裨將軍輔平居成尉伋丞 謂城  
倉間田延水甲溝三十井殄北卒未得

□……付受相與校計同月出入毋令繆,如律令

《居延新簡》E. P. T65:23A

[簡 42] □甲午輔平 □□□□□

《居延新簡》E. P. T59:403

上引[簡 40]中的“輔平連率章”,表明輔平為郡,與《漢志》相合。其餘諸簡中的“輔平”亦皆

① 關於玉門關與玉門縣的問題,陳夢家有過詳細探討(參見其所著《玉門關與玉門縣》,《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著:《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指“輔平郡”。

上述簡文雖然可以證實王莽時期改酒泉爲輔平,但除了[簡41]有“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的明確紀年之外,其餘簡的具體年代信息不明,因此不能推定王莽改酒泉爲輔平的確切時間。不過有資料表明,在新莽初年仍然沿用酒泉舊名。比如《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50.40:“酒泉大尹口書一封,酒泉大尹章”,可證此時雖然已將職官名“太守”改爲“大尹”,但“酒泉”仍用舊名。另外在簡牘中可見酒泉與文德并舉之例,如上引[簡7]、[簡8]。前文曾指出,文德係王莽時期所改敦煌郡之初名,文德之名至遲在始建國元年即已行用。酒泉與文德并舉,表明至少在敦煌改名爲文德之時,酒泉仍用舊名。換句話說,至少在始建國元年,酒泉仍用舊名。

## 2. 輔平郡所領之縣

據《漢志》,王莽時期改酒泉爲輔平。舊領縣九個,其中池頭、綏彌、天衣三個縣未改名,改易縣名者有六個:

顯德:西漢的祿福。載武:西漢的表是。樂亭:西漢的樂涓。輔平亭:西漢的玉門。蕭武:西漢的會水。測虜:西漢的乾齊。

### (1) 輔平亭

輔平亭係西漢玉門縣之改名。據《漢志》,西漢時期敦煌郡的玉門關和酒泉郡的玉門縣,兩地同時并存。玉門關的情形已如前述。漢簡中也有關於玉門縣的信息。比如《敦煌漢簡》2322“玉門丞”、2331“玉門富昌里”等簡文中的“玉門”皆指玉門縣。《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二《隴右道》引闕駟《十三州志》說:“玉門縣,漢置,長三百里,石門周匝,山間纔徑二十里,衆泉流入延興海。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漢志》“玉門縣”下顏師古注引亦說:“闕駟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因此,正如陳夢家研究指出的那樣,涉及酒泉的漢簡中的玉門是縣名,與涉及敦煌的漢簡中的玉門不同,後者是玉門都尉、候官或玉門關之省。<sup>①</sup>

### (2) 居成部

前引[簡38]“輔平居成甲溝候官”、“輔平屬居成三十井候官”、“輔平居成殄北候官”以及[簡39]“輔平居成尉”等,表明至少一段時期內居成部都尉系統劃歸輔平郡管轄。《漢志》未見相關著錄,茲可補。饒宗頤、李均明認爲居延縣曾一度劃歸輔平郡管轄的說法似乎不夠確切,因爲從目前見到的材料來看,如前所引,明確爲輔平所轄的居成,均指軍事系統的居成部,而不是行政系統的居成縣。關於居成與居延的關係問題,詳見後文。

<sup>①</sup> 陳夢家著:《玉門關與玉門縣》,《漢簡綴述》,204頁。

### 三、設屏郡

#### 1. 設屏郡與張掖郡

據《漢志》，王莽時期改西漢的張掖郡爲設屏郡。新莽官印有“設屏農尉章”<sup>①</sup>，王人聰認爲“農尉”乃是“農都尉”，沿用了西漢的職官，通常在邊郡設農都尉，因此“設屏農尉章”之“設屏”應指設屏郡。<sup>②</sup>可證王莽時期確有設屏郡建置。但設屏郡是否如《漢志》所載係承西漢張掖郡改名而來，則需重新討論。居延漢簡中有一枚新莽時期的郵書收發登記簡，其文爲：

[簡43]南書五封：二合檄，張掖城司馬，毋起日，詣設屏右大尉府；一封詣右城官，一封詣京尉候利，一封詣穀成東阿，右三封居延丞印，八月辛卯起，八月辛丑日鋪時，驛北受橐佗莫尚卒單崇，付沙頭卒周良。《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88.30

簡文顯示，有兩封合檄文書，是由張掖城司馬發出，要送至設屏右大尉府。此處“張掖”和“設屏”并舉，表明當時設屏并未取代張掖，因此《漢志》的記載可能并不準確。饒宗頤、李均明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並指出簡文所說的“張掖”可能承襲了西漢時的“張掖郡”，不是由“武威”改稱的“張掖郡”。而“設屏”則應是從原來的“張掖郡”割裂出來設立的新郡。<sup>③</sup>

也有簡文資料表明，新莽初年仍然沿用張掖郡舊名。比如上引[簡7]、[簡8]張掖與文德并舉。前文曾指出，文德係王莽時期所改敦煌郡之初名，文德之名至遲在始建國元年即已行用。張掖與文德并舉，表明至少在敦煌改名爲文德之時，張掖仍用舊名。換句話說，至少在始建國元年，張掖仍用舊名。此外，還有不少簡文顯示出張掖郡名在王莽時期仍然行用的情況：

[簡44]之張掖寧發盧水五百人、功卿與同心士六十人，俱未有發，曰此近謂第一部千八十人者也，議遣君威來出《敦煌漢簡》58

[簡45]□張掖郡居延通澤里大夫忠強年三十□《居延新簡》E. P. T17:27

[簡46]三月己丑，張掖庫宰崇以近秩次行大尹文書事、長史丞下部大尉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有犯者輒言，如詔書，書到言。兼掾義、兼史曲、書吏遷金。

《居延新簡》E. P. T59:160

[簡47]十月丁卯，張掖大尹融、尹部騎司馬武行長史事、丞博□□□□行庫事

① 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卷四，593號。

② 王人聰著：《新莽官印會考》，王人聰、葉其峰：《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90，113頁，101號。

③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168頁。

□□□如律令書。掾戎、兼屬護、書佐定。

《居延新簡》E. P. T59:338

[簡48]□□□隧長上造李欽，始建國三年十月旦乘塞外，盡三年九月晦，積三百□  
……張掖延城大尉元、丞音以詔書增欽勞□□

《居延新簡》E. P. T59:339

[簡49]十月辛酉，將屯偏將軍張掖大尹遵、尹騎司馬武行副咸事、試守徒丞司徒□

□

循下部大尉官縣，承書從事下當者，如詔書，書到言。兼掾義、史馮、書吏□

《居延新簡》E. P. F22:65A

其中[簡48]涉及到隧長李欽的勞績記錄，起於始建國三年十月旦，訖於始建國四年九月晦。同簡中還涉及到張掖延城大尉元、丞音根據詔令的要求，為李欽增加勞績。這也表明，在始建國四年九月仍然沿用張掖舊名。[簡43]“張掖城司馬”和“設屏右大尉府”同時出現在一簡之中，表明張掖和設屏是同時并存的兩個郡。

## 2. 設屏、張掖郡所領之縣

本文贊同王莽時期沿用漢制張掖郡，并從張掖郡分割出設屏郡之說，但目前還沒有關於分割出來的設屏郡所轄縣的詳細資料，因此將二者并論。據《漢志》，張掖郡舊領縣十個，其中顯美縣是舊名，更改縣名者九個：

官武：西漢的麟得。渠武：西漢的昭武。貫虜：西漢的刪丹。否武：西漢的氐池。傳武：西漢的屋蘭。勒治：西漢的日勒。揭虜：西漢的驪軒。羅虜：西漢的番和。居成：西漢的居延。

### (1) 居延

《漢志》說居延在王莽時期被改稱為居成。但大量簡牘資料表明，事實遠非如此簡單，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厘清：一是新莽簡中并存的居延、居成、延城三者之間是什麼關係；二是居成在新莽時期是否曾為郡名；三是新莽時期曾經劃歸輔平郡轄境的居成是否為縣。為討論方便起見，先將有關簡文羅列如下：

[簡50]□國天鳳一年十一月庚子朔丙辰，尉史尚敢言之，乃月十三日到居延，將候長薌良及 □業等，□□蒼□，即日候長薌良、傅育、并妻業，責已決，遣·隧長

《居延新簡》E. P. T4:1

[簡51]□戌卒居延昌里石恭三年署居延代田亭，三年署武成隧，五年因署受絮八斤。二月丁丑自取。

《居延新簡》E. P. T4:5

[簡52]□□第二十一隧長居延沙陰里上造周揚，年二十八，始建國三年……□

《居延新簡》E. P. T7:5

[簡53]□張掖郡居延通澤里大夫忠強，年三十□

《居延新簡》E. P. T17:27

[簡 54] 豐責居延男子張君孫襄絮一枚，直百三十五，入三十五

《居延新簡》E. P. T59:38

[簡 55] 延城甲溝候官第三十隊長上造范尊，中勞十月十泰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三十二歲，長泰尺五寸，應令，居延陽里家去官八十里。屬延城部。

《居延新簡》E. P. T59:104

[簡 56] 甲溝執胡輿隧長居延三泉里

《居延新簡》E. P. T65:339

[簡 57] 第十三隧長居延萬歲里上造馮強，年二十五，始建國天鳳五年正月辛亥除補甲溝候官尉史，代夏侯常。

《居延新簡》E. P. F22:439

[簡 58] 甲渠塞候長居延肩水里公乘竇何，年卅五，始建國天鳳上戊五年正月丁丑除。

《居延新簡》E. P. F22:440

[簡 59] 國天鳳一年十二月己巳朔丁丑，甲溝第三候史并劾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

《居延新簡》E. P. F22:685

[簡 60] 第十六[燧]長居延利上里上造鄭陽，年卅七，始建國地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31·106

[簡 61] 甲溝候官尉史居延安樂

《居延新簡》E. P. W:120

(按：居延是縣，疑安樂是居延下轄的一個里名，即居延安樂里。)

[簡 62] 居延累山里吳詡年三十

《居延新簡》E. N:8

[簡 63] 始建國二年十月癸巳朔乙卯，城倉丞移甲溝候官令史郭卒周仁等卅一人省作府，以府

記廩城倉，用粟百卅六石。令史曰卒馮喜等十四人廩五月盡八月，皆遣不當

《居延新簡》E. P. T4:48A

居延倉丞 十月戊午卒同以來 尉史崇發行事

《居延新簡》E. P. T4:48B

[簡 64] 北書二封：其一封詣居延騎千人；一封章破，詣趙卿治所。五月戊寅下舖，推木隧卒勝有受三十井誠勢隧卒樊隆。己卯蚤食五分，當曲隧卒蔡崇付居延收降亭卒尹

《居延新簡》E. P. T59:156

[簡 65] 一張掖居延都尉豐言願入一月奉泉萬二千

《居延新簡》E. P. T59:539

[簡 66] 伐胡卒 責 布 一領直千八十……已得錢二百，少八百八十，責廣地次隧長陶子賜練襦一領，直八百三十，今爲居延市吏責……

《居延新簡》E. P. T59:645

上引[簡 50]至[簡 62]中的“居延”之後皆綴里名，按照當時的籍貫表述方式，里名之前通常是縣名，由此可知里名之前的“居延”爲縣名。[簡 63]“居延倉丞”、[簡 66]“居延市吏”之“居延”亦指居延縣。其中[簡 63]有明確紀年“始建國二年”，[簡 52]有明確紀年“始建

國三年”，[簡 50]、[簡 59]有明確紀年“天鳳一年”，[簡 57]、[簡 58]有明確紀年“天鳳五年”，[簡 60]雖然殘斷，但根據“始建國地”亦可判定其年代為地皇年間。這些紀年表明在新莽時期，從始建國年間一直到地皇年間，居延作為縣名一直行用。因此，《漢志》關於王莽時期改居延為居成的記載不夠準確，新莽時期並未將居延縣改為居成縣。

上列簡文所見居延縣所領之里有十個，分別是：昌里（見[簡 51]）、沙陰里（見[簡 52]）、通澤里（見[簡 53]）、陽里（見[簡 55]）、三泉里（見[簡 56]）、萬歲里（見[簡 57]）、肩水里（見[簡 58]）、利上里（見[簡 60]）、安樂里（見[簡 61]）、累山里（見[簡 62]）。

另外[簡 64]“居延騎千人”、“居延收降亭”與[簡 65]“居延都尉”中的“居延”則是指居延部，而不是居延縣。據此可知，新莽亦曾在一段時間內沿用漢制居延部之名。

## （2）居成

新莽簡中涉及居成的簡文如下：

[簡 67]居成甲溝第三燧長間田萬歲里上造馮匡，年二十一，始建國天鳳三年閏月乙亥除補止北燧長□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25. 11

[簡 68]□成尉甲溝塞庶士士吏代和恢 《居延新簡》E. P. T27:43  
按：根據文意，斷簡處可補“居”字，作“居成尉”。

[簡 69]·居成部甲溝候官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泰月盡九月吏名籍及□□ 《居延新簡》E. P. W:91

[簡 70]居成甲溝候官尉史馮強□ 《居延新簡》E. P. T6:20

[簡 71]南一封，居成尉，詣使者掾高晏治所 《居延新簡》E. P. T40:177

從文意來看，[簡 67]至[簡 71]中的“居成”，均指軍事系統的居成部，下轄甲溝候官等機構。甲溝候官係王莽時期改漢制甲渠候官而來，漢制甲渠候官屬居延部。據此可推知，王莽時期甲溝候官所屬的居成部，實係改漢制居延部而來。其中[簡 67]有明確紀年“天鳳三年”，[簡 69]有明確紀年“地皇二年”，可知至少在此時段內居延部已改名為居成部。而前文已指出，在天鳳、地皇年間，居延縣名一直行用。據此可以進一步判定《漢志》所載王莽改居延為居成，係針對“都尉治”即部而言，非指改縣名。<sup>①</sup>事實上，王莽並未改居延縣之名，只是改了居延部之名。

## （3）延城

新莽簡中既見“居成甲溝候官”，又見“延城甲溝候官”，即出現了甲溝候官既隸屬於居成、又隸屬於延城的情形。當如何解釋呢？涉及延城的新莽簡除了前引[簡 48]之外，還有

<sup>①</sup> 《漢書·地理志》“張掖郡”下“居延”條曰：“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



如下一條：

[簡 72] 延城甲溝候官第三十隊長上造范尊，中勞十月十秊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三十二歲，長秊尺五寸，應令，居延陽里家去官八十里。屬延城部。

《居延新簡》E. P. T59:104

關於這兩枚簡中所出現的“延城”，饒宗頤、李均明認為[簡 72]中的“延城部”當為“延亭城部”之簡稱，指延亭城部都尉。<sup>①</sup>這一說法似未安。理由如下：第一，[簡 72]中明確出現“延城部”，表明“延城”應為部名；第二，未見“延亭城部”簡稱為“延城部”的實例；第三，[簡 72]中的“延城甲溝候官”，表明當時甲溝候官隸屬於“延城部”。上文已指出，甲溝候官係漢制甲渠候官之改名，舊屬居延部，始建國天鳳、地皇年間，居延部已改稱為“居成部”，仍領有甲溝候官。而此處甲溝候官所屬的“延城部”，很可能是王莽時期對“居延部”的另一次改名。[簡 48]有始建國三年至四年的明確紀年，表明至少在這個時段內已行用“延城部”之名，其年代早於“居成部”行用的天鳳、地皇年間。同簡“張掖延城大尉”表明延城部當時隸屬於張掖郡。據此可以推斷，“居延部”在新莽時期至少經歷了兩次改名：即首改為“延城部”，再改為“居成部”。在這一過程中，其與甲渠（溝）候官的轄屬關係則始終未變。至此，厘清了作為部名的居延、延城、居成三者之間的關係。而居成部在新莽時期曾隸屬於輔平郡（詳見前文輔平郡條）。

另外，後曉榮在“延城郡”條曾引[簡 48]中的“張掖延城大尉”之“延城大尉”為據，<sup>②</sup>未安。如前文所述，此處“延城”指延城部，隸屬於張掖郡。

## 四、居成郡

### 1. 居成郡

在新莽時期，居成除了作為部名之外，也很可能是郡、縣名。《居延新簡》E. P. T52:121 云：“居成大夫史王況 詣門下”。饒宗頤、李均明對此作了獨到的考證，認為此簡表明“居成”曾為郡名，史書於此失載。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新莽曾稱郡太守為“大夫”，如《漢書·王莽傳》載，天鳳元年，王莽“分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居延新簡》E. P. T5:62 見“六遂大夫”。第二，“史”原稱“屬”，設於郡府、都尉府以上機構，縣官未

①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171 頁。

② 後曉榮著：《戰國秦漢地理研究——以考古出土資料為中心》，242 頁。

設。<sup>①</sup> 本文贊同饒、李二位之說。

## 2. 居成間田

新莽簡中有不少關於“居成間田”的資料，那麼“間田”究竟是什麼意思，“居成間田”與“居成”有何關聯，凡此皆值得進一步探討。爲了行文方便，先將相關簡文臚列如下：

[簡 73] □□□□□除□□官行□□臨木□□屬□□，馬□□□，其十二匹□除□……卒部入，故居成間田……以□□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7. 19

[簡 74] 居成甲溝第三隧長間田萬歲里上造馮匡年二十一，始建國天鳳三年閏月乙亥除補止北隧長□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25. 11

[簡 75] 居成間田都田嗇夫孫匡當捕故掾孫□ 《居延新簡》E. P. T59:265

[簡 76] 居成間田造昌里上造王□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482 · 11

[簡 77] 居成間田守馬丞趙况叩頭白記 《居延新簡》E. P. T65:381

所謂“間田”，通常認爲王莽時期未分封之地皆稱“間田”。王國維指出，“間田”乃用《禮記·王制》之語，凡郡縣未封之地皆間田也。<sup>②</sup> 吳榮曾結合“成紀間田宰”、“夙夜間田宰”、“盧江亭間田宰”以及簡文資料，認爲間田不單純是未封之地，它有一定大小，還有一套治理機構。簡文中將間田置於縣之後，里之前。由此可以推測出，間田較里大，甚至可以包括若干個里；而較縣爲小，故必須置於縣之下。間田是介於縣、里之間的一種中間層次，而且和縣、里一樣，是地方政權組織之一。其主管者爲宰，和縣令、長、丞、尉一樣擁有通官印以行使權力。<sup>③</sup> 薛英群認爲西北邊郡地區的間田，非指封土以外的土地，實指各屯田區以外之土地，也就是郡縣行政系統管轄之土地。<sup>④</sup> 饒宗頤、李均明認爲，漢簡所見間田或冠以縣名，或徑稱“間田”代表所在縣。<sup>⑤</sup>

從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間田”與“縣”的含義似更爲接近。理由有二：第一，從間田之後所綴職官來看，應屬縣級。官印“成紀間田宰”、“夙夜間田宰”、“盧江亭間田宰”中的“宰”，應即“縣宰”。據《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王莽改“縣令長曰宰”。[簡 77]“居成間田守馬丞”之“馬丞”，與見於衆多新莽官印中的馬丞印所指相同，即司馬丞，相當於漢制縣尉。<sup>⑥</sup> 第二，從漢代對籍貫的表述來看，通常是縣名+里名，那麼[簡 76]“居成間田造昌里”就相當於居成縣造昌里。

①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172 頁。

② 王國維著：《流沙墜簡·屯戍叢殘》“簿書類”四二。

③ 吳榮曾著：《新莽郡縣官印考略》，《先秦兩漢史研究》，323 頁。

④ 薛英群著：《漢代西北屯田組織試探》，《西北史地》1989 年第 1 期。

⑤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174 頁。

⑥ 參見吳榮曾《新莽郡縣官印考略》（《先秦兩漢史研究》，317—320 頁）。

不過,從目前簡文所見“居成間田”來看,還沒有關於“居成間田”的明確歸屬的資料。本文在認同王莽曾新設居成郡的基礎上,大膽揣測居成間田可能隸屬於居成郡。簡文所見隸屬於居成間田的里有萬歲里(見[簡 74])、造昌里(見[簡 76])。目前未見關於居成郡的其他資料,很可能居成郡存續的時間並不長。

## 五、延亭郡

有資料表明,王莽時期曾新設延亭郡。相關簡文如下:

[簡 78]九月己卯,行延亭連率事偏將軍□□□

勸農掾戎官縣承書從事下□□

《居延新簡》E. P. T52:490

[簡 79]延亭連率府行事□

廉夫子門下奏發□□

《居延新簡》E. P. T59:655A

延亭城司馬官

《居延新簡》E. P. T59:655B

饒宗頤、李均明指出,簡文中的延亭是新莽郡名。史書及前人均未言及。上引簡文中的“行延亭連率事偏將軍”、“延亭連率府”之“延亭”,即指延亭郡。據《漢書·王莽傳》,“連率”為始建國元年新莽所改“郡太守”稱謂。到地皇元年,王莽又曾賜連率偏將軍稱號。故主延亭者既稱“連率”又號“偏將軍”,則“延亭”必為郡名。上引兩簡皆出土於漢居延甲渠候官遺址,延亭當為新莽時在漢制居延縣基礎上新設之郡,與原張掖郡(後稱設屏)分離。<sup>①</sup>

目前除了上述簡文之外,未見其他有關延亭郡的詳細資料。鑒於王莽賜連率偏將軍稱號始於地皇元年,則[簡 78]的年代當不會早於地皇元年。因此,延亭郡可能只是在新莽末期短時存續。

如果居成郡和延亭郡的判定不誤的話,則新莽時期對漢制居延一帶的郡縣建置應有過多次調整。大約《漢志》只著錄了存續時間較長、影響較久的部分。

## 六、樂平郡

據《漢志》,王莽時期改西漢的武都郡為樂平郡。舊領縣九個,其中上祿、平樂道、沮、嘉陵道、循成道等五個未改名,更改縣名者四個:

循虜:西漢的武都。故道:西漢的善治。樂平亭:西漢的河池。楊德:西漢的下辨道。

<sup>①</sup>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171頁。

目前的新莽簡牘中未見該郡縣名稱更改的資料。但在《敦煌漢簡》中有一組來自武都郡的戍卒名籍簡，具有明顯的新莽時代書寫特徵，但縣名均為漢制舊名，表明其為更名之前的資料。據此亦可判定，至少在新莽初年仍沿用漢制武都郡縣名稱。這組簡文包含故道、下辨、河池、循成四個縣道，茲分述如下。

### 1. 故道

涉及故道的新莽簡有四枚：

[簡 80] 戍卒故道平鄉里蔡育二十九 廣昌在文德 《敦煌漢簡》264

[簡 81] □卒故道市陽里楊崔年三十三 上 · 富昌今凌胡 — 楊崔代刑枚  
《敦煌漢簡》268

[簡 82] 戍卒故道故道里上官宏年二十五 上 、步昌 步昌 尚官宏代樊歆  
《敦煌漢簡》269

[簡 83] 戍卒故道官里董獲年三十八 富昌 府 董獲代射大騰 敦煌漢簡》1009

根據上述簡文可檢出新莽時期故道所領里四個：平鄉里（見[簡 80]）、市陽里（見[簡 81]）、故道里（見[簡 82]）、官里（見[簡 83]）。

### 2. 下辨

涉及下辨的新莽簡有一枚：

[簡 84] 戍卒下辨竹里成衆年二十六省府 凌胡 府 — 成衆代楊鴻  
《敦煌漢簡釋文》254

據簡文可知，下辨所領之里包括竹里（見[簡 84]）。

### 3. 河池與河池

《敦煌漢簡》中出現了“何池”與“河池”兩個縣名。據《漢志》，武都郡屬縣有“河池”，未見關於“何池”的著錄。“河”、“何”二字既形近易訛，亦同音可通。那麼究竟何者為本字呢？先看《敦煌漢簡》中的相關簡文：

[簡 85] 戍卒何池大昌里上官詡年二十□□ 《敦煌漢簡》255

[簡 86] 戍卒何池下賁里李東年二十三 上□府 李東代李亥 《敦煌漢簡》256

[簡 87] 戍卒何池何池里王晏年三十 上□ 《敦煌漢簡》257

[簡 88] 戍卒何池耶里綠詡年二十泰 上 益昌 府 綠詡代陰蓬  
《敦煌漢簡》258

[簡 89] 戍卒河池上里期毋伯年三十八 上 廣武 府 期毋伯代唐歆  
《敦煌漢簡》272

[簡 90] 戍卒河池河池里王育年二十泰 𠂔 上 美水 王育代董獲

《敦煌漢簡》1008

上述六枚簡文中，關於戍卒的籍貫，[簡 85]、[簡 86]、[簡 87]、[簡 88] 整理者皆釋作“何池”，而[簡 89]、[簡 90] 則釋作“河池”。從簡影圖版來看，[簡 89] 和[簡 90] 中的“河池”二字與其餘四枚簡中的“何池”寫法相同，亦應改釋作“何池”。雖然在漢簡中，偏旁“𠂔”和“𠂔”的寫法有時十分相似，不易區分，但從圖版來看，這六枚簡文中的“何”、“池”二字左邊偏旁的寫法完全不同，一作“𠂔”，一作“𠂔”，區別十分明顯（見圖一所示）。因此從字形來看，釋作“河池”未安，應以“何池”為是。則[簡 89] 和[簡 90] 應分別改釋作：

戍卒何池上里期毋伯年三十八 上 廣武 𠂔 期毋伯代唐歆 《敦煌漢簡》272

戍卒何池何池里王育年二十泰 𠂔 上 美水 王育代董獲 《敦煌漢簡》1008

《漢志》所載“河池”，很可能是“何池”之誤。而造成這種訛誤的原因大約有二：一是“何”、“河”二字形近而誤；二是人們在傳抄過程中囿於“池”之俗解，以為“何”誤，而有意將“何”改成了“河”。

又據《漢志》“河池”顏師古注曰：“《華陽國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後漢書·西南夷傳·白馬氏傳》亦載：“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注引《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沖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却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逾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王先謙《漢書補注》云：“河池即仇池異名。此山接界廣遠，故在武都者為武都山，而河池又以山氏縣。續志後漢因漾水注，仇鳩水出鳩溪，南徑河池縣故城西南流入濁水。河池水出河池北谷，南徑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

“河池”之所以又名為“仇池”，雖然有可能是不同地域的命名或者方言發音不同所致，但考慮到“河池”在簡文中寫作“何池”，而“何”、“仇”二字之字形亦十分相近，因此“仇池”之名也很可能源自“何池”之訛誤。不過此係揣測，聊備一說。

據《漢志》，王莽時曾將“武都郡”改為“樂平郡”，將“河池”改為“樂平亭”。上述簡文中數字的寫法具有新莽時代特徵，但“何池”地名仍沿用舊名，表明這些簡書寫於王莽初年未改此郡縣名之前。

根據上引簡文，則大昌里（見[簡 85]）、下賁里（見[簡 86]）、何池里（見[簡 87]、[簡 90]）、耶里（見[簡 88]）、上里（見[簡 89]）等五個里均為武都郡何池縣所領。



圖一

#### 4. 脩成與循成

據《漢志》，武都郡下有“循成道”。王念孫《讀書雜誌》卷七“循成道”條指出：“循當爲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訛。《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并作脩城。”《敦煌漢簡》中出現了“脩成”、“循成”兩個縣道名稱，而《漢志》中可考者只有“循成道”，屬武都郡。正如王念孫所說，“脩”、“循”二字形近，疑在傳抄過程中產生訛誤。究竟何者爲是呢？爲了討論方便，先將簡文移錄如下：

[簡 91] 戍卒循成富里左豐年三十五，省府木工美水 府 《敦煌漢簡》253

[簡 92] 戍卒循成泉里索歆年三十，能爲泉履 步昌 □□□ 《敦煌漢簡》270

[簡 93] 戍卒脩成當利里楊馮年三十，省府 取代 省府 — 《敦煌漢簡》1010

首先討論“脩成”的問題。“脩成”雖然不見於《漢志》，但從同出簡文及圖版來看，簡 1010 與 1008、1009、254 等筆迹、格式相同（見圖二），均爲戍卒+縣名+里名+戍卒姓名+年齡。簡 1008 云“戍卒何池何池里王育年二十叁……”，簡 1009 云“戍卒故道宜里董獲年三十八……”，簡 254 云“戍卒下辨竹里成衆年二十六……”。可知其記錄時省略了郡名。而這幾枚簡同出，且筆迹相同，應爲一次寫成，可以推知其郡名亦應相同。據《漢志》，故道、河池（簡文作何池）、下辨均屬武都郡，則脩成亦應屬武都郡。《漢志》云武都郡下轄九個縣道，其中有循成道。“循”、“脩”二字形近，疑在傳抄過程中產生了訛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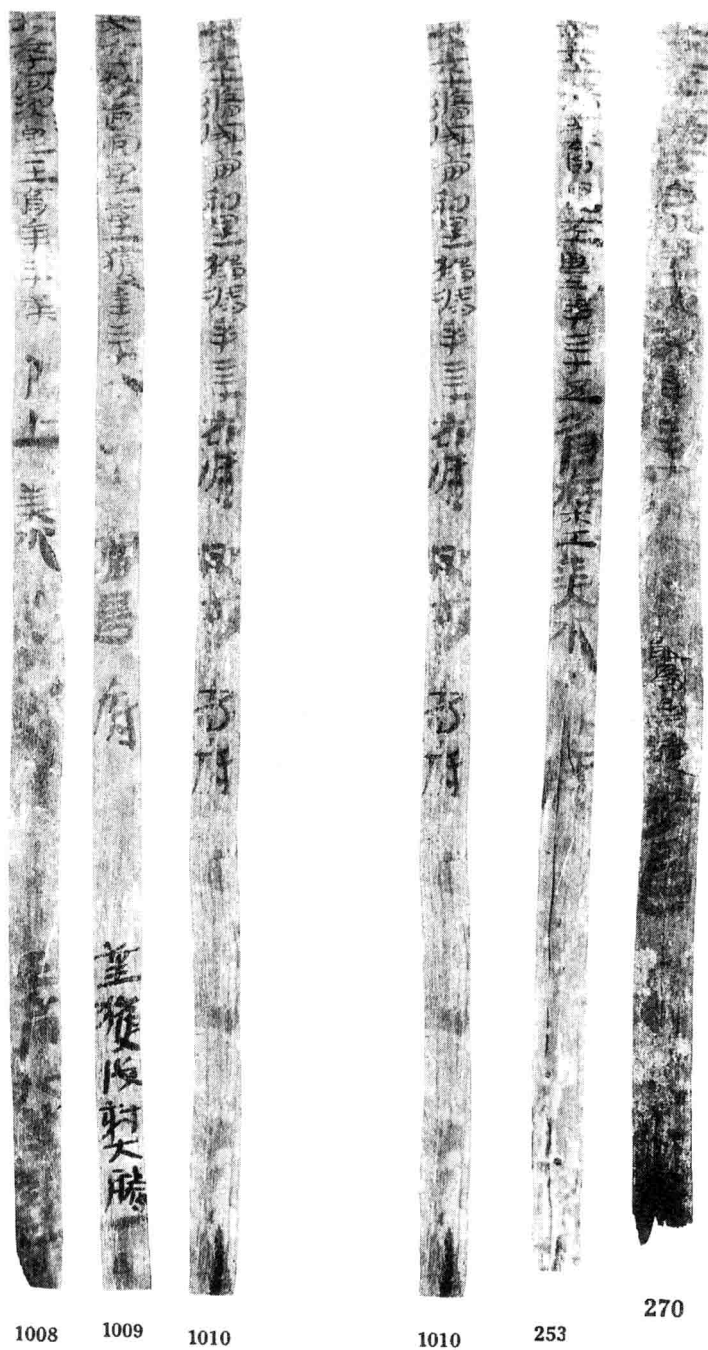
再討論“循成”的問題。如前所引，簡 253、270 中的戍卒籍貫，整理者分別釋作“循成富里”和“循成泉里”。從圖版來看，這兩枚簡中的“循”字墨迹均較漫漶，而簡 1010 中的“脩”字則清晰可辨（見圖三）。通過比較圖版可以看出，兩者字形相同，應爲同一個字。因此，簡 253、270 中的“循成”均應改釋作“脩成”，兩枚簡的簡文亦當重新釋讀如下：

戍卒脩成富里左豐年三十五，省府，木工，美水 府 253

戍卒脩成泉里索歆年三十，能爲泉履，步昌 □□□ 270

如果上述判斷不誤，則《漢志》所載武都郡所轄“循成道”實係“脩成道”之誤，應予校正。亦證明王念孫之說至確。簡文中的“富里”（見[簡 91]）、“泉里”（見[簡 92]）、“當利里”（見[簡 93]）等三個里，皆屬“脩成道”。





1008

1009

1010

1010

253

270

圖二

圖三

## 結語

本文關於新莽時期敦德、輔平、設屏、居成、延亭、樂平諸郡補考的基本結論如下：

敦煌郡從居攝年間到地皇年間，至少經歷了文德、敦德兩度改名。出土簡牘資料比較清楚地反映了敦煌、文德、敦德三個名稱在新莽時期的變遷過程，根據有明確紀年的簡文可知：“敦煌”在居攝三年仍沿用舊名；至遲到始建國元年敦煌已改稱“文德”；而到始建國天鳳三年，文德已改稱“敦德”，至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仍用“敦德”之名。新莽銅虎符銘文表明，敦德郡的治所可能一度設在廣恒縣。與郡名改易相應，與郡同名的敦煌縣也同樣經歷了文德、敦德亭的二度改名，該縣所領之里可考的有五個：高昌里、利成里、安世里、東武里、平定里。相關簡牘資料還表明：效穀、龍勒二縣在新莽時期沿用漢制舊名，與《漢志》相合；敦煌郡雖然經過二度改名，但玉門關都尉一直隸屬於該郡；該郡轄境還有魚離邑，可補《漢志》之缺。

《漢志》記載新莽時期改酒泉郡名為輔平郡，簡文可證實此點。不過簡牘資料同時也顯示，酒泉郡在新莽初年沿用舊名，至少始建國元年時仍用酒泉之名，簡牘所見改稱輔平的明確紀年有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漢制酒泉郡的玉門縣和敦煌郡的玉門關，兩地名同時并存。《漢志》說新莽時期改玉門縣為輔平亭，目前未見相關簡文。有資料表明，作為軍事系統的居成部而不是行政系統的居成縣曾一度劃歸輔平郡管轄。

《漢志》記載新莽時期改張掖郡為設屏郡，但饒宗頤、李均明根據簡牘資料推斷設屏郡并未取代張掖郡，而很可能是從張掖郡分置的。這一看法應該是可信的，簡文表明張掖郡在始建國四年仍沿用西漢舊名。《漢志》說新莽時期改居延縣為居成縣，但簡牘資料表明，新莽時期并未將行政系統的居延縣改為居成縣，通過仔細梳理有明確紀年的簡文，發現居延縣在始建國二年、三年、四年，天鳳一年、五年以及地皇年間一直沿用舊名，因此可判定新莽時期居延縣沒有改名，《漢志》載錄不準確。居延縣所領之里可考的有十個，分別是：昌里、沙陰里、通澤里、陽里、三泉里、萬歲里、肩水里、利上里、安樂里、累山里。而根據簡文資料可知，新莽年間對作為軍事系統的居延部則有二度改名：初年沿用漢制居延部舊名；到始建國三年、四年改稱延城部；天鳳、地皇年間改稱居成部；居成部至少在地皇三年劃歸輔平郡即西漢酒泉郡管轄；該部雖然經過多次改名，但其與甲渠（甲溝）候官的轄屬關係始終未變。

有資料表明，新莽時期很可能在居延一帶先後增設過“居成郡”和“延亭郡”。“居成間田”可能屬於居成郡所領。延亭郡可能只是在新莽末期短時存續。如果居成郡和延亭郡的判定不誤的話，則新莽時期對漢制居延一帶的郡縣建置應有過多次調整。大約《漢志》只著錄了存續時間較長、影響較久的部分。

《漢志》記載王莽時期改武都郡為樂平郡，目前的簡牘中未見該郡縣名稱更改的資料。但在《敦煌漢簡》中有一組來自武都郡的戍卒名籍簡，具有明顯的新莽時代書寫特徵，不過縣

名均爲漢制舊名,表明其爲更名之前的資料。據此亦可判定,至少在新莽初年仍沿用漢制武都郡縣名稱。故道所領之里可考的有四個:平鄉里、市陽里、故道里、官里。下辨所領之里可考的有竹里。通過對文獻記載與簡文和簡影圖版的仔細比勘,可知《漢志》所載武都郡所領的“河池”縣應是“何池”之誤,“循成道”實係“脩成道”之誤,應予校正。何池所領之里可考的有五個:大昌里、下賁里、何池里、耶里、上里。脩成道所領之里可考的有三個:富里、泉里、當利里。

通過本文分析可見,《漢志》所追錄的王莽時期的職方情況,尤其是郡國縣邑名稱改易情形,通常祇著錄了某次所改之名。實際上,大量資料表明,不少郡縣名稱在王莽時期有多次更改,即存在一改再改的情形。因此,不能以某一年的職方建置來涵蓋整個王莽時期的情況,而應充分考慮時間因素,分時段、分年代來考察其具體變化。

## “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考釋<sup>①</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謝桂華

這部簡冊，是由甘肅省博物館等單位組成的居延考古隊於一九七四年，從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甲渠候官所在地破城子遺址塢內東側的第二十二號房屋，即擬定為甲渠候官的文書檔案室（發掘代號為 E. P. F22：E 代表額濟納河流域，P 代表破城子，F22 代表第二十二號房屋）發掘出土的。該房屋的面積雖不大，僅有六·二四平方米，可是，却出土了八百八十九簡，其中基本完整和比較完整的簡冊，竟達約五十部之多。該簡冊包括正文三十五簡（E. P. F22：1—35）和附加的一枚木牋（E. P. F22：36），共三十六簡。木牋上載有“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就是據此來命名的。出土時，整個簡冊的編繩已經朽斷，呈卷狀，簡 1—20 號為一束，裹在裏面；簡 21—35 號為一編，捲在外面，文字面均朝內；注明年月和名稱的 36 號木牋，出於附近。這部簡冊，不僅有明確的紀年，而且內容連貫，全文約一千七百餘字，其中除少數幾個字因簡文漫漶不清無法釋讀外，其他簡文的筆迹都很清晰，是這次出土中最完整的一部簡冊。

“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除了 36 號木牋屬於甲渠候官將這部簡冊存檔時才加上去的以外，其他三十五簡，均應是居延縣廷就甲渠候粟君控告居延縣都鄉客民欠他的債一事，寫移給甲渠候官的文書。其內容包括：一、建武三年十二月乙卯都鄉嗇夫宮初次驗問寇恩的供辭筆錄（E. P. F22：1—20，以下略稱為“乙卯供辭筆錄”）；二、建武三年十二月戊辰都鄉嗇夫宮再次驗問寇恩的供辭筆錄（E. P. F22：21—28，以下略稱為“戊辰供辭筆錄”）；

<sup>①</sup> 此為謝桂華先生遺稿。忠實於原貌，文中所引刊物期數，以及有關簡號皆用中文大寫。——主編。

三、建武三年十二月辛未都鄉嗇夫宮向居延縣廷報告兩次驗問寇恩的過程和結果的呈文(E. P. F22: 29—32, 以下略稱為“辛未呈文”);四、· 右爰書(E. P. F22: 33);五、十二月己卯居延守丞勝給甲渠候官的移文(E. P. F22: 34—35, 以下略稱為“己卯移文”)。“己卯移文”是主件,“乙卯供辭筆錄”、“戊辰供辭筆錄”和“辛未呈文”均為附件,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迄今為止,發現如此完整的有關漢代財務訴訟的原始案卷,尚屬首次,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眾所周知,漢代的律令、司法程序、爰書的意義以及供辭筆錄、呈文、移文的文例和格式等,史籍雖間有涉及,但都語焉不詳,挂一漏萬。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出土的居延漢簡,其中亦包含有不少此類簡牘,又多屬斷簡殘篇,無法連貫起來加以考察。因此,盡管國內外的先輩學者不斷撰文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雖然也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但許多問題仍然不得的解。在這部簡冊中,不僅保留了一條完整的漢律佚文,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空缺,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詳細記載了一個民事訴訟案件的始末和驗問治決過程,提供了有關這一案件的供辭筆錄、呈文、移文等司法文書的原始記錄。所以,這部簡冊是繼雲夢秦簡之後,並和將要公開發表的其他居延新出漢簡、江陵漢簡等,成為解開秦漢法制史上許多疑難問題奧秘的鑰匙。其次,候粟君雖然身為甲渠候官之長,其位秩與縣令、長相當,但他和客民寇恩之間發生財務訴訟,還必須通過寇恩所在的主管民政的居延縣和都鄉來審理,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漢代邊郡地區,軍事和民政兩大系統是各司其職的。第三,透過這部簡冊,生動而具體地反映出地處西北邊陲的軍吏,夥同屬吏,雇人捕魚和長途販賣,進行牟取暴利的歷史真實。第四,這部簡冊中所出現的雇傭勞動和傭工價格、商品買賣和貨幣流通、各種物品的價格和地區差價、以及部分商品的價格用穀來計算等,對於瞭解東漢初年河西地區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狀況,也是很有裨益的。綜上所述,這部完整簡冊的出土,對於研究漢代的法制和文書制度,乃至研究河西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

《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全文發表了這部簡冊的圖版(圖三七—圖四〇)和釋文,同時還發表了甘肅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和徐蘋芳、肖亢達、俞偉超等三篇論文。此後,又陸續發表了陳仲安、裘錫圭、初仕賓和肖亢達、大庭脩、連劭名等五篇論文。一九八八年一月,還出版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雖然各家從不同的側面,發表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但也毋庸諱言,有些問題,諸如簡冊的排列順序、爰書的意義、候粟君控告寇恩負債的準確內容、“辛未呈文”和“己卯移文”乃至整個冊書的性質等,仍然眾說紛紜,各執一端,莫衷一是;有些問題雖已有人提出,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也有一些問題,迄今尚未有人指出。筆者因有幸參加這批新出居延漢簡的整理工作,在對照原簡與照片仔細辨認和反復琢磨簡文原意的基礎上,博采眾長,集思廣益,對這部簡冊的釋文包括標點,重新予以訂正,作簡要的說明和注解,並翻譯成現代漢語,敬請海內外的博雅君子指正。

## 一、簡影

[illegible][illegible]

庚子年三月廿五日都鄉耆夫  
 陳三才等共四十五人聯名  
 稟請將府前大街改鑿之律  
 度是所拘由律書會憲領印文登  
 報並乃度由縣周恩府屬代同  
 時撥款不費銀三百餘兩實銀三百  
 陽市前生年十六歲廷家壬午年十月

聖學史事而史之有月曆爲麻  
 聖君尊倫之樂均蒙慈育不  
 賢聖太上皇之經文爲經主信  
 主頭上持節之從容下下石渠  
 所至慈即主頭南持節慈平  
 之嚴若尺爲嚴百石爲平第君

[illegible]

取鹿所獨有年無特難小兒解堂  
解得鹿則鹿錢之因會事井  
銅幣出白原左金業之允遠  
送事塲勒立第幾羊牽茲爲高

陳子高爲庚子年左堂憲公同  
陳南三贊見子富在車上與  
弟贊爲業權人妻  
店兄贈獻唐城萬王六首詩  
生等所恩與業俱求到居延從用

仙舟十白不須道時亦虛  
 手賈大男旦升為教坊恩居

解州同業錢時市載銀元二千  
 並新米到居是邦行道廿餘日矣計  
 以主信晉報省官學老金畢  
 實當時時有爲手于堂上而  
 與席君國以與會與恩牛已

父子果不相當哉 廿五旨證也 於書上

[illegible]

書見錄事堂修相見越  
非廣不傳卷之四  
謝長書見在府致小則與

卷之六

卷之四

有已卯居延今  
即至 黃海田渠侯官  
黃海田渠侯官  
黃海田渠侯官

此亦直者法匪報也律令



## 二、釋文

☒建武三年十二月候

☒粟君<sup>[1]</sup>所責(債)寇恩事<sup>[2]</sup>：

E. P. F22 : 36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sup>[3]</sup>，都鄉嗇夫宮<sup>[4]</sup>以廷<sup>[5]</sup>所移甲渠侯書召恩詣鄉。先<sup>[6]</sup>以證財物故不

E. P. F22 : 1

以實，臧(贓)五百以上<sup>[7]</sup>，辭(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言請者<sup>[8]</sup>，以辭(辭)所出入罪<sup>[9]</sup>反罪之律辨告<sup>[10]</sup>，乃

E. P. F22 : 2

爰書驗問恩<sup>[11]</sup>。辭(辭)曰：潁川昆陽市南里，年六十六歲，姓寇氏。去年十二月中，甲渠令史

E. P. F22 : 3

華商、尉史周育<sup>[12]</sup>當爲候粟君載魚之鰾得賣，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頭，黃、特、齒

E. P. F22 : 4

八歲，平賈(價)<sup>[13]</sup>直(值)六十石，與交(芟)穀<sup>[14]</sup>十五石，爲[穀]<sup>[15]</sup>七十五石；育出牛一頭，黑、特、齒五歲，平賈(價)直(值)六十石，與交(芟)

E. P. F22 : 5

穀卅石，凡爲穀百石；皆予粟君，以當載魚就(餽)直(值)<sup>[16]</sup>。時，粟君借恩爲就(餽)，載魚五千頭

E. P. F22 : 6

到鰾得，賈(價)直(值)，牛一頭，穀廿七石，約<sup>[17]</sup>爲粟君賣魚沽出時行錢<sup>[18]</sup>卅萬。時，粟君以所得商牛，黃

E. P. F22 : 7

特、齒八歲，以穀廿七石予恩顧(雇)就(餽)直(值)。後二、三[日]<sup>[19]</sup>當發，粟君謂恩曰：黃牛微庾(瘦)<sup>[20]</sup>，所得

E. P. F22 : 8

育牛黑特，雖小，肥，賈(價)直(值)俱等耳，擇可用者持行。恩即取黑牛去，留黃牛，非從

E. P. F22 : 9

粟君借輿(運)牛<sup>[21]</sup>。恩到鰾得賣魚盡，錢少，因賣黑牛，并以錢卅二萬付粟君妻業，

E. P. F22 : 10

少八歲(應爲“萬”)。恩以大車半輶軸<sup>[22]</sup>一，直(值)萬錢；羊羴一枚爲橐，直(值)三千；大筭一合，直(值)千；一石

E. P. F22 : 11

去盧<sup>[23]</sup>一，直(值)六百；輿(運)索<sup>[24]</sup>二枚，直(值)千；皆置業車上。與業俱來，還到第三置<sup>[25]</sup>，

E. P. F22 : 12

恩糴<sup>[26]</sup>大麥二石付業，直(值)六千；又到北部<sup>[27]</sup>，爲業賣(應爲“買”)肉十斤，直(值)穀一石，石<sup>[28]</sup>三千；凡并

E. P. F22 : 13

爲錢二萬四千六百，皆在粟君所。恩以負粟君錢，故不從取器物。又恩子男欽

E. P. F22 : 14

以去年十二月廿日爲粟君捕魚，盡今〔年〕<sup>[29]</sup>正月、閏月、二月，積作三月十日，不得賈(價)直(值)。時，

E. P. F22 : 15

市庸平賈(價)大男<sup>[30]</sup>日二斗，爲穀廿石。恩居鰥得付業錢時，市穀決石四千。以欽作

E. P. F22 : 16

賈(價)穀十三石八斗五升，直(值)鰥得錢五萬五千四〔百〕<sup>[31]</sup>，凡爲錢八萬，用償所負錢

E. P. F22 : 17

畢。恩當得欽作賈(價)餘穀六石一斗五升付。恩從鰥得自食爲業將車<sup>[32]</sup>到居延，

E. P. F22 : 18

〔積〕<sup>[33]</sup>行道廿餘日，不計賈(價)直(值)。時，商、育皆平牛直(值)六十石與粟君，粟君<sup>[34]</sup>因以其

E. P. F22 : 19

賈(價)予恩，已決，恩不當予粟君牛不相當穀廿石。皆證，它如爰書<sup>[35]</sup>。

E. P. F22 : 20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戊辰<sup>[36]</sup>，都鄉嗇夫宮以廷所移甲渠候書召恩詣鄉。先以證財物故不以實，臧(贓)五百以上，辭(辭)以(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言請者，以辭(辭)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書驗問恩。辭(辭)曰：潁川昆陽市南里，年六十六歲，姓寇氏。去年十二月

E. P. F22 : 21

中，甲渠令史華商、尉史周育當爲候粟君載魚之鰥得賣，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頭，黃、特、齒八歲，平賈(價)直(值)六十石，與交(芟)穀十五石，爲穀七十五石；育出牛一頭，黑、特、齒五歲，平賈(價)直(值)六十石，與交(芟)穀卅石，凡爲穀百石；皆予粟君，

E. P. F22 : 22

以當載就(僦)直(值)。時，粟君借恩爲就(僦)，載魚五千頭到鰥得，賈(價)直(值)，牛一頭，穀廿七石，〔約〕<sup>[37]</sup>爲粟君賣魚沽

出時行錢卅萬。時，粟君以所得商牛，黃、特、齒八歲，穀廿七石予恩顧(雇)就(僦)直(值)。後二、三日當發，粟君謂恩曰：黃牛

E. P. F 22 : 23

微庾(瘦)，所將(應爲“得”)育牛黑特，雖小，肥，賈(價)直(值)俱等耳，擇可用者持行。恩即取黑牛去，留黃牛，非從粟君借牛。恩到

鰥得賣魚盡，錢少，因賣黑牛，并以錢卅二萬付粟君妻業，少八萬。恩以大車半轆軸一，直(值)萬錢；羊韋一枚爲橐，

E. P. F 22 : 24

直(值)三千，大筭一合，直(值)千；一石去盧一，直(值)六百；輶(運)索<sup>[38]</sup>二枚，直(值)千；皆在業車上。與業俱來，還到北部，爲業買肉十斤，

直(值)穀一石；到弟(第)三置，爲業糴大麥二石；凡爲穀三石，錢萬五千六百，皆在業所。恩與業俱來到居延，後恩

E. P. F 22 : 25

欲取軸、器物去，粟君謂恩：汝負我錢八萬，欲持器物？怒，恩不敢取器物去。又恩子男欽以去年十二月廿日

爲粟君捕魚，盡今年正月、閏月、二月，積作三月十日，不得賈（價）直（值）。時，市庸平賈（價）大男日二斗，爲穀廿石。恩居 E. P. F 22 : 26

鱣得付業錢時，市穀決石四千。并以欽作賈（價）穀，當所負粟君錢畢。恩又從鱣得自食爲業將車、

莖斬<sup>[39]</sup>來到居延，積行道廿餘日，不計賈（價）直（值）。時，商、育皆平牛直（值）六十石與粟君，因以其賈（價）與恩牛，已 E. P. F 22 : 27

決，不當予粟君牛不相當穀廿石。皆證，它如爰書。 E. P. F 22 : 28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辛未<sup>[40]</sup>，都鄉嗇夫宮敢言之<sup>[41]</sup>。廷移甲渠候書曰：去年十二月中，取客民<sup>[42]</sup>寇恩爲

就（僦），載魚五千頭到鱣得，就（僦）賈（價）用牛一頭、穀廿七石，恩願沽出時行錢卅萬，以（已）得卅二萬。又借牛一頭 E. P. F 22 : 29

以爲揮（運），因賣，不肯歸，以所得就（僦）直（值）牛償，不相當廿石。書到，驗問、治決言。前言解，廷却

書曰<sup>[43]</sup>：恩辭（辭）不與候書相應，疑非實。今候奏記<sup>[44]</sup>府，願詣鄉爰書是正。府錄令明處， E. P. F 22 : 30

更詳驗問、治決言。謹驗問，恩辭（辭）不當與粟君牛不相當穀廿石。又以在粟君所器物，直（值）錢萬五千六百；又爲粟君買肉、糴穀三石；又子男欽爲粟君作賈（價）直（值）廿石；皆[盡]償[所]負 E. P. F 22 : 31

粟君錢畢。粟君用恩器物幣（敝）敗，今欲歸，恩不肯受。爰書自證。寫移爰書，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sup>[45]</sup>。 E. P. F 22 : 32

· 右爰書<sup>[46]</sup>。 E. P. F 22 : 33

十二月己卯<sup>[47]</sup>，居延令<sup>[48]</sup>守丞勝移甲渠候官：候[所]責（債）男子寇恩[事]，鄉置<sup>[49]</sup>辭（辭），爰書自證。寫移，書[到]，□□□□□辭（辭），爰書自證，

E. P. F 22 : 34

須以政不直者法<sup>[50]</sup>。亟報，如律令<sup>[51]</sup>。 掾黨、守令史賞。 E. P. F 22 : 35

### 三、注解

[1] 候，候官之長，亦稱鄣候或塞候，秩比六百石。粟君，人名。粟，姓，君，尊稱。候粟君是甲渠鄣候粟君的省稱。俞偉超《略釋漢代獄辭文例——一份治獄材料初探》（載《文物》一

九七八年第一期,以下略稱《俞文》)認為漢代無粟姓,“粟”當釋“栗”,但原簡寫作“栗”,姑仍從之。

- [2] 此簡屬於上端畫有網目方格的半圓簡頭木牌,漢代稱為楬或楬檠。《周禮·秋官·職金》:“辨其物之媵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鄭玄注:“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櫛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檠。”上面載有簡冊的年月和名稱,即簡冊的表題楬。甘肅居延考古隊簡冊整理小組《“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責寇恩事”釋文》(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以下略稱《釋文》)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以下略稱《釋粹》)均將此楬排列在冊書本文之後。今從徐蘋芳《居延考古發掘的新收穫》(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以下略稱《徐文》),將其排列在冊書本文之前。
- [3] 朔,初一。癸丑為初一日,則乙卯為初三日,曆朔與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所推相合。
- [4] 都鄉,縣治所在的鄉。《日知錄·都鄉》:“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即今之坊廂也。”鄉嗇夫,漢代鄉官名,屬於秩百石以下的少吏,“職聽訟,收賦稅”,參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宮,鄉嗇夫名。
- [5] 廷,史籍亦或作“庭”,《後漢書·郭太傳》注釋引《風俗通義》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此處是居延縣廷的省稱,參見《漢書·王尊傳》、《後漢書·馬援傳》及注。
- [6] 先,簡文作𠂔,舊居延簡五·一〇、七·二〇、三八·二七、一三三·一二、三四六·四六中的先字均如此作。它和下一枚簡文中的乃字,是前後呼應的。《釋文》本釋作“先”,《俞文》改釋作“無”,句讀為“無以證”,意即“無從證明”;《徐文》亦贊同俞說,將“無以證”解釋為“目前尚無其他證據”,均非是。無論從字形、文義,或者從前後文聯繫來看,此字均應以釋“先”為是。這一點,陳仲安《關於〈粟君責寇恩簡〉的一處釋文》(載《文史》第七輯,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以下略稱《陳文》)和裘錫圭《新發現的居延漢簡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以下略稱《裘文》)均已指出。
- [7] 此句,肖亢達《“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略考》(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以下略稱《肖文》)讀為“先以證,財物故不以實,臧五百以上”;初師賓、肖亢達《居延新簡〈責寇恩事〉的幾個問題》(載《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以下略稱為《初、肖合文》)據《說文》將此處的“證”字,解釋為“告”,均非是。從證字開始,到之字為止,是整個律文的內容。舊居延簡二二九·一,二二九·二:“……召宣詣官,先以證財物故不實,臧二百五十以上,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與此文例相類。證應連下讀作“證財物故不以實”。證,證辭,即口供。故不以實,故意隱瞞不講真實情況。臧五百以上,是漢代律令中坐罪的一個等次。《漢書·蕭望之傳》:“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注:“二百五十以上

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矣。”《俞文》將“財物故不以實”相連為句，並解釋為“是說寇恩所負財物事，並不實在”，雖非是，但認為“臧五百以上”，“是漢律中一種坐罪等次的名目”，甚是。

- [8] 滿三日，是漢法規定給受審者更正供辭的期限。《漢書·張湯傳》王先謙補注引張晏曰：“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否）也。”更言，改變口供，參見雲夢秦簡《封診式·訊獄》及注。請，情的假借字，雲夢秦簡和居延簡中屢見，情，真情，參見《周禮·小宰》注、疏。誠如《陳文》所云，在三日內更正供辭的權利，對所有受審者都是適用的，並非指官吏獨享的上訴特權。《俞文》將“更言請”和“先請”、“請”視為一事，將其解釋為“漢代官吏凡高達一定秩次，被決罪後有上訴特權”，非是。
- [9] 出入罪，應連起來讀，乃是出罪和入罪的合成語。《釋文》和《釋粹》都在“入”和“罪”之間標一逗號，則非是。《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引晉灼曰：“律說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漢書·刑法志》：“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注引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又《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論獄[何謂]不直？可（何）謂‘縱囚’？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弗論；及傷其獄，端令不致，是謂‘縱囚’。”出罪，人本有罪而縱免其罪，或本當重罪而予以輕罪；入罪，人本無罪而加之以罪，或本當輕罪而加以重罪。參見《陳文》。
- [10] 先以……律辨告，與《漢書·高帝紀下》：“吏以文法教訓辨告”文例相類。師古注：“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意即官吏在正式驗問前，先把有關法律條文給被驗問的人解釋清楚。參見《裘文》。
- [11] 爰書，《漢書·張湯傳》注：“爰，換也，以文書代替其口辭也。”王先謙補注：“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但從秦簡來看，爰書的意義較為廣泛，僅以司法案件而言，也不僅指供辭，還包括有關記錄和報告書等。
- [12] 甲渠令史華商、尉史周育，皆為甲渠候粟君的屬吏。令史主文書，尉史主巡行徼塞，同屬斗食小吏。
- [13] 平賈，《漢書·溝洫志》注引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時庸之平價也。”是指當時的正常市價。
- [14] 此簡中兩見之“茭”，《釋文》和《釋粹》均釋作“它”，非是；《裘文》改作“交”，甚是。交，乃茭字之假借，讀為茭，乾草。舊居延簡四六九·三：“□卒隨君房交錢二千”，亦借交為茭。用牛車載魚到鱾得，途中需用茭喂牛。交穀，意即抵茭價的穀。又簡二一七·三：“出茭八十束，以食官牛”，亦可佐證。
- [15] 穀字，原簡漏寫，據 E. P. F22: 22 簡文補。又《釋粹》於簡 E. P. F22: 22 中衍釋“育出牛

一頭，黑、特、齒五歲，平賈直六十石，與它穀十五石，爲穀七十五石”，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

- [16] “就”即“僦”之同音假借字。《後漢書·虞詡傳》：“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注引《廣雅》曰：“僦，賃也。”《史記·平准書》：“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引服虔云：“雇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直，僦費，包括雇人和賃車、牛等的費用。
- [17] “約”，意即約定。所謂約定，可能不僅是口頭承諾，而且訂立了用作憑證的契約、券書。舊居延簡二六二·二九：“七月十日，鄣卒張中功貰買皂布章單衣一領，直三百五十，三墩史張君長所，錢約至十二月盡畢已，旁人臨桐史解子房知券□□”；簡二七三·一二：“□石十石，約至九月□必以，即有物故，知責家中見在者。”其約字亦作如是解。《周禮·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鄭玄注：“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傳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寇恩之辭，必有券書爲證。
- [18] 行錢，指市面上流通的符合法度的官鑄錢。舊居延簡一六一·一一：“將軍使者大守議貨錢古惡小萃不爲用，改更舊制，設作五銖錢，欲便百姓錢行。未能”；新出居延簡 E. P. F22: 39：“書到，自今以來，獨令縣官鑄作錢，令應法度。禁吏民毋得鑄作錢及挾不行錢……”可以印證。
- [19] “就直”之“就”，《釋粹》誤作“對”，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日”字，原簡漏寫，據 E. P. F22: 23 簡文補。
- [20] “黃牛”，《釋文》和《釋粹》均誤作“黃特”，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庾”，《釋文》和《釋粹》釋作“庾”，《肖文》認爲“庾”乃“腴”之同音假借字，均非是。《裘文》云：“庾”即“庾”字，當讀爲瘦，甚是。舊居延簡二〇·一二 A、八九·二三、一二四·二八、二二五·二七中的“庾索”之“庾”，均如此寫。又簡四·六 A：“□所由觀之所安人馬叟哉人馬叟”，“叟”字亦寫作“更”。
- [21] “犗牛”之“犗”，《釋文》作“犗”，《釋粹》作“犗”，《肖文》和《釋粹》并據《說文》，將“犗”、“犗”解釋爲“特牛”即公牛，均非是。犗即運之同音假借字。犗牛，用來載運的牛。
- [22] 此簡中之大車半櫓軸和 E. P. F22: 24 中之大車半櫓軸，當指同一種器物。櫓，疑即櫓，木名，同櫓。參見《文選》張平子（衡）《南都賦》及注。可能是指用櫓木做成的大車半軸。
- [23] “去盧”，去，《說文》作△，稱“△盧，飯器，以柳作之，象形。”或稱“筭簠”、“去簠”。乃是用柳條或竹片編制成的盛乾糧的器物。
- [24] “犗牛”和“犗索”之“犗”，字形相同，《釋文》和《釋粹》均作“犗”，《釋粹》云：“犗疑爲

‘牖’之誤。‘牖’，《玉篇》：‘牛膚領也。’”《肖文》認為“犗索”是繩。疑均非是。“犗”與運相通。犗索，疑即指運載的繩索。

[25]《釋文》和《釋粹》均將“還”字連上讀。“置”，《漢書·文帝紀》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第三置，驛站名。參見《釋粹》和《肖文》。

[26]“糴”，居延簡中屢見。此處作買進解，賣出亦寫作“糴”。《釋文》和《釋粹》均作“糴”，意思不錯，但原簡寫作“糴”，今從原簡。

[27]北部，即肩水都尉管轄下的北部候。

[28]“石”字，原簡作重文號，現從《釋文》和《釋粹》，用文字來重複。

[29]“年”字，原簡漏寫，據 E. P. F22: 26 簡文補。

[30]“大男”，居延漢簡中屢見。年齡在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稱大男。

[31]“百”字，原簡漏寫。

[32]“將車”，和舊居延簡一四·一二中之“爲蘭少翁將車”同解，意即卸車，參見《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曰及注引《索隱》。

[33]積字，原簡筆迹脫落，據 E. P. F22: 27 簡文補。“行道廿餘日”之“日”，《釋文》誤作“曰”，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

[34]粟君二字，原簡作重文號，現從《釋文》和《釋粹》，用文字來重複。

[35]“以”，《釋粹》誤作“爲”，可能是排印的疏誤。《釋文》和《釋粹》均將“已決”連上讀。“恩不當予粟君牛不相當穀廿石”，《釋文》和《釋粹》均標點爲“恩不當予粟君牛，不相當穀廿石”，今從《裘文》讀。隸體“它”和“也”形近，容易混淆。“它”，各家都釋作“也”，讀爲“皆證也，如爰書”，非是。應讀作“皆證，它如爰書”，舊居延簡三·三五：“……不職等辭曰：敝實劍庭自刺傷，皆證，所置辭審，它如[爰書]”與此簡文例相類。“它如爰書”，乃此類文書中的常用語，居延簡中屢見。前人亦往往將“它”字誤釋作“也”字，如簡二七·一A、二二七·一五，即是其證。

[36]戊辰爲十六日。

[37]“載”字，《釋粹》誤作“轉”；“鰥得”，《釋粹》誤作“冊得”；均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約”字，原簡筆迹脫落，據 E. P. F22: 7 簡文補。

[38]“犗索”之“犗”，亦與運通。犗索，即運索，參見注[24]。

[39]“莖斬”，斬芻，即斬牲口飼料，參見《漢書·尹翁歸傳》及注。

[40]辛未爲十九日，《釋粹》誤作“辛來”，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

[41]“敢言之”，意即謹告，乃秦漢時期上呈文書中的常用語，居延簡中屢見。

[42]“客民”，《釋粹》誤作“客爲”，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肖文》云：“客民”是指外地遷來居延的人戶，近是。《釋粹》則認為：“客民”同“庸”、“僦”，指出賣勞動力爲生的人，非



是。“客民”一詞，亦見於舊居延簡三〇八·三八，疑為漢代戶籍中的專門用語，指其役籍屬於民籍。寇恩原貫為潁川昆陽市南里，現遷入居延都鄉著籍，故稱客民。

- [43] “揮”，《釋文》作“𢱿”，《釋粹》作“𢱿”，《俞文》改作“揮”，“揮”亦與運通，甚是。“不肯歸，以所得就直牛償，不相當廿石”，《釋文》和《釋粹》均標點為“不肯歸以所得就直牛，償不相當廿石”，今從《裘文》作如是讀。“書到，驗問，治決言。”《徐文》、《俞文》均讀作“書到驗問治決”，將“言”字連下讀，非是。《裘文》已指出，今從《釋文》作如是讀。“前言解，廷却書曰”，《釋文》和《釋粹》均讀作“前言解廷郵書曰”，《肖文》認為“解”，意即送達，《俞文》認為是傳達。《裘文》云：解字，居延簡中屢見，一般作解釋、解答、解辨講。“前言解”一語，亦見於舊居延簡七一·一六，意即對於縣廷轉來的控告寇恩的甲渠候書，上次已經作了答復。“却”與却相通，退回。“廷却書”，是指居延縣廷將都鄉嗇夫宮上報的初次驗問寇恩的供辭筆錄退回。請參見《裘文》。
- [44] “奏記”一詞，亦見於《漢書》的《蕭望之傳》和《朱博傳》，指上書言事。《論衡·對作》：“上書謂之奏，記謂之造作上書。”又云：“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
- [45] “府錄令明處，更詳驗問、治決言。”《釋文》和《釋粹》均讀作“府錄：令明處更詳驗問治決言。”《徐文》和《俞文》則讀作“府錄令明處，更詳驗問治決，言謹驗問”，均非是。今從《裘文》作如是讀。“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意即叩頭死罪死罪謹告，亦為秦漢時期上呈文書中的常用語，居延簡中屢見。
- [46] 此簡的位置，《釋文》原本作如是排列，但《徐文》提出應將此簡排列於 E. P. F22: 28 和 E. P. F22: 29 簡之間，即“戊辰供辭筆錄”之後，“辛未呈文”之前，日本學者大庭脩亦贊同徐說。《初、肖合文》進一步申述了此簡應排列在 E. P. F22: 32 簡和 E. P. F22: 34 之間，即“辛未呈文”之後的理由，甚是。故仍從《釋文》將此簡排列於此。
- [47] 己卯為二十七日。
- [48] 原簡“居延縣令”下空一格沒有署名，說明居延縣廷給甲渠候官的移文，是由主管此事的代理縣丞勝簽署發出的，居延縣令不過是虛領其銜而已。
- [49] “寇恩”之“寇”，《釋文》誤作“冠”，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置”字，因原簡筆劃嚴重殘缺，且筆迹又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各家均未釋。今從殘留筆迹來看，再結合上下文義，試補釋作“置”。
- [50] “政”，為政。“不直”，罪名，不公正。《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適（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又《漢書·張敞傳》：“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另外，還可參見本文注[9]。上述記載均是指獄吏執法不公而言。“須以政不直者法”，意即必須對候粟君按為政不直誣告別人，繩之以法。
- [51] “亟報”，馬上回報。“如律令”，乃漢代公文中的常用語，居延簡中屢見，意即依律令行

事。“報”，《釋文》誤作“極”，可能是排印時的疏誤。《釋文》、《釋粹》等均將“亟報”連上讀作“須以政不直者法亟報。”《肖文》注云：這一簡文是說，應對粟君按為政不直的律令法辦，并作速將處置情況申報上來。《釋粹》則據《漢書·胡建傳》注引蘇林曰：“報，論也。斷獄為報。”認為“亟報”的“報”，即判罪、審決之意，與“申報上級”無涉。《俞文》竟認為這段文辭為縣廷對此案的最後斷決，《初、肖合文》亦深表贊同俞說。《裘文》則提出異議，今從裘說，詳情請參見《裘文》。

#### 四、譯文

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債)寇恩事：

建武三年(公元27)十二月初二日，都鄉嗇夫宮遵照居延縣廷所批轉的甲渠候書，傳寇恩來鄉的署所。先向他宣讀和解釋明白了下列律文，即證財物時，故意隱瞞不講實情，誣告別人五百錢以上，證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正原辭，說出真情，因證辭不實所造成的出罪或入罪，應由提供偽證的人自己承擔，也就是說，按照他所誣告別人同等的罪來處罰他自己。接著用爰書驗問了寇恩。供稱：潁川郡昆陽縣市南里人，年六十六歲，姓寇。去年十二月份，甲渠候官屬吏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承擔為候粟君運魚到鱾得去賣，但因華商和周育都不能去，華商就拿出一頭八歲的黃毛公牛，平價值穀六十石和抵償喂牛的茭價穀十五石，合計穀七十五石；周育拿出一頭五歲的黑毛公牛，平價值穀六十石和抵償喂牛的茭價穀四十石，合計穀一百石，都交給粟君，當作雇人賃車載魚的費用。當時，粟君雇了寇恩，載魚五千頭到鱾得去賣，運費為牛一頭、穀二十七石，約定賣完魚為粟君賣出當時市面上流通的錢四十萬。即時，粟君將他所得華商的那頭八歲黃毛公牛和穀二十七石，給寇恩作為雇他載魚的運費。但過後兩三天，當寇恩要出發時，粟君又對寇恩說：黃牛稍微瘦弱一點，他所得周育那頭黑毛公牛，個兒雖小，可是肥壯，價錢和黃毛公牛都是相等的，任你挑選一頭適用的牛拿去。於是，寇恩就將黑牛帶走，留下黃牛，並不是向粟君借了一頭運魚的牛。寇恩到鱾得將魚賣完，所得不夠四十萬錢，因將黑牛賣掉，把賣魚和賣牛所得共三十二萬錢，都交給粟君的妻子業，還欠八萬錢。寇恩又將大車的一個半柵軸，值錢一萬；一個用羊皮做的橐，值錢三千；大筥一合，值錢一千，一個用柳條編的盛乾糧用的器物，值錢六百；兩條用來運魚的繩索，值錢一千；都擱在業的車上。和業一道返回居延時，走到第三置，寇恩買了大麥二石交給業，值錢六千；又走到北部候，為業買肉十斤，值穀一石，一石穀值錢三千，共折合錢二萬四千六百，都在粟君那裏。寇恩因欠了粟君的錢，所以沒有取走器物。又寇恩的兒子欽從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就為粟君捕魚，到今年正月、閏月、二月底止，共計捕魚三個月零十天，沒有領取工錢。按當時市上傭工平價，十五歲以上男子每日工錢穀二斗計算，共穀二十石。寇恩在鱾得付錢給業時，市上一石穀值錢四千。用欽的工錢穀十三石八斗五升，值鱾得錢五萬五千四百，共計

八萬錢，已將所欠粟君的錢全部還清。寇恩還應當得到粟君付給欽的工錢余穀六石一斗五升。此外，寇恩從鱣得自食爲業駕車回到居延，共計在途中走了二十餘天，沒有計算工錢和伙食費。並且，當時，華商和周育都是按照每頭牛平價值穀六十石給粟君的，因而粟君也是以同樣的價錢將牛給寇恩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寇恩不應當再給粟君兩牛不能相抵的差價穀二十石。都已證實，其他如爰書所述。

建武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都鄉嗇夫宮遵照居延縣廷所批轉的甲渠候書，傳寇恩來鄉的署所。先向他宣讀和解釋明白了下列律文，即證財物時，故意隱瞞不講實情，誣告別人五百錢以上，證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正原辭，說出真情，因證辭不實所造成的出罪或入罪，應由提供偽證的人自己承擔，也就是說，按照他所誣告別人同等的罪來處罰他自己。接著用爰書驗問了寇恩。供稱：潁川郡昆陽縣市南里人，年六十六歲，姓寇。去年十二月份，甲渠候官屬吏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承擔爲候粟君運魚到鱣得去賣，但因華商和周育都不能去，華商就拿出一頭八歲的黃毛公牛，平價值穀六十石和抵償喂牛的茭價穀十五石，合計穀七十五石；周育拿出一頭五歲的黑毛公牛，平價值穀六十石和抵償喂牛的茭價穀四十石，合計穀一百石，都交給粟君，當作雇人賃車的費用。當時，粟君雇了寇恩，載魚五千頭到鱣得去賣，運費爲牛一頭、穀二十七石，約定賣完魚爲粟君賣出當時市面上流通的錢四十萬。即時，粟君將他所得華商的那頭八歲黃毛公牛和穀二十七石，給寇恩作爲雇他載魚的運費。但過後兩三天，當寇恩要出發時，粟君又對寇恩說：黃牛稍微瘦弱一點，他所得周育那頭黑毛公牛，個兒雖小，可是肥壯，價錢和黃毛公牛都是相等的，任你挑選一頭適用的牛拿去。於是，寇恩就將黑牛帶走，留下黃牛，並不是向粟君借了一頭牛。寇恩到鱣得將魚賣完，所得不夠四十萬錢，因將黑牛賣掉，把賣魚和賣牛所得共三十二萬錢，都交給粟君的妻子業，還欠八萬錢。寇恩又將大車的一個半轆軸，值錢一萬；一個用羊皮做的橐，值錢三千；大筥一合，值錢一千；一個用柳條編的盛乾糧用的器物，值錢六百；兩條用來運魚的繩索，值錢一千，都擱在業的車上。和業一道返回居延時，走到北部候，爲業買肉十斤，值穀一石，又走到第三置，爲業買大麥二石，共計爲穀三石，合錢一萬五千六百，所買貨物，都在業那裏。寇恩和業一道回到居延，當時寇恩本想將軸和器物取走，但粟君却對寇恩說：你欠了我八萬錢，還想把器物拿走？並且，還發起火來，所以，寇恩不敢取走器物。又寇恩的兒子欽從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就爲粟君捕魚，到今年正月、閏月、二月底止，共計捕魚三個月零十天，沒有領取工錢。按當時市上傭工平價，十五歲以上男子每日工錢穀二斗計算，共穀二十石。寇恩在鱣得付錢給業時，市上一石穀值錢四千。并已用欽應得捕魚工錢的穀，抵償清所欠粟君的錢。此外，寇恩又從鱣得自食爲業駕車和斬喂牲口飼料回到居延，共計在途中走了二十餘天，沒有計算工錢和伙食費。並且，當時，華商和周育都是按照每頭牛平價值穀六十石給粟君的，因而粟君也是以同樣的價錢將牛給寇恩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寇恩不應當再給粟君兩牛不能相抵的差價穀二十石。都已證實，其他如爰書所述。

建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都鄉嗇夫宮謹告：居延縣廷轉來甲渠候書云：去年十二月份，他雇了客民寇恩，載魚五千頭到鱒得去賣，運費爲牛一頭、穀二十七石，寇恩答應爲他賣出當時市面上流通的錢四十萬，已得三十二萬。此外，寇恩又向他借去一頭牛運魚，因爲已經賣掉，無法歸還，用寇恩所得作爲運費的那頭牛償還，兩牛相抵尚差穀二十石。書到後，對寇恩進行驗問，並將結果上報。關於這件事，雖然上次已經上報了驗問寇恩的供辭筆錄，可是，居延縣廷將它退了回來，並指示說：寇恩的供辭和甲渠候書的控告不相符合，懷疑寇恩的供辭不是事實。現甲渠候又將此事上告到居延都尉府，並答應到鄉糾正爰書。居延都尉府下令查明判處，望再次詳加驗問寇恩，並將結果上報。謹再次對寇恩進行驗問，寇恩仍然供稱不應當付給粟君兩牛不能相抵的差價穀二十石。此外，寇恩又用攔在粟君那裏的器物，值錢一萬五千六百；又爲粟君買肉和大麥，值穀三石；又兒子寇欽爲粟君捕魚的工錢，值穀二十石，已經全部還清了他所欠粟君的錢。還有，粟君已把寇恩攔在他那裏的器物，用破舊了，現在又想退回，寇恩不肯接收。上述事實，均有驗問寇恩的供辭筆錄爲證，今一并將它謄寫上報，叩頭死罪死罪謹告。

· 以上爲爰書。

十二月二十七日，居延縣令（其名空缺）、代理縣丞勝移文給甲渠候官：甲渠候粟君控告男子寇恩欠他的債一事，都鄉已將有關事實驗問清楚，且有寇恩的供辭筆錄爲證，今一并將它謄寫寄去，書到後，……辭，望候粟君爰書自證，否則，必須對候粟君按爲政不直誣告別人，繩之以法。馬上回報，依律令行事。掾党、代理令史賞。

（附記：謝桂華先生《〈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考釋》一文，曾由日本學者吉村昌之先生翻譯爲日文，發表於《史泉》第73號（1991年）上，中文版則未公開發表過。謝先生在世的時候，我曾向他討要過此文的中文稿，但尋覓未果，後來謝先生的家人也幫忙找過，仍無蹤迹。直到2011年8月29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日本奈良大學簡牘研究會等主辦“東亞的簡牘與社會——東亞簡牘學探討”學術研討會上，得見吉村昌之先生，我懷著僥倖的心理向他打聽是否還保留有謝先生此文的中文稿，沒想到，他十分肯定地說他還保存有中文稿複印件，並答應回國後複印一份寄給我。9月13日，我即收到了吉村昌之先生寄來的信和文稿複印件。時隔二十年之久，吉村昌之先生仍然完好留存著謝先生的文稿，讓我十分感佩。在此特別向吉村昌之先生表達敬意和謝忱！

謝先生此文雖然撰寫於二十多年前，但仍然是解讀簡牘資料的典範之一，既有助於對《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的理解，也有助於提點後學在運用簡牘資料研究問題時，必須以準確解讀資料爲前提，力戒浮躁。又考慮到謝先生此文的中文版未曾發表過，日文版國內學者亦稀見，因此提交《簡帛研究》刊出，以饗讀者。對謝先生中文稿的整理錄入，完全忠實於原貌，僅對個別明顯的文字疏誤做了修訂。謹以此紀念我的老師謝桂華先生！——鄔文玲）

## 長沙吳簡所見的“市布”<sup>①</sup>

[日]中央大學文學部 阿部幸信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付晨晨譯

**內容提要** 長沙走馬樓吳簡中一批記載吏民購買布匹納入庫的竹簡，可稱之為“入市布簡”。其中，民入市布簡上登記了買布人的鄉名和丘名，這可能是此人沒能及時繳納，爾後買布補繳的反映。上述內容可以從入市布簡和普通入布簡編綴在同一簿籍中進行管理的事實中得到確認。另一方面，吏入市布簡中却没有記載鄉名，並且與百姓納布的簿籍分開管理。這是由於吏是根據上級官府命令進行市買，這種買布行為與民繳納的性質不同，故而需要分開管理。

**關鍵詞** 長沙吳簡 市布 布簿

### 一、問題的提出

1996年出土的長沙走馬樓吳簡<sup>②</sup>（以下簡稱“長沙吳簡”）數量多達10萬餘枚，但大部分都是簿籍殘件，給研究帶來極大困難。可能由於同時代史料稀少的緣故，長期以來長沙吳簡研究對簡文中特有的用語和制度投入了較多的關注，但這種研究取向不能突破長沙吳簡作

① 本稿為平成23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出土資料群のデータベース化とそれを用いた中国古代史上の基層社会に関する多面的分析》（研究代表者：関尾史郎）分擔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② 概要可參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吳簡J22發掘簡報》（《文物》1995年第5期），胡平生、李天虹《長沙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第7章第4節“長沙走馬樓吳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為“殘件”的局限。目前,嘗試復原簿籍的原始形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探討的研究方法逐漸成為主流。涉及簿籍構成要素的研究,可舉出永田英正、李天虹關於居延漢簡的研究<sup>①</sup>和李均明對秦漢簡牘的綜合整理。<sup>②</sup>以長沙吳簡為主的研究也積累豐厚,如汪小烜、安部聰一郎、張榮強、侯旭東、凌文超、鷺尾祐子等人對戶籍的研究<sup>③</sup>,谷口建速、侯旭東、陳明光、王素、凌文超等人對米簿、錢簿的研究等。<sup>④</sup>然而,目前似乎還沒有涉及記錄布匹納入情況的這批小型竹簡(以下簡稱“入布簡”)的研究,更未見相關專論。

與入米簡的情況相同,入布簡的出土示意圖、揭剝圖也還未公布,所以欠缺復原簿籍的決定性要素。不過,導致入布簡整理滯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以居延漢簡為首的秦漢出土簿籍中尚未發現百姓交納布匹的記錄。可是在已經刊布了圖版和釋文的 28050 枚小型竹簡<sup>⑤</sup>中,與布相關簡有 1250 枚以上。而且,吳簡中最早公布的嘉禾吏民田家莧<sup>⑥</sup>(以下簡稱“田家莧”)中有如下記載:

1. 夫丘男子廬仲,佃田七町,凡廿三畝,皆二年常限。其十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三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為米十五斛六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十五斛六斗,四年十一月卅日付倉吏鄭黑。凡為布三丈二尺六寸,四年十月廿一日付庫吏潘有。其旱田

①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集成一、二》,《東方學報》(京都)第 46、47 冊,1976,改題《居延漢簡の集成一》,後收入所著《居延漢簡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9;《居延漢簡の集成三》,改題《居延漢簡の集成二》,後同收入《居延漢簡の研究》。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② 李均明著:《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③ 參見汪小烜《走馬樓吳簡戶籍初論》(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一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安部聰一郎《試論走馬樓吳簡所見名籍之體式》(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二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張榮強《孫吳簡中的戶籍文書》(《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收入所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 年第 1 期),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功能》(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鷺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連記式名籍簡的探討——關於家族的記錄》(《吳簡研究》第三輯)等。

④ 參見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よりみる孫吳政權の穀物搬出システム》(《中國出土史料研究》第 10 號,2006),《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関係簿初探》(《民衆史研究》第 72 號,2006),侯旭東《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研究》(《吳簡研究》第二輯),陳明光《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官府倉庫帳簿體系試探》(《中華文史論叢》2009 年第 1 期),王素《長沙吳簡中的“月旦簿”與“四時簿”》(《文物》2010 年第 2 期),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庫錢帳簿體系復原整理與研究》(《第五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2011)等。

⑤ 參見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上、中、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上、中、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叁]》(上、中、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以下分別簡稱《竹簡壹》、《竹簡貳》、《竹簡叁》。圖錄本中作為簡編號的出版號與清理揭剝號、盆編號的關係說明參考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的現場揭取與室內揭剝——兼談吳簡的盆號和揭剝圖》,《吳簡研究》第三輯。另外,本稿撰寫時(2012 年 2 月)雖然已有《竹簡肆》出版的消息,但未得其書。

⑥ 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上、中、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爲錢一千二百八十，四年十二月廿日付庫吏潘有。  
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戶曹史張愴、趙野、陳通校。(4·85)<sup>①</sup>

由上可知當時米、布、錢是一併徵收的，可見布匹是十分重要的徵收物品。因此若想深入理解孫吳時期的稅制和社會，就不能回避對入布簡的探討。

此前，關於長沙吳簡所見布的考察，多以“調布”的分析爲中心。<sup>②</sup> 我亦附驥其後，通過分析“入……調布”簡（以下簡稱“入調簡”），指出調的賦課以鄉爲單位，以及調收繳後不足部分可能是由吏通過市場進行籌措。<sup>③</sup> 前稿中，將上述入調簡與未標有“調”字的普通入布簡均視爲繳納布匹時製作的原始記錄，並基於這種“入調簡與入布簡性質的相同”，在討論中並未明確區分兩者的區別。不過，同樣的方法若是運用在其他的研究中，比如探討入布簡與入調簡的關係、或者吏籌買布匹的各種情況，就會出現不少問題。可以說，布的研究也一樣，若是忽略了復原管理布相關各種信息的“布簿”的工作，依然會陷入本文開始指出的“局限”而難以突破。

因此，本稿抱着進一步推進研究布的賦課和徵收過程的目的，嘗試考察布簿的內容及其製作過程。不過，如果是僅僅討論布簿的形制，就與業已進行的米簿、錢簿相關研究沒有任何不同，無非是疊床架屋，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前文曾經提及，長沙吳簡中的入布簡，有些簡文中標有“調”字，還有些記錄的是吏通過市場籌買調布。目前所知，祇有入布簡具有以上特徵，這是入布簡與入米簡、入錢簡之間最大的不同。考察具有這種特徵的入布簡在布簿中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下文將首先對布匹的市場購買記錄進行分類，通過考量這些記錄在布簿中占據的位置，一併探討布簿的製作過程和入布簡、入調簡的處理方式。經過這些討論，吏在市場中買布和民戶納布之間的關係，最終也會變得越來越明朗吧。

① 以下釋文及簡編號，田家菀相關簡依據《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菀》，小型竹簡依據《竹簡壹》、《竹簡貳》、《竹簡叁》。

② 對“調布”及“調”有過通盤考察的相關論考有：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吳簡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高敏《讀長沙走馬樓吳簡劄記之一》（《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收入所著《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所見“調”的含義——兼與王素同志商榷》（《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收入《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王素《吳簡所見“調”應是“戶調”》（《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張旭華《吳簡“戶調分爲九品收物”的借鑒與創新》（《許昌師專學報》2002年第4期），于振波《走馬樓吳簡初探》，卷4“漢調與吳調”（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中村威也《獸皮納入簡から見た長沙の環境》（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 第二集》，2004），楊際平《析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的“調”——兼談戶調制的起源》（《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阿部幸信《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調納入簡初探》（《立正史學》第103號，2008）。

③ 阿部幸信著：《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爲中心》，《吳簡研究》第三輯。



## 二、各類“市布”記錄

前稿中曾列舉了以下兩條吏購布的記錄：

2. 入□鄉嘉禾二年吏所調布二匹<sub>||||</sub>嘉禾二年十月三日……□(壹·6947/12)<sup>①</sup>
3. 入平鄉嘉禾二年官所調布二匹<sub>||||</sub>嘉禾二年九□(貳·6420/20)

雖然簡文中并未明言買布，記載的祇是“吏所調”、“官所調”，但是通常吏不可能自己織布繳納，所以實際情況當是吏購買布匹納入庫。而且從簡文中記載了鄉名來看，簡文記述的是吏為特定某鄉進行的買辦。

然而，通檢已經公布的小型竹簡可以發現，這種例子祇是少數，直接記載購布行為的竹簡則更加常見，即“市布”簡。下面，將《竹簡壹》、《竹簡貳》、《竹簡叁》中包含了“市”、“布”兩字的簡全部摘出，如下所示：

4. □二日收責悉畢付庫吏殷連領□留市牛□□□布到□月□□□□(壹·3078/9)
5. <sub>||||</sub>吏李珠到涇口市嘉禾元年布簿別列出□□(壹·3686/9)
6. <sub>||||</sub>萬四千斛直一千八百付庫吏殷連當市二年調布(壹·3733/9)
7. <sub>||||</sub>百廿就留付□市今年所市布□十四匹一丈六尺付庫吏殷連<sub>||||</sub>(壹·4372/11)
8. <sub>||||</sub>□□□市得布一百四匹五尺五寸布匹賈<sup>②</sup>三千六百<sub>||||</sub>錢<sub>||||</sub>為米百廿斛悉畢謹列市得布匹(壹·4405/11)
9. □留市今年所<sub>||||</sub>領布重絞促□部吏收責到(壹·4487/11)
10. 出具錢八萬一千為行錢八萬五千二百<sub>||||</sub>九十五錢市嘉禾二年調布嘉禾三年正月卅(壹·5359/12)
11. 出具錢三萬為行錢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錢市嘉禾二年調布嘉禾三年正月卅(壹·5379/12)
12. 已入四萬三千一百□龍□廟所市絹絳布<sub>||||</sub>賈<sub>||||</sub>(壹·6386/12)
13. 五萬一千八百卅付□市布合□□(壹·8550/13)
14. <sub>||||</sub>付市吏潘矜市所調布廿三匹二尺(壹·8723/13)
15. 入吏李珠所市布一百卅匹 <sub>||||</sub><sub>||||</sub><sup>③</sup>(貳·4106/19)

① 簡號後用“/”隔開的數字代表該簡所在的盆號。

② “賈”，《竹簡壹》作“直”。文中據圖版改，但可能兩者語義互通。

③ “匹”後的“<sub>||||</sub>”據圖版插入。《竹簡貳》中作“□”。

16. 入<sub>市</sub>吏潘矜所市布一百六十四匹(貳·4212/19)
17. 所市布二百九十三匹<sub>嘉禾元年九月廿九日付庫吏殷</sub> <sub>①</sub>(參·182/23)
18. 入市吏潘矜<sub>所市布三百六十匹</sub><sub>嘉禾</sub>……<sub>②</sub>(參·232/23)
19. 右市布三匹九丈五尺 中(參·246/23)
20. 入廣成鄉所市布一匹 <sub>嘉禾元年八月九日漂丘男子</sub><sub>③</sub>(參·272/23)
21. 入中鄉所市中賜布二匹<sub>嘉禾元年八月廿六日唐丘男子</sub><sub>④</sub>(參·279/23)
22. 入廣成鄉所市布一匹 <sub>嘉禾元年八月九日端丘</sub><sub>⑤</sub>(參·445/23)
23. 右吏潘矜李珠所市布<sub>百一十三匹二丈</sub><sub>⑥</sub>(參·455/23)
24. 入市租錢市所調布一百五十匹<sub>嘉禾元年八月廿日</sub><sub>⑦</sub>付庫吏殷 <sub>⑧</sub>  
(參·462/23)
25. 入西鄉入後所市布一匹三丈九尺<sub>嘉禾元年九月六日錫丘男子宗</sub><sub>⑨</sub>(參·473/23)
26. 入西鄉入後所市布三丈九尺<sub>嘉禾元年九月十日楊漫丘李和付庫吏殷</sub><sub>⑩</sub>(參·480/23)
27. <sub>市布三匹</sub> <sub>⑪</sub>(參·1007/23)
28. <sub>所市布</sub> <sub>⑫</sub>(參·5850/35)
29. 李珠市嘉禾二年所調布得八百卅匹其七百匹<sub>賈</sub><sub>⑬</sub>(參·6435/36)
30. <sub>李珠市嘉禾二年所調布</sub>(參·6464/37)
31. 李珠市嘉禾<sub>年</sub>所調布<sub>⑭</sub>(參·6553/37)
32. 出錢五萬二千八百被<sub>嘉禾二年八月十五日己未書給市布</sub><sub>⑮</sub>(參·7160/37)
33. <sub>錢十萬三千嘉禾年七月十日</sub><sub>⑯</sub>史陳通市<sub>布</sub>(參·7269/37)
34. <sub>市布</sub>(參·7387/38)

① 《竹簡叁》後段作“監丘<sub>吏</sub><sub>①</sub>……”。從圖版來看，雖然釋作“監”的部分判讀十分困難，但鑒於該字左上部分筆劃向左下拉伸，右側又可以識讀出縱橫交叉的“十”字形，因此這裏可能是個“付”字。從“監”字的“皿”到“丘<sub>①</sub>”部分因為編綴受到污損，祇能看到兩條長橫杠，可以認為是“監”和“丘”下面的橫杠。基於同樣理由，可以將此視為“庫”字的上半部分。“吏<sub>①</sub>”中“吏”下面緊接着的“<sub>①</sub>”，不過僅僅看到簡中央有一個極其小的黑點，極有可能祇是單純的污點。後面的文字近似“殷”字，而且緊接着長空格，與小型竹簡中經常出現的“庫吏殷連”(由於“連”是自署，在基於某種原因未寫的情況下，多為空格)的寫法相同。而且也應該考慮到小型竹簡中“庫”字多被寫得縱長。由此，將這一部分視作“付庫吏殷”比較合適。

② 《竹簡叁》前段作“入市吏張翔<sub>所布三匹</sub>……”，文中據圖版改。

③ 《竹簡叁》釋作“一百一十三匹二丈”，但從圖版來看明顯不是“一百”，可能是“六百”，但無法斷定。

④ “賈”，《竹簡叁》作“直”。據圖版此出有斷裂，雖然不明顯，但據殘餘部分字形將其判讀為“賈”。

⑤ “布”前的文字，雖然《竹簡叁》中認為可能是“以”，可是文意不通。由於圖版中難以判讀，文中暫且作“<sub>①</sub>”。

35. □□市布□□(參·7890/39)

36. □□已出五十萬一百四錢付市掾潘玠吏李珠市嘉禾二年布(參·8396/39)

從簡 10、11 以錢換布的例子可以確定“市”是購買的意思。而且由簡 6 可知,有時候用米折錢買布。<sup>①</sup>

通觀以上 33 例,首先可以明確,出現“市布”簡的盆僅限於第 9、11、12、13、19、23、35、36、37、38、39 盆。《竹簡壹》前言中已述,《竹簡壹》至《竹簡叁》中的小型竹簡是自挖掘機從 J22 號井中所挖出的廢土裏回收,並以 39 坨的形式分別保存在盆中,然後進行整理的。<sup>②</sup>雖然回收時諸簡已成坨狀,不過考慮到多數簿籍混在一起的可能性,很難判斷聚在一坨裏的諸簡是否有緊密的聯繫。盡管如此,前賢已經指出,通過收集整理同一盆中的散簡,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復原簿籍。反過來,我們不得不考慮若簡所在盆不同,則所屬簿籍亦不同的可能性。這是以下討論中不能忽略的一點。

根據李天虹的研究,居延漢簡中穀出入簿包括①簽牌、②標題、③上餘、④正文、⑤“右”類、⑥“凡”類、⑦現餘、⑧呈報八部分。<sup>③</sup>前文各例中,也有近於標題簡(簡 5)、呈報簡(簡 8)和“右”類簡(簡 19、23)的簡。餘下各簡除了難以分類的幾支<sup>④</sup>,似乎都是正文簡。不過由於書寫內容各式各樣,所以從簡的特徵和內容區別,可大致劃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是構成庫錢簿籍的一批簡(簡 6、10、11、30—36)。據凌文超的研究<sup>⑤</sup>,第 36、37、38 盆包含有“裸錢領收出用餘見簿”、第 12 盆有“裸錢承餘新入簿”,他特別指出簡 10、11、31—33 也是以上錢簿的一部分。正如凌氏所言,這些簡雖然記錄的是庫錢被支出,並用於換布,但是支出的金額相當龐大,多達 5 萬至 10 萬錢,加之簡 32 中還可以看到“被……書”的用語,可見這裏記錄的買辦行為可能是根據上級官府特別命令而執行的。簡而言之,有時下級官府迫於某種情況,必須在短時間內大量統購布匹。這些簡就是製作於此時、並作為錢簿的一部分匯總起來的。此外,相當於小計的是簡 36 那種記載了因“市布”支付 50 多萬錢的“已出”簡<sup>⑥</sup>。從行文用語來看,簡 30 也應該是“已出”簡的殘片。而且,鑒於簡文中錢的交付對象不是布匹買辦的負責人,而是以府庫出納管理人員身份多次出現的庫吏殷連,簡 6 可能是通過支出倉米換錢,並將這些錢作為購布資金再次入庫的記錄。因此,把簡 6 也視為錢簿的

① 于振波著:《走馬樓吳簡初探》,92 頁。

② 《竹簡壹》上,1 頁。

③ 李天虹著:《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71—79 頁。

④ 嚴重缺損的斷簡(簡 27、28、34、35),作為文章一部分難以判斷語義的簡(簡 4、9)歸為此類。

⑤ 參照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庫錢帳簿體系復原整理與研究》。

⑥ “已出”簡的功能依照後文“已入”簡。關於“已入”簡,參照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関係簿初探》(57 頁)。

一部分比較妥當。

相反,以“入”起首的記述布匹納入的“入……市布”簡(以下簡稱“入市布簡”)明顯屬於布簿。目前可以確認簡15、17、18、20—22、24—26是有同文符號的筭,也就是說祇是納入的原始記錄。入市布簡不僅與“入……布”形式的入布簡、“入……調布”形式的入調簡在書寫格式上十分相像,而且與這些簡一樣集中出現在第23號盆,加之同一盆中還有簡19、23那樣具有統計功能的“右”簡,所以把第23盆中其他散簡納入入市布簡研究的視野就變得十分重要。關於這一點,本文將在第四節中詳細論述。

此外,還有采用“已入……”書寫格式的簡。明確屬於此類的祇有簡12,但是簡14、16也比較符合此類簡的格式。就像簡12從距頂端約3釐米的位置開始書寫,“已入”簡在開始書寫前,自頂端往下空出相當於幾個字符的長度屬於通例。<sup>①</sup>那麼從殘簡長度(約18.5釐米)就可以推測簡16上部殘缺了約5釐米<sup>②</sup>,而且該簡自下往上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7.5釐米)有編綴痕迹,再往上7.5釐米處還有避開編痕的空白,總長正好與推論契合。從殘缺部分的長度,可以斷定簡16不是以“入”字開頭。但是若簡文前有差不多1釐米大小的“已”字,則上部的空白變為4釐米,正好與簡12的起首位置差不多。所以,簡16是“已入”簡的可能性非常大。另外,簡14與簡16書寫格式相同,記載內容均以布匹數額完結,也可以視為“已入”簡殘件。方才所提各簡的文字都避開了編痕,所以應該是在預先編好的簡冊上書寫的。據谷口建速的研究,這種避開編痕的簡,是將原始記錄重新整理為月旦簿的二次記錄的一部分。<sup>③</sup>對比以下入米簡的“已入”簡可知,與入米簡不記錄穀物種類不同,“市布”簡的特色是把買辦者、購買方式作為附屬信息插在“已入”和布匹數量之間。

### 37. 已入六百六十斛二斗(壹·1688/5)

最後一類是不屬於以上任何分類的簡7、13、29。可以肯定這幾支簡的簡文均避開了編痕,所以不會是原始記錄。雖然簡7明顯描述的是布匹的納入,但是,簡文前半部分不可讀,所以整體文意不明。簡13、29與前文中第一類的簡30、36格式類似,然而不同之處在於還記載了布匹的數額,所以應該區別對待。雖然把這些簡都看作布簿的組成部分比較合適,可是考慮到簡文內容并不明確,詳細的探討不得不留待他時。

綜合以上內容可知,在各種各樣的“市布”簡中,明確記載布匹購入的有作為原始記錄的

① 谷口建速著:《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関係簿初探》,57頁。

② 谷口建速著:《竹簡の大きさについて》《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に関する比較史料学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化》,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2007,26頁中,與“已入”簡關係密切的“明細簡”實測值為23.5釐米。

③ 谷口建速著:《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関係簿初探》,49—50頁。

入市布簡和二次記錄的“已入”簡。其中例子相對較多，與實際購布情形聯繫更加密切的是入市布簡。下節，就對入市布簡的內容作進一步探討。

### 三、關於入市布簡的探討

如上所述，入市布簡與入調簡的格式相同，所以在分析中可以援用入調簡的研究成果。首先，比照入調簡，試着對入市布簡的書寫格式進行分類。

如下三例：

38.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所調布一匹<sub>〃</sub>嘉禾二年八月十五日三州丘男子鄧兒付庫吏殷連受(貳·5538/12)

39. 入都鄉橫溪丘男子張□調布四匹三丈九尺<sub>〃</sub>嘉禾二年十月十二日烝弁付主庫吏殷連受(壹·8195/13)

40. 入廣成鄉調鹿皮一鹿皮四合五枚<sub>〃</sub>嘉禾二年八月十一日掾黃客付庫吏殷連受(貳·8902/23)

由上可知，入調簡的書寫格式有三種：①在同文符號前段記錄鄉名，後段記錄丘名和納入者姓名；②全部在同文符號的前段記錄鄉名、丘名、納入者姓名；③同文符號前段記錄鄉名但不記錄納入者姓名，或者後段有吏的自署名。和前稿<sup>①</sup>一樣，本文依然將①稱為格式甲、②稱為格式乙、③稱為格式丙。根據前稿的分析，格式甲是百姓的單次納入記錄；格式乙是以納入者信息為重點，由多個或者單個格式甲重新匯總整理而成的；格式丙是由吏購布或購皮時，省略納入者信息製作而成的格式乙的一個變種。前一節最初介紹的簡2、3自然屬於格式丙。

那麼，比照上述分類，就可以把入市布簡中簡15、18歸為格式乙，其他各簡歸為格式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簡24，正如後文的論述，從納入布匹的數量可以判斷簡文中吏是納入的主體。那麼簡24就成為與吏相關的格式甲。如此一來，這就與前稿的分析結果互相抵牾。由於目前尚不明確格式甲與格式乙在功能上的區別，所以暫且擱置這一點。目前首先需要留意的問題是吏的納入每次都以荊的形式進行記錄。因為根據谷口建速的研究，入米簡中納入的米若不是出自吏民賦稅，官府就可能製作荊以外其他形式的納入簡。<sup>②</sup>在這一點上，入米簡與入調簡大不相同。

① 阿部幸信著：《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為中心》。

② 谷口建速著：《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關係簿初探》，51頁。

接下來將關注納入布匹的數量。正如楊際平所言，入調簡中納布 1 匹的例子占多數，尚未發現納入 7 匹以上的情況。<sup>①</sup> 但是，在簡 15、17、18、24 中，納入布多達 140 至 360 匹。這種與普通入調簡、入布簡性質完全不同的納入行為，正好與錢簿的組成部分——“市布”簡中反映的大規模購布行為互相呼應。反之，除此以外，入布簡與入調簡幾乎相同。

此外，簡文書寫格式中涉及的納入主體也是一個問題。簡 15、18 的納入者是吏，而簡 20、21、25、26 是百姓。簡 22 中記有丘名，納入主體應該也是百姓。簡 17、24 的納入主體不明，但是鑒於 293、150 匹的納入量，納入主體不可能是百姓，將吏視為納入主體更妥。頗有意思的是簡文中記載的“市布”主體不僅有“吏”，而且還有普通百姓。由簡 25、26 中的“入後所市布”可以看出，有人因為某種原因，應該繳納的布（或布的一部分）沒能及時繳納，故在此之後買布補繳。與吏入市布簡不同，民入市布簡和入布簡、入調簡一樣，都記錄了鄉名、丘名，這暗示了百姓“入後所市布”與通常的納布行為沒有什麼本質性不同。雖然簡 20—22 中沒有“入後”的字樣，可是很難想像除了百姓特地買布交納外還有什麼其他情況，所以將其視為簡 25、26 的同一類型相對合宜。參照入調簡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有時候同一人在同一年度中多次交納布匹，<sup>②</sup> 所以購布追加納入也可視為上述情形中的一種。

綜合以上分析，入市布簡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 I. 吏的購布記錄（簡 15、17、18、24）——不記錄鄉名

（簡 15、17、18 為格式乙，簡 24 為格式甲。購買數額均很大。）

#### II. 百姓的購布記錄（簡 20—22、25、26）——記錄鄉名

（均屬於格式甲，購買數額小。）

由此，不得不進一步考慮，這類記錄在簿籍中究竟占據了什麼位置。下一節，即以入市布簡集中出現的第 23 號盆為主要對象討論這個問題。

## 四、布簿的製作過程與入市布簡的位置

就目前所知，百姓納布的記錄可分為入布簡、入調簡和入市布簡 3 類。假若以“布”、“調布”、“市布”為分類標準，則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相關“右”簡。可是在長沙吳簡裏最常見的以鄉為單位的統計簡中，目前還沒有發現用“調”、“市布”歸類的例子。<sup>③</sup> 第 23 盆中祇有以下

① 楊際平著：《析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的“調”——兼談戶調制的起源》，50 頁。

② 阿部幸信著：《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為中心》，234 頁。

③ 雖然《竹簡壹》中有如下例子：

右廣成鄉[ ]調布六匹……（壹·8225/13）

據圖版無“調”字，或許釋文中“調”為衍字。

兩例：

41.      · 右西鄉入布五十匹二丈三尺(參·239/23)  
 42.      · 右都鄉入布合卅五匹一丈四尺      中(參·245/23)

可知,入布簡與入調簡、入市布簡祇會在原始記錄時分開記載,在進一步以鄉為單位統計的時候,則不會作此區分。

此外,還有如下“右”簡：

43.      · 右民入布卅六匹三丈九尺(參·249/23)  
 44.      · 右入布卅七匹二丈      □(參·105/23)

以上兩簡均沒有記載鄉名,簡43記的是“民入”。簡19與以上兩簡相似,都是略去鄉名只記“市布”。<sup>①</sup>這幾例中,納布量均與一鄉總量(參照簡41、42)持平或略少,所以即使省略了鄉名,也不會是鄉級以上的合計。至於簡44,不僅省了鄉名甚至沒有“民”字,從簡文記錄的布匹數額來看,視為以鄉為單位的合計簡更好。那麼,以上這些沒有鄉名的“右”簡究竟具備什麼功用呢?

對米簿中“右”簡特徵有過縝密研究的佐川英治認為,“右”簡的起首位置與統計層級的高下相對應,它的匯總順序是“右入”(據頂端5釐米稍上)→“右某鄉入……”(3釐米稍下)→“右諸鄉入”(2釐米以內)。<sup>②</sup>通過圖版可知,前稿中列舉的鄉級合計簡41、42都是從3.6釐米的位置開始書寫,這與佐川氏對米簿的考察結果一致。此外,簡19、43、44的起首位置分別是3.6釐米、3.9釐米、1.2釐米。據此推測,匯總百姓賦課布匹的合計形式可能是：

“右民入布……”+“右市布……”→“右入布……”

所在盆不同,但與“右入布”簡起首位置差不多的還有以下例子:<sup>③</sup>

45. 右蒯廿五枚布合五十匹三丈二尺(貳·5321/20)

① 所在盆不同,但具有同樣特徵的還有下簡：

· 右民入稅布四百卅七□□(貳·734/15)

但是該簡從簡頭5.4釐米處開始書寫,與後引簡44的起首位置不一致。雖然從字面上類似於“右民入布……”這樣的下層合計,但是簡文中稅布數量作為一鄉納布總計實在太多。本來該簡就是第15盆中唯一的與布有關聯的簡,而且“稅布”的說法在長沙吳簡中基本沒有,所以還存在簡文是否真的寫的是“稅布”的根本性疑問。雖然據圖版無法作出明確判斷,但這裏有可能是“稅米四百卅七斛”(這種“稅米”的事例在長沙吳簡中多次出現)。留待今後的課題。

② 佐川英治:《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の租稅納入竹簡に関する基礎的調査(1)——“入米簿”中の“右”で始まる集計簡——》,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出土史料群のデータベース化とそれを用いた中国古代史上の基層社会に関する多面的分析”プロジェクト、三菱財團人文科學研究助成“新出土三國吳簡・西晉簡と地方行政システムの研究”プロジェクト)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 2009年度特刊》,2010,75—76頁。

③ 簡45起首自1.9釐米,簡46起首自1.2釐米。



46. 右蒯卅二枚布合五十五匹二丈三尺 $\square$ (叁·5837/35)

以上兩簡明顯是“蒯”的合計，雖然簡 44 與它們的文字不同，但其功用應該是相同的。換言之，簡 19、43 是簡 44 的細目。由於統計時沒有區分作為原始記錄的入布簡和入調簡，所以兩者之間沒有特別的差異。祇是，既然有“右市布……”簡，那麼就可能分別統計民入市布簡與入布簡、入調簡。<sup>①</sup>

第 23 盆中沒有發現提示納布統計周期的簡，但入布簡、入調簡頻出的第 13 盆中，有下簡：

## 47. 集凡起五月一日訖十五日民入嘉禾二年布合廿匹三丈六尺(壹·8197/13)

該簡布匹不足 21 匹，作為合計簡數量稍少，即使考慮到 5 月不是納布的主要時期<sup>②</sup>，仍然不像多個鄉納入的記錄。這樣一來，鄉內的布匹或許以半月為單位進行匯總統算。侯旭東曾經指出，米的納入是一天一結計<sup>③</sup>，布的匯總統計雖然不會如此頻繁，但應該比窪添慶文推測的一月一結計的周期更短。<sup>④</sup>總之，依據這種基礎性的底帳，官府每月一日製成月旦簿<sup>⑤</sup>，就是簡 41、42 那樣的各鄉合計簡，或者簡 48 那樣多個鄉的合計簡。而且從簡 49 可知，此時原始記錄被彙編為二次記錄。<sup>⑥</sup>

48.  $\square$ 凡十二月一日訖卅日入布八百卅一匹一尺(叁·170/23)

## 49. 入南鄉嘉禾二年布卅一匹二丈四尺 ▼ 中(貳·6106/20)

那麼在簿籍中，簡 2、3 那樣的吏入調簡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雖然這些簡記述的也是購布行為，但是與吏入市布簡不同，它們不僅記載了鄉名而且數額也很小。從各鄉統計的書寫方式來看，吏入調簡與民入調簡可能都屬於鄉總帳，一般不會分開統計。但是鄉合計簡 47 中的“民入”二字暗示，“吏所調”、“官所調”指的不單純是吏補足徵收中不足份額，而更可能是一種與百姓納布更加密切的采辦行為。聯繫到百姓的“市布”，這一點就變得更加明顯。雖然民入市布簡是購布納入時製作的，但如下簡所示，有的百姓沒能買到布，就用米代納。

① 雖然從官府的角度來看，納入的布匹是否是被買來的並不重要，即便如此還是出現了這種方式的合計，應該是基於某種理由吧。這個問題有待他日研究。

② 窪添慶文：《走馬樓吳簡の庫吏関係簡について》，《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に関する比較史料学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化》研究成果報告書，46 頁。

③ 侯旭東著：《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研究》，6—7 頁。

④ 窪添慶文：《走馬樓吳簡の庫吏関係簡について》，48 頁中，依據“右”簡的出現頻率，認為布匹以一個月為統計周期。

⑤ 雖然在第 23 盆中未見到布的月旦簿標題簡，但在含有大量入布簡、入調簡的第 20 盆中有如下例子：

主庫史殷連謹列十月旦承餘新入二年布匹數簿 $\square$ (貳·6233/20)

⑥ 簡 49 上不僅有表明已經確認的墨點和“中”字印記，而且還避開了編痕，定是二次記錄。

50. 入平鄉嘉禾四年品布一匹准入米一斛胄畢<sub>𠂔</sub>嘉禾五年正月九日<sub>𠂔</sub>丘番<sub>𠂔</sub>關邸  
閣董基付三州<sub>𠂔</sub>倉<sub>𠂔</sub>吏<sub>𠂔</sub>(參·3811/31)

那麼官府方面就應該有必要把米換成布，以此補足布匹的賦課定額與實際徵收額之間的差距。如果各鄉各月都出現這種情況，就不難想像相對小額的布匹交易時有發生。簡2、3或許就是這種交易留下的記錄。若果真如此，那麼這種買辦行為，就與用官府庫錢“市布”不同，而是吏作為百姓的代理人在買布。這樣一來，簡文採用與吏入市布簡不同的表達方式——“吏所調”、“官所調”也就變得更容易理解。若以上假說正確，那麼這些入調簡就與民入市布簡一起用“右市布簡……”的形式一起合計。

以上論述的是鄉布簿的製作過程，接下來涉及的是吏入市布簡和“已入”簡的統計方式。這些簡在原始記錄時與鄉沒有關係，所以不會以“右某鄉入布……”的形式匯總統計。如果吏入市布簡中的巨額交易包含在以鄉為單位的合計中，那麼每一鄉的總額肯定明顯比簡41、42中的數額高得多。不僅如此，如：

51. <sub>𠂔</sub><sub>𠂔</sub>八月一日訖卅日<sub>𠂔</sub>吏入<sub>𠂔</sub>嘉禾二年布合一千八十六匹<sub>𠂔</sub><sub>𠂔</sub>(貳·5952/20)

考慮到簡51這種標為“吏入”的月合計簡和簡5那樣“市布簿”標題簡的存在，基本可以確定吏通過“市布”獲得的布匹與鄉內繳納的布匹分別在不同籍冊中進行管理。不難想像，由於目的不同，因為上級官府的命令等特殊情況進行的大規模布匹買辦與常規稅務，需要分開管理各自的收支。

但是，由於與入布簡、入調簡相比，吏入市布簡或“已入”簡太過稀少，所以復原由它們構成的簿籍內容和製作過程極其困難。其中殘留的唯一線索就是簡23。它是“市布”簡中經常出現的潘孁、李珠二人“市布”的合計簡。簡文起首距頂端2釐米，可知該簡屬於高級別合計簡。那麼，自然也有相對下層的合計。暗示這種細目存在的就是簡29。簡29在正要對李珠“市”的840匹調布中700匹記述些什麼的地方斷裂了。雖然依據接下來記述的內容不能確定簡文的完整意思，但是從“其七百匹”的說法來看，剩餘的140匹與文中700匹應該是基於某種不同被分開了。與這種區分相呼應，布匹以某種形式分別統計，然後以簡23的形式再次合計，最終像簡51那樣統計合算，就是吏“市布”簡的總計方式吧？目前祇能推測到這種程度，像簡23、簡51到底是入市布簡的合計，還是“已入”簡的合計，實在無法確定。祇能有待今後材料的增加。

至此，特別限於入市布簡與布簿的關係，本文的討論要點可總結如下：

①民入市布簡雖然與入布簡、入調簡（包括由吏代購的部分）分開統計，但是這些簡在以鄉為單位合計時一起匯總核算。因此，月旦簿中的記載不區分百姓各種性質的納布。

②雖然吏入市布簡的統計過程尚不明確，但是鑒於“已入”簡特地避開編痕，可知有對吏

入市布簡進行統計整理的二次記錄。

③吏“市布”的簿籍，與為常規稅務製作而成的布簿被分別管理。

最後，依據以上討論結果，本文試着從“市布”行為發生的背景出發，推測孫吳初期“調”的實態，來作為本稿的結語。

## 五、“市布”視角下的“調”

從百姓購布納布的實例可以看出，孫吳初期的長沙，布匹維持着一定程度的流通，民間也具有相應的生產餘力。雖然有些百姓會購布繳納，或者以米代納，但比起布匹生產力低下的推測，考慮因為死亡或者其他緣故以致戶缺乏承擔布匹生產活動的女性成員則更為合理。祇是，透過長沙吳簡，我們已經知道當時有一些“不任調”的“下品之下”戶，所以不能僅僅因為布在市場上稍有流通，就斷定各家各戶都備置有充足的布匹。冬賜布的頒行正是出於賑恤的必要。<sup>①</sup> 故而官府需要儲備大量布匹以應對這種事態。前稿中論述的“調”本質在於調整物流，<sup>②</sup>正是基於上述原因。

然而，雖然在長沙可以買到布，可是一旦官府需要數百匹以上大宗購買時，似乎就很難僅憑長沙之力維持供應。作此推測是因為在簡5中，李珠特地奔赴到距離較遠的漚口買布。漚口是軍事上的要地，嘉禾初年呂岱曾屯駐在這裏。<sup>③</sup> 從處於河流交匯的位置來看，漚口很可能本身就是民間物資的集散地，更不用說呂岱軍團需要大量的物資供應。畢竟，若是沒有集中相當數量的剩餘物資，很難設想吏可以在此地大宗採購布匹。由此自然引發出一個疑問——“調”果真是由全國統一施行麼？也許“調布”祇是針對長沙一帶的區域性賦課，而沒有在長沙周邊地區實施呢？長沙吳簡中，長沙地區出現為數眾多的“叛走人”可能正是與這種賦課的偏向有關。

若果真如此，那麼由吏進行的“市布”就不再僅僅是出於滿足官府的需要，可以說吏通過從富餘地收購布匹然後運往缺布地的行動，起到了在大範圍內調整物流的作用。簡29中，吏購入的840匹布被稱為“調布”。文中的“調”，既然指的是“購買的物品”，自然就不會有“賦課”的意思。這一簡文完全凝聚了引發更大規模“市布”的本質原因和“調”在當時的實際語意。

① 阿部幸信著：《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為中心》，247頁。

② 阿部幸信著：《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為中心》，249頁。

③ 《三國志》卷六〇《呂岱傳》：黃龍三年(231)，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234)，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

通過吏“市布”維持的大區域範圍內的“調”和面向百姓賦課的小區域範圍內的“調”，都被稱為“調”，現象上也都表現為物流調整。但是正如前稿已述，向百姓徵收調布的體系在逐漸整備，繳納的調布被稱為“品布”，<sup>①</sup>并向與戶品掛鉤的制度化方向發展。雖然兩者都被稱為“調布”，可是考慮到來源和目的的不同，便分別放在不同的簿籍中進行管理。這種制度恰如實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對布簿真正的復原有待今後，內容層面上，潘釐、李珠的身份和職掌也是尚未解決的重要問題。即便如此，通過關注簿籍，而稍許探明“調”的實際形態，就已經充分達到了本稿的研究目的。暫且就此擱筆。

（本稿近完成時，才得知凌文超氏在《文史》2012年第1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走馬樓吳簡采集庫布帳簿體系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戶調》的大作，可是迫於文章提交日期的關係未能參考。在此特別表示歉意。）

<sup>①</sup> 簡50中有“品布”字樣，“調”、“品布”連用的例子可舉出：入□鄉二年所調品布二匹（嘉□□）（貳·5873/20）

## 試論吳簡名籍的製作周期及相關問題<sup>①</sup>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社會發展學院 鄧瑋光

**內容提要** 在名籍中,戶籍與一般名籍很難區分,錯誤的區分甚至不作區分以及不恰當的命名都有可能導致問題的複雜化。本文首先對吳簡名籍的定名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可以利用吳簡標題簡中的自名來定義簿籍。在此基礎上,對吳簡中戶籍的製作周期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關鍵詞** 走馬樓吳簡 名籍 製作周期

在正式討論問題前,筆者想先就本文中吳簡“名籍”的概念略作解釋。在吳簡中有大量記錄人名年紀等信息的簿籍,筆者將其統稱為“名籍”。“戶籍”屬於“名籍”的一種,“名籍”除了“戶籍”以外還包括其他一些簿籍,筆者將這些除“戶籍”以外的“名籍”統稱為“一般名籍”,以便與總的“名籍”概念相區分。

在走馬樓吳簡中“戶籍”一詞屢見,如:

1. 𠄎𠄎𠄎著戶籍督條列人名年紀爲簿忠等文書到𠄎(肆·4482)

不過簡1爲行政文書,並非標題簡。在已公布的吳簡中,尚未出現自名“戶籍”的標題簡。

<sup>①</sup> 本文寫作得到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江蘇教育學院“科學研究‘十二五’規劃課題”：“走馬樓吳簡的復原與研究”的資助。

關於吳簡戶籍的內涵與定義，整理者在簡牘公布初期曾使用過“戶口簿籍”的概念<sup>①</sup>，“戶口簿籍”包含了“民籍”、“吏籍”和“師佐籍”，內涵十分寬泛，這是當時研究尚未深入，又急需公布材料的情況下不得已而採用的辦法。隨着研究的深入，學界開始注意到戶籍與一般名籍間的區別。為此，羅新先生指出，應對“戶籍簿”和“名籍”進行嚴格區分，即使明顯屬於“普通戶籍”的簡，也不能簡單地統一歸類。<sup>②</sup>關於吳簡戶籍與一般名籍的分類研究成果，凌文超先生在其《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功能》一文中已經予以了簡要歸納，毋庸筆者在此贅言。<sup>③</sup>先行研究為深化吳簡名籍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但由於他們以個別簡例的格式為主要討論對象，所以隨着研究的深入，局限性也逐漸暴露出來，凌文超即曾質疑其有管中窺豹之嫌。<sup>④</sup>

凌文超的質疑并非毫無根據。首先，由於很多一般名籍在內容與格式上取材於戶籍，所以僅以格式作為判斷標準，極易將兩者混淆。其次，名籍成於眾吏之手，書手的習慣是否會影響名籍的格式以及名籍是否存在嚴格的格式規範都是未知數。下面略舉四條簡例以便說明：

2. 起妻阿年廿(參·2452)
3. 東妻大女銀年六十三(壹·10343)
4. 平陽里戶人公乘黃風年六十八(參·4271)
5. 平陽里戶人公乘烝[平]年卅□ 筭一 踵兩足(參·4275)

其中，簡2為凌文超所復原的“作部工師簿”Ⅱ中的簡<sup>⑤</sup>，簡3為其所復原的“戶籍簿”Ⅰ中的簡<sup>⑥</sup>，簡4、5則都屬於其復原的“戶籍簿”Ⅲ。若單獨將四簡進行比較，祇考慮格式，極易誤判簡2、3屬於同類簿籍，簡4、5分屬不同簿籍。以上例證充分說明，對簿籍的分類必須建立在簡冊復原的基礎上，否則很容易誤入歧途。

在這一背景下，提倡在簡冊復原基礎上進行研究的凌文超的意見應值得重視。根據實

① 詳情請參見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

② 羅新著：《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北大史學》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35—337頁。

③ 詳情請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功能》(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11、12頁)。

④ 詳情請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功能》(12頁)。

⑤ 凌文超將由《竹簡》[壹]、[叁]中復原出的兩種“作部工師簿”，分別命名為“作部工師簿Ⅰ、Ⅱ”。Ⅰ對應[壹]中的復原結果，Ⅱ對應[叁]中的復原結果(參見其著《走馬樓吳簡兩套作部工師簿比對復原整理與研究》，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⑥ 凌文超將依據《竹簡》[壹]、[貳]、[叁]附錄揭剝圖復原整理出的三種戶籍簿(凌自己根據[壹]、[叁]復原的兩種，以及侯旭東根據[貳]復原的一種)，按《竹簡》卷次分別命名為戶籍簿Ⅰ、Ⅱ、Ⅲ。

踐,凌先生提出了自己關於吳簡“戶籍簿”的定義。其認為“以記錄出地僦錢者、工師、<sup>①</sup>叛走、賜兵物者、戶品出錢者、軍吏、州吏、私學等爲中心”的“人名簿”,由於“未對鄉里編戶民進行統一記錄,而是因某種特定目的載錄了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口”,所以應非“戶籍”;而“詳細記錄了鄉里、戶口及賦、役等信息”的“吏民簿”,因爲“除去田制方面的內容,與紙本戶籍載錄的主要項目大致相同”,所以性質應與“戶籍”相同。不過,由於無法排除“吏民簿”祇是轉抄“戶籍”中內容而非原始“戶籍”的可能性,所以凌文超使用了含義較寬泛的“簿”作爲中心詞,將這類“吏民簿”定名爲“戶籍簿”。<sup>②</sup>

凌文定義的基本思路在於,充分考慮戶籍與一般名籍在性質與格式上的異同,採取較爲謹慎的命名方法予以定名。但筆者認爲其命名中仍有一些不妥之處。凌文中的“戶籍簿”使用了“戶籍”的名稱,但指的却是一種類戶籍的簿籍(如凌文中自言,無法斷定該類簿籍即爲戶籍),雖然其使用了含義寬泛的“簿”來進行命名,但仍容易造成誤解。此外,戶籍與一般名籍性質、功能有別,一種簿籍不可能同時具有這兩種身份。凌文超關於“戶籍簿”的定義看似兼顧了多方,實際上却模糊了戶籍與一般名籍間的區別,凌文中提到的一些難解的現象正是由於這種模糊的定名而造成的。

綜上,爲了避免歧義,筆者認爲應對“戶籍”的概念進行嚴格的定義,即專指以登記居民的基本戶口信息爲目的的簿籍,至於由其所衍生出的各種功能性簿籍,如爲收取賦稅、派發徭役等而做成的簿籍都應歸爲一般名籍。

那吳簡中是否有明確的戶籍呢?筆者推測,可能吳簡中並不存在自名“戶籍”的簿籍,相當於我們稱爲“戶籍”的簿籍實爲已知名籍中的一種,但由於沒有明確的戶籍標題簡,所以無法得到確認。在無法確認何種簿籍爲“戶籍”前,筆者認爲,應盡量避免在命名中使用“戶籍”這個名詞,而使用吳簡時代的自名來命名簿籍,如根據“兵曹徙作部工師及妻子本事”簽牌將與其對應的簿籍定名爲“作部工師簿”。同理,可將凌文超命名爲“戶籍簿”Ⅰ的簿籍根據標題簡:

#### 6. ☒小武陵鄉☐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紀簿(壹·10153)

定名爲“吏民簿”。不過,並非所有的名籍都能找到與之對應的標題簡,在沒有標題簡的情況下,可一律暫定名爲“名籍簿”。因爲“名籍”與“簿”都是寬泛的概念,這樣或可避免由於命名而造成的誤解。

<sup>①</sup> 即爲師佐——筆者注。

<sup>②</sup> 詳情請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功能》(《吳簡研究》第三輯,10頁)。凌文超認爲秦漢魏晉時期,“籍”一般專指名籍簡冊,籍疏人名戶口,而“簿”指代較爲寬泛,簿疏文書類聚,多指日常行政中廣泛運用的各類官文書。



不過,由於本文經常要涉及凌文超文中的觀點,爲了行文方便,筆者仍會借用“戶籍簿”這個名詞,但這裏的“戶籍簿”專指凌文超所定義的“戶籍簿”,筆者會加雙引號予以提示。

##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戶籍的製作周期,張榮強先生根據不同“戶籍簡”中同名者的年齡差距推測爲每年更造。<sup>①</sup> 凌文超先生雖未明確提出異議,但指出自己復原的“戶籍簿”Ⅲ中有一枚簡:

7. 平陽里戶人公乘黃監年五十 六年三月廿三日物故死 訾 五 十(叁·4298)

雖然凌先生復原出的“戶籍簿”Ⅰ、Ⅲ都非完整“戶籍簿”,但兩份“戶籍簿”裏,平陽里編戶民中有部分人名存在對應關係,且同名者的年齡都一致,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兩份簿籍記錄的應是平陽里同年的情況。因爲“戶籍簿”Ⅰ記錄的是嘉禾四年的情況,所以“戶籍簿”Ⅲ中的平陽里編戶民的年齡也應是嘉禾四年的數據。但在簡7中出現了“六年”的字樣,似乎說明這份簿籍直到嘉禾六年仍在使用的。如果戶籍每年更造,爲何會出現戶籍使用年限超出一年的情況,對此凌文超表示費解。<sup>②</sup> 如果張先生的結論不誤,就必須對簡7中的現象給予合理的解釋。

在繼續討論問題前,有必要先對張先生推出戶籍每年更造的思路略做梳理。張文中引用了兩組簡:

第一組:

8. 元妻大女汝年卅第一 𠄎(壹·8678)

9. 元妻大女汝年卅一第一(壹·10314)

第二組:

10. 如母大女妾年六十六(壹·10525)

11. 如母大女妾年六十七(壹·10190)

這兩組簡中人名與親屬名完全相同,視兩組簡例中的同名者爲同一人有一定依據。而同組不同簡的同名者間年齡差距正好爲一歲,再結合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中“產子恒以戶時(占年)”的規定,以及西魏大統十三年籍“A、B兩卷尤其是B卷所載的戶口、課役及田土集計,每年都會發生變化”這個旁證,張先生得出了孫吳戶籍“每年更造”的判斷。

<sup>①</sup> 張榮強著:《孫吳簡中的戶籍文書》,《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這裏的“戶籍簡”是張先生文中的用詞。)

<sup>②</sup> 凌文超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功能》,《吳簡研究》第三輯,48頁。




在張先生的論據中,《二年律令·戶律》(前186)以及西魏大統十三年籍(547)兩條論據,時間距孫吳嘉禾年間(232~238)都在兩百年以上。《二年律令》為西漢初期的法律,西魏大統十三年籍為西魏時的名籍,其與孫吳之間一經東漢,一歷兩晉。兩漢、漢晉間的社會制度都有重大變革,所以用這兩條論據來論證孫吳時期的情況恐略顯不足。因此,張先生的關鍵證據實際是開始的四枚吳簡。


四枚簡中的同名者為同人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並非定論,因為吳簡中存在同名異人者同樣稱謂的親屬同名的現象,如:



12. 騰兄公乘斗年五十一筭一断足以嘉禾五年十月廿日被病物故(貳·2939)
13. 騰兄公乘斗年卅三筭一雀兩足復(叁·3369)


以上兩簡的圖版都十分清晰,並無誤釋。關於兩位“騰兄公乘斗”的描述稍有差異,一為“断足”,一為“雀兩足”。此外,兩者年齡相差18歲。“断足”與“雀兩足”之間是否存在區別,限於材料,不敢妄下定論,但18歲的年齡差距却讓人懷疑兩位“騰兄公乘斗”之間的關係是否為同人。雖然張先生在自己的論文中列舉了三組跨年較大的同姓名簡,但筆者認為這三組簡例可能存在誤釋。

第一組:

14. 常遷里戶人公乘朱倉年卅一筭 (壹·2694)
15.   里戶人公乘朱倉年卅筭一 (壹·2954)


參照圖版,簡15中的“卅”,圖版中祇剩大半部,釋文者很可能是根據二、三豎間的距離來判斷這個字為“卅”,但在簡:

16.   里戶人公乘李任年卅五  (叁·731)

中“卅” 的三豎就緊靠在一起,所以僅憑圖版,很難斷定這個字是“卅”還是“卅”。此外,與簡15同屬第9盆的兩簡:

17. 常遷里戶人公乘何練年六十一腫兩足 (壹·2910)
18. 常遷里戶人公乘胡豪年六十四 (壹·2913)

可分別與同屬第37盆的兩簡:

19. 常遷里戶人公乘何練年六十一 踵兩足 (叁·6981)
20. 常遷里戶人公乘胡豪年六十四  (叁·6985)

對應。而在37盆中還有一枚簡:

## 21. 常遷里户人公乘朱倉年卅一 筭一(叁·6956)

據宋少華先生介紹,“各盆中大多數被擾亂的散簡,雖不成坨,但因出自同一采集地點,又因淤泥而粘連在一起,他們之間或多或少可能會有一些關聯”,<sup>①</sup>而9盆與37盆中對應的兩組簡又都同屬常遷里名籍簡,所以筆者判斷它們分屬兩份常遷里名籍簿。從同名者年齡相同這點來看,兩份名籍簿記錄的時間斷限應該相同。與這兩組簡同盆臨近的常遷里名籍簡很可能也屬於同盆同份簿籍,即簡15與簡17、簡18同屬一份名籍簿,簡21與簡19、簡20同屬一份名籍簿。據前文分析可知,兩份名籍簿記錄的是常遷里同年的情況,而簡15與簡21中的户人同姓名,其餘相關信息也基本相同,如果兩簡中户人爲同人,則其關於年齡的記錄也應一致。綜上,筆者認爲簡15的正確釋文應爲:

常遷里户人公乘朱倉年卅一筭一

第二組:

22. 里户人公乘胡豪年七十三 (壹·2672)

18. 常遷里户人公乘胡豪年六十四(壹·2913)

第二組中簡22圖版僅殘存左半,圖版中的“七十三”并不清晰。如果把第一、二組簡放在一起考慮,簡14與簡22簡號相近且都同屬第8盆,簡15與簡18簡號相近且都同屬第9盆。同盆中的簡間可能存在關聯,所以兩組簡很可能分屬兩份常遷里名籍簿。如果這個判斷不誤,則兩份名籍簿間的年齡變化應該相同,但簡14與簡15同歲,而簡22與簡18間相差9歲,出現了矛盾。所以,筆者懷疑簡22中釋文可能有誤。

第三組:

23. 富貴里户人公乘胡禮年六十踵兩足(壹·14)

24. 富貴里户人公乘胡禮年五十四筭一踵兩足復 (壹·2957)

對照圖版,簡23圖版并不清晰,而與兩簡臨近的一組同屬富貴里的簡,

25. 富貴里户人公乘黃述年廿一 (壹·28)

26. 富貴里户人公乘黃述年廿筭一<sup>②</sup>(壹·3004)

其中簡23與簡25同屬第1盆且簡號相近,簡24與簡26同屬第9盆且簡號相近,兩組簡又都是富貴里名籍簡,因此,筆者推斷簡23與簡25、簡24與簡26分屬兩份富貴里名籍簿,兩

① 宋少華著:《長沙三國吳簡的現場揭取與室內揭剝——兼談吳簡的盆號和揭剝圖》,《吳簡研究》第三輯,2頁。

② 原釋文作“富貴里户人公乘黃述年廿筭一”。對照圖版及簡19,筆者改“述”爲“述”。

份簿籍間的年齡變化應當相同。但黃述在兩份名籍簿中祇相差一歲,而胡禮却相差六歲,於理不合,所以筆者推測簡 23 釋文可能有誤。

此外,已公布的走馬樓簡中,有明確標題簡的名籍的日期主要集中在嘉禾四、五、六三年,尚未見其他年號,所以筆者懷疑走馬樓簡中的名籍可能主要作成於嘉禾年間。兩份同地簿籍間同名者年齡差距超過三年的都應慎重考慮兩個問題:1、釋文是否有誤,2、同名者是否即為同人。綜上,筆者懷疑年齡相差達 18 歲的兩位“騰兄公乘斗”可能是同名異人。由於存在“騰兄公乘斗”這樣的簡例,所以將簡 8、9 中的“汝”,簡 10、11 中的“妾”判斷為同人可能還需謹慎。

不過除了這四條簡例以外,在上文中有兩條更為明確的同人簡可作為替代。簡 25、26 為同里同身份同名者,兩位“黃述”是同人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兩簡中年齡正好相差一歲。不過,這是否能證明孫吳戶籍“每年更造”呢?筆者認為仍需慎重。在使用這兩簡來說明戶籍的製作周期前,有必要先回答兩個疑問。首先,這兩簡是否屬於同類簿籍;其次,如果屬於同類簿籍,這類簿籍是否即為戶籍。但正如前文在分析名籍的分類時所指出的,若無完整的簡冊作為參考,僅憑個別簡例,很難判斷其歸屬。而簡 25、26 不屬於任何已復原的簡冊,所以很難斷定兩簡的歸屬,自然也就無法回答前面的兩個問題。在無法確認兩簡性質的情況下,即用它們來說明戶籍的製作周期恐怕不妥,因為我們無法確認兩簡中的差異究竟是兩類簿籍間的差異,還是不同時間做成的單一簿籍間的差異,甚至連這兩簡是否屬於戶籍都不能下定論。

經過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在討論戶籍的製作周期以前,有必要先對名籍的類型進行分析。

## 二、對名籍類型的分析

從現有的標題簡來看,至少存在三種與“戶籍簿”有關的名籍標題:

第一種:

27. 縣鄉謹列嘉禾四年人名年紀為簿 ☒ (貳·7957)
28. 南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戶數(?)口食人名年紀簿(壹·9088)
6. ☒ 小武陵鄉 ☐ 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紀簿(壹·10153)
29. 廣成鄉謹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為簿(貳·1798)
30. 廣成里謹列所 ☐ 吏人名年紀為簿(壹·8655)
31. ☒ 廣 ☒ 成里謹列 ☒ 領任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為簿(貳·1797)

第二種：

32. 小武陵鄉謹列嘉禾五年限佃□戶口食人名簿(貳·9)

33. 南鄉謹列嘉禾五年限佃人戶口食人名簿 卣(貳·1131)

第三種：

34. 桑鄉謹列所領後(?)判占二人名年紀簿 □(壹·5532)

其中第三種標題簡釋文可能有誤，故暫不予以討論，祇以第一、二兩種標題簡作為研究對象。兩種標題簡中，第一種即為凌文中所提及的“吏民簿”的標題簡。其中簡 27 與其餘各簡格式上略有不同，並無出現“吏民”字樣，但從簡 27 所羅列的項目來看，其與“吏民簿”的主體基本相同，故筆者懷疑其很可能即為縣“吏民簿”的標題簡，所以將其歸入第一種標題簡。第二種為“限佃簿”的標題簡。目前，在侯旭東與凌文超的復原中都祇涉及“吏民簿”的標題簡。

這兩種標題簡對應的內容是否存在差異呢？筆者在“吏民簿”與“限佃簿”兩種標題簡周圍選出幾枚相關簡進行了比較。因為竹簡[叁]中無“吏民簿”的標題簡，所以祇舉[壹]、[貳]中的例子各 1 例，作為這類的代表：

35. 吉陽里戶人公乘謝莖年五十筭一刑右足(壹·10458)

36. 民男子黃鼠年卅四盲右目 鼠妻大女汝年卅一筭一(貳·1801)

“限佃簿”的標題簡中，簡 32 附近有名籍簡：

37. [安]陽里戶人公乘孫陶年卅七 妻大女思年廿六(貳·30)

而簡 33 周圍大部分是倉米簡，簡 33 似乎是混入其中的，所以沒有選取簡例。

對比兩類標題簡的對應簡，屬於“吏民簿”的簡中會記錄“筭”，而屬於“限佃簿”的簡似乎不記錄“筭”。在遍檢簡 32 所在的第 15 盆後（從簡貳·1～1535），筆者祇找到了一條與“筭”有關的簡：

38. 右勝家口食三人 筭二 訾□(貳·652)

但此簡“筭”出現的位置與“吏民簿”中的情況不同，不在戶人簡而在小結簡中。因此，就第 15 盆簡來看，“限佃簿”與“吏民簿”的區別似乎就在於“筭”的有無。

不過這種區別是否就是兩類簿籍間的主要差別呢？在簡 32 附近還有一枚簡：

39. □集凡小武陵西二鄉新住限佃[客]卅四戶口食卅一人故戶中□(貳·35)

這是一枚小結簡，簡 37 類簡很可能就屬於這條小結簡所在的簿籍中。如果這個推測可以成立，則“限佃簿”中無“筭”可能與他們是新住限佃客，政府還未規定他們的“筭”有關。此外，

還有一種可能,仔細觀察簡 32,在其標題中祇提及“口食人名”,所以很可能此外的項目,記錄者並不關心。因此,以“筭”的有無作為兩類簿籍的區分標準還需謹慎。

綜上,“吏民簿”與“限佃簿”間可能存在是否有“筭”的差別,但未必絕對。除此以外,兩類簡在格式上很難區分。

既然兩類簡很難區分,那凌先生指出的特例,是否是因為混淆了兩類簡而產生的呢?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筆者還注意到另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凌先生將復原的“戶籍簿”Ⅲ與“戶籍簿”Ⅰ對照時發現,在同屬小武陵鄉的三里中,祇有東陽里出現了相差一歲的現象:

40. □妻大女驚年卅筭一(壹·10432)
41. □妻大女驚年卅一 □男弟□年十七□□□(叁·4479)
42. 羊妻大女屈年廿四筭一(壹·10452)
43. □母大女主年卅五 羊妻大女屈年廿五<sup>①</sup>(叁·4491)

而平陽里、高遷里中的年齡則與“戶籍簿”Ⅰ相對應。

44. 平陽里戶人公乘朱碩年卅一筭一(壹·10246)
45. 平陽里戶人公乘朱碩年卅一 訾 五 十(叁·4287)
46. 高遷里戶人公乘五將年卅五筭一(壹·10407)
47. 高遷里戶人公乘五□年卅五 訾 五 十(叁·4503)

由於平陽里與東陽里不在一份揭剝圖中,所以暫不考慮平陽里的情況。而東陽里與高遷里都是利用揭剝圖叁·圖四復原的,兩里的簡屬於同份簿書的可能性很大,但同份簿書中却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紀年狀態,一種與嘉禾四年接近,一種却似乎是嘉禾五年的簿書,讓人十分迷惑。

但如果結合兩個疑問一起考慮的話,也許能帶給我們新的思路。簡 7 中嘉禾四年的信息一直使用到嘉禾六年,而“戶籍簿”Ⅲ中同鄉三里間的數據差了一年。因為體現簿籍年代差距的關鍵就是年齡,所以,筆者認為“戶籍簿”Ⅲ似乎對於年齡的準確性并不在意。如果把這種現象放在“吏民簿”中去考慮,確實讓人無法理解,因為該類簿籍的標題簡中明確提到了“年紀”,表現出對年齡的重視。但如果把他們放到“限佃簿”這類簿籍中去考慮,一切就豁然開朗。因為這類簿籍的標題簡中強調的是“口食人名”而不是“年紀”。對於這種標題的含義,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限佃簿”的作用在於對佃種土地的人口進行控制,因此,如果勞動力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比如勞動者死亡,一定會予以如實記錄。但在關心勞動力的同時,“限佃簿”并不關心勞動者的年齡,所以對簿籍中的年齡變化、正誤,并不十分在意。如果

① 原釋文作“□母大女主年卅五 □妻大女屈年廿五”。凌文超據補“□妻”為“羊妻”,對照圖版,可從。

以上推測不誤的話，則兩個疑問的產生可能都與簿籍的性質有關。

爲了檢驗以上推測，有必要對“限佃簿”進行考察，但由於缺乏揭剝圖以及相應的出土信息，目前尚無滿足要求的材料可供我們查考。不過，雖然沒有完整的“限佃簿”，但類似的簿籍還是存在的，例如“作部工師簿”。雖然與“限佃簿”的具體功能不同，但“作部工師簿”也屬於一般名籍。對“作部工師簿”的考察也許有助於我們瞭解“限佃簿”的情況。

### 三、對“作部工師簿”的考察

在名籍中，“作部工師簿”（整理者將其命名爲“師佐籍”）是迄今研究最爲透徹的。相關研究者有羅新<sup>①</sup>、韓樹峰<sup>②</sup>、于振波<sup>③</sup>、沈剛<sup>④</sup>、凌文超<sup>⑤</sup>五位先生，筆者亦曾進行過相關研究。<sup>⑥</sup>其中，羅文認爲簡牘中的作部應直屬武昌，師和佐則是作部工匠們具體的稱謂，師佐來自十三個縣（侯國），以縣爲單位與正戶百姓異籍管理，隨需要轉徙無定，轉徙之時舉家相隨，魏晉時期地方政府的作部，可能隸屬兵曹。韓文先對“師佐籍”格式做了總結，然後對師佐名稱進行了考辨，最後認爲“師佐籍”可能是長沙郡各縣向郡手工業機構遣送師佐的花名冊，而非作部遷徙師佐的花名冊，師佐是具有專門技能，並以此爲生的個體工匠，“師佐籍”反映了手工業者身份卑微化的初始階段。于文對師佐及其家庭成員的性別、年齡結構做了統計分析。沈文對走馬樓吳簡中“師佐籍”的格式進行了重新復原，區分出“右”類和“凡”類的不同，認爲師佐名籍是兩次編成，師佐是由郡縣兩級地方政府負責管理，但分工各有不同。政府在每年八月編制“師佐籍”總賬。凌文與筆者小文思路相似，即都是從復原入手，考慮利用竹簡[壹]與[叁]中兩份“作部工師簿”間的對應關係來進行研究；但筆者並未考慮到利用揭剝圖及盆號與簡冊間的聯繫來輔助復原，而祇使用了內容對照的辦法，分析中也未涉及師佐的家屬部分，因此必須承認凌文的分析比筆者的更具說服力。從復原角度而言，筆者較爲贊同凌文的觀點，下文的探討即以凌文的復原成果及相關論述爲基礎展開。

① 羅新著：《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57—63頁。

② 韓樹峰著：《長沙走馬樓所見師佐籍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一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167—189頁。

③ 于振波著：《走馬樓吳簡師佐籍蠡測》，《漢學研究》24卷2期，2006，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續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73—110頁。

④ 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所見師佐籍格式復原及相關問題探討》，《人文雜誌》2008年第6期。

⑤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兩套作部工師簿比對復原整理與研究》，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九》，162—237頁。

⑥ 參見拙著《走馬樓吳簡“師佐籍”的復原嘗試》（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第二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7—21頁）。



根據凌文的分析，爲了征討武陵蠻，孫吳政權調集了作部師佐參與征討，爲了掌握師佐的情況，在征討前大致爲“黃龍三年二月至黃龍三年七月之間”製作了“作部工師簿”Ⅰ，隨着時間的推移，當留在本縣的師佐家屬發生變故時，就在與“作部工師簿”Ⅰ相關的家屬簡上補充變故信息，以通知調徙在外勞作的師佐本人。

筆者贊同凌文的觀點。但凌文并未交待這份“作部工師簿”Ⅰ在征討武陵蠻結束後的去向，也未交待補充變故信息的具體方法，而這些都關係到對簿籍中年齡屬性的認定。

爲了解決以上問題，首先有必要對孫吳征討武陵蠻的活動時間有所瞭解。孫權征討武陵蠻的行動從黃龍三年二月持續到嘉禾三年十一月，而參考以下與“作部工師簿”Ⅰ有關的師佐家屬物故簡：

48. □□子男郡年十六在本縣 黃龍三年七月廿日物故(壹·8968)
49. 冉姪子男取年廿四在本縣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物故(壹·6023)
50. 侍子男陽年廿一在本縣 嘉禾二年二月一日物故(壹·8232)
51. □子女客年八歲在本縣 嘉禾二年三月十[日][物]□(壹·7469)
52. 碩妻汝年五十五在本縣嘉禾二年十二月五日物故(壹·6070)
53. [在][本]縣嘉禾三[年]二月二日[物]故(叁·2602)
54. 令大妻思年卅五在本縣 嘉禾三年二月五日物故(壹·8216)
55. [禿]年卅五 以嘉禾三年三月六日被病物故 留(壹·6754)
56. 陽子男山年廿一在本縣嘉禾三年六月十一日物故(壹·5887)
57. 啓男弟敦年廿二在本縣□□過三年正月十二日物故(壹·5936)
58. [兄]士年五十九在本縣 士以過三年二月十日被病物故(壹·5697)
59. [過]三年九月一日被病物故<sup>①</sup>(壹·8156)

可以發現，這些簡中的物故時間從黃龍三年(231)七月廿日到嘉禾三年(234)六月十一日之間，正好都在孫吳征討武陵蠻的時間斷限內。更爲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過三年”這個名詞。

“過年”一詞在吳簡中常見(如簡60—65)。最早對其作出解釋的是胡平生先生，胡先生利用“考實許迪割米案”J22—2540木牘中記錄的“過四年十一月七日”，將“過四年”解釋爲“去年——四年”。<sup>②</sup>凌文超先生對其觀點表示贊同，並將這一觀點引入對“過三年”的理解中，認爲“過三年”不外乎指黃龍或嘉禾三年，其中嘉禾三年的可能性更大。因爲簡52記錄的日期是“過三年正月十二日”，如果是黃龍三年，此時尚未征討武陵蠻，師佐可能亦未調徙。

① 原釋文作“[武]三年九月一日被病物故”。凌文超據圖版改“武”爲“過”，對照圖版，應無誤。

② 胡平生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三文書考證》，《文物》1999年第5期，45頁。

對於凌先生的判斷，筆者表示贊同。

但如果“過三年”即是“嘉禾三年”，那為什麼同份簡冊中又會出現兩種寫法呢？凌先生將其解釋為書手的習慣。對此，筆者稍有異議。在討論前，先將竹簡中出現的“過年”情況羅列如下：

57. 啓男弟敦年廿二在本縣□□過三年正月十二日物故(壹·5936)
58. □□兄士年五十九在本縣 士以過三年二月十日被病物故(壹·5697)
59. □過三年九月一日被病物故<sup>①</sup>(壹·8156)
60. □□過年領吏民部□□(壹·4309)
61. 右三戶口食六人過年別戶各有父母兄□(貳·816)
62. □過年地僦錢□□六千五百 □(貳·7583)
63. □右一人地僦錢月五百□過年九(?)月□被病□(貳·7611)
64. □……地□僦錢月五百簿以過□年□一月十被病物故妻汝單身□(貳·7612)
65. □民入過□(貳·7739)

加上前述木牘 J22—2540，“過年”的使用至少涉及案件、物故、別戶、地僦錢四個方面，且以上諸簡牘中筆迹並不統一，可見“過年”是一個文書習語，並不是某人的書寫習慣。此外，以常理來說，作為行政文書，日期的標注都有嚴格限定，因為文書產生的相關責任很多都與文書中的時間密切相關，所以“過三年”的書寫應該有其特別的含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再回到最能反映“過年”情況的木牘 J22—2540。現參考胡平生、王素兩位先生的釋文再對照木牘圖版，將筆者校釋后的釋文抄錄如下：

(1) 錄事掾潘琬叩頭死罪白：過四年十一月七日，被督郵敕，考實吏許迪，輒與核事吏趙譚、

(2) 部典掾烝若、主者史李珠，前後窮核考問。迪辭：賣官餘鹽四百廿六斛一斗九升八合四勺，偁米

(3) 二千五百六十一斛六斗九升已。二千四百卅九斛一升，付倉吏鄧隆、穀榮等。餘米一百一十二斛六斗八升，迪割

(4) 用飲食不見，為廖直事所覺後，迪以四年六月一日偷入所割用米畢，付倉吏黃瑛等。

(5) 前錄見都尉，知罪深重，詣言：不割用米。重複實核，迪故下辭，服割用米。審前

<sup>①</sup> 原釋文作“□武三年九月一日被病物故”。凌文超據圖版改“武”為“過”，對照圖版，應無誤。

後榜押迪,凡

(6) □不加五毒,據以迪□□服辭結罪,不枉考迪。乞曹重列言府。傳前解,謹下啓,琬誠

(7) 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

(8) 若 二月十九日戊戌〔白〕

凌文根據 J22—2540 木牘中的落款日期爲“二月十九日戊戌〔白〕”,判斷該文書當製作於“五年”。雖然筆者同意凌文的結論,但僅以“二月十九日戊戌〔白〕”來作爲證據似乎略顯不足。

因爲走馬樓吳簡中存在以不同形式記錄同一事件的情況,所以筆者想通過找出這樣的記錄來對上述結論進行更有力的支持。經過搜檢,筆者在竹簡中找到以下幾枚與“許迪案”有關的簡牘:

66. □嘉禾五年正月十七日兼錄事□……

……許迪軍法革(貳·7192)

67. □已列言乞傳前□□迪軍法乞府□□(貳·7230)

68. □□事部譚實核迪故如前□乞□□□□迪言□(貳·7233)

69. □□掾督郵旁己丑書曰部核事掾趙譚考實□□(貳·7235)

70. □……

……迪獄革(貳·7236)

71. 六歲□科不坐迪兄下從□□(貳·7237)

72. □錄事掾番琬校(貳·7239)

以上這組簡中,簡 67~72 簡號相近,內容與木牘 J22—2540 也有對應,因此,可以判斷這組簡應與木牘 J22—2540 中的許迪案有關。雖然簡 66 與其他諸簡未必同屬一份文書,但根據其中“許迪軍法革”與簡 70 中“……迪獄革”的類似語句,可以判斷其應爲與“許迪案”有關的一系列文書中的一份。簡 66 中出現的時間爲“嘉禾五年正月十七日”,雖與木牘 J22—2540 中的“二月十九日”並不完全吻合,但此時“許迪案”的案情已經基本明瞭到了結案階段,所以兩份文書間的時間間隔應不是很大,因此,將木牘 J22—2540 的作成時間判斷爲“嘉禾五年”(“五年”)應該是成立的。

既然記錄“過四年”案件的文書“五年”製作,是否意味着記錄“過”的文書都是在發生事件的次年成文的呢?那記錄“過三年”的文書是否就是“四年”完成的呢?雖然對於這兩個問題目前並無明確的證據,但筆者傾向於肯定的答案。因爲“嘉禾三年”的次年“嘉禾四年”

正是孫吳征討武陵蠻行動結束的下一年。按照常理,隨着征討行動的結束,對於參加征討行動的軍隊、工匠都會進行重新安置,而要重新安置,首先就應確認軍隊、工匠的人數及具體情況,而要確認工匠的人數及具體情況無疑會用到“作部工師簿”。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筆者前文的推測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為什麼“過三年”不直接寫成“嘉禾三年”呢?筆者認為有必要就物故信息的書寫時間進行考察。凌文根據這類簡中物故信息“○以過/[年號]○年○月○日(被病)物故”的字體與其前師佐家屬信息字體不同的現象,判斷這些物故信息應是在物故師佐家屬簡和“作部工師簿”Ⅰ製作完成後,才登記到“作部工師簿”Ⅰ對應簡的下欄。對於凌文的判斷,筆者表示贊同。但這些改動的具體時間凌文並未進行說明。經過搜檢,筆者找到了如下這枚簡:

73. 今月十五日物故大男李[戡]周曼證知[頤]被病物故[書]實願乞列言□□□(參·5723)

上簡表明,在某人物故的當月,物故情況即會被上報,並會被要求出示人證。既然物故信息會每月上報,則“作部工師簿”中的信息隨着接到的通報每年更新也是有可能的,而與之對應的很可能就是在“作部工師簿”中出現的以年號開頭的物故信息,因為是物故當年的記錄,所以不需用“過”。

但再嚴密的文書制度也都會有漏洞,如凌文中指出的:

74. 佐吳[龔]子男[萬]年五歲 吳昌(參·2336)

75. 佐□□子男被年[四]歲 劉陽(參·2337)

76. 佐鄧物子男郡年[四]歲 醴陵(參·2342)

77. 佐□毛子女兒年五歲 攸(參·2343)

這四枚簡應為原本遺漏,在最後的統一編連與檢校過程中補入的簡。既然師佐的家屬有被漏記的情況,那麼物故信息被漏記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漏記的信息在最後的簡冊檢查中被補入,但因為已經非物故當年的記錄,所以使用了“過”。

從以上的分析還可以看出,從征討武陵蠻前被製成開始到最後嘉禾四年重新檢校為止,簿籍上所有的變化都是直接記錄在原始簿籍上的。仔細查看圖版,“作部工師簿”中的年齡部分基本沒有塗改的痕迹,也就是說,“作部工師簿”上的年齡信息似乎都未發生變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應該是由“作部工師簿”的性質決定的,“作部工師簿”的目的在於控制師佐及其家屬,而不是年齡,除了物故叛逃等可能造成人口變動的因素外,其他的變化都不會體現在“作部工師簿”中。

由“作部工師簿”可以類推其他一般名籍的情況。這類簿籍往往因某事而作,便於政府控制參與某事的勞動力,例如“作部工師簿”是因為征討武陵蠻臨時調集師佐所作,因此,這類簿籍多是一次性的,不存在重作周期,作成後直到事件完成前簿籍中的年齡就基本不動

了。不過當簿籍中的人員因為物故、叛逃而發生變動時，政府會在簿籍中隨時補充相應情況，所以會出現物故時的年齡還是物故前幾年的現象。同時，由於這類簿籍一般祇強調人名與人數，所以在作成初始簿籍時，可能會登記不同年的數據。當事件完成後，政府會對簿籍進行檢校，簿籍中的人員會被重新安置。從總體上來說，這類簿籍與戶籍不同。戶籍為了如實地反映變化中的人的情況，如年齡，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被不斷重作；而此類簿籍因事而生，所有的變動都在原始簿籍上體現，當事件完成後便結束了歷史使命。

那“戶籍簿”Ⅲ又是出於何種目的而作成的呢？凌先生根據“戶籍簿”Ⅲ中諸里末尾都有“定應役民”戶的總結簡，而未發現有關算賦的總結簡，判斷其為“派役而製作”。凌文的判斷有其依據，不過筆者還想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根據凌文超的判斷，“戶籍簿”Ⅲ中的里可能分屬南鄉、小武陵鄉。由於“戶籍簿”Ⅲ為一份簿籍，所以如果“戶籍簿”Ⅲ有標題簡的話，南、小武陵兩鄉的標題簡可能相距較近。而簡32、33兩枚標題簡正與南鄉、小武陵鄉有關且兩簡同益。從格式來看，“戶籍簿”Ⅲ中也有大量不記錄“筭”的簡，而記錄“筭”的祇有五條：

78. 平<sup>母</sup>大女委年七十 平妻大女取年廿八筭一(參·4274)

79. 平陽里戶人公乘烝<sup>平</sup>年卅<sup>口</sup> 筭一 踵兩足(參·4275)

80. 平陽里戶人公乘番來年廿九 筭一(參·4277)

81. 妻大女<sup>口</sup>年廿三筭一 <sup>口</sup>子男滄年十二刑左手(參·4283)

82. 妻大女妾年卅二筭一 子男端年十四(參·4348)

在這點上，“戶籍簿”Ⅲ與簡32、33對應簡的情況類似。不過，“戶籍簿”Ⅲ中簡7有嘉禾六年三月份的物故信息，似乎此簿的製作也可能在嘉禾六年之後。但“戶籍簿”Ⅲ中戶人簡的書寫一般是將信息寫在上欄，“訾”寫在下欄，空出中欄，如簡45“平陽里戶人公乘朱碩年卅一 訾 五 十(參·4287)”。簡7的物故信息正出現在中欄，因此，物故信息完全有可能與“作部工師簿”一樣是後來補入的。從前文對一般名籍的分析來看，這種後補入物故信息的情況應是常態。同時，如果此簿確為嘉禾六年後所作，根據簡29“廣成鄉謹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為簿(貳·1798)”，以理推測，“吏民簿”的製作應是各鄉同時進行，既然廣成鄉嘉禾六年有了新的“吏民簿”，則南鄉、小武陵鄉也應該有新的“吏民簿”。“吏民簿”的內容與戶籍密切相關，“吏民簿”中數據的變化，意味着戶籍中也應發生變化。如果“戶籍簿”Ⅲ為嘉禾六年後製作，則其完全可以採用新的嘉禾六年的戶籍數據，而不用固守原有的嘉禾四、五年的數據。此外，由於是用於專門用途，政府此時關心的是能使用的勞動力，已經去世的人可能根本無需記錄。所以，筆者認為“戶籍簿”Ⅲ的製作時間應不晚於嘉禾六年。

排除這點疑問後，根據凌文的分析，因“戶籍簿”Ⅲ的戶籍信息中有嘉禾五年的年齡資料，所以其製作必在嘉禾五年之後，如果簡7確為後來補入，則簿籍的製作時間又必在物故信息補入之前即嘉禾六年三月廿三日之前，而嘉禾五年正好在這個範圍中。所以，簡32、33有成為“戶籍簿”Ⅲ標題簡的可能。不過由於簡32、33與“戶籍簿”Ⅲ并不同益，簡32、33對

應簡的格式與“戶籍簿”Ⅲ也有一些細微差別，所以在沒有進一步證據前，還不敢妄下定論。

#### 四、對吳簡名籍製作問題的一些推測

從目前已知的名籍標題簡來看，祇有“吏民簿”有“嘉禾四年”、“嘉禾六年”兩個年號，但這能否說明“吏民簿”的製作周期為兩年還有待商榷。下面略舉幾例以便說明。

為了避免出現前文所擔心的混淆不同種類名籍的情況，這裏所使用的嘉禾四年“吏民簿”為凌文超所復原的有明確標題簡，簡 6“☐小武陵鄉☐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紀簿(壹·10153)”的“吏民簿”中的內容。

83. 高遷里戶人公乘五棠年廿筭一(壹·10293)

84. 吉陽里戶人公乘區張年廿八筭一給州吏(壹·10367)

85. 凡口八事六 筭四事三 訾 一 百(壹·10121)

這裏所使用的嘉禾六年“吏民簿”為侯旭東所復原的有明確標題簡，簡 29“廣成鄉謹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為簿(貳·1798)”的“吏民簿”中的內容。

86. 民男子楊禿年六十 禿妻太女姑年卅九筭一(貳·1795)

87. 縣吏謝韶年五十一(貳·1806)

88. 右金家口食三人(貳·1767)

89. ☐ · 定應役民廿戶(貳·1704)

僅從標題簡來看，兩份“吏民簿”間似乎並無本質不同。但從具體內容分析，兩份“吏民簿”的格式差別很大。嘉禾四年“吏民簿”的起始稱謂為“某里戶人公乘某”，嘉禾六年“吏民簿”的起始稱謂為“民/某吏”。除了戶人簡起始稱謂有別外，據凌文超先生分析，兩份“吏民簿”間還有三點不同：1、嘉禾四年“吏民簿”中的戶口簡注記“筭一”相對詳盡，且其戶計簡“凡口○事○ 筭○事○”對算賦進行了統計；嘉禾六年“吏民簿”中“筭一”的記錄時常缺失，也未發現有關算賦的總結簡。2、嘉禾四年“吏民簿”對“訾○”的記錄很全面，而嘉禾六年“吏民簿”中未見記錄。3、嘉禾四年“吏民簿”中諸里末尾無“定應役民”戶的總結簡，而嘉禾六年“吏民簿”中有。據此，凌文認為兩份簿籍的功能有別，嘉禾四年“吏民簿”注重徵賦，嘉禾六年“吏民簿”注重派役。雖然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來驗證凌文超的這一推論，但兩份“吏民簿”間存在區別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以上兩份“吏民簿”，一為嘉禾四年小武陵鄉的“吏民簿”、一為嘉禾六年廣成鄉的“吏民簿”，兩份“吏民簿”間的區別是否與鄉的不同有關呢？根據簡 27“縣鄉謹列嘉禾四年人名年紀為簿 ☐ (貳·7957)”可以推知，廣成鄉嘉禾四年也可能製作過“吏民簿”。經過搜檢，筆者找到了以下兩枚與廣成里有關的簡：



90. 廣成里户人公乘□(壹·803)

16. 廣成里户人公乘李任年卅五 □(叁·731)

廣成里屬於廣成鄉，而以上兩枚簡的格式與嘉禾四年小武陵鄉“吏民簿”中的格式類似，所以筆者推測它們有可能即為嘉禾四年廣成鄉“吏民簿”中的內容。換言之，不同鄉間“吏民簿”的記錄格式可能基本相同。因此，兩份簿籍中的差別應與鄉無關，而是與記錄的年代有關。

對比完嘉禾四、六年的“吏民簿”後，再來單獨看嘉禾四年的“吏民簿”。嘉禾四年是孫吳征討武陵蠻行動結束的次年，正是戰事結束後各種關係重新調整的一年。因此，嘉禾四年“吏民簿”的出現到底是定期重作的結果，還是適應於戰後需要的結果值得考慮。

聯繫以上兩種現象，筆者懷疑“吏民簿”的製作可能是因需而作，並不存在某個固定的重作周期。隨着需求不同，簿籍的格式也會因之改變。

最後，再就戶籍的製作周期略述管見。從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對名籍進行分類十分不易，因此，試圖直接通過確認戶籍來探尋戶籍的製作周期十分困難。除了直接通過戶籍來解決問題外，是否還有其他思路呢？比較容易想到的就是從戶籍與一般名籍的關係這個角度去尋找思路。由於一般名籍大多是依據戶籍製作而成，所以可以將它們看成戶籍的衍生物。衍生物與本體的關係在於，本體的變化會體現在衍生物中，質言之，戶籍的變化會在一般名籍中顯現出來。一般而言，如果逆向思維的話，一般名籍中的變化反過來也可以反映出戶籍的變化。因此，雖然無法直接通過戶籍來確認戶籍的製作周期，但可以通過對一般名籍的考察來解決問題。如果這一思路可行的話，就不用再考慮必須使用同類簿籍的限制了，因為一般名籍都來源於戶籍，從本體與衍生物的角度來說，它們的性質是一樣的。

但以上思路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衍生物沒有自行變異，也就是說，衍生物變化的原因祇能來自本體，而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在戶籍與一般名籍這個例子中很難給出肯定的答案。如前文所述的簡25、26，凌文超復原的“戶籍簿”Ⅲ與“戶籍簿”Ⅰ中一年的年齡差距，究竟是來自於對戶籍的忠實轉錄，還是自行調查獲取的結果，限於材料，無法給予定論。此外，即使以上思路成立，也祇能證明上述材料所存在的年代有連續兩年重造戶籍的情況，至於以後是否也遵循這個周期就不得而知了。

在戰亂時期，對人口進行詳細統計十分不易，要像和平時期一樣周期性地造籍恐怕更加困難，因此，按需造籍可能纔是常態。此外，政府製作戶籍是為了掌控人口，如果有相應的簿籍承擔類似的作用，那正式戶籍存在的意義就被削弱了，而“作部工師簿”、“限佃簿”這樣的一般名籍正符合上述要求。不過，筆者並不否認隨着時間的推移，孫吳政權的鞏固，孫吳政府會不斷重作戶籍，但其是否存在特定周期，恐怕尚需更有力的證據，纔能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張學鋒師的悉心指導，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



# 漢代的更卒

## ——試論徭役、兵役制度

[日]立命館大學文學部 鷲尾祐子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楊振紅譯

### 序

漢代通過掌握、支配每一個百姓建立國家物質的、人的基礎。官府依靠百姓的負擔，獲得必要的物資和勞動力，而百姓以各種方式提供的負擔分為兩種，即繳納各種物品和金錢的賦稅，以及直接以自身提供勞動力的徭役。根據宮崎市定的研究，賦本來是指兵役，租指百姓耕作公田的收穫物，因此租賦徭役等百姓的負擔均可以看做是提供勞動力。<sup>①</sup> 戰國時代以降，人們才認識到，如何通過兵役、徭役等向國家高効地提供勞動力，並加以活用，是關係到

① 宮崎市定著：《中國古代賦稅制度》，收入其著《アジア史研究》，同朋舍，1957，1933年初刊。

維持國家統治的重要政治課題。<sup>①</sup> 特別是，當時百姓已成為大規模戰爭的主要兵力來源，也成為抓捕盜賊等維持治安人員的來源。而且，國家運行所必須的物資運輸、國家施設和官舍的修建也需要依靠百姓之力，同時百姓生活所必需的道路、橋梁以及灌溉設施的完善也依賴徵發百姓的勞動力來完成。一方面百姓是國家運行的基礎，但另一方面站在百姓的立場上，也有人批評國家過重的負擔導致了百姓的困苦：

凡民有七亡：(略)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略)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  
(《漢書·鮑宣傳》)

漢代的賦稅，除了繳納耕地收穫的穀物租之外，還有人頭稅(算賦、口錢)，這二者是主要負擔，這一點已很清楚。<sup>②</sup> 除此之外，還有臨時徵收的賦<sup>③</sup>，以及對富裕階層按照財產進行的臨時性徵調。<sup>④</sup> 關於物品、金錢類的徵收，已經大致明瞭，對整體制度已可以進行比較明確的說明。但關於直接役使身體的徭役、兵役制度，不明瞭的地方還很多。

關於漢代的徭役、兵役制度，自濱口重國 1931 年發表系列文章<sup>⑤</sup>確立研究基礎以來，日本主要是以更卒和正(正卒)兩種負擔為中心進行考察。可以確定這二者是主要徭役負擔，<sup>⑥</sup>

① 《管子·小匡篇》：“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昼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

類似的鄉里制度也見於《周禮·地官司徒·族師》：“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百姓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百姓，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此外東漢末徐幹指出，不徒勞的公平徵發，以及由此對百姓進行必要的準確的掌握，是統治安定的根本：“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勛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百姓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徐幹《中論·民數篇》)

② 據《二年律令·田律》簡 255，還有以戶為單位征課的賦和芻：“卿以下，五月戶出賦十六錢，十月戶出芻一石，足其縣用，餘以入頃芻律入錢。”《二年律令》是湖北省江陵縣西北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的。由於第一簡的背面記有“二年律令”，故以此稱之。關於“二年”是指哪個皇帝的二年有各種說法。由於同墓出土的《曆譜》截止於呂后二年，因此一般認為書寫的是這一年以前的律、令(參見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76,2004)。

③ 《漢書·食貨志》載晁錯言：“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④ 關於財產稅，請參見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三章“算賦及算緡、告緡”，汲古書院，1993)。

⑤ 濱口重國見《踐更和過更——如淳說批判》(1931年初刊)、《〈踐更和過更——如淳說批判〉補遺》(1932年初刊)、《關於秦漢時代徭役勞動的一問題》(1934年初刊)，均收入其著《秦漢隋唐史研究》(東大出版會，1966)。

⑥ 參見文末所附史料 C 文獻資料(5)。

但關於其制度內容却還有很多疑點。首先，作為壯年男子全部征課的定期徭役，在當時的記載中最多見的是更卒。漢代有壯年男子<sup>①</sup>在所屬郡縣一年中一個月輪番作更卒勞動的制度。而關於其勞動的內容，大體上沿襲了濱口重國更卒不是兵役而是力役的說法。<sup>②</sup>亦即學界對於更卒是定期的地方性徭役沒有異議。而且，這一役務在西漢中期以降可以用錢納來代替，也已為定說。

另一方面，關於正、正卒，如何解釋《漢書·食貨志》所載董仲舒上書和《漢舊儀》<sup>③</sup>這樣的基本史料是研究的中心課題，但目前對這兩條材料均有多種解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對正是兵役這一點大體上有共識外<sup>④</sup>，對制度內容的理解卻存在分歧。首先關於正、正卒<sup>⑤</sup>是否是所有壯年男子的義務，或者祇是對被選拔者所課；<sup>⑥</sup>其次，它作為兵役是在地方服役<sup>⑦</sup>，還是在中央和邊境地區服役，<sup>⑧</sup>還是擔任郡國兵和長安衛士均可，<sup>⑨</sup>分各種說法。在有關漢代軍隊、戰鬥的記載中見到的各種兵，關於誰是做什麼的，也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對於正的制度也無法進行清晰的說明。

此外，由於董仲舒上書中同時提到正和更卒，因此以往多將他們聯繫起來進行解釋。但也有很多種說法，如正和更卒的徵發對象不同<sup>⑩</sup>；徵發對象相同，成為更卒者也要負擔正，更卒

① 山田勝芳認為，女子也要作更卒（見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鳩杖與徭役制度》（《簡帛研究二〇〇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② 見濱口重國《踐更和過更——如淳說批判》，其著《秦漢隋唐史研究》上，第二部第一。

③ 《漢舊儀》下卷：“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而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掌兵馬。丞一人，治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民應令選爲亭長。”（孫星衍輯、周天游校注：《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

④ 孫言誠認為正卒也包含徭役。（見孫言誠《秦漢的徭役和兵役》，《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3期）。渡辺信一郎認為，正卒從事兵役和吏役（見渡辺信一郎《漢代國家社會勞動編制》，《殷周秦漢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2001）。

⑤ 也存在其他說法，如正是正卒的省略，或者具有別的意義。

⑥ 山田勝芳、渡辺信一郎持第一種意見（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渡辺信一郎《漢代國家社會勞動編制》（《殷周秦漢代史的基本問題》）。濱口重國、重近啓樹持後一種意見（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研究》上，第二部第三“關於秦漢時期徭役勞動一問題”；重近啓樹《秦漢稅役體系研究》，“圍繞兵制諸問題”，汲古書院，1999）。西田太一郎認為，正是兵役義務者，正卒是其中實際徵發爲兵者（西田太一郎《漢的正卒》，《東洋文化與社會》1，1950）。山田勝芳也認為正是兵役負擔者（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藤田勝久認為，正卒是對傳籍後的男子課徵的一般義務，與此相對，正是專門的兵士（藤田勝久《西漢徭役勞動及其運行形態》，《中國史研究》8，1984，收入其著《中國古代國家和郡縣社會》，汲古書院，2005）。

⑦ 參見重近啓樹《秦漢稅役體系研究》（“圍繞兵制諸問題”）。藤田勝久認為，正卒從事內郡各地軍隊所屬的勞動，勞動的地域不限於其中的一個郡縣而遍及內郡各地（藤田勝久《西漢徭役勞動及其運行形態》，《中國史研究》8，1984）。

⑧ 山田勝芳認為，當一年的衛士，或者一年的邊境戍卒（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

⑨ 參見大庭脩《材官考——漢代兵制之一斑》（《龍谷史壇》36，1952）。西田太一郎認為，任郡國兵的同時，也擔任邊境戍卒或者長安衛士之一（西田太一郎《漢的正卒》，《東洋文化與社會》1，1950）。渡辺信一郎也持此看法（渡辺信一郎《漢代國家社會勞動編制》，《殷周秦漢代史的基本問題》）。

⑩ 參見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研究》上，第二部第三“關於秦漢時期徭役勞動一問題”；重近啓樹《秦漢稅役體系研究》。

義務開始在前；<sup>①</sup>兩者的負擔者不同，更卒義務結束後才擔任正。<sup>②</sup>而且，如何說明“傳籍”一詞意味著達到年齡者到底承擔怎樣的義務，對於更、正（正卒）的解釋也有影響。

由於與徭役兵役有關的幾個詞彙相互關聯，就要求對每個詞彙進行解釋說明時不能相互矛盾，但由於現存史料均是斷片式的，就每個資料可做多種解釋，因此，如上所述，目前存在各種極不同的說法。特別是關於正（正卒），這一傾向尤其明顯，對主要的兩條史料提出了所有可能的讀法，但卻無法證明各自的解釋是唯一正確的，哪一種說法是唯一可能的。

另一方面，新出土文字資料的出現也產生了漸漸縮小解釋範圍的效果。特別是近年《二年律令》的出土等，使我們得以見到當時的若干律令，關於傳籍的意義一定程度上變得清晰了。但是，有關“正”的史料依然沒有增加，而關於更卒，由於史料的增加反而出現了新的問題。在近年新出現的出土文字資料中，除了百姓定期到縣服勞役外，還不時可以見到關於踐更的記載。例如文末所附“踐更·更卒資料”中《二年律令》簡484—485和簡486史、卜、祝的踐更。由此可知，更、踐更不僅是指對百姓征課的地方性定期徭役的更卒制，還是在各種場合使用的一般性詞語，即使是與以往認為的更卒制度有關的史料，也產生了這樣看是否正確的疑問。

區別更卒和其他負擔的一個線索是，負責決定徵發工作的是什麼官，以及確定、選拔被徵發者的手續主要是由哪一級官府負責的。<sup>③</sup>首先看是否有必要將幾種徭役、兵役的資料，根據擔任徵發者的是哪個官進行分類。然後，搞清楚存在幾種邑、縣等不同的官負責的徭役義務，從中區別出它是否是更卒的義務，以及即使不是更卒，也可以對百姓日常負擔的徭役兵役義務進行考察。本文就是基於這一視角，對更卒進行考察。

## 一 更的各種類型

除了部分例外之外，壯年男子在所屬地方行政單位要定期作更卒。集中反映更卒的材料是文末所附資料B文獻律、律說中所見漢律及如淳、服虔說。濱口重國考察了這些資料中的矛盾點，以服虔說為基礎，指出更卒實際去服勞役為踐更，出錢免除當番的義務為過更。<sup>④</sup>目前這一說法已為定說。關於踐更的“更”到底是什麼意思，渡辺信一郎進行了詳細的討論。<sup>⑤</sup>

渡辺認為，更有更代、交替的意思，<sup>⑥</sup>但也指應當服勞役的期間，進而指一定期間的勞役

① 參見西田太一郎《漢的正卒》（《東洋文化與社會》1，1950），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渡辺信一郎《漢代國家社會勞動編制》（《殷周秦漢代史的基本問題》）。

② 錢劍夫著：《試論秦漢的正卒徭役》，《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③ 重近啓樹已論及更卒的徵發權從縣轉移到郡（重近啓樹《徭役諸形態》，《東洋史研究》49—3，1990）。

④ 見濱口重國《踐更和過更——如淳說批判》，其著《秦漢隋唐史研究》上，第二部第一。

⑤ 渡辺信一郎著：《漢代更卒制度再探討——服虔、濱口說批判》，《東洋史研究》51—1，1992。

⑥ 《漢書·晁錯傳》：“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義務。這一點從《漢書·蓋寬饒傳》和《魏相傳》的對比就可明瞭：

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漢書·蓋寬饒傳》）

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漢書·魏相傳》）

渡辺從《蓋寬饒傳》的“復留共更一年”在《魏相傳》中作“復留作一年”，論證指出《蓋寬饒傳》的“更”和《魏相傳》的“作”都同樣具有服勞役的意思（進而認為“居”也是同義），而“更”在具有“カワル”（更替）意思的同時，本身就包含了“カワル”（更替）勞役的意思，指一定期間的勞役義務。<sup>①</sup>

如渡辺所說，“更”在徭役材料中作名詞使用時，已脫離了動詞“更替”本來的含義，指勞役義務期間，或者更替提供的勞役。秦律中可以見到渡辺所說的明確指勞役義務期間的例子：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為灸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sup>②</sup>）

此律規定，三個月檢查一次官府飼養的田牛的生育情況，在正月進行綜合評價，若評為“最”，賜予田嗇夫壺酒和束脯，除去飼養者“一更”。“一更”指一更期的勞役，“除一更”意味著作為獎勵免除一更期的勞役。如果“更”不是表示從事這一徭役的一定期間，就不可能用免除“表示量的數字+更”的表現形式，很明顯“更”代表的是一定期間的勞役。此外，“更”有時也指官吏的職務期間，如：

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拜為沛郡太守。（顏師古注引如淳說：“邊吏三歲一更。”《漢書·段會宗傳》。）

這裏的“更”雖然也讀作“カワル”，但却不是“更替”的意思。祇能解釋為一定的職務期間，<sup>③</sup>

① 渡辺信一郎著：《漢代更卒制度再探討——服虔、濱口說批判》，《東洋史研究》51—1，1992。

② 1975年出土於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十一號墓。松崎つね子認為，除《編年記》外，其他文書的年代下限是統一秦以前（松崎つね子：《中國古典新書〈睡虎地秦簡〉》，第一章第五節，明德出版社，2000）。王輝推測，秦昭王二十八年雲夢縣納入秦統治，至秦律普及需要一定時間，應將簡書的上限定為昭王晚年（見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新文豐，1999）。吉本道雅認為，以《秦律十八種》為首的秦律的抄寫時間，是始皇元年到四年十一月之間，在始皇七年以前已不具實際意義（見吉本道雅《睡虎地秦簡年代考——兼及日本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現狀》，北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第二次人文學術研討會資料，《北京與京都——架設中日的知識橋梁》，2007年12月15日）。松崎、吉本認為，《睡虎地秦簡》中的秦律，基本上都是統一前使用的法令。此外，吉本道雅還對這些律文在統一後是否具有實效性提出了質疑（見吉本道雅《睡虎地秦簡年代考》）。

③ 根據徭役的種類、從事的職掌，一更的時間有可能不同，不一定指同樣的期限。如前引《蓋寬饒傳》的例子，兵役多一年為一更。

令戍卒歲更。（《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漢書·晁錯傳》）

此外，稍後列舉的《段會宗傳》中，邊境官吏的更是三年。

“更盡”應解釋為“更”的結束、終了。

此外,數字和“更”連起來使用的例子,還有文末所附“踐更、更卒資料”中的《二年律令》簡 477—478、479、482—483、484—485、486。廣瀨薰雄對此有不同的解釋。廣瀨考察了整理小組歸為《史律》(廣瀨認為不應當歸為《史律》,而應歸為《尉律》)系列簡中所見六更、八更、十二更,認為按照整理小組的說法,“數字+更”是指踐更的次數,年齡越高踐更的次數越多,這與重視養老的漢代社會的情況不合,從而提出更數的增加應是給予特權。進而論證“數字+更”是幾個月輪一次踐更當番,如六更是指每六個月當番一次,時間為一個月。並說明了這樣理解的理由,即“更”本來是“更代”的意思,五更是指五人輪替,十二更是十二人輪替。<sup>①</sup>此外,廣瀨薰雄還通過對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紀南鎮松柏村漢墓出土木牘所記南郡所屬各縣(以及侯國)卒數<sup>②</sup>中所見“數字+更”的例子,進一步補充加強了己說。<sup>③</sup>陳偉以廣瀨的“數字+更”是多少人更代的說法為基礎,提出松柏出土南郡卒簿的例子是前引如淳說所引律說中的“卒更”,從多數縣實行“三更”來看,踐更一個月、一年中踐更四次是當時的基本制度。<sup>④</sup>張金光則認為,“更”是更次,將全縣的卒分為三部分,編為三個隊列,進而從國家徭役制度存在統一性和定量性這一角度,對當時存在一郡中實行多種踐更次數制度的觀點進行了批駁。<sup>⑤</sup>松柏漢墓出土簡牘所見南郡更卒制度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sup>⑥</sup>如何解釋這一材料是今後的課題。

此外,在稱謂的前頭冠以“更”稱作“更某”,指更替從事勞動的人員,也是與勞役有關的

① 廣瀨薰雄著:《張家山漢簡所謂〈史律〉中有關踐更之規定的探討》,《人文論叢》2004 年卷,2005。

② 參見彭浩《讀松柏出土四枚西漢木牘》(《簡帛》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③ 廣瀨薰雄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研究》,《秦漢律令研究》,汲古書院,2010。

④ 陳偉著:《簡牘資料所見西漢前期的“卒更”》,《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⑤ 張金光著:《說秦漢徭役制度中的“更”——漢牘〈南郡卒編更簿〉小記》,《魯東大學學報》2011 年第 2 期。

⑥ 陳偉將此簡中的卒看成是和文末所附史料 B 文獻律、律說以及 C 文獻資料中提到的地區一樣,是原則上所有男子都要負擔的更卒、踐更的例子(陳偉《簡牘資料所見西漢前期的“卒更”》,《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縣的更卒人數非常少。例如,醴陽縣祇有 87 人,與同出松柏漢墓的江陵縣《二年西鄉戶口簿》中的大男人數 991 人相比,非常少。西鄉戶口簿的大男,即使包括未傳籍的年輕人、不負擔徭役的老年者以及殘障者和官吏等有職務者,作為一縣中更卒負擔對象的人數,87 人是否太少了?它可能不是縣踐更者名簿,而是南郡的卒由各縣分擔出任的名簿,很難用這個資料來說明縣一級的踐更制度。此外,將“三更”解釋為每次踐更一個月,每年輪換三次,共踐更四次,“五更”、“六更”等也相應解釋為每年踐更的次數不同,就會如張金光所說,因縣不同而造成每個人的負擔不均等。

此外,廣瀨薰雄將《漢書·昭帝紀》如淳引律說的“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解釋為,每五個月輪一次“更”(廣瀨薰雄《張家山漢簡所謂〈史律〉中有關踐更之規定的探討》,《人文論叢》2004 年卷)。這樣解釋的話,“更”字本身就是“踐更”的意思即實際就役,其根據是此文出現的其他“更”字全部都為“踐更”的意思。但是,律說中所見“更”字,是否都可以解釋為踐更呢?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中,更共出現四次,“五月乃更也”之外,均為名詞,沒有必要將名詞的更和動詞的更解釋為同義。律說中名詞的“更”,正如本文介紹的渡辺說,既可以指更代提供勞役,也可以表示勞役義務期間。動詞的更(五月乃更),既可以解釋為“更代”的意思,也可以讀作更替在縣中踐更五個月。



特殊的“更”的用法。“更卒”就是這類結構的熟語，更卒之外還有秦律中的“更隸臣妾”：

冗隸妾二人當工一人，更隸妾四人當工一人，小隸臣妾可使者五人當工一人。（略）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工人程》簡109）

更隸妾節（即）有急事，總冗，以律廩食。不急勿總。 倉（《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簡54）

從上述例子可知，隸臣妾是作為刑罰被強制勞役的官奴婢，是以“踐更”即更替履行職務的形式提供勞役。楊振紅認為秦漢簡牘中的“更”和“冗”常常作為一組概念使用，從詞義上來看，《二年律令·史律》中的“更”指更役，更是輪番、交替的意思，與此相對，“冗”是不更換、長期在官府供役的意思。從漢到唐的時期，官府勞動分長時期供役和輪番更代兩種類型，“更”為後者。<sup>①</sup> 這樣，“更”所反映的以更替形式提供的職務，就不止徭役、兵役，官奴婢的勞役也同樣適用這一服役形態。

因此，當時的徭役可分為像更卒這樣由不特定的勞動徵發的，和由特定的職務徵發的兩種。《二年律令·戶律》簡308“募百姓欲守縣邑門者，令以時開閉門，及止畜產放出者。令百姓共（供）食之，月二石”，<sup>②</sup>是對看守縣邑門者的給食規定，門衛是從百姓中徵募充當的。此外，據《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和《史記·酈食其列傳》，秦代的里監門（里的門衛），是出於生計的需要由希望者自己要求擔任的。《張耳陳餘列傳》裴駰《集解》引張晏說，監門是里的“正衛”，但本文第三部分所引《禮記·王制》孔穎達疏引鄭玄《駁五經異議》說，“正衛”是給事公家的徭役。里監門也是一種徭役。里門和縣邑門的門衛，被認為是擔任官的最底層的一種徭役，但門衛這類特定職務的徵發不是依靠定期的輪番制的更卒，而是單獨進行徵發的徭役。此外亭中也有一些卒維持基層治安，他們也不是官吏，而是從百姓中徵發的。<sup>③</sup> 渡辺信一郎因他們從事的是官府的特定職務，因此將他們作為從百姓中徵發的官府最下層的吏來考察。他們總稱為卒，相當《周禮》的胥、徒，他們的勞務包括在長官出行時擔任導從、隨從、官府的警衛，與從事道路、治水工程等單純勞動的一般徭役者的更卒力役有本質不同，相當唐代的色役和番官。其中被稱作“賤更之小吏”者（參見文末所附資料C《續漢書·輿服

① 楊振紅著：《秦漢簡中的冗、更與供役方式——從〈二年律令·史律〉談起》，《簡帛研究二〇〇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② 富谷至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報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研究·譯注篇》，朋友書店，2006。

③ 根據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木牘一正的東海郡《集簿》，每亭平均有4個卒。據《史記·高祖本紀》可知，亭在秦末就已經存在。《史記·田叔列傳》褚少孫所補《任安傳》中，任安替人做求盜、亭父（兩者均是亭卒的名稱），由此可知，他們不是更卒，而是有固定職掌的卒。



志》),由輪番踐更者擔任。<sup>①</sup>

渡辺列舉的勞役者,主要是《續漢書·輿服志》記載的西漢末到東漢的例子,但其中《後漢書·虞詡傳》中見到的走卒<sup>②</sup>,可以確定在秦末漢初就存在了。《里耶秦簡》中有“走顎行尉”(J1①66 背),這個“走”應當就是走卒,走(卒)在秦末已經存在。

如上,漢代很可能存在爲了從事某種特定職務而進行徵發的情況,那麼其中很可能也存在以“更”即輪番形式而定期使役者,即以“更”從事特定職務的徭役負擔。

□□□□令不更以下更宿門。(《二年律令·戶律》簡 309)

此文是關於不更以下爵位者,以“更”即輪番的形式輪番警衛門的規定,但守衛的是哪個門不清楚。

此外,向官府提供專門技能的工人,也以“更”即輪番的形式從事工作。

十二年,上郡守壽造,漆垣工師乘(?)工更長剩。<sup>③</sup>

這是 1974 年出土的銅戈上的銘文,“十二年”被認爲是秦昭襄王十二年(前 295)。黃盛璋認爲工更長剩是縣所屬工人,是以更卒之役徵發的,但據《二年律令》,工人是由具有專門技能的人給事官府,技能優秀者可免除其他徭役。<sup>④</sup> 下文關於樂人講以外樂<sup>⑤</sup>“踐更”的記載,可能和工人一樣因有專門技能而從事特定役務的例子:

四月丙辰,黔城旦講乞鞠,曰:故樂人,(中略)講曰:踐更咸陽,以十一月行,不與毛盜牛。(略)今講曰:踐十一月更外樂,月不盡一日下總咸陽,不見毛。(《張家山漢墓竹

① 渡辺信一郎著:《漢魯陽正衛彈碑小考——圍繞正衛、更賤》,永田英正編:《中國出土文字資料的基礎性研究》,平成四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 A 研究成果報告書,1993。

② 《後漢書·虞詡傳》:“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李賢注:“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從更賦之外另收走卒錢可知,走卒不是更卒之職。

③ 參見黃盛璋《新出秦兵器銘刻新探》(《文博》1988 年第 6 期)。

④ 《二年律令·復律》簡 278—280:“□□工事縣官者復其戶而各其工數。大數衛(率)取上手什(十)三人爲復,丁女子各二人,它各一人,勿算(算)繇(徭)賦。家毋當繇(徭)者,得復縣中它人。縣復而毋復者,得復官在所縣人。新學盈一歲,乃爲復,各如其手次。盈二歲而巧不成者,勿爲復。”

⑤ 外樂見於《二年律令·秩律》簡 449。簡 449 中,在公車司馬、大倉、治粟大倉、中廡、未央廡等八百石官名後面,在池陽(池陽的陽以下爲簡 450)、長陵、濮陽等八百石縣令的縣名前面,對於其屬於八百石官一組還是縣名一組,意見有分歧。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解釋爲奉常的屬官,主管樂人(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奏讞書》)。森谷一樹也認爲是官名(見森谷一樹《張家山漢簡·秩律初探》,《洛北史學》6,2004)。黃人二認爲是縣名(見黃人二《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 17 試釋》,收入《出土文獻論文集》,2005)。但是,《奏讞書》中的這一案件明確說,樂人講是在咸陽踐更,或者爲了踐更前往咸陽,未說外樂是在縣踐更。筆者從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和森谷說,認爲是官名。

簡·奏讞書》，見文末所附史料 A 出土文字資料)。<sup>①</sup>

樂人講在十一月的一個月間，在首都咸陽外樂的官署，作為樂人就役務。他離開自己所屬縣去咸陽踐更。其集合地點也是咸陽，和在自己縣集合後派往其他地方不同。這裏的“更”，應當不是“律說”所謂“居更縣中”的“更”。因此，即使是“更”的徭役，也有不擔任更卒類的一般工作，而被固定為某種特定職務的情況。而且，這種輪番定期從事特定職務的情況也被稱作“踐更”。

也就是說，從現存史料看，將就役稱作“踐更”的徵發，存在Ⅰ兵役、Ⅱ從事特定之職的徭役、Ⅲ更卒三種類型。“踐更”並不僅僅用於表示壯年男子全體人員義務的縣中更卒，也指從事者輪番從事多種勞動，在一定期間就任當番。特別是，各種兵役、力役很多都採取輪番、定期地在一定期間內就役的“踐更”形式，更卒祇不過是其中的一種。不能說凡是有“更”、“踐更”等詞語的徵發事例，都是更卒的例子。如果關於徵發的“踐更”是以多種形式存在的，那麼，有關“踐更”的例子中哪些是專門指更卒的？如何加以區別呢？而且，以往一直把力役負擔者稱作更卒，<sup>②</sup>認為社會資源的整合動員是以更卒為主的，<sup>③</sup>但是，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難道祇有更卒嗎？關於這兩點，將在下節考察。

## 二 負責徵發的官

為了解決上述疑問，該如何將更卒與其他徭役加以區別呢？是否可以從決定徵發或者負責這一事務的官府的不同，來區別其異同呢？擁有徵發決定權者，以及負責確定、選拔被徵發者手續者，因徵發類型的不同而不同。通過著眼於這些差異，將關於徭役的斷片式記載加以區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即使在因徭役過重而激起民衆反抗的秦代，為了不妨害百姓的生產活動，政府方面也建立了預防負擔過重的措施，對恣意徵發的官吏進行處罰。例如，文末所附“踐更、更卒資料” A 列舉的《里耶秦簡》中即可見到令規定，輸送物資時必須首先讓刑徒和為了償還債務而服勞役的人承擔此任務，除緊急情況之外不能徵發百姓。而且，為了防止不緊急不必要的徵發，以及為了私事的徵發和徵發人數過多，進行徵發時必須向上級機關進行報告。文末所附“踐更、更卒資料” A 出土文字資料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徭律》簡 115—124 的 5 規定，

① 李學勤認為亭的慶向雍廷告發事件的“元年”是秦王政元年（見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 年第 3 期）。

② 參見濱口重國《踐更和過更——如淳說批判》，其著《秦漢隋唐史研究》上，第二部第一。

③ 例如，高敏即將睡虎地秦簡《徭律》中的土木工程等全部視為更卒的負擔。（見高敏《秦漢的徭役制度》，《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禁止縣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拆毀改建公舍、官府、廷，如果必須進行改建，需要向上級機關申請同意；<sup>6</sup> 規定，無論是一般經常性工程或者申請的工程，主管官吏（司空、匠）都要估算工程的天數和需要的人員數，如果出現超過兩天以上的勞動力或者不足的情況，就要受到“不察”譴責，估算與實際情況有差異時要按律進行懲罰。漢代似乎也有同樣的規定，《二年律令》簡410載，縣道官隨意毀掉官府寺舍進行改建，要課以罰金刑。<sup>①</sup> 若確如上述，對徵發有嚴格的限制，破壞法律時有罰則規定的話，那麼，由誰決定徵發，由誰決定動員什麼樣的人，責任人顯然是明確的。也就是說，在戰國末的秦國顯然對於作為責任人的主管者是很明確的，而從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徭律》來看，縣及其上級機關作為徵發主體，決定徵發的官署可能有若干個。

重近啓樹已從徵發主體角度對各種徭役進行了區別。重近首先對睡虎地秦簡《徭律》進行分析，將其分為中央徭役和更徭，從徵發權以及與此相關的就役地點的角度進行了比較研究，指出臨時性的中央徭役是由中央政府管轄、徵發的，就役地點已超出縣的範圍。另一方面，更徭是由縣管轄、徵發的，主要是在縣內從事定期性的勞役。<sup>②</sup>

筆者認為，如後文所述，睡虎地秦簡《徭律》中，除了中央、縣兩個級別外，還有邑的徭役，應當將其與縣為主體徵發的徭役加以區別，但重近啓樹從徵發權角度對徭役種類進行區分是有效的方法。此外，雖然重近沒有論及，但是除了決定徵發的主體的官之外，也有必要確定具體負責派誰來服役務的官。正如重近啓樹所指出的那樣，主要的徵發單位是保管戶籍的縣。但縣中負責徵發的官并非祇有一個。

在以往研究中，有的學者根據文末所附“踐更、更卒資料”C《郭解傳》的例子，認為縣內負責更卒徵發事務的是尉的屬官尉史。<sup>③</sup> 但通常徵發時，某日前往某集合地點的命令是預先通知本人的：

可（何）謂逋事及乏繇（徭）。律所謂者，當繇（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會，為逋事。（略）（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164）

十一<sup>④</sup>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沅、丞嘉敢瀦（讞）之。六月戊子發弩九詣男子無憂，

① 《二年律令》簡410：“縣道官敢擅壞更官府寺舍者，罰金四兩，以其費負之。”此外，Hulsewé 根據《晉書·刑法志》中有“科有擅作修舍事”的記載，認為漢代也應有和睡虎地秦簡類似的規定（A. F. P. Hulsewé *Remnants of Chi'n Law*, Leiden: E. J. Brill, 1985, P. 65）。而且，以“擅興繇賦”坐削爵的例子在《漢書·王子侯表》中可以見到（祚陽侯仁），雖然詳細情況不清楚，但恣意徵發顯然應受處罰。

② 重近啓樹著：《徭役諸形態》，《東洋史研究》49—3，1990。

③ 山田勝芳認為，西漢時期尉史主管踐更和軍役，以及實際徵發事務（見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渡辺信一郎也認為更卒屬於尉史負責的業務，首先是在縣一級編制的（見渡辺信一郎《漢代更卒制度的再探討——服虔、濱口說批判》，《東洋史研究》51—1，1992）。

④ 十一年為漢高祖十一年（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

告爲都尉屯，已受致書，行未到，去亡。(略)(《奏讞書》簡117)

正如《郭解傳》所反映，尉史不負責直接向本人發出通知的工作，而是負責抽選應當徵發的更卒，製作成冊，並安排將命令傳達給他本人。<sup>①</sup> 尉史是縣尉的下屬，主要是負責文書的官吏。<sup>②</sup> 由於直接負責製作被徵發者名冊工作的是尉史，所以郭解請託的就是尉史，但是被徵發者的選定是否妥當這一責任則應當由其上級尉來承擔。<sup>③</sup>

但是，縣中擔任選定徭役負擔者工作的還有其他官吏。例如，大庭脩指出，從《東觀漢記·周黨傳》的記載

初，鄉佐發黨徭道，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太平御覽》四九六《人事部·鬥爭》引《東觀漢記·周黨傳》)

來看，鄉佐是直接負責徵發的。<sup>④</sup> 鄉是縣的下級行政單位。而且，從下列記載看，作為鄉官進行公正的徵發，比起鄉佐來，毋寧說是鄉行政負責人鄉嗇夫的義務：

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續漢書·百官志五》)

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後漢書·第五倫傳》)

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引《風俗通》)

從上述三個例子來看，被期望公平決定徭役徵發先後的是有秩、嗇夫等鄉的長官。和之前談到的尉、尉史一樣，嗇夫和佐可能是負責人與實際實施者的關係。邢義田認為，鄉是掌管戶籍和人口的單位，通過八月案比確定應當排除在徭役之外的人。<sup>⑤</sup> 鄉是漢初最基層的行政組織，負責戶籍的製作及保存，<sup>⑥</sup> 由其根據鄉里的實際情況負責選拔被徵發者是最合適的。那麼，什麼樣的徭役是由鄉負責選擇徵發人員呢？在前引《東觀漢記》的例子中，可見到鄉徵

① 在前引《奏讞書》中，可見到接受(授予?)致書之事。也有可能是傳達命令文書。

② 根據李均明的研究，邊境所置甲渠候官塞尉的屬官有尉史，主要主管文書。縣尉史也和它一樣是負責文書的官吏(見李均明《甲渠候官規模考》，《文史》第34輯，1992)。根據富谷至的研究，除了處理文書之外，還可見到塞尉尉史夜間值勤的例子(見富谷至《漢代穀倉制度——從額濟納河流域的食糧配給談起》，《東方學報》京都68，1996)。

③ 此外，雖不是有關更卒的規定，睡虎地秦簡中還可見到徵發戍卒時，若不遵從法律，對縣嗇夫、尉和士吏進行懲罰的規定：“·戍律曰：同居毋并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簡39)

④ 大庭脩認為，這一事件發生在西漢末、王莽以前(見大庭脩《漢代的嗇夫》，《東洋史研究》14—1、2，1955，收入其著《秦漢法制史研究》，創文社，1982)。

⑤ 邢義田著：《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2，1989。

⑥ 《二年律令·戶律》簡328—330：“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實不徙數盈十日，皆罰金四兩，數在所正、典弗告，與同罪。鄉部嗇夫、吏主及案戶者弗得，罰金各一兩。”

發人修整道路,鄉似乎是徵發的主体,而與縣為徵發主体的更卒徭役明顯不同。而且根據漢初的律令,鄉負責維護邑中道<sup>①</sup>,道路若不修整,嗇夫要受處罰,由此來看,鄉嗇夫本身被賦予了興起補修工程的權力。前引《周黨傳》中所謂“徭道”,就應當是鄉作為主体管理邑中道路工程時,由鄉的官吏來調查自己管理的戶籍進行徵發的事例。

鄉嗇夫主管的是前引《二年律令》中的“邑中之道”,邑是其管轄的範圍。關於邑的徭役範圍的記述,秦律中已經出現:

興徒以為邑中之紅(功)者,令結(埵)堵卒歲。未卒堵壞,司空將紅(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復垣之,勿計為繇(徭)。(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115—124,文末所附資料A)

此律是關於徵發修建邑的圍牆工程,對居民而言是最貼近的社会資源整合的徵發規定。表示這一就役地域範圍的“邑”,《二年律令》中有一例,在時代稍晚的《後漢書》關於東漢初光武帝的記載中,以及東漢末碑文中也可見到。

睨老各半其爵繇(徭),□入獨給邑中事。(略)(《二年律令·徭律》簡407)

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繇役。(《後漢書·王良傳》)

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隸釋》卷一《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sup>②</sup>

也就是說,從睡虎地秦律時代開始直到西漢、東漢,都存在就役範圍為“邑中”的徭役。關於睡虎地秦簡中的“邑”有各種說法。其一,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解釋為“城邑”<sup>③</sup>、Hulsewé解釋為聚落(settlement)等<sup>④</sup>,即將其解釋為集中居住形成的聚落。另一種說法,將“邑”看做是與縣相同的行政單位<sup>⑤</sup>。漢代確實存在像公主擁有的湯沐邑那樣的相當縣的行政單位。但是,關於《漢書·高帝紀》所載“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顏師古認為“邑”隸屬於縣。<sup>⑥</sup>邢義田還舉了其他例子,認為直到晁錯時“邑”都是相當於鄉的單位。<sup>⑦</sup>因此,應當認為睡虎

① 《二年律令》簡247—248:“鄉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道有陷敗不可行者,罰其嗇夫、吏主者黃金各二兩。(略)”

② 從碑文中的“永壽二年”年號,可知是東漢末桓帝時期的記載。

③ 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④ A. F. P. Hulsewé *Remnants of Ch'in Law*.

⑤ 重近啓樹認為,“邑中之功”是指縣內徭役的意思(見重近啓樹《徭役諸形態》,《東洋史研究》49—3,1990)。山田勝芳雖不是針對此條律文,但認為《後漢書·王良傳》中所見“邑中小徭”,和如淳注引律說的“居更縣中”相一致,將“邑中”解釋為“縣中”(見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

⑥ 顏師古注引應劭說:“沛,縣也。豐,其鄉也。”

⑦ 此外,邢義田還指出,在此後的漢制度中,雖然將皇后和公主所食之地稱作邑,但是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依然說“鄉,國離邑”(邢義田著:《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2,1989)。

地秦律和漢初《二年律令》中所見“邑”，應不是和縣同級，而是像鄉一樣為縣的下屬單位。這也可以從下述推論得到證明，前引《二年律令》簡 247—248 規定，鄉負責邑中道，假如邑就是縣，就不得不解釋為鄉要負責比自己單位更大的縣道，這解釋不通。再者，從前引睡虎地秦簡《徭律》“邑中”和“縣”同時出現在同一條文中，也可知邑和縣屬於不同的範疇。<sup>①</sup>

此外，由官控制、管理的居住區域意義上使用的“邑”的例子，散見於文獻以及出土文字資料：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百姓或弃邑居野（野），入人孤寡，徼人婦女，非邦之故也。（略）魏戶律（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165—215）

這是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 252）的《戶律》<sup>②</sup>，“野”與“邑”相對，禁止脫離“邑”到“野”中居住，可以窺見邑是官府認可的居住地區。前引《二年律令》簡 247—248 規定了耕作地域的“道”和“邑”之道的管理者。據此可確定，“邑”是指與“田”（耕作地域）相對的百姓居住區域，而不一定僅指“湯沐邑”那樣特殊的行政單位。于振波也指出，從《二年律令》的記載來看，當時存在“鄉部”和“田部”兩個系統，前者負責“邑中”即居民區，後者負責耕作區。<sup>③</sup>

漢代聚落的最小單位是“里”。根據宮崎市定、何雙全、堀敏一的研究，可知里的形態是用圍牆圍起來，與外界隔開，設有出入的門。<sup>④</sup>《周禮正義·地官·里宰》所附鄭玄注說，邑如里一樣（邑猶里也），無論是里還是邑都是人居住的聚落，兩者沒有區別。但是邑有時也指將“里”包含在其中，相對較大的聚落形態。例如，據《說苑》，在里門之外有邑門，顯然邑是比里大的區域。

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說苑·脩文》）

這類邑有門：

處曰：守汧邑南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簡 101）

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并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略）。於是更相追捕，賊并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十六年）

① 參見文末所附資料 A《睡虎地秦簡·徭律》。

② 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

③ 于振波著：《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初探》，文津出版，2004。

④ 參見宮崎市定《漢代的里制和唐代的坊制》（《東洋史研究》21—3，收入《宮崎市定全集》七，岩波書店，1962），何雙全《漢簡、鄉里志及其研究》（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堀敏一《中国古代的里》（《唐代史研究報告 VI·中国都市の歴史研究》，收入其著《中国古代的家和聚落》，汲古書院，1996）。



在規定的時間開閉。這裏再次引用第一部分已舉過的例子：

募百姓欲守縣、邑門者，令以時開閉門，及止畜產放出者，令百姓共（供）食之，月二石。（《二年律令》簡 308）

邑用圍牆與外界隔開。

今有邑方二百步，各中開門。出東門十五步有木。問出南門幾何步而見木。（《九章算術》卷九《句股》）

《九章算術》的例子中，四邊的中央均有門，推測應是正方形的邑，那麼其前提必須是邑的周圍是被牆圍起來的，否則不可能問從南門走多少步可以見到距東門十五步的樹。從上述資料可知，“邑”有時指這樣一種形態的聚落，即包含了幾個里在內，和里一樣用圍牆與外界隔開，通過門管理人與物的出入。據池田雄一研究，漢代存在數十戶規模的小聚落，而且，從漢武帝到王莽時期出現了與城邑相對的沒有城郭的散村（鄉里）。並非所有的聚落都是由幾個里構成的，也有祇有一個里的小規模聚落，但是在漢初，聚落無論規模大小，以及是否有堅固的城牆，基本上都是與外面區域明確區別開的“邑”。<sup>①</sup>

也就是說，“邑中”是居住區域內、聚落內的意思，而不是縣內的意思。因此“邑中”的徭役是為了維持聚落所進行的必要工作，如前引《二年律令·田律》中對必要社會基礎設施的道路進行整修，以及睡虎地秦簡《徭律》中修建邑的圍牆工程等，是與居民生活關係最密切的設施。因此成為邑中徭役徵發主體，以及負責公平選擇被徵發者工作的應當是鄉。

如上所述，鄉為了維持生活基礎而進行徭役徵發，不僅如此，當縣一級進行徵發時，鄉有時也接受縣的命令參與選拔被徵發者。在前引《里耶秦簡》中，洞庭郡守禮向縣嗇夫卒史嘉、假卒史穀、屬尉下達的命令文書稱，運輸武器時盡量不要徵發一般百姓，而主要由“縣卒徒隸居貲贖責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等刑徒和債務勞動者、兵卒等充任，如果破壞這一盡量少徵發百姓的命令時需向縣劾報。文書背面記載的送達地址中有鄉。這應當是因為鄉是負責選定被徵發者工作的最基層單位吧。

此外，《九章算術》中還可見到反映由鄉負責選定、派遣從事上級機關徭役者工作的記載：

今有北鄉算八千七百五十八，西鄉算七千二百三十六，南鄉算八千三百五十六，凡三鄉，發徭三百七十八人。（《九章算術·衰分》）

三個鄉合計徵發 378 人，顯然這不是針對鄉主管的徭役勞動所進行的徵發，而是接受上級機

<sup>①</sup> 池田雄一著：《漢代的里和自然村》，《東方學》38，1969，收入其著《中国古代的聚落和地方行政》，汲古書院，2002。



關委託進行的徵發。

如上所述，鄉負有公平選定被徵發者的職責，實現這一職責有兩次機會，一是鄉本身進行基層社會資源整合之機，一是縣下達派出徭役者命令之機，很顯然這兩種類型的徵發都與負責實際徵發工作和責任人爲尉史、尉所徵發的更卒不同。因此，反過來，若談到尉負責的除更卒之外的徵發，應當基本上是所有的兵役徵發事務。

戍律曰：同居毋并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簡39）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涿丞嘉敢獻（獻）之。六月戊子發弩九詣男子毋憂告，爲都尉屯，已受致書，行未到，去亡。·毋憂曰：變（蠻）夷大男子，歲出五十六錢以當繇賦，不當爲屯，尉烹遣毋憂爲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略）（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簡117）

據睡虎地秦簡所見秦律，負責按律徵發兵士的，除了縣長官之外還有尉和士吏。從《奏讞書》的例子來看，接受郡都尉的命令，負責徵發郡兵士人選的是道尉。也就是說，決定徵發兵役者的是郡下屬的縣一級人員，基本上由縣、道的尉負責。這樣更卒本來是兵役的可能性就浮現上來。

如果立足於兵役和徭役尚未分化的觀點<sup>①</sup>，更卒本來是兵役的推測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實際上也存在將兵役稱作“繇役”的記載：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漢書·衛青霍去病傳》武帝詔；《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作“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但是，與這一前提相悖的是，也有反映兩者是明顯不同種類徵發的例子。例如，《二年律令》中，對於到達集合地點和就役地點後，隨意離開崗位或者逃亡的罪行，<sup>②</sup>兵役與徭役的罰則是不同的。

當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盜去署及亡盈一日到七日，贖耐。過七日，耐爲隸臣，過三月，完爲城旦。（《二年律令》簡398）

① 濱口重國《踐更和過更——如淳說批判》指出，按加藤繁說，更卒的名称是兵役和力役尚未分離的先秦時代萌芽的，因此本來的更卒是指在一定期間內更替從事國家的兵事以及各種力役，但後來隨著軍備擴張的需要逐漸出現兵役和力役義務分離的傾向，到秦漢時期首先從民丁中選取材力優秀的人入兵籍，而對其餘的民丁課徵力役義務，與這一變化相應，更卒的名称也演化爲僅服力役者（參見其著《秦漢隋唐史研究》上，第二部第一）。但是，出現更卒名称的是漢代以後的資料。

② 據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164“已閱及敦（屯）車食若行到繇（徭）所乃亡，皆爲乏繇（徭）”，“乏徭”是指在集合地點閱視後，或者到達就役地點後逃亡。關於“敦車食”有多種說法，A. F. P. Hulswé 解釋爲集結車、食糧（A. F. P. Hulswé *Remnants of Chi'n Law*），松崎つね子認爲“敦”是如同的意思（松崎つね子：《中國古典新書〈睡虎地秦簡〉》）。

乏繇(徭)及車牛當繇(徭)而乏之,皆貲日廿二錢,有(又)賞(償)乏繇(徭)日,車□  
(《二年律令》簡 401<sup>①</sup>)

此外,《禮記·王制》中也把力役和兵役區別開來: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

如上所述,漢代無論是法制上還是觀念上兵役和徭役都是被區別開的,<sup>②</sup>從《二年律令》簡 398 和 401 的例子可知,對徵發的時間問題,戍和徭役也有不同的法律規定。

而且,預先確定服役時間的踐更方式的徵發,從史料來看是不適合從事建設、土木工程等工作者的徵發方式。之所以如此,從文末所附材料 A 睡虎地秦簡《徭律》可知,秦代已經預先估算徵發人數和天數,如果出現超過二日以上勞動力或不足的情況就會受到“不察”的譴責,估算與實際不同時要按律進行處罰。若按照這一規定,即使踐更的時間是一個月,如果預先估算工程需要的天數少於一個月,豈不是踐更期間未滿就從役務中解放出來了嗎?但現實中是存在一個月以下徵發的,睡虎地秦簡記載有逃避從事二十日建築工程的事例:

亡自出 鄉某爰書,男子甲自詣,辭曰:士五(伍),居某里,以迺二月不識日去亡,毋(無)它坐,今來自出。·問之□名事定,以二月丙子將陽亡,三月中逋築宮廿日,四年三月丁未籍一亡五月十日,毋(無)它坐,莫覆問。(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 96—98 正,參見文末所附資料)

有學者認為官府文書上記錄天數,是爲了將未完成的部份延期到以後完成,<sup>③</sup>從文末所附材料 B《漢書·昭帝紀》顏師古注引如淳說踐更一個月休十一個月的說明來看,它與定期就役的更卒徵發的特質是相悖的。亦即,土木工程等徵發所具有的根據不同情況分別設定徵發時間的特質,與更卒定期的在一定期間從事義務的特質,本來就是不相容的。<sup>④</sup>

①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認為(見《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開頭的字爲“乏”字。此外,“皆貲日”後面的字,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認為是“十”(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以紅外線照片爲基礎改爲“廿”(《二年律令與奏讞書》)。

② 高恒認為,秦律中有《徭律》和《戍律》,徭役和兵役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服役(高恒《秦律中的徭、戍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2期)。胡大貴、馮一下也認為秦律中的徭和戍有嚴格區別(胡大貴、馮一下《試論秦代徭戍制度》,《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山田勝芳、重近啓樹也持同樣看法(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重近啓樹《徭役諸形態》,《東洋史研究》49—3,1990)。

③ 山田勝芳指出,正如睡虎地秦簡《徭律》特意提出是否計入徭役義務天數的問題那樣,雖然規定是卅日但并不一定一次徭役徵發就完成三十日,記錄勞役天數是爲了處理不足的天數等(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研究》,第四章“徭役、兵役”)。但是,邑中的工程亦即以鄉爲主体的工程中,也可見到“勿計爲繇”。這樣,無論哪一級官府製作的簿籍都要記錄徭役天數,與其認為是讓服固定天數的徭役,不如說是爲了避免僅讓少數人負擔進行公平徵發,記錄就役完成的天數,可能是作爲以後選擇徵發者時使用的資料。

④ 參見第一部分所引《漢書·晁錯傳》、《漢書·蓋寬饒傳》、《漢書·魏相傳》。

因此,說到為什麼像文末所附材料 C《漢書·谷永傳》、《鹽鐵論·水旱篇》、《禁耕篇》記載的,宮室建築和道橋的修整以及製鹽或鐵製品鑄造,要徵發本來是兵役的更卒,這可以從文末所附材料 A《里耶秦簡》找到答案,即為運輸兵器徵發時,要“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司寇隱官踐更縣者”,也就是說改用兵士和刑徒們執行這一任務,而將一般百姓的徵發控制在最小限度。亦即,為了減少百姓的負擔,秦代時已經讓軍隊做超出其原有任務之外的工作,漢代進一步在各方面使用更卒,其結果是從事與軍務相分離的工作變成常態化。但關於更期結束後是否結束役務,或者是否延長就役時間,延長的話是否作為“徭”記錄下來,尚不清楚。

而且,如後文所述,戰鬥力的中心由以所有一般男性為對象徵發的兵士,向由以服役來換取赦免死罪的刑徒和被選拔者構成的精銳部隊轉移,也是引發這一變化的一個原因。作為兵力意義減弱的對壯年男子無差別徵發部隊的活用法,本來每次都要徵發人從事工程和輸送任務,進一步通過繳納錢,使在必要的時間內只需要動員必要的人這樣彈性的方法成為可能。而且,《里耶秦簡》的例子中,縣接受郡的命令,負責選擇從事徭役的人,再向下級機關下達直接選定工作的命令,隨著轉用更卒的擴大,其就役範圍也超越所屬縣而擴大到郡以上。

此外,如前所述,民間最基層社會資源的整合本來是由鄉負責的,不是更卒的任務,而且比比規模更大的道路和橋梁的修築也不是更卒的任務。這可以從東漢晚期劉姓墓出土的桓帝延熹元年文書《甘谷漢簡》中<sup>①</sup>有“責更、算、道、橋錢”,<sup>②</sup>可知在更錢之外另外徵收道、橋錢。也就是說,社會基礎的建立本來是由鄉或者縣、郡徵發的個別的徭役來負擔的,為了使百姓的負擔最小化而改用了更卒。

上文對擁有徵發權的官府和負責選擇徵發者事務的官吏進行了考察。首先確認了不僅是郡縣長官,鄉長為了建立地域社會基礎也擁有徵發權。抽選被徵發者、製作名簿的工作,是鄉嗇夫(或者有秩)或者縣尉的職責,直接負責這一事務工作的官吏負責具體事務。總之,鄉的長官負責選擇從事力役者,縣尉負責抽選士兵,各負其責,無論是郡、縣、鄉哪一級決定、主管的徵發(但鄉不負責兵役),都是如此。

## 結 語

本文以百姓最主要負擔的更卒為中心探討了徵發制度。首先,踐更指從事者以輪番更替勞動的形式在一定期間就役當番。像更卒這樣,讓人輪番從事一定期間役務的就役形式,

<sup>①</sup> 李均明、何雙全認為,它是宗正府卿劉桓就宗室之事向皇帝報告的奏書和皇帝下達的詔書(見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集》,文物出版社,1990)。

<sup>②</sup> 參見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集》。

是各種徭役、兵役普遍采用的方式，不能說所有記載踐更的例子都是更卒之役。爲了對各種徭役和兵役進行區別考察，著眼於負責選定被徵發人員的官，就會發現與兵役有關的是縣武官之長的尉，負責徭役事務的是鄉的長官，更卒是由尉徵發的一種兵卒，但從秦到漢初開始轉用到其他徭役中，到漢中期轉化爲從事徭役的卒。

以往研究認爲，道路的修整等與生活基礎設施建設有關的工程勞役主要是由更卒來承擔的，但是與聚落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基礎工程，無疑是由縣的下級機構——鄉來負責的，很多情況下是以自行動員本鄉百姓的方式進行。本文雖然主要討論的是定期性徭役更卒，但是，以鄉的徭役爲代表的不定期負擔肯定不少，這種不定期征課的負擔，無疑是壓在人們身上的沉重負擔。文中已數次提及的文末所附材料 A 秦代《里耶秦簡》記載的武器輸送任務依據的就是隨時性徵發，而據反映漢初情況的《二年律令》，不僅是輸送，包括邑圍牆的修築、道路和橋梁、灌溉設施的修建等也都是如此。

(略)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繇(徭)使。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補繕邑院<sup>①</sup>，除道橋，穿波(陂)池，治溝渠，塹奴苑。自公大夫以下……勿以爲繇(徭)。市垣道橋，令<sup>②</sup>市人不敬者爲之。(略)(《二年律令·徭律》簡 411—414)

秦漢時期雖有法律限制，但禁絕恣意徵發并不容易。

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

而且，秦滅六國在全國推行郡制後，其直接統治的地區與戰國時代相比有了飛躍式擴展，這同時意味著地區間輸送和從事兵役、徭役者負擔的增大，這一沉重負擔引發了全國的反叛。漢初，較遠的地區主要爲諸侯王國，當廢除諸侯國改行郡時，向中央派遣的長距離徵發也成爲沉重負擔，這是從郡向諸侯王國逃亡者頻繁出現的一個原因。<sup>③</sup> 吳楚七國之亂後，諸侯王

①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的《二年律令與秦讞書》將“邑”下不清楚的字釋作“院”。此從。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釋作“命”，何有祖改釋爲“令”(何有祖：《讀〈二年律令〉劄記》，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研究·譯注篇》，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秦讞書》亦同。

③ 賈誼《新書·屬遠篇》：“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奸人。”([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卷第三，中華書局,2000,第117頁)。

國的國土減少，漢不得不直面統治廣闊疆域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採取了減少地方輸送的物資量等臨時措施<sup>①</sup>，同時對於輸送的人夫，也採取了不徵發百姓而雇用勞動者充當的方式。<sup>②</sup> 這樣，雇用勞動者以及作為刑罰強制勞役的刑徒，成為官府取得勞動力的重要源泉。<sup>③</sup>

由於意識到減輕徭役是政治課題，以昭帝期為界<sup>④</sup>出現了免除百姓的更卒就役而代之以繳納更錢，官府採取雇傭他人代替的一系列方法。作為一減輕負擔的方法，在更錢納入制度開始之前，也出現了富裕之民用錢雇傭他人來替代完成勞役的經常化現象。例如文末資料 C《史記·貨殖列傳》載“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在昭帝以前就已出現富裕之家出錢雇傭他人來代服兵役勞役。本來秦律規定：“上節（即）發委輸，百姓或之縣就（僦）及移輸者，以律論之”（睡虎地秦簡《效律》簡 49），禁止雇傭他人代服勞役。但是，在漢代雇傭代役被允許，至少富裕的人減輕了勞役負擔。隨著兵役、勞役就役間接化的發展，必要的時候雇傭必要的人員這一彈性的運用成為可能，更錢的剩余部份也成為官府的財源。<sup>⑤</sup>

此外，無論中央、郡、縣哪一級的徵發，負責其人員選定工作的都是鄉的長官及屬官，以及縣的尉、尉史，掌握運用徵發制度主幹部的是鄉和縣。也就是說，漢代左右建立物的、人的基礎的，左右徵發制度運用的，就是這些最基層的行政機關。鄉和縣是依據戶籍和兵籍來進行徵發的，那麼，“籍”到底是怎樣製作的呢？與個人有關的信息來源是戶籍，戶籍採取的是將人以戶為單位進行登記的特殊形態，這一“籍”的制度是從戰國時代到秦漢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戶”是什麼，為什麼要以戶所屬的形式來掌握百姓，對於考察徭役制度的特質也是重要的課題。

## 附：踐更、更卒資料

### A. 出土文字資料

a. 1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誅。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毆（也），及詣。水雨，除興。

2 興徒以為邑中之紅（功）者，令結（嫖）堵卒歲。未卒堵壞，司空將紅（功）及君子主堵者

① 《漢書·昭帝紀》元鳳二年：“六月，赦天下。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後略）’”

② 《漢書·食貨志下》：“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顏師古注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

③ 《漢書·陳湯傳》：“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

④ 渡辺信一郎著：《漢代更卒制度再探討——服虔、濱口說批判》，《東洋史研究》51—1，1992。

⑤ 重近啓樹著：《徭役諸形態》，《東洋史研究》49—3，1990。

有罪，令其徒復垣之，勿計爲繇(徭)。

3·縣葆禁苑，公馬牛苑，興徒以斬(塹)垣離(籬)散及補繕之，輒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歲或壞決(決)，令縣復興徒爲之，而勿計爲繇(徭)。卒歲而或決(決)壞，過三堵以上，縣葆者補繕之。三堵以下，及雖未盈卒歲而或盜決(決)道出入，令苑輒自補繕之。縣所葆禁苑之傅山、遠山，其土惡不能雨，夏有壞者，勿稍補繕，至秋毋雨時而以繇(徭)爲之。

4 其近田恐獸及馬牛出食稼者，縣嗇夫材興有田其旁者，無貴賤，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繕之，不得爲繇(徭)。

5 縣毋敢擅壞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壞更殿(也)，必灑(灑)之。欲以城旦舂益爲公舍官府及補繕之，爲之，勿灑(灑)。

6 縣爲恆事及灑(灑)有爲也，吏程攻(功)，贏員及減員自二日以上，爲不察。上之所興，其程攻(功)而不當者，如縣然。度攻(功)必令司空與匠度之，毋獨令匠。其不審，以律論度者，而以其實爲繇(徭)徒計。 繇(徭)律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115—124，分段參照重近啓樹《徭役諸形態》，《東洋史研究》49—3，1990。)

b.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爲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誅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減絮，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 廩苑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廩苑律》簡13—14)

c. 亡自出 鄉某爰書，男子甲自詣，辭曰：士五(伍)，居某里，以迺二月不識日去亡，毋(無)它坐，今來自出。·問之口名事定，以二月丙子將陽亡，三月中逋築宮廿日，四年三月丁未籍一亡五月十日，毋(無)它坐，莫覆問。(略)(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96—98 正)

d. 四月丙辰，黥城旦講乞鞠，曰：故樂人，不與士伍毛謀盜牛，雍以講爲與毛謀，論黥講爲城旦。覆視其故獄，元年十二月癸亥，亭慶以書言雍廷，曰：毛賣牛一，質，疑盜，謁論。毛曰：盜士伍牝牛，無它人與謀。牝曰：不亡牛。毛改曰：迺已嘉平可五日，與樂人講盜士伍和牛，牽之講室，講父士伍處見。處曰：守汧邑南門，已嘉平不識日，晦夜半時，毛牽黑牝牛來，即復牽去。不知它。和曰：縱黑牝牛南門外，迺嘉平時視，今求弗得。以毛所盜牛獻和，和識，曰：和牛也。講曰：踐更咸陽，以十一月行，不與毛盜牛。(中略)今講曰：踐十一月更外樂，月不盡一日下總咸陽，不見毛。(中略)·講曰：十月不盡八日爲走馬魁都傭，與偕之咸陽，入十一月一日來，即踐更，它如前。(《張家山漢墓竹簡·奏讞書》簡99—111)。

e.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卒史穀、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責(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即)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毆，不欲興黔首。嘉、穀、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



贖責、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決<sup>①</sup>泰守府。嘉、穀、尉在所縣上書。嘉、穀、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里耶秦簡》J1①6005A 正面，J1①6006A 文字大體相同）

三<sup>②</sup>月丙辰，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尉別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啓陵、貳春，皆勿留脫，它如律令／鉤手。丙辰水下四刻，隸臣尚行。三月癸丑水下盡□，陽陵士五<sup>③</sup>句以來／邪手。二<sup>④</sup>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裏（裏）陽成辰以來。／羽手。如手。（《里耶秦簡》J1①6005A 背面）<sup>⑤</sup>

f. 諸當行粟，獨與□<sup>⑥</sup>父母居，老如皖老，若其父母罷瘡（瘡）者，皆勿行。金瘡，有□病，皆以爲罷瘡（瘡），可事如皖老。其非從軍戰瘡也，作縣官四更，不可事，勿事。勿（？）以爲<sup>⑦</sup>眡（？）瘡之令、尉前。（《二年律令》簡 408—409）

g. □學童能風（諷）書史書三千字，誦<sup>⑧</sup>卜書三千字，卜六<sup>⑨</sup>發中一<sup>⑩</sup>以上，乃得爲卜，以爲官佐<sup>⑪</sup>。其能誦三萬以上者，以爲卜上計六更。缺，試脩法，卜<sup>⑫</sup>六發中三以上者補之。（《二年律令》簡 477—478）

h. 以祝十四章試祝學童，能誦七千言以上者，乃得爲祝五更。大祝試祝，善祝、明祠事者，以爲冗祝，冗之。（《二年律令》簡 479）

i. 大史、大卜謹以吏員調官史、卜縣道官，縣道<sup>⑬</sup>官受除事，勿環。吏備（僦）罷、佐勞少者，毋敢亶（擅）史、卜。史、卜受調書大史、大卜而逋留，及亶（擅）不視事盈三月，斥勿以爲

① 原釋文作“史”。據王煥林意見改（見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

② 據里耶秦簡講讀會《里耶秦簡譯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8 號，2004）。此外，王煥林也持此意見（見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

③ 據里耶秦簡講讀會《里耶秦簡譯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8 號，2004）、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

④ 據胡平生《讀里耶秦簡劄記》（簡帛研究網 <http://www.jianbo.org>，2003），里耶秦簡講讀會《里耶秦簡譯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8 號，2004）。

⑤ 附記：由於縣卒和踐更者是并列記錄的，因此，在縣踐更者不是縣卒的解釋也存在可能（參見楊振紅《徭、戌爲秦漢正卒基本義務說——更卒之役不是“徭”》，《中華文史論叢》2010 年第 1 期）。正如本文所述，在縣踐更者並不一定是更卒。因此，應解釋這裏是將更卒的縣卒和其他踐更者一起記錄。

⑥ 富谷至《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研究·譯注篇》認爲“若”後一字不清楚。

⑦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二年律令與奏讞書》認爲“以”後面是“爲”字。

⑧ 據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改。

⑨ 據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改。

⑩ 據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改。

⑪ 據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將“處”改爲“佐”。

⑫ 據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廣瀨薰雄《〈二年律令·史律〉劄記》（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二），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改。

⑬ 據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道”字下有重文符號。



史、卜。吏壹弗除事者，與同罪。其非吏也，奪爵一級。史、人〈卜〉屬郡者，亦以從事。（《二年律令》簡 482—483）

j. 謁任史、卜，上計、脩法。謁任卜學童、令外學者，許之。□□學俳敢擅繇（徭）使史、卜、祝學童者，罰金四兩。史、卜年五十六，佐爲吏盈廿歲，年五十六，皆爲八更。六十，爲十二【更】。五百石以下至有秩爲吏盈十歲，年當皖老者，爲十二更，踐更。<sup>①</sup>（《二年律令》簡 484—485<sup>②</sup>）

k. 疇尸、茜御、杜主樂皆五更，屬大祝。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踐更大祝。（《二年律令》簡 486）

l. 民占數以男爲女，辟更繇，論爲司寇。（李均明、劉軍：《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考述——兼論挈令》，《文物》1993 年第 10 期。）

#### B. 文獻律、律說：

a.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

（《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顏師古注引如淳。《史記·郭解傳》裴駰《集解》所引如淳說大致相同，祇有部分内容不同。渡辺信一郎采納的是《漢書》顏師古注。渡辺認爲“卒踐更”的“踐”是衍字<sup>③</sup>，但若從如淳、李賢的三品說不可能是衍字。《史記·吳王濞列傳》張守節《正義》，亦可見到大致相同的文字，祇是不包括律說和《食貨志》曰。）

b. 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史記·吳王濞列傳》司馬貞《索隱》）

c. 服虔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百姓心，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說，“踐更”下面的二字不明，而富谷至《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注篇》認爲，從簡的長度來看，說“踐更”下面兩字不明很勉強。王偉認爲，文在“踐更”後結束，其下無字（王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初探》，簡帛研究網）。

② 王偉認爲簡 485 與 486 不相連（王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初探》，簡帛研究網）。彭浩認爲，簡 486 接在簡 103 之後（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

③ 渡辺信一郎著：《漢代更卒制度再探討——服虔、濱口說批判》，《東洋史研究》51—1，1992。

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漢書·吳王濞傳》顏師古注引。《史記·吳王濞傳》裴駟《集解》引《漢書音義》大體同。）

C. 文獻資料

a.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史記·吳王濞傳》）

b.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史記·游俠列傳·郭解》）

c.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史記·貨殖列傳》）

d. 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漢書·循吏列傳》）

e.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略）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略）漢興，循而未改。（後略）

顏師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漢書·食貨志上》載董仲舒上言）

f. 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漢書·谷永傳》）

g. 文學曰：“……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鹽鐵論·禁耕篇》）

h.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中略）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鹽鐵論·未通篇》）

i.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幣易貨，或時貴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鹽鐵論·水旱篇》）

j. 賢良曰：“……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鹽鐵論·水旱篇》）

k. 一業(歲<sup>①</sup>)使民居更一月,何據? 年二十三儒(傳)<sup>②</sup>,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  
(《論衡·謝短篇》)

l. 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續漢書·輿服志》)

m. 劉劭《爵制》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貴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

n. 更卒歸誠自詣因。

顏師古注:“卒給使役者也,更言其去來更代也。”(《急就篇》第二十七章)

(本文最初以《更卒について—漢代徭役試論—》之名,刊於立命館東洋史学会中國古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立命館東洋史学会叢書》四,《中國古代史論叢》續集,2005。修訂後收入筆者著《中国古代の専制國家と民間社会—家族・風俗・公私》,第一章“漢代における更卒と正—徭役・兵役制度に関する試論—”,立命館東洋史学会,2009。此次爲了刊載於《簡帛研究》,又進行了修訂。

2010年,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財政と國家》(汲古書院)出版,本文引用的論文多數被收錄。本文參考的是渡辺氏初刊論文,雖嫌無禮,但確未及論及其新刊大著,特此聲明。)

① 黃暉《論衡校釋》引孫星衍說,“業”應改爲“歲”(見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第568頁)。

② 據黃暉《論衡校釋》引孫星衍說,“儒”當改爲“傳”。

## 2006 年以來敦煌懸泉漢簡研究述評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韓 華

敦煌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已近二十年，圍繞懸泉置及懸泉漢簡的論著已近百篇，特別是從 2006 年以來，懸泉漢簡釋文的陸續公布，為研究漢代西域和中央的關係、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郵驛與傳舍以及羌族等諸多問題提供了新的資料，因此有必要對圍繞新發表簡文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

### 一、懸泉漢簡中的西域與漢朝中央政府關係

何海龍《從懸泉漢簡談西漢與烏孫的關係》（《求索》2006 年第 3 期）主要根據懸泉漢簡中有關烏孫的記載並結合傳世典籍，對西漢與烏孫交往關係進行梳理，認為漢與烏孫的關係可以分親與全面管理兩階段來認識，同時在漢與烏孫的交往關係上，解憂公主和馮嫫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敦煌懸泉漢簡中，有簡文反映漢代大宛國的情況，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中的“大宛”簡以及漢朝與大宛的關係考述》（《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2010）對懸泉漢簡中 10 多枚與大宛相關的簡牘，利用考古學中的層位學原理對簡文內容進行了詳細考察，指出大宛的中心在今費爾干納盆地，範圍包括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和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的一部，是古代中國最早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地區之一，為研究漢朝與中亞地區友好交往的歷史提供了最直接的實物與文獻的相關證據，極為珍貴。兩漢時期，康居是地處中亞的西域大國，它不僅在中亞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西交通史上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古希臘作家和古代波斯的文獻中都沒有留下有

關康居的記載,唯一的材料就是中國的史書,而中國史書的記載又過於簡略,難窺古代康居之全貌。郝樹聲《簡論敦煌懸泉漢簡〈康居王使者冊〉及西漢與康居的關係》(《敦煌研究》2009 年第 1 期)結合文獻記載,對這些簡牘材料進行解析,揭示古代康居與西漢王朝的來往關係,有助於推動西域史、中亞史和中國秦漢史的研究。她通過考證康居五小王的都城位置,探明了康居國當時的地理範圍;通過分析康居王使者前來朝貢時與酒泉太守發生糾紛的具體案例,指出在西漢張騫通西域後的百餘年間西漢王朝一直同遠在今天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一帶的國家保持着友好交往的關係,而且直接證明了這些國家是最早同古代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地區。袁延勝《懸泉漢簡所見康居與西漢的關係》(《西域研究》2009 年第 2 期)對 14 枚與康居國有關的懸泉漢簡作了考證,依據其中 11 枚紀年簡,分別揭示了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時期康居與漢朝的曲折關係,彌補了史書記載的不足,深化了對西漢時期康居與漢朝關係的瞭解。其《懸泉漢簡所見辛武賢事迹考略》(《秦漢研究》第四輯,2010),利用懸泉漢簡中有關辛武賢事迹的記錄,比對了辛武賢在神爵年間征討西羌、甘露元年帶兵到敦煌、甘露二年罷兵的相關事迹,豐富了我們對辛武賢事迹的瞭解,也是對《漢書》等傳世典籍失載的相關史實的重要補充。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樓蘭(鄯善)同漢朝的關係》(《西域研究》2009 年第 4 期)認為,早在西域都護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經在政治上接受漢朝的管理,漢朝還在此屯田戍守。其《從懸泉漢簡看西漢武昭時期和宣元時期經營西域的不同戰略》(2010 年“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會議)認為漢代經營西域的戰略經歷了由武帝、昭帝到宣帝、元帝時期,從開拓到經營階段的轉變。

此外,汪桂海《從出土資料談漢代羌族史的兩個問題》(《西域研究》2010 年第 2 期)主要將目前所見到的簡牘材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就羌族的種落、護羌校尉與護羌使者、民族壓迫與羌人的反抗等問題予以探討,印證和補充了史書記載。王旺祥《敦煌懸泉置漢簡所記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論》(《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9 年第 1 期)也對戊己校尉的設置年代、職責、隸屬關係、自身屬員作了考證。這些研究,對認識漢與車師的交往具有重要作用。

## 二、懸泉漢簡中的姓氏和人名的相關研究

研究漢代人名的語法特點和人名所賦予的時代涵義是秦漢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懸泉漢簡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張俊民從簡文中單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復姓、少數民族人名、與中央官吏相關者、有名有字者、名字中有敬稱者等方面入手進行考察,撰寫了系列論文,為這方面的研究開闢了新思路。其中,《敦煌懸泉置出土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一)》(《隴右文博》2006 年第 2 期)主要從記錄單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簡文提供的信息,探討所涉及的問題,包括吏員的變更、文書分類、制度的演變和管理方式等。《敦煌懸泉出土漢

簡所見人名綜述(二)——以少數民族人名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以懸泉漢簡中出現的少數民族人名為中心,重點探討其中的羌人和西域諸國人名,對瞭解與認識漢代西北地區的社會風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敦煌懸泉置出土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三)——懸泉漢簡所見漢代復姓資料輯考》(《秦漢研究》第二輯,2008)對懸泉漢簡中的復姓進行歸納,特別是對一些史書上從未出現過的姓氏的考證,彌補了傳世典籍記載的不足。《敦煌懸泉出土漢簡所見人名綜述(四)——以中央機構職官為中心的考察》(《簡帛研究二〇〇七》,2010)對懸泉漢簡文書中的傳和詔書所記錄的官名和人名進行考察,將其與傳統史書文獻相比較,可以發現一些史書未記錄或記錄有出入的信息,既可以反證史書文獻,又可以檢驗簡牘釋文。所涉中央機構的職官有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光祿大夫和侯及其屬官,對重新認識和檢驗漢代的職官制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懸泉漢簡所見敬稱與謙稱》(《秦漢研究》第四輯,2010)從懸泉漢簡的相關文書出發,對敬稱、謙稱和敬謙互稱三個方面進行歸納研究,為認識漢代文書制度、內容和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此外,賈叢江《兩漢時期西域人漢式姓名探微》利用傳世典籍并結合懸泉漢簡,重點探討了兩漢時期西域人采用漢式姓名的問題,認為王莽於西漢元始二年(前11)實行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導致其後西域人改用漢式名字的直接原因。

### 三、漢代的郵驛與傳舍

經過考古發掘後可知懸泉置遺址在漢代就是郵驛機構,而梳理懸泉漢簡,無疑對研究漢代郵驛制度、郵驛職官和懸泉置本身的功能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王棟梁《從懸泉漢簡看漢代的郵驛制度》(《社科縱橫》2007年6月20日)認為上世紀90年代初期發現的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保存最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一處漢魏郵驛機構,通過懸泉置遺址及其出土簡牘和文物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對漢代邊塞地區的“置”這個概念有全新的認識。張俊民《懸泉漢簡“置丞”簡與漢代郵傳管理制度演變》(韓國《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二十輯,2008)利用懸泉漢簡對“置丞”存在的時間、任職人員及其前後的變化作了考察,發現“置丞”一職出現的最早時間是五鳳二年(前56),記錄“置丞”一職最晚的時間是初元三年(前46)，“置丞”一職消亡被其他形式取代的確切時間是建昭二年(前37)。“置丞”出現之前,郡太守為了體現郡級政府對郵傳系統的重視,加強管理,除了對置本身的管理之外,還委派屬吏監領懸泉置的事務。這些人員,有時稱“監領”、“監置史”或“史”,他們的身份有時是“亭長”,有時是“都吏”,有時是太守的“守屬”。“置丞”一職被取消後,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況。“置丞”一職消亡時間的確定,前後不同方式的變化,無疑是漢代社會制度、特別是郵傳管理制度變化的一種體現,勾勒并反映了其間的轉變軌迹。張經久、張俊民《敦煌漢代懸



泉置遺址出土的騎置簡》利用懸泉漢簡中的“騎置”簡，探討作為漢代郵驛系統的一級機構的騎置的功能和作用，認為在西漢時期騎置是以傳遞重要和緊急文書為主的郵驛機構，介於置與亭之間，一般情況下有吏一人、馬三匹、驛騎三人。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所見的亭》（《南都學刊》2010 年第 1 期）認為，從懸泉漢簡可知“亭”的功能有三種：邊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郵驛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時間很短，有興替之變。懸泉漢簡中的“亭”可以揭示當時敦煌郡效穀縣的社會信息，特別對於還原該地區的郵驛道里和郵驛系統的結構有着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置、騎置和亭，構成了效穀縣的郵驛系統和文書傳遞綫路。其《懸泉漢簡所見郵驛制度初探——以津令、制度簡為中心的考察》（2010 年“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會議）利用懸泉漢簡中的津令、制度簡，考察了漢代的郵驛制度，認為津令、制度簡雖屬於法律文書，也可視為漢代郵驛制度的一部分。

所謂傳舍、郵舍或驛舍，名雖異，義相同，在漢代是供驛長、驛夫以及往來官吏休息食宿的場所，懸泉漢簡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資料。朱慈恩《漢代傳舍考述》（《南都學刊》2008 年第 3 期）根據懸泉漢簡，認為漢代的傳舍是郵傳制度的組成部分，負責公職人員公差旅行時的食物供應、休息住宿和行道交通工具，有一套嚴格而細緻的管理方式，保證了其正常運行，但是傳舍有別於普通旅舍。侯旭東《西北漢簡所見“傳信”與“傳”——兼論漢代君臣日常政務的分工與詔書、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 年第 3 期）對西北漢簡中的傳車文書作了分類考察，並對與此相關的政務處理方式作了細密考證。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傳舍及傳舍制度》（《魯東大學學報》2010 年第 6 期）認為，“傳舍”作為吏員出行的主要住宿機構或休息場所，在漢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關係到漢代行政體系的運作和管理。懸泉漢簡是漢代郵驛系統中目前唯一確定且保存下來的文書檔案，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研究，從一定角度再現了漢代的傳舍制度和運作方式。王裕昌《漢代傳食制度及相關問題研究補述》（《圖書與情報》2010 年第 4 期）對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懸泉漢簡中涉及傳食的內容加以比較，考察了傳食接待等級、傳食錢款來源等問題，認為郵傳制度是秦漢國家信息和交通管理的重要制度，傳食制度是漢代驛置傳舍系統招待公務人員的一種制度。初世賓《懸泉漢簡拾遺（二）》（《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2011）對《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中所刊的 25 枚懸泉漢簡（26 至 50）簡文重新進行考察，為研究傳信簡和官文書中的“副”提供了新思路。

#### 四、懸泉漢簡中的文字學

趙岩《再論敦煌懸泉置漢簡中的一條律文》（簡帛網 2008 年 9 月 13 日）認為，懸泉置漢簡裏“毆親父母及同產”這條律文中的“及”字可能為原簡誤寫，或者為誤釋，“及”的位置應



爲“之”字。王偉《懸泉漢簡札記一則》(簡帛網 2009 年 2 月 24 日)對敦煌懸泉漢簡 II 90DXT0114(3):54“兵令十三當占緡錢匿不自占不以實罰及家長戍邊一歲”中“兵”的釋讀提出異議,認爲“兵令”應釋爲“筭令”,與簡文內容正相契合,而此簡正是關於算緡錢的規定。

## 五、懸泉漢簡所反映的佛教問題

佛教傳入敦煌的具體時間,傳世典籍有着較爲確切的記載。懸泉“浮屠簡”的發現,爲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提供了新的最直接的證據,是其補史證史的新體現。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浮屠簡”略考——兼論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2008 年 6 月蘭州“中國吐魯番學會年會暨佛教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通過對第 VI 91DXF13C②:30 簡文內容和此探方 11 枚紀年簡的比較分析,得出結論認爲,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在公元 1 世紀下半葉,比竺法護在敦煌翻譯佛經的時間早 200 年,比莫高窟開鑿洞窟的時間早 300 年。李永平《敦煌懸泉置遺址 F13 出土部分簡牘文書性質及反映的東漢早期歷史》(《敦煌研究》2010 年第 5 期)對新近公布的敦煌懸泉置遺址 F13 出土部分簡牘文書的性質進行了分析,認爲簡牘中出現的“小浮屠”當爲漢代“里”的名稱,並對簡牘文書中的人物、官職及東漢官方史學的編纂等也進行了研究探討。

## 六、懸泉漢簡中所涉及的職官

賈叢江《西漢伊循職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 年第 4 期)利用出土簡牘結合傳世典籍,認爲西漢所設伊循都尉屬於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區除存在隸屬於敦煌郡候望系統的都尉職官外,還存在隸屬於中央大司農的屯田系統的職官。護羌校尉始置於西漢時期,然史學界對專門管理羌人事務的重要官職的始置年代、名稱、職掌等問題均有不同的看法。劉國防《西漢護羌校尉考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3 期)以懸泉漢簡爲中心,結合傳世文獻考證後認爲,護羌校尉的設置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其前身就是漢朝政府臨時性派出的使者,漢武帝神爵二年(前 60)成爲一個管理活動於涼州刺史部內各郡縣的羌人,同時對塞外羌人負有偵伺之責的固定官職,因其護羌校尉持節巡行各地,又被稱爲護羌使者。

## 七、敦煌懸泉置月令詔書

石明秀《先秦兩漢月令生態觀探析——以敦煌懸泉壁書爲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

2008 年第 2 期)以敦煌懸泉壁書為切入點,結合傳世典籍,全面探究了秦漢的自然生態觀。指出月令觀和生態觀法治化,使我國古代農業經濟不斷煥發機活力,進而鑄就了封建時代高度的農業文明。劉芳池《懸泉詔書整理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2006)利用敦煌懸泉置出土《四時月令》,結合西漢時期其他詔書文獻,對該詔書的頒發背景、體式、漢代詔書的結構組成、下達程式等方面作了探討;同時,對詔書內容和文字作了考釋,並結合多種文獻中的相關月令,對該懸泉詔書進行歸類,並進行較為系統的總結和評述,力爭說明月令一類文獻對漢代政治所施予的影響。

## 八、近五年懸泉漢簡所涉及的其他問題

“適”作為漢代的一種勞役方式,或說是一種行政處罰方式,被學術界所認識。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所見“適”與“適”令》(《蘭州學刊》2009 年第 11 期)利用懸泉漢簡並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對“適”作了歸納,認為漢代的“適”這一制度比較完善,存在類似“適令冊”的令,某人被“適”文書和具體服“適”文書。“適令冊”直接反映了類似懸泉置的驛站機構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待管理制度,不按照規定應該受到什麼樣的處罰,就是“適”多少里。

藍黃、燕妮《中國複式簿記產生於漢代——基於敦煌懸泉漢簡的新証》(《會計之友》2009 年第 3 期下)從複式簿記的特徵入手,並結合懸泉漢簡中的賬簿檔案,分析歷史背景以及簡文中所描述的經濟業務,以事實說話,挖掘相關證據,得出複式簿記產生於我國西漢的結論。

牛路軍、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鼓與鼓令》(《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指出,一般所說的鼓是一種樂器,在古代又有比較獨特的用法,通過考察懸泉漢簡中“鼓”的相關資料,不僅可以復原漢代的鼓令,而且可以知曉在懸泉置的日常生活中“鼓”用於接待,以敲鼓次數的多少告知接待單位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

李岩雲《1998 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批簡牘涉及的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2009 年第 2 輯)就 1998 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批簡牘中涉及到的玉門置、甘露二年將軍起居簿、邊塞挈令第六、舉書等幾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證實了玉門置的存在,補証了懸泉漢簡中所記敦煌有九置而總數缺一之記錄;甘露二年將軍起居簿,則是反映破羌將軍辛武賢在敦煌玉門關一帶活動時的重要證據;邊塞挈令第六,是為處理北方邊塞上一些與軍事相關的具體問題而使用的袖珍版的資料匯編;舉書,是關於一個名叫江君的張掖農都尉被舉薦為禮樂長的事情。這些內容都是以前敦煌簡牘中沒出現過的,對於填補敦煌漢代歷史的空白具有重要價值。

孫少華《秦漢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學術交流及其文學影響》(《齊魯學刊》2009 年第 5 期)

認為河西走廊是秦漢時期華、戎交往的重要門戶，承載着雙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務，也是雙方文化學術交流的重要紐帶與歷史見證。兩漢時期，佛教和道教已出現在河西走廊上，後世所產生的小說和戲曲，也與河西走廊傳入的西域文化不無關係。高榮《河西漢晉簡牘及其學術價值》（《河西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認為河西簡牘是指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居延、玉門、武威等地出土的簡牘。河西簡牘的年代上自西漢，下迄西夏，前後延續一千二三百餘年，其中主要集中在漢晉時期。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郵驛交通及民族關係等諸多領域，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尤其是漢晉時期的歷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張俊民《對漢代懸泉置馬匹數量與來源的檢討》（《秦漢史論叢》第11輯）利用懸泉漢簡並以懸泉置為例從馬匹的數量和來源兩個方面探討了漢代郵驛系統“置”的馬匹數量和來源，認為可能在西漢的“置”中馬匹配備每置約40匹左右，而馬匹的來源主要是靠敦煌郡無償調撥，多以“出入簿”的方式記錄馬匹的調入或死亡注銷，即“傳馬出入簿”。

韓華《兩漢時期河西四郡自然災害探析——以懸泉漢簡為中心》（《絲綢之路》2010年第20期）利用懸泉漢簡中的資料及相關文獻記載，對漢代河西四郡的蝗災、沙塵暴、地震、風災、乾旱等五種災害進行分析，結合今人對相關災害的定級標準，揭示上述災害的破壞程度，以期對今天的防災、減災有所借鑒。

劉樂賢《懸泉漢簡中的建除占“失”殘文》（《文物》2008年第12期）對懸泉漢簡中的建除占“失”殘文與孔家坡漢簡《日書》相關簡文進行分析和比較，認為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失”應讀為“魅”，指人死後變成的能作祟害人的厲鬼，亦即古書記載的“歸殺”或“回煞”，懸泉漢簡建除占“失”簡冊殘文中的“失”，也應如此理解。

馬怡《懸泉漢簡“失亡傳信”冊補考》（《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對既往學者關於“失亡傳信冊”的研究提出新的看法，認為第二編不是單純的官吏名冊，第二編的最後一枚簡文應為敦煌郡府對其屬縣的命令，要求各縣、置站完整地彙寫關於“使者”的情況，謹慎留意而不懈怠。從兩編的時間關係、官文書的下行順序和兩編本身連綴的現狀來看，第二編和第一編是彼此相關聯的，應當同屬於“失亡傳信冊”這宗文檔。

近五年以來與懸泉漢簡相關研究的專著僅有一部，即郝樹聲、張德芳的《懸泉漢簡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對懸泉置、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兩漢時期的紀年問題、時稱問題、河西地區的歷史地理、中西交通、西北地方的民族關係以及西域諸國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作了系統研究。歷史地理學方面日本學者宮宅潔《懸泉置及其周邊——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簡帛研究二〇〇四》，2006）也有相關論述。

從以上圍繞懸泉漢簡研究的論著不難發現，懸泉漢簡本身所承載的歷史信息非常豐富，對解決秦漢史的重要問題有極大作用，相信釋文全部公布後，一些疑問將會迎刃而解。

## 簡帛文字編編纂的現狀與展望<sup>①</sup>

西南大學文獻研究所 張顯成

**內容提要** 四十年來簡帛文字編的特點主要有:1.各時期簡帛文字編的數量極不平衡;2.有部分文字編是供書法學界使用的;3.有些是綜合性文字編,而不是專門整理彙編某批簡帛材料字形的成果。其不足主要有:1.有的文字編是直接剪貼原圖版文字來入編的,底色很濃,影響了實用性;2.有些文字編字形摹寫失真,影響了字編的質量;3.有些文字編辨識文字有誤;4.有些文字編文字所歸部類不確。今後簡帛文字編的編纂當需要注意以下問題:1.要高度重視簡帛文字的釋讀;2.入編字形不能失真,最好引進電腦技術進行原實物文字處理;3.要高度重視文字編的實用性;4.應編出成體系的文字編。

**關鍵詞** 簡帛文字編 現狀回顧 未來展望

### 一、四十年來簡帛文字編編纂的概況

一個世紀以來,發現了大量的簡帛文獻,由此產生的顯學“簡帛學”也呈現勃勃生機,大有超過甲骨學甚至敦煌學之勢,因為甲骨文獻不可能再有像過去那樣的大發現,也不可能再發現一個敦煌藏經洞,而簡帛文獻一直在陸續不斷地出土面世,故簡帛學在當今越來越熱。

簡帛是戰國至魏晉時期的文獻,而這段時期,正是漢字產生重大變化的時期,是產生隸

<sup>①</sup> 基金項目:重慶市2009年度社科項目《秦漢簡牘文字編》(2009YY03),國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項目《秦漢簡帛系列字形譜》(11XZS001)。

變、楷化,並最終形成楷書的時期,故無論是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來說,還是從書法史的角度來講,對這段時期漢字的主要載體簡帛所載文字的整理研究,無疑都具有極重要價值。就簡帛文字的整理而言,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編纂文字編。<sup>①</sup> 這一工作開始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1974年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的王夢鷗《漢簡文字類編》,可算是較早問世的這類著作。

其後有不少這類著作陸續出版,到了八十年代,主要有以下三部: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日]佐野光一《木簡字典》,[日]雄山閣,1985年;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

進入九十年代,這類工具書迅速增多,主要有:張世超、張玉春《秦簡文字編》,[日]中文出版社,1990年;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年;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郭若愚《戰國楚簡文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6年;張光裕、袁國華《包山楚簡文字編》,臺灣藝文印書館,1996年,等等。

進入二十一世紀,這類工具書承接前勢而陸續問世,主要有:張守中《郭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編纂材料實為《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壹)》);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程燕《望山楚簡文字編》,中華書局,2007年;李守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編(1—5)》,作家出版社,2007年;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巴蜀書社,2008年,等等。

由上可知,近四十年來,對簡帛字形進行整理彙編的工作是可喜的,簡帛文字編成果是豐碩的,達19部。<sup>②</sup> 粗略地說,這些文字編有以下特點:

一是各時期簡帛所編文字編的工作開展不平衡。我們知道,兩漢簡帛的種數(或言“批數”、“宗數”)是整個楚、秦、漢、吳簡帛中最多的,但已編成文字編者,却是楚簡帛多,秦漢簡帛少,六朝簡無。其中,楚簡帛文字編達8部,占整個文字編總數的42%;秦簡文字編4部,占整個文字編總數的21%;漢簡帛文字編5部,占整個文字編總數的26%;綜合性的2部,占

① 文字編,學界又稱“字形表”,如《古文字字形表》,或稱“字表”,如《侯馬盟書》所附《字表》。我們認為稱“字形譜”為好,因為這類成果重在反映文字形體(字形),且這類成果應該成體系,全面反映所編纂材料字形全貌,構成字形譜系。

② 還有一些文字編是某批簡帛整理研究成果中的附錄或為其成果中的一部分,此不計入。另,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也未計入。

整個文字編總數的 11%。楚簡帛材料中,幾乎每一種簡帛都編有文字編,而不光六朝簡牘無文字編,且秦漢簡帛特別是兩漢簡帛中編有文字編者也甚少。迄今已公布正式發掘報告的大宗秦漢簡帛共 20 宗,編有文字編者僅 3 宗(且銀雀山漢簡祇編了第一函)4 種,即:張世超、張玉春《秦簡文字編》,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故各時期簡帛文字編的數量是極不平衡的,時間越往後所編的文字編越少,至魏晉則為零。究其原因,大概是人們認為楚簡帛文字辨識難度大,秦以後文字相對容易些,故多趨於編楚簡帛文字編。實際上,秦漢魏晉正是漢字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搜集整理這段時期的漢字,在漢字發展史研究方面正具有不可小視的重大價值。

二是有部分文字編是供書法學界使用的。如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此二者表現出明顯的為書法學界使用的編纂目的。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此二者也是書法學價值高於文字學價值。

三是有些是綜合性文字編,而不是專門整理彙編某批簡帛材料字形的成果。如: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等等。並且,這些綜合性文字編編纂的目的往往是供書法者使用,如上舉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和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既屬綜合性文字編,又是主要供書法學界使用的文字編。

## 二、當前簡帛文字編編纂存在的不足

四十年來簡帛文字編編纂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有其鮮明的特點。不過,任何一種科學研究工作都有一個完善的過程,現有文字編自然有其不足,有待完善的地方也不少。下面簡要言其一二。

(一)有的文字編直接采用原照片文字入編,影響了字編的實用性。簡帛文字的載體自然是簡牘或絹帛,故整理報告祇能采取將文字原件照像製版的形式來再現原件文字(實物文字),不可能像碑刻文字、甲金文字那樣使用拓片形式來再現原件文字,所以簡帛整理報告上的原件文字多不太清晰,甚至有的非常模糊。編纂簡帛文字編若將文字照片直接剪貼入編或直接複製入編,則文字編的可讀效果即可使用效果就會很差,如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就是采用直接剪貼入編的方法來編纂的,據作者言,僅剪貼照片文字他們就花了很大功夫,甚是辛苦,但該書的原簡文字如整理報告一樣,都有很濃的底色,從而大大影響了該書的實用性。

(二)有的文字編文字摹寫失真。現有的簡帛文字編,入編文字大都是采取手工摹寫原



件文字的方法,或若原整理報告有文字摹本,就直接複製原摹本文字入編。這樣的好處是“原件文字”清晰,可讀性很強,但若摹寫失真,則會影響甚至大大影響字編的質量,因為你所呈現的原文實際上已失真走樣了,無論是以之來作文字研究,還是用之於書法研究、書法臨摹,其價值已大打折扣了。此僅舉一例:張守中先生是臨摹出土文字的行家高手,有“天下第一摹手”之譽,他所編的《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就是采用手工摹寫原件文字入編的方法來編纂的,但是該書中的不少摹文都有程度不同的失真,試將該書卷一的“元”、“蔡”二字與原件照片字對比如下:

表一:《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元”、“蔡”二字與原件照片字對比表

字頭及原字出處	照片文字	張書摹文及該書頁碼	說 明
元 (編年記第5簡)		元 (第1頁)	末兩筆失真最為明顯。
蔡 (編年記第33簡)		蔡 (第6頁)	原字艸頭是左中低於右中,而摹文相反。 原字支的末筆書寫方向是左下往右上,而摹文則相反,是左上往右下。

由上可知,張書摹文與原件文字相比,已有明顯失真。可以想象,連張守中先生這樣的高超摹手的文字編摹文都有明顯失真,則其他此類文字編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由於現行簡帛文字編特別是早期文字編的入編文字大都采取的是手工摹寫原件文字的方法,故所呈現的原件文字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真,從而影響了文字編的質量。

(三)有些文字編辨識簡帛文字方面有誤。編纂文字編,首先要認准原件文字,這是最基礎的工作,整個文字編的工作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故此項工作十分重要。盡管簡帛整理者對原件文字已進行過比較全面的識讀隸定,但這並不等於說其釋文就百分之百正確,就無任何釋讀問題了,故在進行文字編編纂時,需要首先將整理報告釋文與原件文字進行認真校核,力求認准每一個字。一旦這一工作未做好,文字編的質量則必然會受到影響。此僅以陳松長先生《馬王堆簡帛文字編》舉一例來說明(此書屬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是秦漢簡帛文字編中質量較高者)。《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的《養生方》第82行有這樣一個字:



帛書整理者隸為“諗”。但細審此字,則知此字當隸為“諗”,即左從言,不從音。試將此字與帛書其他從“言”的字作一對比:



表二：“諄”與其他從“言”之字對比表

 (諄)	 (諛,《五行》290)
	 (諗,《戰國縱橫家書》257)
	 (誰,《繫辭》29)
	 (誤,《五行》263)
	 (識,《老子乙本》176)

通過對比可知此字左從言無疑,當釋“諄”。此字也見於《集韻·模韻》,音同都切,今音 tú。陳書依整理者之釋也將此字隸為“諄”(見陳書第 100 頁),顯然不確。<sup>①</sup>

(四)有些文字編文字歸部歸類不確。現行文字編大都按《說文》的 540 部以及簡文是否見於《說文》來歸簡帛文字的部類,這種做法是正確的,但或由於疏忽或對《說文》不太熟,有不少文字編入編文字的歸類不確。此仍僅以陳松長先生《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為例來說明,該書也是按《說文》來歸部類的,但有以下不盡妥當的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歸部不當。如“戾”字為《說文》未收字,此字從尸、矢聲<sup>②</sup>,陳書將“戾”字歸於“矢部”(第 215 頁),顯然不當,當歸“尸部”。

第二種情況是簡帛文字《說文》已見但誤歸於《說文》未見。如陳書將“菑”(第 32 頁)、“菑”(第 32 頁)、莖(第 33 頁)、葷(第 33 頁)諸字均歸於《說文》所無字,實際上,這些字均見於《說文》的《草部》。

第三種情況是誤合二字為一字以致歸部誤。如陳書第 49 頁將“戔”置於字頭“哉”下,即將“戔”、“哉”視為一字,不當。戔,小篆作“戔”,故又可隸為“戔”,《說文》歸於《戈部》:“傷

① 此字讀為“塗”,所在上下文為“(房中)治巾方”內容,該方“諄”字所在下文為:“(將藥汁)諄(塗)所漬布。乾之,即善臧(藏)之。節(即)用之,操以循(插)玉筴(策),馬因驚矣。”

② 《玉篇》歸《尸部》,云:“戾,糞也,與矢同,俗又作屎。”《集韻》矧視切,上聲、書紐、旨韻。

也。从戈、才聲。”哉，小篆作“𢦏”，故又可隸爲“哉”，《說文》歸於《口部》：“言之間也。从口、戔聲。”故“戔”當歸於“戈部”，“哉”當歸於“口部”，方是。

### 三、簡帛文字編編纂的展望

展望未來，簡帛文字編當越加完善，應更加具有科學性與實用性。筆者從 2004 年起正式涉獵簡帛文字編工作，至今已 8 年有餘，我們計劃將秦漢吳晉簡逐一編製成文字編（我們稱“字形譜”），然後彙爲大型文字編，<sup>①</sup>下面結合我們的編纂體會來談談對簡帛文字編編纂工作的展望。

（一）要高度重視簡帛文字的釋讀。文字編，是所編材料文字釋讀的彙集，故編纂簡帛文字編，一定要首先認准文字，一旦簡帛文字辨釋錯誤，則會大大影響文字編質量。如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牝痔》259—260 行原整理報告釋文：<sup>②</sup>

一，冶麋（麋）蕪本、方（防）風、烏彖（喙）、桂皆等，漬以淳酒而坑之，大如黑叔（菽），而吞之。始食一，不智（知）益一，□<sub>259</sub>爲極。有可，以領傷。恒先食食之。<sub>260</sub>

按：上引原釋文第 260 行第 5 字，即“有可以領傷”之“以”，原帛文作：



顯然此字是“爲”字，不是“以”字，原整理者隸定誤。第 260 行第 1 字也是“爲”，原帛文作：



若將此行第 5 字與之作一對比，則第 5 字當釋“爲”更明。

裘錫圭先生指出，第 260 行第 5 字上下文釋文疑當讀爲“有（又）可以領傷”<sup>③</sup>，裘先生在研究此處帛文的句讀時惜也未能指出句中“爲”錯釋爲“以”字之誤。故若文字編按原整理者釋文將此字列於“以”字下，則大誤。

再如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諸傷》第 25—29 行原整理報告釋文：

一，令金傷毋痛，取薺孰（熟）乾實，燂（熬）令焦黑，（1）冶一；林（朮）根去皮，（2）冶二，凡二物并和，取三<sub>25</sub>指最（撮）到節一，醇酒盈一衰栝（杯），入藥中，撓飲。不者，酒半

① 這項工作也得到了重慶市社科基金 2009 年規劃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 2011 年項目的支持，謹致謝！

② 需訂正字下加着重號，下同。若有必要，則隨文注明簡號或帛書行第號。

③ 裘錫圭著：《馬王堆醫書釋讀瑣議》，《湖南中醫藥學學報》1987 年第 4 期，42—44 頁。

枯(杯)。已飲,有頃不痛<sub>26</sub>。復痛,飲藥如數。不痛,毋飲藥。藥先食後食次(恣)。(3)治痛時,毋食魚、彘肉、馬肉、龜<sub>27</sub>、蟲(虫)、葷、麻○洙采(菜),毋近內,病已如故。(4)治病毋時。壹(5)治藥,足(6)治病。藥已(7)治,裹以<sub>28</sub>繒臧(藏)。(8)治林(尢),暴(曝)若有所燥,(9)治。令<sub>29</sub>。

爲便於說明問題,以上我們對上引一段原整理報告釋文所有的“治”、“治”二字(凡9個)予以了編號,現將這9個字原整理報告的隸定與原帛文字列表對比如下,并在誤釋字後打上“?”:

表三:整理者所釋“治”、“治”二字與原帛字形對比表

原整理者所釋	治	治
原帛文字	(1) 𠄎	(3) 𠄎
	(2) 𠄎	(4) 𠄎
	(5) 𠄎(?)	(6) 𠄎
	(7) 𠄎(?)	(8) 𠄎(?)
	(9) 𠄎	

(5)的左下略有殘損,但左爲“水”無疑。“治”、“治”二字的區別在於左邊“治”從水、“治”從“彡”。通過對比可知,原整理報告釋文(5)(7)當釋“治”而誤釋爲了“治”,(8)當釋“治”而誤釋爲了“治”。上引釋文(5)、(7)、(8)三處當分別修正爲:“壹治〈治〉藥”、“藥已治〈治〉”、“治林(尢)”。




若文字編按原整理報告釋文來釋讀文字,則勢必錯誤,陳松長先生《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463頁“治”這一字頭下便按原整理者釋文誤將上引(7)的“治”列在該字頭下,自然不當。

(二)字形不能失真,最好引進電腦技術進行原實物文字處理。字形是文字編的靈魂,若字形失真,則文字編的質量會大打折扣。現在有了電腦技術,爲簡帛文字編的編纂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條件,但這並不等於說在使用電腦進行原實物文字處理時就可以掉以輕心。近二三十年來,電腦技術的發展,爲我們進行原實物文字處理帶來了極好的條件,我們可以藉之進行文字編編纂。但電腦是靠人來掌控的,即使有很好的軟件,也需要人的精心操作,才能

使原件文字不失真。如上所述,簡帛原件文字的載體是簡牘或絹帛,整理報告祇能採取將文字原件照像製版的形式來再現原件文字(實物文字),不可能像碑刻文字、甲金文字那樣使用拓片形式來再現原件文字,所以簡帛整理報告照片上的原件文字多不太清晰,甚至有的非常模糊。這就要求我們在利用電腦進行原照片的文字處理時要極其小心以求精確。據我們的體會,每一字的處理都應是小心翼翼的,有的字需要半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方能處理完畢,我們師生在處理簡帛文字時,由於長時間手握鼠標,致使手掌腫脹不堪,而一天下來,也最多祇能處理二三十個字,所以,簡帛原件文字的處理又是一件十分辛苦甚至十分痛苦的事。

陳松長先生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是率先利用電腦技術來處理原件字形的,開了學界使用電腦技術來編纂文字編之先河,值得充分肯定。該書《凡例》云:“彙編之字頭嚴格按照原物照片取樣,然後經電腦處理統一大小,不添不改,盡量讓字形保存原形原貌。”這一原則當然是十分正確的。但可能是由於出於非一人而為的原因,也可能是初次引進電腦技術的原因,該書也有少量字形處理失真者,如上引《五十二病方》第28行“藥已治〈治〉”之“治”,陳書處理就有失真,現將原件文字及我們處理後的字,與陳書對比如下:

表四:“治”字原帛照片、處理後當作字形、陳書字形對比表

原帛作	
用電腦處理後當作	
陳書處理後的字形(第463頁)	

通過對比可知,陳書顯然已失真,特別是“治”字的左半部分失真最為明顯。

(三)要高度重視文字編的實用性。簡帛文字編是工具書,故一定要高度重視其實用性。要考慮到文字編首先是供文字研究者使用的工具書,所以要高度重視文字編為文字學服務首先應當反映出文字學信息這一宗旨,有鑒於此,就最好要標注每一簡帛文字出現的頻率,以顯示每一字在簡帛時代所使用的頻度。這樣,也就反映出了哪些字是極高頻字,哪些字是高頻字,哪些字是中頻字,哪些字是低頻字;甚至還可以反映出哪個字或哪幾個字是最高頻字,哪些字是僅使用一兩次的極低頻字。這樣,就可以為漢字發展史的研究提供出極有用的信息。但是,目前祇有少數文字編標注了字頻,希望今後的文字編都能標出字頻,甚至可以將每一簡帛文字的出處都標注出來,如是,則更有利於漢字史研究。當然,標注字頻不光有利於漢字史的研究,也有利於簡帛的整理研究,有利於書法學及簡帛相關其他學科的研究。

(四)應編出成體系的簡帛文字編。如前所述,目前所編簡帛文字編已有一定數量,但遠遠不成體系,還比較零散,多是某一批簡帛的文字編,還沒有把整個楚簡帛、整個秦簡、整

個兩漢簡帛、整個吳簡文字彙為斷代字編的成果，更沒有把整個簡帛文字彙為一部像《金文編》那樣的大型字編。我們認為，簡帛數量汗牛充棟，字量十分龐大，文字編體系的構建應是自下而上的，應先編各批（宗）簡帛的字編，然後彙為斷代字編，最後彙為總編；不能僅搞選編，僅選擇一些文字入編就了事。祇有這樣由小到大、自下而上，才有可能編出成體系的高質量的簡帛文字編。下面，將我們構建的“秦漢吳簡系列字形譜”作一說明，以拋磚引玉，請教於方家：<sup>①</sup>

將大宗秦漢吳簡牘 23 宗中除已編纂了質量較好的字形譜以外的部分，逐一編纂成字形譜（以下簡稱“字形分譜”），其中秦簡字形譜 7 種，漢簡字形譜 13 種，吳簡字形譜 2 種；然後再彙集這些分譜和時賢有關成果，彙編為字形斷代譜 3 種；最後形成字形總譜 1 種。詳如下：<sup>②</sup>

### 一、字形分譜(21 種)：

1. 睡虎地秦簡字形譜
2. 龍崗秦簡字形譜
3. 周家臺秦簡字形譜
4. 龍崗秦簡字形譜
5. 嶽麓秦簡字形譜(已刊部分)
6. 里耶秦簡字形譜(已刊部分)
7. 放馬灘秦簡字形譜(待獲得紅外照片後方編纂)
8. 銀雀山漢簡[貳]字形譜
9. 武威漢簡字形譜
10. 尹灣漢簡字形譜
11. 居延漢簡字形譜
12. 居延新簡字形譜
13. 敦煌漢簡字形譜
14. 額濟納漢簡字形譜
15. 金關漢簡字形譜(已刊部分)
16. 張家山漢簡字形譜

① 因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正參與馬王堆簡帛的整理，該中心主任劉釗教授正在主持 2010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馬王堆簡帛字詞全編》，其中的“字編”就是文字編，故我們未將馬王堆簡帛列入本“系列字形譜”中。

② 以下各分譜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現正在完善，待分譜工作正式結束，則進入第二階段，即“字形斷代譜”編纂，繼而進入第三階段，即編纂“字形總譜”。

17. 武威漢代醫簡字形譜
18. 阜陽漢簡字形譜(已刊部分)
19. 孔家坡漢簡字形譜
20. 東牌樓漢簡字形譜
21. 三國吳簡大木簡字形譜
22. 三國吳簡竹簡字形譜(已刊部分)

## 二、字形斷代譜(2種):

1. 秦簡字形譜
2. 漢簡字形譜
3. 吳簡字形譜

## 三、字形總譜(1種)

秦漢吳簡字形總譜

如上所述,簡帛文字編編纂工作雖然十分辛苦,但很有必要做。因為秦漢吳是漢字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是漢字史上由古文字發展為今文字并且三國是楷書即將成熟的重要時期,<sup>①</sup>出土秦漢吳簡帛文字真實地反映了該時期漢字的面貌,全面系統地整理秦漢吳簡帛文字,編製成相互配套的系列字形譜,無論是對於古文字的研究和漢字發展史的研究以及全漢字庫的建立,還是對於簡帛的整理釋讀和簡帛所涉各學科的深入研究,以及對於大型字典的編纂和書法學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我們希望學界能有更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工作中,以促進漢字史研究,促進全漢字庫的建立,促進書法學研究,促進簡帛的整理研究和簡帛所涉相關學科的發展。

<sup>①</sup> 我們稱三國吳簡文字為“准楷書”。

## 日本の中國出土簡帛研究論著目録(二) (1910—2011)

[日]早稻田大學 柿沼陽平

### 六、論文

作者,論文名,雜誌名,刊期,出版社,出版年

1. 後藤朝太郎,中垂発掘の漢代の木簡について,書画之研究,1-5,1917
2. 後藤朝太郎,中央亜細亜発掘の漢代木簡に就いて(上),書画骨董雜誌,129,1919
3. 後藤朝太郎,中央亜細亜発掘の漢代木簡に就いて(下),書画骨董雜誌,130,1919
4. 玉井是博,燉煌戸籍残簡について,東洋学報,16-2,1927
5. 高田竹山,楼蘭発現燕策に附て,書道,2-10,雄山閣,1933
6. 馬衡,漢の“居延筆”について,書芸,4-2,1934
7. 高田柱下,スタインと木簡,書道,5-11,雄山閣,1936
8. 馬衡(徐子康譯),漢の居延筆を記す,書道,5-11,雄山閣,1936
9. 西川寧,漢人の墨迹について一卷頭影本の解説をかねて一,書道,5-11,雄山閣,  
1936
10. 羽田亨,「觚」の形式一卷頭十九頁左端の急就篇に関して一,書道,5-11,雄山閣,  
1936
11. 羽田明,天田弁疑,東洋史研究,1-6,1936
12. 原田淑人,支那古代簡札の編綴法に就いて,東方学報,6,1936



13. 石田幹之助, 支那の西陲に発見された漢晋間の木簡について, 書苑, 1-1, 1937
14. 玉井是博, 再び燉煌戸籍残巻について, 東洋学報, 24-4, 1937
15. 玉井是博, 再び燉煌戸籍残巻について〔正誤表〕, 東洋学報, 25-1, 1937
16. 藤原楚水, 図解書道史—流沙墜簡の文字—, 書苑, 3-9, 1939
17. 松田寿男, 漢魏時代に於ける西北シナの開発, 東亜論叢, 3, 東京文求堂, 1940
18. 瀧川政次郎, 流沙墜簡にみえる漢代法制の研究, 満州学報, 6, 1941
19. 平岡武夫, 竹冊と支那古代の記録, 東方学報, 13-2, 1942
20. 相澤春洋, 支那上代の書道(六朝まで), 書道, 11-1, 雄山閣, 1942
21. 谷村義雄, 行・草書の話, 書道, 12-7, 雄山閣, 1943
22. 森鹿三, 最近における中国学会の動向, 東光, 2, 1947
23. 西嶋定生, 漢代の土地所有制—特に名田と占田について—, 史学雑誌, 58-1, 1949
24. 松田寿男, 居延と白亭, 東洋史論叢 和田博士還暦記念, 1951
25. 宇都宮清吉, 西漢時代, 東方学, 2, 1951
26. 宇都宮清吉, 続漢志百官受俸例再考, 東洋史研究, 11-3, 1951
27. 大庭脩, 材官攷—漢代兵制の一斑—, 龍谷史壇, 36, 1952
28. 瀧川政次郎, 上代烽燧考, 史学雑誌, 61-10, 1952
29. 仁井田陞, 中国売買法の沿革, 法制史研究, 1, 1952
30. 松本善海, 秦漢時代における亭の変遷,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3, 1952
31. 西川寧, 中国人の墨迹, ミュージアム, 21, 1952
32. 川勝義雄, 居延漢簡年表,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33. 大庭脩, 漢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昇進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34. 大庭脩, 挾令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35. 岡崎敬, 漢代辺境兵士の被服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36. 吉田光邦, 弓と弩,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37. 米田賢次郎, 漢代の辺境組織—燧の配置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38. 米田賢次郎, 中国古代学界の展望(4) 居延漢簡とその研究成果(1), 古代学, 2-3, 1953
39. 平中苓次, 居延漢簡と漢代の財産税, 立命館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 1, 1953
40. 森鹿三, 長沙出土の漢簡,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41. 森鹿三, 関嗇夫王光,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42. 森鹿三, 居延漢簡研究序説, 東洋史研究, 12-3, 1953
43. 森鹿三等, カラホト附近出土漢代文書整理ならびにそれによる漢代史の総合的研

究,総合研究報告集録人文篇,昭和27-28年度,1953

44. 西村元佑,漢代の徭役制度,東洋史研究,12-5,1953
45. 伊藤道治,漢代居延戦線の展開(付 居延烽燧表),東洋史研究,12-3,1953
46. 中田薫,「支那律令法系の発達について」補考,法制史研究,1,1953
47. 大庭脩,漢代の関所とパスポート,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論叢,16,1954
48. 大庭脩,漢代官吏の勤務規定—休暇を中心として—,聖心女子大学論叢,4,1954
49. 梅原末治,近時出現の文字資料,書道全集,1,平凡社,1954
50. 米田賢次郎,漢代辺境兵士の給与について,東方学報,25,1954
51. 米田賢次郎,中国古代学界の展望(5) 居延漢簡とその研究成果(2),古代学,3-2,1954
52. 日比野丈夫,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いて,東方学報,25,1954
53. 石田幹之助,支那西陲出土の簡牘,定本書道全集,3,河出書房,1954
54. 松田寿男,東西交通史における居延についての考,東方学論集,1,1954
55. 藤枝晃,漢簡職官表,東方学報(東京),25,1954
56. 西川寧,王羲之前期—李柏文牘稿を中心として—,定本書道全集,3,河出書房,1954
57. 岩井大慧,オーレル・スタイン卿第三次中亜探検将来文書考釈,学燈,51-10,1954
58. 原田淑人,急就篇—二千年前の速成教科書—,読書春秋,5-9,1954
59. 大島利一,屯田と代田,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0. 大庭脩,漢の嗇夫,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1. 吉田光邦,漢簡二題,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2. 米田賢次郎,帳簿より見たる漢代の官僚組織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3. 木村重信,ニジェリアの絵画と木簡—その心性と触覚性—,墨美,46,墨美社,1955
64. 内野熊一郎,漢碑漢簡の資料性,中国文化研究会会報,5-1,1955
65. 仁井田陞,スタイン第三次中亜探検将来の中国文書とマスペロの研究—法律経済史料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64-6,1955
66. 日比野丈夫,郷亭里についての研究,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7. 森鹿三,令史弘に関する文書,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8. 藤枝晃,釈「見署用穀」ほか—「長城のまもり」訂誤—,東洋史研究,14-1、2,1955
69. 藤枝晃,長城のまもり—河西地方出土の漢代木簡の内容の概観—,『遊牧民族の研究』ユーラシア学会研究報告,1955
70. 日比野丈夫,スタイン第三回中亜探検采集木簡,墨美,57,墨美社,1956

71. 森鹿三, 長沙出土の竹簡, 墨美, 55, 墨美社, 1956
72. 松井如流, 木簡の書法, 書品, 68, 1956
73. 澤谷昭次, 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図卷, 定本書道全集, 1, 河出書房, 1956
74. 大庭脩, 漢の官吏の兼任について, 聖心女子大学論叢, 9, 1957
75. 日比野丈夫, 漢の西方発展と両関開設の時期について, 東方学報, 27, 1957
76. 森鹿三, 居延簡に見える馬について, 東方学報, 27, 1957
77. 森鹿三, 居延出土の木簡, 墨美, 60, 墨美社, 1957
78. 大庭脩, 爰書考, 聖心女子大学論叢, 12, 1958
79. 瀧川政次郎, 短冊考一 弘田柵址出土の木札について一, 古代学, 7-2, 1958
80. 米田賢次郎, 大庭脩, 敦煌・居延出土漢簡, 書道全集 2, 平凡社, 1958
81. 米澤嘉圃, 漢代における書と画との関係, 書道全集月報, 19, 1958
82. 森鹿三, 漢晋の木簡, 書道全集, 2, 平凡社, 1958
83. 森鹿三, 居延出土の一冊書について, 石浜先生古希記念東洋学論叢, 1958
84. 西村元佑, 漢代の騎士, 龍谷史壇, 44, 1958
85. 内藤乾吉, 米田賢次郎, 樓蘭出土魏晉簡, 書道全集, 3, 平凡社, 1959
86. 森鹿三, 居延漢簡の集成一とくに第二亭食簿について一, 東方学報, 29, 1959
87. 森鹿三, 樓蘭出土李柏文書について, 書道全集, 3, 平凡社, 1959
88. 森鹿三, 西域出土の書蹟, 書道全集, 3, 平凡社, 1959
89. 森鹿三, 李柏文書の出土地, 龍谷史壇, 45, 1959
90. 森鹿三, 居延の早期簡, 墨美, 92, 墨美社, 1959
91. 市川任三, 亭長と游檄, 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 2, 1959
92. 藤枝晃, 木簡の字すがた, 墨美, 92, 墨美社, 1959
93. 大庭脩, 漢代官吏の辞令について,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10-1, 1960
94. 森鹿三, 居延出土の卒家属廩名籍について, 立命館大学, 18, 1960
95. 森鹿三, 新刊《居延漢簡甲編》によせて上、下, 書報, 22、23, 極東書店, 1960
96. 市川任三, 亭長と游檄(二), 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 3, 1960
97. 大庭脩, 居延出土の詔書冊と詔書断簡について,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論叢, 52, 1961
98. 森鹿三, 敦煌・居延出土の漢曆について, 史泉, 22, 関西大学史学会, 1961
99. 森鹿三, 居延漢簡とくにウラン・ドルベルジン出土簡について, 史林, 44-3, 1961
100. 田中有, 有紀年漢簡資料年表, 漢文学会会報, 20, 1961
101. 田中有, 漢牘研究史年表, 漢魏文化, 2, 1961

102. 大庭脩, 史記三王世家について—漢代公文書の様式よりみた研究覚書—, 史泉, 23, 23, 関西大学史学会, 1962
103. 飯島春敬, 書の生態, 西域出土木簡と残紙, 書芸文化院, 1962
104. 米田賢次郎, 秦漢帝国の軍事組織, 古代史講座, 5, 学生社, 1962
105. 青山杉雨, 西域出土の書蹟が今日の書道に与えた影響, 西域出土木簡と残紙, 書芸文化院, 1962
106. 田中有, 民俗思想に関する簡牘資料, 漢魏文化, 3, 漢魏文化研究会, 1962
107. 大庭脩, 漢代詔書の形態について, 史泉, 26, 関西大学史学会, 1963
108. 米田賢次郎, 中国古代の肥料について—二年三毛作成立の一側面—, 滋賀大学学芸学部紀要(社会科学), 13, 1963
109. 米田賢次郎, 漢魏屯田と晋の占田・課田, 東洋史研究, 21-4, 1963
110. 森鹿三, 居延出土の王莽簡, 東方学報, 33, 1963
111. 市川任三, 漢代における居延甲渠戦線の展開, 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 6, 1963
112. 田中有, 有紀年簡を中心とする無紀年漢簡資料(一), 漢魏文化, 4, 1963
113. 尾形勇, 漢代屯田制の一考察—特に武帝・昭帝期を中心に—, 史学雑誌, 72-4, 1963
114. 大庭脩, 魏晉南北朝告身雑考—木から紙へ—, 史林, 47-1, 1964
115. 林巳奈夫, 長沙出土戦国帛書考, 東方学報, 36, 1964
116. 市川任三, 居延簡印章考,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5, 無窮会, 1964
117. 田中有, 漢簡隸書考—八分の完成—, 内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学論集, 1964
118. 永田英正, 居延漢簡縫墜考—とくに甲渠候官を中心として—, 東方学報, 36, 1964
119. 池田末利, 紹介〈武威漢簡〉, 書報, 4, 極東書店, 1965
120. 大庭脩,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について—漢代律令研究之一—, 史泉, 30, 関西大学史学会, 1965
121. 市川任三, 前漢に於ける張掖郡の都尉に就いて,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6, 無窮会, 1965
122. 尾形勇, 漢代に於ける「姓」と身分—中国古代奴隸制に関する一考察—, 歴史学研究, 298, 1965
123. 好井隆司, 秦漢帝国の構造について, 歴史学研究, 312, 1966
124. 林巳奈夫, 長沙出土戦国帛書考補正, 東方学報, 37, 1966
125. 市川任三, 漢牘曆譜考, 都立武蔵丘高等学校研究紀要, 1, 1966
126. 原田淑人, 東と西(九)中国古代木簡書の一様式觚について, 聖心女子大学論叢,

27, 1966

- 127. 林巳奈夫等, 図版解説 信陽出土竹簡, 武威出土木簡, 書道全集, 26, 平凡社, 1967
- 128. 森鹿三, 新出土木簡・石刻について, 書道全集, 26, 平凡社, 1967
- 129. 市川任三, 兩漢亭名拾遺, 立正大学教養部紀要, 1, 1967
- 130. 田中利明, 儀礼の“記”の問題—武威漢簡をめぐる—, 日本中国学会報, 19, 1967
- 131. 尾形勇, 漢代における「臣某」形式—古代帝国の君臣関係について—, 史学雑誌,

76-8, 1967

- 132. 佐藤武敏, 漢代の戸口調査, 集刊東洋学, 18, 1967
- 133. 米田賢次郎, 漢代田租查定法管見, 滋賀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17, 1968
- 134. 米田賢次郎, 良家子雜感, 東洋史研究, 26-4, 1968
- 135. 片倉讓, 漢代の士伍, 東方学, 36, 1968
- 136. 市川任三, 前漢辺郡都尉考, 立正大学教養部紀要, 2, 1968
- 137. 市川任三, 漢牘改元考,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無窮会), 7, 1968
- 138. 大庭脩, 前漢の節について—將軍仮節の前提—,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2, 1969

- 139. 大庭脩, 漢の銅虎符と竹使符, 鎌田博士還暦記念歴史学論叢, 1969
- 140. 市川任三, 簡牘紀年譜, 立正大学教養部紀要, 3, 1969
- 141. 藤枝晃, 樓蘭文書札記, 東方学報, 41, 1970
- 142. 永田英正, 礼忠簡と徐宗簡について—平中氏の算賦申告書説の再検討—, 東洋史

研究, 28-2, 3, 1970

- 143. 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帳集録,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 19-4, 1971
- 144. 大庭脩, 漢の中郎将・校尉と魏の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 史泉, 42, 関西大学史学会, 1971

- 145. 林巳奈夫, 長沙出土楚帛書十二神的由来, 東方学報, 42, 1971
- 146. 貝塚茂樹, 二千百年前の中国—長沙馬王堆古墳の奇迹—, 中央公論, 87-10, 1972
- 147. 長谷川修等, 新発見漢代墳墓の謎—二千一百年前の墳墓は語る—, 芸術新潮, 23,

1972

- 148. 宮川寅雄、関野雄等, 長沙漢墓の奇迹—よみがえる軟侯夫人の世界—, 週刊朝日,

9, 1972

- 149. 日原利国, 春秋公羊伝における俠気の礼賛—所引の説話をめぐって—, 日本中国学会報, 24, 1972

- 150. 西川寧, すいすいと軽い筆勢, 週刊朝日増刊, 9, 10, 1972

151. 永田英正, 漢代の結婚の生態, 週刊朝日増刊, 9, 10, 1972
152. 池田雄一, 漢代における郷について, 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 18, 1973
153. 大庭脩, 大英博物館の敦煌漢簡, 古代史講座月報, 7, 学生社, 1973
154. 宮崎市定, 漢代長沙王国年表, 史林, 56-2, 1973
155. 鶴木利雄, 中国文学の発展過程における漢代隸書の構造, 富山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21, 1973
156. 林已奈夫, 楚の竹簡と竹簡用具青銅工具, 中華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覽図録, 1973
157. 林已奈夫,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の帛画, ミュージアム, 267, 1973
158. 林已奈夫, 佩玉と綬一序説一, 東方学報(京都), 45, 1973
159. 那珂正, 中国人の天・地・人思想—漢代の彩色絹絵をめぐって—, 季刊現代中国, 6, 1973
160. 森鹿三, 漢晋の簡牘, 書道芸術, 別巻3, 中央公論社, 1973
161. 藤枝晃, 竹簡・木簡の作り方, アサヒグラフ臨時増刊, 6, 1973
162. 土居淑子, 馬王堆一號漢墓について—中国におけるその後の研究の紹介—, 古美術, 42, 1973
163. 永田英正, 漢字の発生と展開, ENERGY(エナジー), 10-2, 1973
164. 永田英正, 居延漢簡にみる候官についての一試論—破城子出土の〈詣官〉簿を中心として—, 史林, 56-5, 1973
165. 大庭脩, 敦煌漢簡釈文私考,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23-1, 1974
166. 林已奈夫,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副葬の食物, ミュージアム, 280, 1974
167. 土居淑子, その後の馬王堆一號漢墓, 古美術, 44, 1974
168. 永田英正, 居延新簡の集成——破城子(ム・ドルベルジン)出土の定期文書——, 東方学報, 46, 1974
169. 永田英正, 居延漢簡の集成二—破城子(ム・ドルベルジン)出土の定期文書二(完)—, 東方学報, 47, 1974
170. 岸本良彦, 呂氏春秋における政治思想の一問題,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1, 1975
171. 池田雄一, 馬王堆出土古地図と漢代の村, 歴史と地理, 242, 山川出版社, 1975
172. 大庭脩, 漢代の決事比—王杖十簡配列の一案—,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25, 関西大学文学会, 1975
173. 大庭脩, 漢代史研究の資料としての木簡, 世界史のしおり, 75-5, 帝国書院, 1975

174. 大庭脩, 森鹿三先生と木簡研究, 東洋学研究 居延漢簡篇, 同朋舎, 1975
175. 今枝二郎, 馬王堆出土『老子』古寫本について, 大正大学研究紀要(文学部、仏教学部), 61, 1975
176. 金谷治, 新出土の竹簡〈孫子〉について, 図書, 4, 岩波書店, 1975
177. 井口大介, 虎符の変遷と唐代の符節制度について, 城西人文研究, 3, 1975
178. 藤枝晃, 敦煌学の現段階, 図書, 5, 岩波書店, 1975
179. 小倉芳彦, ナカミとコロモ—馬王堆三号墓帛書地図を読む, 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月報, 6, 1975
180. 越智重明, 家と家人,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4, 1975
181. 安部道子, 楚の令尹について, 東海史学, 10, 1976
182. 波多野太郎, 馬王堆出土老子考, 東方宗教, 47, 法蔵館, 1976
183. 池田末利, 古代中国思想における宗教の性格, 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模索, 創文社, 1976
184. 大庭脩, 中国出土の簡牘について, 第一回木簡研究集会記録, 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 1976
185. 大塚彰一郎, 商鞅と韓非の農戦思想について, 漢文学会会報國學院大學, 22, 1976
186. 島邦男, 馬王堆老子から見た河上公本, 集刊東洋学, 36, 1976
187. 殿村晋一, 古代中国の農業, 商学研究年報, 1, 1976
188. 東晋次, 漢代における家族と郷里,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4, 1976
189. 渡辺信一郎, 中国における律礼制と社会構成, 歴史学研究, 別冊, 1976
190. 福井文雅, 中国思想研究の在り方について, 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模索, 創文社, 1976
191. 福井重雄, 漢代における策書の形式, 奥田慈應先生喜寿記念 仏教思想論集, 平楽寺書店, 1976
192. 福井重雅, 漢代における対策の書式, 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模索, 創文社, 1976
193. 岡本光生, 墨家の人間観,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2, 1976
194. 好并隆司, 漢代皇帝支配秩序の形成, 東洋史研究, 35-2, 1976
195. 好并隆司, 湖北江陵鳳山西漢墓出土の十号墓竹木簡牘について, 歴史学研究, 436, 1976
196. 和田萃, 東アジアの古代都城と葬地, 古代国家の形成と展開, 吉川弘文館, 1976
197. 江村治樹, 西漢官僚における「覧」と「能」,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4, 1976
198. 江頭広, 先秦官職資料(第一部), 佐賀大学教育学部研究論文集, 24-1, 1976



199. 金谷治,中国自然観の研究所説,集刊東洋学,35,1976
200. 金谷治,帛書『老子』について—その資料性の初歩的吟味—,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模索,創文社,1976
201. 井口喜晴,漢代の鉄製武器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1976
202. 栗原圭介,春秋時代における祭祀観念の形成,日本中国学会報,28,1976
203. 木村英一,馬王堆出土の帛書老子について,追手門学院大学創立十周年記念文集(文学部篇),1976
204. 浅野祐一,『墨子』尚同論の構造,文化(東北大・文),40-1,2,1976
205. 浅野祐一,『墨子』尚賢論の特性について,国学院雑誌,77-6,1976
206. 日原利国,王道から霸道への転換,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模索,創文社,1976
207. 山室三良,孔子の思想とその時代,福岡大学人文論叢,8-2,1976
208. 山田統,秦王と篁,国学院雑誌,77-11,1976
209. 山田巖,始皇帝と儒家,宇都宮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6,1976
210. 上原淳道,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の帛画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古代史研究,4,雄山閣,1976
211. 石川三佐男,中国古代に於ける燕の宗教的意義と『詩経』燕燕篇の「興」について,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9,1976
212. 滝村陰一,〈アジア的〉国家の論理構造,展望,207,1976
213. 田中麻紗巳,『淮南子』の「自然」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36,1976
214. 武田秀夫,荀子の政治観,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模索,創文社,1976
215. 武者章,卜辞に見える咸戊と咸,史学,47-4,1976
216. 小野勝也,中国古代における文書主義の成立,東洋学術研究,15-6,1976
217. 原宗子,いわゆる“代田法”の記載をめぐる諸解釈について,史学雑誌,85-11,1976
218. 中村充一,秦代の「賜死」,東洋史論集 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事業会東洋史論集編集委員会,1976
219. 中林史朗,鬼神の性格に関する一考察,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15,1976
220. 滋賀秀三,中国古代の刑罰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石井良助先生還暦祝賀 法制史論集,創文社,1976
221. 池田雄一,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陂・小渠・井戸灌漑について—馬王堆出土駐軍図の紹介によせ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1,1977
222. 池田雄一,商鞅の県制,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84,1977

223. 赤井清美, 馬王堆一号漢墓(并解説), 漢簡第12巻 馬王堆漢簡併解説, 書道資料集成, 12, 東京堂出版社, 1977
224. 赤塚忠,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風の信仰と五行説, 二松学舎大学論集, 創立百周年記念, 1977
225. 船越昭生, 近年出土の漢代地図について—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地図と和林格爾出土壁画地図, 鷹陵史学, 3, 4, 1977
226. 大庭脩, 雲夢睡虎地竹書秦律の研究,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27-1, 1977
227.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木簡のかたち—, 日本美術工芸, 460, 1977
228.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2)—木簡のはたらき—, 日本美術工芸, 461, 1977
229.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3)—木簡出土の記録—, 日本美術工芸, 462, 1977
230.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4)—今世紀における木簡の発掘1—, 日本美術工芸, 463, 1977
231.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5)—今世紀における木簡の発掘2—, 日本美術工芸, 464, 1977
232.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6)—木簡の内容1 法律—, 日本美術工芸, 465, 1977
233.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7)—木簡の内容2 書籍—, 日本美術工芸, 466, 1977
234.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8)—木簡の内容3 遺策—, 日本美術工芸, 467, 1977
235.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9)—木簡の内容4 文書その一—, 日本美術工芸, 468, 1977
236.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0)—木簡の内容5 詔書—, 日本美術工芸, 469, 1977
237.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1)—木簡の内容6 下達文書—, 日本美術工芸, 470, 1977
238.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2)—木簡の内容7 上申文書—, 日本美術工芸, 471, 1977
239. 大庭脩, 臨沂竹簡兵書と兵家, 咄咄, 8, 1977
240. 大庭脩, 木簡, 講座・飛鳥を考える2, 創文社, 1977
241. 多田狷介, 戦国・秦漢期における共同体と国家, 史潮, 新2, 1977
242. 飯島和俊, 漢初期の官吏任用における二・三の問題, 中央大学大学院論究, 8, 1977
243. 宮川寅雄, 最近の中国古文物に接して, 古美術, 52, 1977
244. 古賀登, 中国古代史の時代区分問題と雲夢出土の秦簡, 史観, 97, 1977
245. 谷口満, 祝融諸子伝承の成立, 文化(東北大), 40-3・4, 1977
246. 関野雄, 新中国における考古学の成果, 法制史学, 29, 1977
247. 好井隆司,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山川神祭祀の変貌, 岡山大学法文学部学術紀要史学篇, 38, 1977

248. 吉田光邦,中国古代の技術観・自然観,東洋学術研究,16-2,1977
249. 今枝二郎,馬王堆漢墓『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について,大正大学研究紀要(文学部、仏教学部),63,1977
250. 堀毅,雲夢出土の秦簡の基礎的研究,史観,97,1977
251. 栗原圭介,秦・漢における王制篇成立の思想的背景,大東文化大学紀要人文科学,15,1977
252. 栗原圭介,古代祭祀に見える報祭の系譜,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16,1977
253. 栗原圭介,禋祀儀禮の原初形態遡源考,東洋研究,46,1977
254. 饒宗頤,出土文字資料から見た秦代の文学,東方学,54,1977
255. 山本達郎,敦煌発見の籍帳にみえる「自田」,東方学,53,1977
256. 上田早苗,『史記』の構成と黄老思想,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20,1977
257. 松清秀一,前漢書体史の基礎的考察—1・馬王堆出土帛書,和洋国文研究,13,1977
258. 藤枝晃,漢簡研究の現状,第二回木簡研究集会記録,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1977
259. 西川寧,帛“数”—嶧山刻石・詛楚文・馬王堆帛書—,書品,258,1977
260. 小口彦太,中国古代における法とその担い手達,歴史評論,331,1977
261. 星野謙一郎,會盟考,响沫集,1977
262. 熊代幸雄,中国農法の展開,アジア経済調査研究双書,238,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7
263. 伊藤道治,蓋彝銘考,神戸大学文学部紀要,6,1977
264. 永田英正,江陵鳳凰山十号漢墓出土の簡牘—とくに算錢を中心として—,鷹陵史学,3,4,1977
265. 永田英正,江陵鳳凰山十号漢墓出土の簡牘,森鹿三博士頌寿記念論文集,同朋舎,1977
266. 原宗子,『管子』と郭崇燾,响沫集,1977
267. 越智重明,一畝二百四十歩制をめぐる,東方学,53,1977
268. 越智重明,漢時代の家をめぐる,史学雑誌,86-6,1977
269. 早苗良雄,『漢簡』居延漢簡(一)(二),史泉,51,1977
270. 斎藤忠,古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葬送儀礼,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論集,1,1977
271. 中林史朗,西漢時代に於ける益州について,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16,1977
272. 滋賀秀三,武威出土王杖十簡の解釈と漢令の形態,国家学会雑誌,90-3,4,1977
273. 安田晴彦,前漢時代における河西置郡に就いて,東洋史苑,13,1978

274. 赤堀昭, 神農本草經に記載された薬功, 日本医史学雑誌, 241, 1978
275. 赤堀昭, 新出土資料による中国医薬古典の見直し, 漢方の臨牀, 25, 1978
276. 赤堀昭, 武威漢代医簡について, 東方学報, 50, 1978
277. 大久保莊太郎, 漢帛書の書について, 羽衣学園短期大学研究紀要, 14, 1978
278.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3)—木簡の内容8 旅券と送り状—, 日本美術工芸, 472, 1978
279.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4)—木簡の内容9 帳簿—, 日本美術工芸, 473, 1978
280.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5)—木簡の書—, 日本美術工芸, 474, 1978
281.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6)—木から紙へ—, 日本美術工芸, 475, 1978
282.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7)—新居延簡の発掘—, 日本美術工芸, 476, 1978
283. 大庭脩, 木簡のはなし(18)—日本の木簡をめぐって—, 日本美術工芸, 477, 1978
284. 大塚伴鹿, 商君の法と秦墓竹簡, 東方, 6, 1978
285. 島森哲男, 馬王堆出土儒家古佚書考, 東方学, 56, 1978
286. 稲葉一郎, 秦始皇の貨幣統一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37-1, 1978
287. 渡部武, 秦漢時代の謫戍と謫民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36-4, 1978
288. 渡辺信一郎, “仁孝”, 史林, 61-2, 1978
289. 宮川寅雄等, 馬王堆古墳と満城漢墓の全貌, 中国文明の原像(上),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78
290. 古賀登, 尽地力説・阡陌制補論,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23, 1978
291. 谷口満, 楚都邑考, 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 28-2, 1978
292. 谷口満, 王国維「秦都邑考」補辨, 北海道教育大学人文論究, 38, 1978
293. 好并隆司, 中国古代の家父長的家内奴隸制, 歴史学研究, 462, 1978
294. 好并隆司, 中国における皇帝権の成立と展開, 理想, 644, 1978
295. 江村治樹, 侯馬盟書考, 東洋史論集 内田吟風博士頌寿記念, 同朋舎, 1978
296. 金子修一,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皇帝祭祀の一考察, 史学雑誌, 87-2, 1978
297. 堀敏一, 中国の律令制と農民支配, 歴史学研究, 別冊特集, 1978
298. 堀毅, 秦漢刑名考—主として雲夢出土秦簡による—,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別冊4, 1978
299. 内山俊彦, 馬王堆帛書『経法』『十大経』『稱』『道原』小考, 東方学, 56, 1978
300. 若江賢三, 文帝による肉刑除去の改革, 東洋学術研究, 17-6, 1978
301. 森秀樹, 戦後秦漢期における「微」の思想, 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7, 1978
302. 石井明, 秦の始皇帝の鉄権, 東京大学教養学部教養学科教養学科紀要, 10, 1978

303. 町田三郎, 秦の思想統制について—雲夢秦簡ノート—, 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論集, 4, 1978
304. 小池一郎, 帛書老子文体考, 中国文学報, 29, 1978
305. 小笠原宣秀, 大谷探検隊員の風格, 龍谷史壇, 73, 74, 1978
306. 紙屋正和, 前漢時代の関と馬弩関, 福岡大学人文論叢, 10-2, 1978
307. 中村充一, 秦の客卿について, 歴史論集 生江義男先生還暦記念, 生江義男先生還暦記念歴史論集刊行委員会, 1978
308. 池田雄一, 中国古代の「社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東洋史・考古学論集 三上次男博士頌寿記念, 朋友書店, 1979
309. 船川豊,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法と共同体, 歴史学研究, 別冊特集, 1979
310. 大庭脩, 中国簡牘研究の現状, 木簡研究, 1, 1979
311. 島森哲男, 慎獨の思想, 文化, 42-3, 4, 1979
312. 飯島和俊, 「文無害」考—「睡虎地秦墓竹簡」を手がかりとして見た秦・漢期の官吏登用法—, 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 3, 1979
313. 古賀登, 雲夢睡虎地某喜墓の秦律等法律文書副葬事情をめぐって, 史観, 100, 1979
314. 谷口満, 秦興起の経済的要因, 中国文史哲学論集 加賀博士退官記念, 講談社, 1979
315. 海野一隆, 地図学的見地よりする馬王堆出土地図の検討, 東方学報(京都), 51, 1979
316. 金谷治, 古佚書『経法』等四篇について, 加賀博士退官記念 中国文史哲学論集, 講談社, 1979
317. 堀池信夫, 京房の六十律, 日本中国学会報, 31, 1979
318. 堀敏一, 中国古代の新史料発見と歴史の書きかた, 世界史のしおり, 1979-14, 1979
319. 山口久和, 中国古代の自然法思想, 東洋学術研究, 18-1, 1979
320. 山田慶兒, 『黄帝内経』の成立, 思想, 662, 1979
321. 山田勝芳, 近年の秦漢史研究をめぐって, 集刊東洋学, 42, 1979
322. 杉本憲司, 漢墓出土の文書について—特に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について—, 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 5, 1979
323. 田中有, 漢代遺策考—新出土資料を中心として—, 加賀博士退官記念 中国文史哲学論集, 講談社, 1979
324. 町田三郎, 雲夢秦簡「編年記」について, 九州中国学会報, 22, 九州中国学会, 1979

325. 武藤博久等,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校訂,懷德,49,1979
326. 穴澤辰雄,老子本体論考—〈帛書〉本による第一章の解釈—,加賀博士退官記念 中国文史哲学論集,1979
327. 伊藤伸,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老子甲本,書品,258,1979
328. 影山剛,中国古代における都市と商工業,歴史学研究,471,1979
329.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集成三,東方学報,51,1979
330.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にみえる帳簿類について—中国木簡学の発達—,第三回木簡研究集会記録,1979
331. 越智重明,漢時代の算賦をめぐって,三上記念論集,1979
332. 曾布川寛,崑崙山と昇仙図,東方学報(京都),51,1979
333. 紙屋正和,前漢時代の商賈と緡銭令,福岡大学人文論叢,11-2,1979
334. 重近啓樹,秦漢の国家と農民,歴史学研究,別冊特集,1979
335. 白須浄真,在地豪族・名族社会,講座敦煌,3,大東出版社,1980
336. 坂出祥伸,導引考—古代の養生術と医学とのかかわり—,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 東洋学論集,1980
337. 坂詰秀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の印象,月刊考古学ジャーナル,184,1980
338. 池田温,中国における国家形成,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17,1980
339. 池田温,中国の律令,八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4,1980
340. 稲葉一郎,桑弘羊の財政策,東洋史論叢 三田村博士古稀記念,立命館大学人文学会,1980
341. 渡辺信一郎,前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専制国家形態についての覚書,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158,1980
342. 河崎孝治,墨家の終期について,東洋学論集 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1980
343. 鶴間和幸,秦漢期の水利法と在地農業経済,歴史学研究,別冊特集,1980
344. 榎一雄,漢魏時代の敦煌,講座敦煌,2,大東出版社,1980
345. 江村治樹,春秋戦国時代の銅戈・戟の編年と銘文,東方学報,52,1980
346. 菊池英夫,中国法の「基本原理」についての従来の研究,歴史学研究,484,1980
347. 堀敏一,身分制と中国古代社会,駿台史学,50,1980
348. 堀敏一,晋泰始律令の成立,東洋文化,60,1980
349. 豊嶋陸,韓詩外伝に見える思想の源流,東洋学論集 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1980

350. 梁玩喆, 爵を通じて見た漢代の庶人考, 東洋史論叢 三田村博士古稀記念, 立命館大学人文学会, 1980
351. 美川修一, 所謂漢の高祖の功臣の動向について, 中国前近代史研究 栗原朋信博士追悼記念, 雄山閣, 1980
352. 初山明, 法家以前, 東洋史研究, 39-2, 1980
353. 初山明, 甲骨文中の“五刑”をめぐって, 信大史学, 5, 1980
354. 浦野俊則, 秦漢初の簡牘帛書の書体と隸書の成立, 二松学舎大学論集, 昭和 54 年度, 1980
355. 若江賢三, 秦漢時代の労役刑—ことに隸臣妾の刑期について—, 東洋史論, 1, 1980
356. 若江賢三, 秦漢時代の「完」刑について—漢書刑法志解説への一試論—, 愛媛大学法文論集(文学科編), 13, 1980
357. 杉村邦彦, 壁書考, 滋賀大国文, 18, 1980
358. 松崎つね子, 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竹簡「編年記」からみた墓主「喜」について, 東洋学報, 61-3, 4, 1980
359. 太田幸男, 湖北睡虎地出土秦律の倉律をめぐって その一, 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三部門, 31, 1980
360. 太田幸男, 中国古代国家成立に関するノート, 歴史評論, 357, 1980
361. 太田幸男, 商鞅変法の再検討・補正, 歴史学研究, 483, 1980
362. 太田有子, 古代中国における夫婦合葬墓, 史学, 49-4, 1980
363. 町田章, 中国古代の都城, 八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 3, 平凡社, 1980
364. 土居淑子, 秦漢の考古美術—新発見の遺迹から—, 和光大学人文学部紀要, 14, 1980
365. 小口彦太, 中国前近代の法と国制に関する覚書, 歴史学研究, 483, 1980
366. 小山満, 楼蘭主国胡那羨について, 創価大学創立十周年記念論文集, 創価大学出版会, 1980
367. 野本直, 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共同体」範疇の再審, 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上), 1980
368. 野村浩一, 東アジア文化圏における法の観念, 法とは何か, 1980
369. 伊藤徳男, 漢代塩鉄専売制の実施について, 東北学院大・論集(歴史学地理学), 10, 1980
370. 永田英正, 簡牘よりみたる漢代辺郡の統治制度, 講座敦煌, 3, 大東出版社, 1980



371. 永田英正, 中国における雲夢秦簡研究の現状, 木簡研究, 2, 1980
372. 永田英正, 新居延漢簡中の若干の冊書について, 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 3, 1980
373. 越智重明, 六朝の良・賤をめぐって, 史学雑誌, 89-9, 1980
374. 越智重明, 井田と轅田, 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 東洋学論集, 1980
375. 沼尻正隆, 呂氏春秋に見える道家者流, 漢学研究, 18, 19, 1980
376. 重沢俊郎, 秦代独裁権力の思想的源流とその評価, 中国研究, 113, 1980
377. 佐竹靖彦, 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家族的な社会秩序, 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報, 141, 1980
378. 佐竹靖彦, 秦国の家族と商鞅の分異令, 史林, 63-1, 1980
379. 池田温, 中国における簡牘研究の位相, 木簡研究, 3, 1981
380. 池田温, 中国歴代墓券略考, 東文研紀要, 86, 1981
381. 池田雄一,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管見, 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 26), 100, 1981
382. 池田雄一, 中国古代聚落の展開, 歴史学研究, 1981 年別冊特集, 1981
383. 赤堀昭, 『陰陽十一脈灸経』の研究, 東方学報, 53, 1981
384. 赤堀昭, 新出土医学資料—馬王堆医帛と武威医簡—, 書論, 1981
385. 村上嘉実, 漢墓新発見の医書と抱朴子, 東方学報(京都), 53, 1981
386. 大庭脩, 最近発見された漢—唐書書道史関係資料—, 書論, 18, 1981
387. 大庭脩, 中国簡牘称呼についての提言, 木簡研究, 3, 1981
388. 大庭脩, 居延新出「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書—爰書考補—, 東洋史研究, 40-1, 1981
389. 大塚勝美, 唐代法における別籍異財の禁律に就いて, 北九州大学法政論集, 8-3, 4, 1981
390. 島森哲男, 黄老思想の構造と位置—「経法」等四篇を読んで考える—, 集刊東洋学, 45, 1981
391. 島田正郎, 初の日中法制史研究者間の交流, 中国研究月報, 401, 1981
392. 渡辺信一郎, 呂氏春秋上農篇蠡測, 京都府立大学術報告人文, 33, 1981
393. 富田健之, 前漢武帝期以降における政治構造の一考察,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9, 1981
394. 岡本光生, 戦国末期から漢代初期にかけての墨家の様相, フィロソフィア, 69, 1981
395. 岡田功, 楚国と呉起变法, 歴史学研究, 490, 1981
396. 工藤元男, 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みえる大内と小内—秦の少府の成立をめぐって—, 史観, 105, 1981
397. 工藤元男, 秦の内史—主として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よる—, 史学雑誌, 90-3, 1981

398. 古賀玲子,漢代聚落の組織について,東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1981
499. 谷口孝之,中国古代昭穆制度発生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中国学会報,33,1981
400. 好并隆司,商鞅「分異の令」と秦朝権力,歴史学研究,494,1981
401. 好并隆司,中国古代山沢論の再検討,佐藤博士還暦記念 中国水利史論集,国書刊行会,1981
402. 吉田隆英,鬼市と異人,東方宗教,58,1981
403. 江村治樹,雲夢睡虎地出土秦律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40-1,1981
404. 江村治樹,戦国・秦漢簡牘文字の変遷,東方学報(京都),53,1981
405. 堀毅,秦漢時代の嗇夫について—『漢書』百官表と雲夢秦簡による一考察—,史滴,2,1981
406. 馬場公彦,二つの『孫子』をめぐる諸問題—銀雀山漢墓出土の竹簡資料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哲学,10,1981
407. 内山俊彦,陰陽・大極・聖人—繫辭伝その他について—,荒木教授退休記念 中国哲学史研究論集,葦書房,1981
408. 片山智士,長沙馬王堆一号漢墓出土の文字資料,書論 特集:中国書道史の新資料,18,1981
409. 片山智士,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の文字資料の研究,福岡教育大学紀要,30-5,1981
410. 平勢隆郎,“楚曆”小考,中山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版,1981-2,1981
411. 齊藤国治,前漢時代(206B~A23)の天文史料(1),科学史研究,138,1981
412. 齊藤国治,前漢時代(206B~A23)の天文史料(2),科学史研究,139,1981
413. 浅野裕一,道家思想の起源と系譜(下)—黄老道の成立を中心として—,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15,1981
414. 橋本敬造,先秦時代の星座と天文観測,東方学報(京都),53,1981
415. 森村謙一,新出土医藥資料における自然品目の探究,東方学報(京都),53,1981
416. 山田勝芳,鳳凰山十号墓文書と漢初の商業,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33,1981
417. 山田勝芳,均輸平準と桑弘羊—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財政と商業—,東洋史研究,40-3,1981
418. 山下竜二,皇帝の「家事」,中哲文学会報,6,1981
419. 石田秀美,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精神疾病観,日本中国学会報,33,1981
420. 松田秀一,中国律令期の蚕桑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について,史学雑誌,90-1,1981,
421. 湯浅幸孫,地券徵存考釈,中国思想史研究,4,1981

422. 西川靖二, 漢初における黄老思想の一側面, 東方学, 62, 1981
423. 相原俊二, 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東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1, 1981
424. 相原俊二, 秦の始皇帝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 東洋大・文史学科紀要, 35, 1981
425. 小倉肇, 上古漢語の音韻体系, 言語研究, 79, 1981
426. 熊谷治, 古代中国の朱について, 東方学, 61, 1981
427. 越智重明, 周礼の財政制度・田制・役制をめぐっ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9, 1981
428. 斎藤実郎, 李悝の所説に関する一考察, 史滴, 1, 1981
429. 中村充一, 秦王の即位と官僚の立場, 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下巻, 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 1981
430. 佐伯富, 塩から見たる中国古代史, 大谷大学研究年報, 33, 1981
431. 佐竹昭,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赦について一日中比較のための一試論一, 広島大学総合科学部紀要 I 地域文化研究, 7, 1981
432. 板野長八, 秦誓の作成, 史学研究(広島大), 154, 1982
433. 池田温, 中国における出土文字資料整理研究の近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の活動—, 東方学, 64, 1982
434. 池田雄一, 出土文物による最近の先秦史研究, 中国歴史学界の新動向, 刀水書房, 1982
435. 吹野安, 史記亀策伝補伝窺管, 東洋文化, 復刊 49、50, 1982
436. 大庭脩, 雲夢秦簡に関連して, 東方, 20, 1982
437. 大庭脩, 『居延漢簡甲乙編』の出版と漢簡研究, 東方, 22, 1982
438. 大庭脩, 『居延漢簡甲乙編』の出版と居延漢簡研究,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32-1, 1982
439. 大庭脩, 出土文物による最近の秦漢史研究, 中国歴史学界の新動向・新石器時代から現代まで, 刀水書房, 1982
440. 東晋次, 漢代の貴戚に関する覚書, 愛媛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Ⅱ部人文・社会科学, 14, 1982
441. 渡辺信一郎, 国家・共同体・小農民経営, 地域社会の視点, 1982
442. 工藤元男, 戦国秦の都官一主として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よる一, 東方学, 63, 1982
443. 鬼頭有一, 司馬遷の思想, 名古屋商科大学論集, 27-1, 1982
444. 韓養民(森博達譯), 秦置相邦・丞相考, 古代学研究, 97, 1982
445. 好并隆司, 商鞅变法の新解釈, 権力構造, 1982
446. 間瀬収芳, 雲夢睡虎地秦漢墓被葬者の出自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41-2, 1982
447. 江村治樹, 雲夢出土秦律と秦の地方自治, 人文, 25, 1982

448. 角谷定俊, 秦における青銅工業の一考察, 駿台史学, 55, 1982
449. 角田文衛, 呂太后と赤眉の衆, 古代文化, 34-1, 1982
450. 金谷治, 先秦における法思想の展開, 集刊東洋学, 47, 1982
451. 堀敏一, 漢代の七科謫とその起源, 駿台史学, 57, 1982
452. 堀敏一, 中国における律令制の展開, 東アジア世界, 6, 1982
453. 堀毅, 清・薛允升輯『漢律輯存』, 島田還暦記念, 1982
454. 米田賢次郎, 中国古代麦作考, 鷹陵史学, 8, 1982
455. 楠山修作, 漢代の算錢について, 東方学, 64, 1982
456. 初山明, 秦の隸属身分とその源流—隸臣妾問題に寄せて—, 史林, 65-6, 1982
457. 平井正士, 漢代に於ける儒家官僚の公卿層への浸潤, 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 国書刊行会, 1982
458. 浅野裕一, 道法を生ず—道法思想の展開—,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 16, 1982
459. 橋本由美, 賞について—告姦の場合—,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五, 5, 雄山閣, 1982,
460. 若江賢三, 漢代の「不道」罪について, 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希祝賀記念論集—, 1982,
461. 山田勝芳, 前漢武帝代の祭祀と財政, 東北大・教養・紀要, 37, 1982
462. 枅母昌三, 秦漢時代の労役に関する一考察—『史記』孝景本紀「男子二十而得傅」の検討を中として, 立命館史学, 3, 1982
463. 手塚隆義, 馬弩関考, 史苑, 41-2, 1982
464. 松崎つね子, 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の家族と国家,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五, 吉川弘文館、雄山閣、研文出版, 1982
465. 薮内清, 近年の考古学的発掘, 科学史からみた中国文明,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82
466. 薮内清, 馬王堆出土の五星占について, 科学史からみた中国文明,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82
467. 薮内清, 馬王堆三號墓の医書, 科学史からみた中国文明,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82
468. 薮内清,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の「五星占」について, 小野勝年博士頌寿記念 東方学論集, 龍谷大学東洋史学研究会, 1982
469. 田中有, 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老子』乙本と卷前古佚書, 書品, 264, 1982
470. 五井直弘, 城市の形成と中央集権体制, 歴史学研究, 別冊, 1982
471. 武田通治, 古代中国の地図と馬王堆出土地図, 地理, 27-11, 1982
472. 武田佐知子, 古代国家の形成と身分標識, 歴史学研究, 別冊, 1982

473. 影山剛, 桑弘羊の均輸法試論, 東洋史研究, 40-4, 1982
474. 越智重明, 前漢の財政につい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0, 1982
475. 越智重明, 漢時代の緡錢をめぐって, 東洋学報, 63-3, 4, 1982
476. 曾我部静雄, 復について, 日本歴史, 414, 1982
477. 沼尻正隆, 呂氏春秋にみえる誠信説, 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紀要, 26, 1982
478. 紙屋正和, 前漢郡県統治制度の展開について(上), 福岡大学人文論叢, 13-4, 1982
479. 紙屋正和, 前漢郡県統治制度の展開について(下), 福岡大学人文論叢, 14-1, 1982
480. 紙屋正和, 前漢時代の郡・国の守・相の支配権の強化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41-2, 1982
481. 中村充一, 范雎と王稽, 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 1982
482. 佐藤武敏, 『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と水利灌漑, 中国水利史研究, 12, 1982
483. 佐竹靖彦, 中国前近代史における共同体と共同体論についての覚え書, 人文学報, 1, 1982
484. 阿辻哲次, 「史書」と「史篇」, 静岡大学人文論集, 33, 1983
485. 奥崎裕司, 漢代の反乱における“民衆法”, 史潮, 新 14, 1983
486. 板野長八, 管仲の参国伍鄙の制を論じて商鞅の県の制に及ぶ, 東方学, 66, 1983
487. 柴田清継, 『呂氏春秋』の養生説と政治思想, 鹿島哲学会・哲学, 34, 1983
488. 渡部武, 漢代の画像に見える機織, 安田学園研究紀要, 23, 1983
489. 渡辺信一郎, 分田攷, 中国史像の再構成 国家と農民, 文理閣, 1983
490. 飯山正雄, 周代における簡作の形態とその書法について, 日本中国学会報, 35, 1983
491. 福宿孝夫, 馬王堆漢墓の総合研究, 宮崎大・教育紀要(人文科学), 54, 1983
492. 富谷至, 謀反—秦漢刑罰思想の展開—, 東洋史研究, 42-1, 1983
493. 富谷至, 秦漢の労役刑, 東方学報, 55, 1983
494. 富田健之, 漢代における『詔獄』の展開, 古代文化, 35-9, 1983
495. 高橋均, 「春秋事語」と戦国策士, 中国文化・漢文学会会報, 41, 1983
496. 好并隆司, 商君書徠民篇釈読, 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篇, 4, 1983
497. 好并隆司, 「封建」社会の崩壊と古代帝国, 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 1983
498. 久村因, 古梁州の湯泉について, 名古屋大学教養部紀要 A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7, 1983
599. 堀敏一, 中国初期の土地固有主義と土地取引の起源, 書斎の窓, 322, 1983
500. 堀毅, 秦漢刑政攷, 法制史研究, 33, 1983

501. 堀毅, 秦漢賊律攷, 慶應義塾創立 125 年記念論文集, 1983
502. 鈴木喜一, 戦国時代の君臣倫理, 日本中国学会報, 35, 1983
503. 楠山修作, 阡陌の研究再論, 東方学, 66, 1983
504. 浅野裕一, 古佚書「伊尹九主」の政治思想, 島大國文, 12, 1983
505. 浅野裕一, 秦漢帝国の法治主義,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 17, 1983
506. 森田邦博, 雲夢秦簡と韓非子, 中国哲学論集, 9, 1983
507. 山田勝芳, 均輸平準の史料論的研究(一), 歴史, 61, 1983
508. 上田早苗, 古代中国の都市, 講座考古地理学, 2, 1983
509. 水出泰弘, 戦国秦の「重一兩十二(十四)一珠」錢について—主として睡虎地秦簡による—, 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 7, 1983
510. 藤田勝久, 漢代における水利事業の展開, 歴史学研究, 521, 1983
511. 藤田勝久, 前漢時代の漕運機構, 史学雑誌, 92-12, 1983
512. 町田三郎, 李斯をめぐって, 中国哲学論集, 9, 1983
513. 新井光風, 睡虎地秦墓竹簡, 書品, 272, 1983
514. 伊藤徳男, 前漢の宗廟制, 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13, 1983
515. 伊藤敏雄, 魏晉期樓蘭屯戍の基礎的整理(一), 東洋史論, 5, 1983
516. 越智重明, 七科謫をめぐっ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1, 1983
517. 越智重明, 春秋戦国時代の隷属者をめぐっ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2, 1983
518. 越智重明, 均輸法をめぐって, 古代文化, 35-3, 1983
519. 重近啓樹, 秦漢の郷里制をめぐる諸問題, 歴史評論, 403, 1983
520. 水上健造, 商鞅「経済論」の一考察(1), 和光経済, 15-2, 1983
521. 竹内照夫, 游侠盜賊考, 中国哲学, 12, 1983
522. 佐藤佑治, 雲夢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地方行政, 中国史における社会と民衆 増淵竜夫先生退官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3
523. 安倍道子, 春秋楚国の申県・陳県・蔡県をめぐって, 東海大学紀要文学部, 41, 1984
524. 安居香山, 緯書の天文気象雑占の成立と展開, 識緯思想の総合的研究, 国書刊行会, 1984
525. 板野長八, 商鞅の変法を繞る老子と孟子, 史学研究, 162, 1984
526. 布目潮颯, 機密漏洩罪を通じて見た中国律令制の展開, 中国律令制の展開, 1984
527. 池田温, 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家族的な社会秩序 猛獣対策法規, 律令制の諸問題 滝川政次郎博士米寿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4

528. 池田温, 中国古代買田・買園券の一考察,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 山川出版社, 1984
529. 池田雄一, 李悝の法経について, 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 112, 1984
530. 池田雄一, 春秋戦国時代の罪刑法定化の動きと以吏爲師について, 中国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国家・社会との関係, 刀水書房, 1984
531. 川北靖之, 日唐律比較研究序説, 律令制の諸問題 滝川政次郎博士米寿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4
532. 大庭脩, 肩水金關出土の永始三年詔書冊について,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33-2, 1984
533. 稲葉一郎, 漢代の家族形態と経済変動, 東洋史研究, 43-1, 1984
534. 渡部武, 漢代の画像に見える市, 東海史学, 18, 1984
535. 渡部武, 中国古代の市, 月刊百科, 263, 1984
536. 福宿孝夫, 馬王堆漢墓の総合研究(2), 宮崎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 56, 1984
537. 岡田功, 戦国秦漢時代の約と律令について, 歴史学研究, 534(増刊号), 1984
538. 岡野誠, 中国法史の時代区分について, 中国律令制の展開, 1984
539. 高橋継男, 逸文唐令三条と唐戸令参考資料一条, 東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3, 1984
540. 工藤元男, 睡虎地秦墓竹簡の属邦律をめぐって, 東洋史研究, 43-1, 1984
541. 工藤元男, 馬王堆出土『戦国縦横家書』と『史記』, 中国正史の基礎的研究,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1984
542. 鶴間和幸, 中国古代の水系と地域権力, 佐藤博士退官記念 中国水利史論叢, 国書刊行会, 1984
543. 間瀬収芳, 秦帝国形成過程の一考察—四川省青川戦国墓の検討による, 史林, 67-1, 1984
544. 角谷定俊, 秦における製鉄業の一考察, 駿台史学, 62, 1984
545. 金谷治, 『管子』輕重篇の成立, 東洋史研究, 43-1, 1984
546. 金温権, 「苞」「贄」の用語に関する一考察, 史境, 9, 1984
547. 近藤則之, 戦国より漢初に至る春秋説話伝承の一側面—読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 中国哲学論集, 10, 1984
548. 菊池英夫, 律令法系の特質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 中国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国家・社会との関係, 刀水書房, 1984
549. 堀敏一, 計帳と戸籍に関する私見, 中国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国家・社会との関係, 刀水書房, 1984



550. 堀敏一,中国における律令法典の形成—その概要と問題点—,中国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国家・社会との関係—周辺諸民族の場合を含めて—,刀水書房,1984
551. 堀毅,漢律遡源攷,中国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4
552. 堀毅,唐律遡源攷—秦律における『一人有数罪』の規定を中心とする—,滝川政次郎博士米寿記念論集 律令制の諸問題,汲古書院,1984
553. 鈴木喜一,戦国時代の君臣関係,東方学,68,1984
554. 末次信行,漢代の地方統治政策について—地方長吏の在職期間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学,68,1984
555. 初山明,漢代豪族論への一視角,東洋史研究,43-1,1984
556. 浅野裕一,黄老道の政治思想—法術思想との対比—,日本中国学会報,36,1984
557. 若江賢三,睡虎地秦墓竹簡に見られる誣告反坐を通して見た貲財に関する一考察,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 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国書刊行会,1984
558. 山田勝芳,前漢武帝代の財政機構改革,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1,1984
559. 山田勝芳,中国古代中世の老人優遇策—王杖十簡と侍丁—,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41-1,1984
560. 山田勝芳,均輸平準の史料論的研究(二),歴史,62,1984
561. 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均の理念,思想,721,1984
562. 石川英昭,韓非子の法思想(三),鹿児島大学法学論集,20-1,1984
563. 水上健造,商鞅「経済論」の一考察(2),和光経済,17-1,1984
564. 太田幸男,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みえる「室」「戸」「同居」をめぐって,西嶋定生博士還暦記念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1984
565. 湯浅邦弘,秦の法と法思想—雲夢秦簡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中国学会報,36,日本中国学会,1984
566. 湯浅邦弘,秦律の理念,中国研究集刊,1,1984
567. 藤田勝久,「四民月令」の性格について,東方学,67,1984
568. 藤田勝久,前漢の徭役労働とその運営形態,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8,1984
569. 藤田勝久,中国古代の関中開発—郡県制形成過程の一考察—,佐藤博士退官記念 中国水利史論叢,国書刊行会,1984
570. 藤田勝久,中国古代の関中開発,佐藤博士退官記念 中国水利史論叢,国書刊行会,1984
571. 藤田忠,禘祭・袷祭の成立について,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8,1984
572. 鶴飼昌男,居延漢簡に見える文書の通伝について,史泉,60,1984

573. 尾形勇,「吹律定姓」初探,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山川出版社,1984
574. 尾形勇,中国の姓氏,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社会と習俗,学生社,1984
575. 梶山勝,前漢南越王墓出土の金印『文帝行璽』に関する一考察,古代文化,36-10,1984
576.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姓氏・婚姻・シャーマニズム・ト占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社会と習俗,学生社,1984
577. 原宗子,『管子』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流通経済大学論集,19-1,1984
578. 越智重明,秦漢時代の孝の一考察,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山川出版社,1984
579. 張晋藩(何天貴譯),中国法制史研究の現状と現存する主要な問題,比較法雑誌,17-4,1984
580. 中村充一,秦の公子,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国書刊行会,1984
581. 中村治兵衛,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巫覡,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社会と習俗,学生社,1984
582. 重近啓樹,秦漢における賦制の展開,東洋学報,65-1,2,1984
583. 佐藤武敏,前漢の戸口統計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1,1984
584. 佐原康夫,戦国時代の府・庫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1,1984
585. 安倍道子,楚の申県の変容をめぐって,西と東と,汲古書院,1985
586. 濱田英作,前漢の河西回廊への進出と諸郡の建置について,史観,112,1985
587. 池田雄一,前漢時代における西北経営と匈奴対策,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116,1985
588. 赤堀昭,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の湯と膏の調整に用いられた操作,日本医学雑誌,31-1,1985
589. 赤堀昭,治法をめぐる問題,新発見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 論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
590. 村山孚,長沙馬王堆漢墓—二千年前の古屍発見,中国 考古と歴史の旅,中央公論社,1985
591. 村上嘉実,五十二病方の人部薬,新発見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 論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
592. 大川富士夫,後漢代の会稽郡の豪族について,立正大学文学部論叢,81,1985
593. 大川俊隆,文字発展過程における偏傍添加字の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地,1985,
594. 大庭脩,中国における最近の漢簡研究,木簡研究,7,1985
595. 大庭脩,地湾出土の騎士簡冊—「材官攷」補正,末永先生米寿記念献呈論文集,

1985

596. 大庭脩, 近年出現した中国書道史の史料, 同朋, 同朋舎, 1985
597. 大櫛敦弘, 漢代の「中家の産」に関する一考察—居延漢簡所見の「賈・直」をめぐって—, 史学雑誌, 94-7, 1985
598. 稲葉一郎, 戦国秦の家族と貨幣経済, 戦国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5
599. 渡辺信一郎, 阡陌制論, 東洋史研究, 43-4, 1985
600. 飯島武次, 東周時代周室と秦の副葬陶器, 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歴史編, 平凡社, 1985
601. 飯尾秀幸, 中国古代の家族研究をめぐる諸問題, 歴史評論, 428, 1985
602. 飯尾秀幸,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国家と共同体, 歴史学研究, 547, 1985
603. 富谷至, 連坐制とその周辺, 戦国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 1985
604. 岡村秀典, 秦文化の編年, 古史春秋, 2, 1985
605. 高木智見, 春秋時代の結盟習俗について, 史林, 68-6, 1985
606. 宮川尚志, 中国史上の難民, 創価大・アジア研究, 6, 1985
607. 谷口義介, 春秋時代の藉田儀礼と公田助法, 史林, 68-1, 1985
608. 好并隆司, 商君書徠民・算地両篇よりみた秦朝権力の形成過程, 東洋史研究, 44-1, 1985
609. 鶴見尚弘, 中国封建社会論, 中世史講座 5, 1985
610. 鶴田一雄, 漢代石闕考, 新潟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 27-1, 1985
611. 吉本道雅, 春秋載書考, 東洋史研究, 43-4, 1985
612. 江田佳代子, 漢代の辺境防備と豪族, 青山学院大茅茨, 1, 1985
613. 末沢又彦, 韓非子の法思想, 秋田法政, 1, 1985
614. 牧秀明, 前漢時代の水旱災に対する救済策について, 立命館史学, 6, 1985
615. 楠山修作, 漢代における国家財政について, 史林, 69-3, 1985
616. 初山明, 爵制論の再検討, 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 178, 1985
617. 初山明, 秦の裁判制度の復元, 戦国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5
618. 大川俊隆, 文字發展過程における偏旁添加字の位置: 中山王諸器銘文を中心として, 中国研究集刊, 2, 1985
619. 平勢隆郎, 趙孟とその集団成員の「室」,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98, 1985
620. 浅野裕一, 帛書『五行篇』の思想史的位置—儒家による天への接近—, 島根大学教

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篇),19,1985

621. 若江賢三,漢代の穀価,東洋哲学研究所紀要,1,1985

622. 若江賢三,秦律における贖刑制度(上)—秦律の体系的把握への試論—,愛媛大学  
法文論集(文学科編),18,1985

623. 三條彰久,先秦辟雍小考,西と東と,汲古書院,1985

624. 山田慶兒,夜鳴く鳥,思想,736,1985

625. 山田慶兒,馬王堆漢墓出土医書三則,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 論考篇,京  
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

626. 山田慶兒,鍼灸と湯液の起源 古代医学形成の二つの位相,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  
料の研究 論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

627. 山田勝芳,均の理念の展開—王莽から鄭玄—,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43,1985

628. 水上健造,商鞅「経済論」の一考察(3),和光経済,17-2、3,1985

629. 松崎つね子,中国における農民反乱,中世史講座7,学生社,1985

630. 太田幸男,中国古代史研究の課題と方法に関する覚書,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三部  
門社会科学,37,1985

631. 湯浅邦弘,『尉繚子』の富国強兵思想,東方学,69,1985

632. 藤川正数,古代中国における礼説とその習俗,桜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論叢,10,1985

633. 田中有,簡牘・帛書に見る前漢初期の書法,東洋芸林論叢 中田勇次郎先生頌寿  
記念,1985

634. 王亜南(奥田秋夫監譯),中国地主経済封建制度論綱(1),広島経済大学経済研究  
論集,8-2、3,1985

635. 五井直弘,中国における最近の発掘,歴史評論,421,1985

536. 五井直弘,中国古代城堡・都城調査の近況,史潮,新16,1985

637. 小口彦太,中国の法と裁判,中世史講座4,1985

638. 小南一郎,大地の神話,古史春秋,2,1985

639. 伊藤徳男,循吏と循理,東北学院大論集(歴史学地理学),15,1985

640. 桜井謙介,新出土医薬関係文物について,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 論考  
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

641. 影山剛,桑弘羊の平準法試論,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歴史編,平凡社,1985

642. 影山輝国,思孟五行説—その多様な解釈と龐樸説—,東京大学教養学部人文科  
学科紀要,81,1985

643. 原宗子,雲夢秦簡における食料関係史料をめぐって,流通経済大学創立二十周年

記念論文集,流通経済大学出版会,1985

644. 越智重明,西周春秋戦国時代の諸侯の社,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4,1985

645. 曾我部静雄,庶人にして官に在る者,東洋学報,67-1・2,1985

646. 斎木哲郎,馬王堆帛書より見た道家思想の一側面—「経法」等四篇の古佚書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学,69,1985

647. 斎藤實郎,秦の始皇帝の泰山封禪,日本大学芸術学部紀要,14,1985

648. 斎藤秀昭,漢代における自首について,明治大・院・紀要,22,1985

649. 紙屋正和,前漢前半期の貨幣制度と郡県支配体制,福岡大学人文論叢,16-4,1985

650. 志野敏夫,漢の衛士と「饗遣故衛士儀」,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別冊哲学・史学編,11,1985

651. 佐原康夫,漢代の市について,史林,68-5,1985

652. 安倍道子,春秋後期の楚の「公」出現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5-2,1986

653. 坂出祥伸,導引の沿革,導引体要,谷口書店,1986

654. 濱田英作,西漢における匈奴降者に対する処置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哲学・史学編,12,1986

655. 池田温,中国古代の奴婢観,東洋史論叢 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刀水書房,1986

656. 池田温,中国古代契約文書の整理,中国朝鮮文書史料研究,1986

657. 池田雄一,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の秦律—王室の家法から国家法へ—,律令制 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汲古書院,1986

658. 池田雄一,睡虎地出土竹簡にみえる伍制について,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 東洋史論叢,刀水書房,1986

659. 川勝守,中国地方行政における県と鎮,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5,1986

660. 大庭脩,武威出土「王杖詔書・令」冊書,関西大学文学論集創立百周年記念号,1986

661. 飯島和俊,戦国秦の非秦人対策—秦簡を手掛かりとして見た—,戦国秦の社会構造,中村治兵衛先生古希記念 東洋史論叢,刀水書房,1986

662. 富田健之,内朝と外朝,新潟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27-2,1986

663. 富田健之,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尚書体制の形成とその意義,東洋史研究,45-2,1986

664. 高木智見,春秋時代の軍礼について,(名古屋大)東洋史研究室報告,11,1986

665. 工藤雅樹,日中比較古代文化史論の試み1,(宮城学院女子大・基督教文化研)研究年報,18,1986

666. 工藤元男, 中国古代の占い, 東書, 125, 1986
667. 工藤元男,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について, 史滴, 7, 1986
668. 古賀登, 唐代賦役制度の再検討, 律令制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 汲古書院, 1986
669. 古賀登, 唐代賦役制下の官賤民の負担, 東洋史論叢 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 刀水書房, 1986
670. 谷口満, 春秋楚鼎試論, 北海道教育大学人文論究, 47, 1986
671. 鶴間和幸, 秦帝国の形成と地域, 歴史と地理, 372, 1986
672. 横野秀昭, 中国古代の色による身分表示, 史学, 55-4, 1986
673. 江村治樹, 戦国三晋都市の性格,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 32, 1986
674. 金谷治, 新出資料と中国古代思想史, 追手門学院大学東洋文化学科年報, 1, 1986
675. 久富木成大, 「春秋左氏伝」における“免”字の用法と刑鼎の公開, 金沢大・教養論集(人文科学), 23-2, 1986,
676. 久富木成大, 釈神罰, 金沢大学教養部論集人文科学篇, 24-1, 1986
677. 酒井忠夫, 中国史上の氓と流氓, 中国史における乱の構図, 1986
678. 橘純信, 馬王堆漢墓《周易》異文に反映する方音的特徴, 漢学研究(日本大学), 24, 1986
679. 堀敏一, 古代中国における身分制と身分観念, 駿台史学, 67, 1986
680. 堀敏一, 唐戸令郷里・坊村・鄰保関係条文の復元をめぐって, 東洋史論叢 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 刀水書房, 1986
681. 堀敏一, 中国における良賤身分制の成立過程, 律令制 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 汲古書院, 1986
682. 堀毅,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法と慣習, 中央学院大学総合科学研究所紀要, 3-1, 1986
683. 堀毅, 秦簡物価考, 中央学院大学総合科学研究所紀要, 4-1, 1986
684. 堀毅, 秦漢法制史研究の歴史と現状, 現代経済・社会の歴史と理論 中央学院大学創立二十周年記念論集, 中央学院大学総合科学研究所, 1986
685. 堀毅,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考, 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年代記の研究, 1986
686. 栗原益男, 逸文からみた令についての若干の考察, 律令制, 1986
687. 林剣鳴(林世景譯), 中国木簡の出土とその研究の近況, 史滴, 7, 1986
688. 林克, 『素問』標本病伝体論の時刻制度, 漢方研究, 9, 1986
689. 初山明, 漢代結俸習俗考—石刻史料と郷里の秩序(1)—, 島根大学法文学部紀要(文学科編), 9-1, 1986
690. 清水康教, 関於六十支的吉凶, 福星, 復刊 119, 1986

691. 若江賢三,秦律における贖刑制度(下)—秦律の体系的把握への試論—,愛媛大学  
法文論集(文学科編),19,1986
692. 若江賢三,漢代の「不敬」罪について,中国史における乱の構図,雄山閣,1986
693. 山田勝芳,後漢時代の徭役と兵役,歴史,66,1986
694. 山田勝芳,「父老憚約束石券」と秦漢時代の父老,旧中国社会に於ける指導者層の  
研究,1986
695. 太田阿佐子,漢代における羽人について,青山学院大茅茨,2,1986
696. 太田幸男,睡虎地秦墓竹簡の「日書」に見える「室」「戸」「同居」をめぐって,東洋  
文化研究所紀要,99,1986
697. 藤田勝久,漢代の黄河治水機構,中国水利史研究,16,1986
698. 藤田勝久,馬王堆帛書『戦国縦横家書』の構成と性格,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19-  
2,1986
699. 藤田勝久,『史記』穰侯列伝に関する一考察—馬王堆帛書『戦国縦横家書』を手が  
かりとして—,東方学,71,1986
700. 町田三郎,管子「侈靡篇」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4-4,1986
701. 桐本東太,市にさけぶもの,史学,55-4,1986
702. 王亜南(奥田秋夫監譯),中国地主経済封建制度論綱(2),広島経済大学経済研究  
論集,9-1,3,1986
703. 細川一敏,中国における法思想の起源と論理,弘前大学人文学部文経論叢人文科  
学篇,21-3,1986
704. 伊藤徳男,再び漢代の塩鉄専売制について,古代文化,38-6,1986
705. 越智重明,漢時代の市をめぐって,史淵,122,1986
706. 越智重明,秦の国家財政制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5,1986
707. 曾布川寛,秦始皇帝陵と兵馬俑に関する試論,東方学報,58,1986
708. 斎木哲郎,秦儒の活動素描,日本中国学会報,38,1986
709. 紙屋正和,前漢時代における県の長吏の任用形態の変遷について,福岡大学人文  
論叢,18-1,1986
710. 中村治兵衛,律令制と郷里制,律令制—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汲古書院,1986
711. 重近啓樹,秦漢の兵制について,人文論集—静岡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科研究報  
告,36,1986
712. 佐藤三千夫,江陵雨台山楚墓について,白山史学,22,1986
713. 佐々木恵介,律令里制の特質について,史学雑誌,95-2,1986



714. 池田温, 東亜古代簿帳管見, 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 1, 1987
715. 池田雄一, 廷尉平と直指繡衣使者—漢代の司法行政一斑—, 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 32, 1987
716. 大庭脩, 敦煌凌胡隧址出土冊書の復原, 木簡研究, 9, 1987
717. 大櫛敦弘, 雲夢秦簡「日書」にみえる「困」について, 中国社会と文化, 2, 1987
718. 丹喬二, 中国学界における「古代」史分期問題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 1, 史叢, 40, 1987
719. 稲葉一郎, 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形成, 中国貴族制社会の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7
720. 富谷至, ふたつの刑徒墓—秦～後漢の刑役と刑期, 中国貴族制社会の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7
721. 岡田功, 漢代居延出土「塞上烽火品約」をめぐって, 東洋学報, 68-1, 2, 1987
722. 工藤元男, 二十八宿占(1)—秦簡「日書」筭記—, 史滴, 8, 1987
723. 古賀登, 『通点』所載天宝某載戸税収入の再検討, 東方学会創立40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 東方学会, 1987
724. 鶴間和幸, 漳水渠・都江堰・鄭国渠を訪ねて, 中国水利史研究, 17, 1987
725. 菅本大二, 馬王堆文物その後の研究動向—黄老思想研究の展開—, 新しい漢文教育, 5, 1987
726. 金谷治, 陰陽五行説の成立について, 東方学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 1987
727. 堀敏一, 中国古代編戸制の研究—とくに聚落の変遷について—, 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報, 29, 1987
728. 堀敏一, 雲夢秦簡にみえる奴隸身分, 東洋法史の探求, 汲古書院, 1987
729. 堀毅, 『漢書』刑法志考証, 中央学院大学総合科学研究所法学論叢, 1, 1987
730. 堀毅, 秦漢盜律攷, 東洋法史の探求 島田正郎博士頌寿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7
731. 李学勤(大庭脩譯), 新しく発見された簡帛と漢代初期學術史の若干の問題について, 東方学, 73, 1987
732. 豊島静英,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国家の発生について(試論), 歴史評論, 450, 1987
733. 栗原圭介, 古代中国の王権における「刑罰」の概念, 大東文化大学紀要人文科学, 25, 1987
734. 栗原圭介, 「礼」構造に見る月令的思考形態, 集刊東洋学, 57, 1987
735. 笠川直樹, 大川俊隆氏の「偏傍添加字説」批判, 中国研究集刊, 黄, 1987

736. 林咏荣,考在中日両国法制上之衍進及其問題,東洋法史の探求,1987
737. 内山俊彦,秦～漢初の道家と法家,中国古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認識,創文社,1987
738. 楠山修作,中国古代国家の成立—商鞅变法の一考察—,歴史学研究,571,1987
739. 浅野裕一,漢の帝国運営と黄老道(上),中国研究集刊,黄号,1987
740. 橋本敬造,顓頊暦元と歳星紀年次,東方学報(京都),59,1987
741. 山田勝芳,秦漢時代の傳と年齢,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47,1987
742. 山田勝芳,秦漢時代の大内と小内,集刊東洋学,57,1987
743. 上田早苗,「秦律」における責任,中国貴族制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
744. 湯浅邦弘,塩鉄論争に見る管子と董仲舒の思想,日本中国学会報,39,1987
745. 藤田勝久,『史記』戦国紀年の再検討—睡虎地秦簡『編年記』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愛媛大学教養部紀要,20,1987
746. 藤田勝久,戦国・秦代の軍事編成,東洋史研究,46-2,1987
747. 土居淑子,中国考古の近年の動向,アジア研究(和光大学),4,1987
748. 西川利文,後漢の官吏登用法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仏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紀要,15,1987
749. 西川素治,漢代の遺言状,中国古代の法と 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7
750. 西江清高,春秋戦国時代の湖南・嶺南地方,紀尾井史学,7,1987
751. 影山剛,権酤の制定とその歴史的背景—前漢朝の権酤と桑弘羊 I—,帝国学園紀要,13,1987
752. 永田英正,再び漢代辺郡の候官について,滋賀大学教育学部紀要,36,1987
753. 越智重明,春秋戦国時代の田制・田税制,久留米大比較文化研究科紀要,1,1987
754. 越智重明,漢時代の公田,東方学会創立 40 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東方学会,1987
755. 増田精一,漢代西域の勝兵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考古と歴史 岡崎敬先生退官記念論集上,同朋舎,1987
756. 重近啓樹,漢代の復除について,東方学,73,1987
757. 竹浪隆良,漢六朝期における人身の売買と質入れ,歴史学研究,564,1987
758. 佐藤長,周王朝の系統について,鷹陵史学,13,1987
759. 佐藤武敏,秦・漢初の漆器の生産について,古史春秋,4,1987
760. 佐竹靖彦,漢代田制考証,史林,70-1,1987

761. 佐竹靖彦, 商鞅田制考証, 史学雑誌, 96-3, 1987
762. 安居香山, 馬王堆出土の天文氣象雜占, 緯書と中国の神秘思想, 平河出版社, 1988
763. 坂本具償, 『漢書』五行志の災異説, 日本中国学会報, 40, 1988
764. 池田雄一, 漢代における司法の展開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8
765. 池田雄一, 漢代の河南県城をめぐって—漢代の地方「都市」について—, 唐代史研究会報告第Ⅵ集 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 1988
766. 大庭脩, 漢簡研究ノート, 史泉, 68, 1988
767. 大櫛敦弘, 秦漢国家の陸運組織に関する一考察—居延漢簡の事例の検討から—, 東洋文化, 68, 1988
768. 富谷至, 黄泉の国の土地売買—漢魏六朝地券考—, 大阪大学教養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 36, 1988
769. 岡田功, 中国古代の烽火規定と律令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8
770. 工藤元男, 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より見た法と習俗, 木簡研究, 10, 1988
771. 工藤元男, 埋もれていた行神—主として秦簡「日書」による—,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06, 1988
772. 古賀登, 建中初年の年支兩税と兩税斛斗・兩税錢,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8
773. 谷村憲齋, 「ヘディン文書」将来始末記—「ヘディンと楼蘭王国展」開催に寄せて—, 書道研究, 1988
774. 谷口満, 江陵紀南城考, 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 3, 1988
775. 谷口満, 春秋時代の都市, 東洋史研究, 46-4, 1988
776. 谷中信一, 漢代縦横家考—齊地方の思想的特色として—, 東洋の思想と宗教, 5, 1988
777. 関口順, 孟子の性説の理解と解釈, 中国社会と文化, 3, 1988
778. 関野雄, 雷文塼から見た漢代の將作機構, 考古学叢考上卷, 吉川弘文館, 1988
779. 好并隆司, 『商君書』戦法・立本・兵守三篇・釈読, 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篇, 9, 1988
780. 好并隆司, 雲夢秦簡日書小論, 中国社会史の諸相(横山英等編), 勁草書房, 1988
781. 角谷常子, 『塩鉄論』の史料性格, 東洋史研究, 47-2, 1988
782. 今井凌雪, 「ヘディン文書」の周辺, 書道研究, 2-10, 1988

783. 近江昌司,漢画像塼瑣事,天理大学学報,157,1988
784. 堀池信夫,漢代の神仙養生説・医学と知識人,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
785. 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戸,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27,1988
786. 堀敏一,良奴・良賤制はいつ成立したか,史学雑誌,97-7,1988
787. 堀敏一,中国古代の里,唐代史研究会報告第Ⅵ集 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1988
788. 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市,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8
789. 量博満,滇王国の文化的背景,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8
790. 林劍鳴( 冨谷至譯),中国における秦漢史研究の現状と展望,古代文化,40-5,1988
791. 茂澤方尚,韓非子の「聖人」について(上),駒沢史学,38,1988
792. 初山明,春秋訴訟論,法制史研究,37,1988
793. 若江賢三,中国古代の古尺について,社会科学研究,16,1988
794. 山田慶兒,扁鵲伝説,東方学報( 京都),60,1988
795. 山田勝芳,前漢武帝代の三銖錢の発行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0-9,1988
796. 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の商と賈—その意味と思想的背景—,東洋史研究,47-1,1988
797. 山田勝芳,王杖十簡と王杖詔書令—漢代の老人優遇策をめぐって—,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49,1988
798. 山田勝芳,馬車と牛車,綜合研究中世の文化,角川書店,1988
799. 山田勝芳,秦漢時代の金石文字—文字の書き手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文化研究所報告(1985～1986),東北大学,1988
800. 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の金融—特に高利貸を中心として—,中国金融史の基礎的研究,1988
801. 石田勇作,隋開皇律令から武德律令へ,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8
802. 松崎つね子,湖北における秦墓の被葬者につい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被葬者「喜」と関連して—,駿台史学,73,1988
803. 湯浅邦弘,馬王堆帛書『明君』の思想的意義,中国研究集刊,宙号,1988
804. 藤田勝久,『史記』韓世家の史料的考察,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21,1988
805. 藤田勝久,『史記』戦国紀年一覽表,中国史研究,9,1988
806. 藤田忠,漢代“雩祭”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国士館大学人文学会紀要,21,1988

807. 鵜飼昌男, 漢代の文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記」という文書の存在—, 史泉, 68, 1988,
808. 田中良, 領尚書事と「政」の委任, 鷹陵史学, 14, 1988
809. 小谷仲男, 死者の口に貨幣を含ませる習俗, 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 13, 1988
810. 小木良一、加藤泰弘, 睡虎地秦墓竹簡の研究, 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5部門芸術・体育, 40, 1988
811. 伊藤敏雄, 魏晋期楼蘭屯戍の基礎的整理(二), 東洋史論, 6, 1988
812. 原田浩, 青川秦墓木牘考, 史海, 35, 1988
813. 澤田多喜男, 先秦漢初期養生思想の諸相, 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 平河出版社, 1988,
814. 増田勝彦, 「ヘディン文書」の修復を終えて, 書道研究, 2-10, 1988
815. 重近啓樹, 秦漢の公田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8
816. 佐藤長, 秦王朝の系統について, 鷹陵史学, 14, 1988
817. 佐竹靖彦, 県郷亭里制度考証, 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報, 199, 1988
818. 佐竹靖彦, 中国古代史の姿をもとめて, 中国社会と文化, 3, 1988
819. 佐竹靖彦, 阜陽漢簡“里八則爲田十則”小考, 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 唐代史研究報告Ⅵ集, 刀水書房, 1988
820. 佐竹靖彦, 鄭国渠と白渠,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88
821. 湯浅邦弘, 馬王堆帛書『明君』の思想史的意義, 中国研究集刊, 6, 1988
822. 坂出祥伸, 中国古代の気または雲気による占い—漢代以後における望気術の発展—, 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 10, 1989
823. 坂出祥伸, 房中と回春の術, 世界の歴史(週刊朝日百科), 30, 朝日新聞社, 1989
824. 坂出祥伸, 望気術のさまざま, 関西大学文学論集, 38-2, 1989
825. 濱田弘作, 古代中国会計史一考, 千葉商大論叢, 27-2, 1989
826. 成田年樹, 秦代の文字資料, 書論, 25, 1989
827. 池田温,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重数節日の成立,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六, 吉川弘文館・雄山閣・研文出版, 1989
828. 池田雄一, 論中国古代法制的発展, 中国史研究, 1989-2, 1989
929. 池田雄一, 漢代の有用文字について—官吏と識字—, アジアの教育と文化 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 巖南堂書店, 1989

830. 大庭脩,日本の木簡と中国の木簡,書道研究,24,1989
831. 大櫛敦弘,漢代の鉄専売と鉄器生産,東方学,78,1989
832. 稲葉一郎,秦始皇の巡狩と刻石,書論,25,1989
833. 渡辺信一郎,漢代の財政運営と国家的物流,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41,1989
834. 福田哲之,『蒼頡篇』の内容と構造—阜陽漢簡『蒼頡篇』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中国学会報,41,1989
835. 高木智見,春秋時代の聘礼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7-4,1989,
836. 高木智見,古代中国における肩脱ぎの習俗について,東方学,77,1989
837. 工藤元男,雲夢睡虎地秦墓簡「日書」より見た秦・楚の二十八宿占い,古代,88,1989
838. 宮崎洋一,居延漢簡の整理についてマイケル・ローウェー氏の方法の再検討,史叢,43,1989
839. 鶴間和幸,漢代皇帝陵・陵邑・成国渠調査記,古代文化,41-3,1989
840. 鶴木大寿,シルクロード出土の木簡研究入門,書道研究(特集:シルクロードの文字と書1),1-3,1989
841. 胡平生(田中幸一譯),阜陽漢簡『年表』整理札記,(関西大)史泉,70,1989
842. 間嶋潤一,漢代に於ける所謂「未踰年の君」の解釈に就いて,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第I部,75,1989
843. 江村治樹,戦国時代の都市とその支配,東洋史研究,48-2,1989
844. 久富木成大,戦国期陰陽家の国家意識,金沢大学教養部論集人文科学篇,27-1,1989
845. 酒井忠夫,反閉について,立正史学,66,1989
846. 豊島静英,漢代の皇帝崇拜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599,1989
847. 栗原圭介,古代中国の氏族制度と民族性,東洋研究,92,1989
848. 劉得寛,中国の伝統的法思想と現代における法の発展,東海法学,3,1989
849. 劉海年(堀毅譯),戦国秦漢時代における法の沿革,(早大)史滴,10,1989
850. 茂澤方尚,『韓非子』所見「李克(悝)」の遺説と実像,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六,吉川弘文館・雄山閣・研文出版,1989
851. 日比野丈夫,王莽時代の河西四郡について,内陸アジア史研究,5,1989
852. 三條彰久,『呂氏春秋』と伊尹説話,中国古代史研究,6,研文出版,1989
853. 山田慶兒,本草の起源,中国古代科学史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

854. 山田勝芳, 秦漢時代の復除(1)―秦の復―, 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 52 号, 1989
855. 松崎つね子, 睡虎地秦簡に於ける「非公室告」・「家罪」,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六, 吉川弘文館・雄山閣・研文出版, 1989
856. 湯浅邦弘, 「稱」の思想―馬王堆帛書『稱』に於ける天道と統治原理―,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 23-2, 1989
857. 藤田勝久, 『史記』趙世家の史料性格, 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 22-1, 1989
858. 藤田勝久, 『史記』春申君列伝の編纂過程, 東方学, 77, 1989
859. 田中淡, 『墨子』城守諸篇の築城工程, 中国古代科学史論[正篇],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9
860. 桐本東太, 不死の探求,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六, 吉川弘文館・雄山閣・研文出版, 1989
861. 西川利文, 漢代辟召制の成立, 鷹陵史学, 15, 1989
862. 小林聡, 後漢の少数民族統御官に関する一考察,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7, 1989
863. 伊藤敏雄, 楼蘭の遺迹―近年の楼蘭調査によせて―, 大阪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生活科学紀要, 38-2, 1989
864. 伊藤潤, 中国史上における「共同体」について, (日大)史叢, 42, 1989
865. 伊藤伸, シルクロード出土の書法史資料概観, 書道研究, 1-3, 1989
866. 永田英正, 簡牘から見た漢代の文書政治―簡牘の古文書的アプローチ―, 唐代史研究会会報, 2, 1989
867. 越智重明, 塩鉄論争をめぐって, 久留米大比較文化研究科紀要, 5, 1989
868. 澤田多喜男, 『帛書老子』考―書名〈老子〉成立過程初探―, 中国―社会と文化, 4, 東大中国学会, 1989
869. 齋木哲郎, 秦儒と中庸, 東洋文化, 297, 1989
870. 齋藤実郎, 前漢武帝の対外政策, 日本大学芸術学部紀要, 18, 1989
871. 紙屋正和, 武帝の財政増収政策と郡・国・県, 東洋史研究, 48-2, 1989
872. 重近啓樹, 漢代の仮作について, 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 195, 1989
873. 佐藤武敏, 後漢の戸口統計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六, 吉川弘文館・雄山閣・研文出版, 1989
874. 佐藤佑治, 中国都市における「市」官吏―唐前期まで―, 中国古代史研究, 6, 研文出版, 1989
875. 佐原康夫, 居延漢簡月俸考, 古史春秋, 5, 1989
876. 佐原康夫, 秦漢陶文考, 古代文化, 41, 1989



877. 佐原康夫, 漢代の官衙と属吏について, 東方学報(京都), 61, 1989
878. 坂出祥伸, 「気」の自然観, 気と人間科学, 平河出版社, 1990
879. 長澤和俊, 楼蘭屯戍の実態(上),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哲学・史学編), 35, 1990
880. 池田雄一, 銀雀山漢墓出土「守法等十三篇」について, 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 刀水書房, 1990
881. 大庭脩, 秦漢の木簡, 書道研究, 4-5, 1990
882. 大櫛敦弘, 秦代国家の穀倉制度, 海南史学, 28, 1990
883. 東晋次, 東漢名節考, 古代文化, 42-3, 1990
884. 富谷至, 漢代辺境の関所—玉門関の所在をめぐって—, 東洋史研究, 48-4, 1990
885. 岡田功, 春秋戦国秦漢時代の貸借関係をめぐる—考察, 駿台史学, 78, 1990
886. 工藤元男, 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と道教的習俗, 東方宗教, 76, 1990
887. 吉本道雅, 春秋事語考, 泉屋博古館紀要, 6, 1990
888. 吉岡眞之, 紙簡, 日本歴史, 504, 1990
889. 吉田滋一, 中国家父長制論批判序説, 中国専制国家と社会統合—中国史像の再構成Ⅱ—, 文理閣, 1990
890. 久富木成大, 呂不韋と秦の覇業, 金沢大学教養部論集人文科学篇, 28-1, 1990
891. 堀敏一, 雲夢秦簡に見える家と近隣—「中国古代の家と戸」補考—, 駿台史学, 78, 1990
892. 堀敏一, 中国古代の亭をめぐる諸問題, 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布目潮風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90
893. 李開元, 前漢初年における軍功受益階層の成立, 史学雑誌, 99-11, 1990
894. 李学勤(小幡敏行譯), 紙以前の書籍, 中国古代漢字学の第一歩, 凱風社, 1990
895. 鈴木直美, 鳳凰山10号漢墓出土史料からみた江陵社会, 駿台史学, 80, 1990
896. 茂澤方尚, 韓非子の「聖人」について(中), 駒沢史学, 42, 1990
897. 楠山修作, 青川秦墓木簡を読む, 東方学, 79, 1990
898. 初山明, 出土文字資料ノート—木簡・骨簽・瓦書—, 古史春秋, 6, 1990
899. 浅見直一郎, 中国南北朝時代の葬送文書—北齊武平四年王江妃随葬衣物疏を中心—to, 古代文化, 42, 1990
900. 日原伝, 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について—馬王堆医帛との比較から—, 中国哲学研究, 2, 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 1990
901. 三保忠雄, 居延簡牘資料における量詞の考察,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24-2, 1990

902. 山田勝芳, 秦漢時代の復除(2)—漢代の復除とその対象—, 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 54, 1990
903. 杉本憲司, 江蘇省儀徵県の前漢墓出土の「先令券書」—前漢時代の貧についての—考—, 布目潮風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 汲古書院, 1990
904. 申英秀, 雲夢秦簡「日書」の歳星占いから見た古代中国人の天文図法,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哲学・史学編), 別冊 16, 1990
905. 松本民雄, 先秦時代における商業観の変移, 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 4, 1990
906. 藤田高夫, 前漢後半期の外戚と官僚機構, 東洋史研究, 48-4, 1990
907. 藤田勝久, 『史記』と中国出土書籍, 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 23-1, 1990
908. 西川利文, 漢代博士弟子制度について, 鷹陵史学, 16, 1990
909. 西川素治, 「漢代の遺言状」補説—『先令券書』の釈文をめぐる—, 駿台史学, 78, 1990
910. 小林伸二, 春秋時代の遷徙について, 鴨台史論, 3, 1990
911. 新井光風, 秦始皇時期の肉筆, 書道研究, 4-3, 1990
912. 熊谷滋三, 後漢の異民族統治における官爵授与について, 東方学, 80, 1990
913. 一ノ本弥生, 中国古代の樹木思想の展開, 京都精華学園研究紀要, 28, 1990
914. 永田英正, 「候史広徳坐罪行罰」檄について—兼ねて候史の職掌を論ず—, 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 刀水書房, 1990
915. 斎木哲郎, 先秦・秦漢期の陰陽五行思想と自然認識(上), 鳴門教育大学研究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 5, 1990
916. 紙屋正和, 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郡・国への規制の強化, 古代文化, 42-7, 1990
917. 重近啓樹, 秦漢における徭役の諸形態, 東洋史研究, 49-3, 1990
918. 重近啓樹, 秦漢の商人とその負担, 駿台史学, 78, 1990
919. 滋賀秀三, 前漢文帝の刑制改革をめぐる—『漢書』刑法志脱文の疑い—, 東方学, 79, 1990
920. 佐原康夫, 漢代の郡県の財政機構について, 東方学報(京都), 62, 1990
921. 濱田英作, 前漢における剣と争闘, 史観, 125, 1991
922. 長澤和俊, 楼蘭屯戍の実態(下),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哲学・史学編), 36, 1991
923. 長澤和俊, 西域木簡発見史 木簡に執念をこめた探検家たち, 墨, 93, 1991
924. 船越信, 秦漢時代の瓦塼文刑徒墓誌, 古代文化, 43-9, 1991
925. 串田久治, 前漢における予言・「謡」の諸相, 中国研究集刊, 10, 1991

926. 大川俊隆, 秦漢期の帛書の出土と研究の紹介, 古代文化, 43-9, 1991
927. 大庭脩, 〈検〉の再検討, 書学書道史研究, 1, 1991
928. 大庭脩, 中国木簡発見の経過, しにか, 2-5, 1991
929. 大庭脩, 中国木簡研究の近況と課題, 書道研究, 5-3, 1991
930. 大庭脩, 出土資料として見た木簡, 墨, 93, 1991
931. 大形徹, 神農本草学の神仙観, 東方宗教, 77, 1991
932. 大形徹, 老子と房中術, 人文学論集(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 9, 10, 1991
933. 大櫛敦弘,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鉄製農具の生産と流通, 東洋史研究, 49-3, 1991
934. 岡村秀典, 秦漢金文の研究視角, 古代文化, 43-9, 1991
935. 岡村秀典, 戦国から秦漢への文様の展開, 泉屋博古館紀要, 7, 1991
936. 工藤元男, 齊の紫は敗素なれども価十倍す—訳注作業の中から—, 創文, 327, 1991
937. 工藤元男, 『日書』の風景—データベース化による先秦社会の諸相—, 古代文化, 43-8, 1991
938. 黄曉芬, 秦の墓制とその起源, 史林, 74-6, 1991
939. 吉村昌之, 居延出土の王莽簡について, 史泉(関西大), 74, 1991
940. 角谷常子, 秦漢時代の石刻資料, 古代文化, 43-9, 1991
941. 堀毅, 法三章攷, 法学研究(慶大), 64-1, 1991
942. 李学勤, 銀雀山出土の竹簡にみえる市法について, 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都市の比較史的研究, 1991
943. 茂澤方尚, 『韓非子』「飭令」篇と『商君書』「靳令」篇, 駒沢史学, 43, 1991
944. 初山明, 皇帝支配の原像, 王権の位相, 弘文堂, 1991
945. 若江賢三, 古代中国における禁錮, 正統と異端, 1991
946. 若江賢三, 秦律中の城旦舂について, 愛媛大学人文学会創立十五周年記念論集, 愛媛大学人文学会, 1991
947. 三保忠夫, 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簡牘資料における量詞の考察,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 25, 1991
948. 山邊進, 『墨子』尚同三篇の統治機構とその論理, 日本中国学会報, 43, 1991
949. 山田勝芳, 漢時代の王杖と復除, 久留米大学論叢, 40-2, 1991
950. 山田勝芳, 甘谷漢簡に関する一考察, 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 56, 1991
951. 山田勝芳, 前漢謁者・中書・尚書考, 集刊東洋学, 65, 1991
952. 山田勝芳, 中国古代の士人・庶人関係, 中国社会における士人庶人関係の総合的

研究,1991

953. 山中章,考古学からみた古代木簡,しにか,2-5,1991
954. 石田秀美,初期の房中養生思想と僊説,東方宗教,77,1991,
955. 辻正博,帛書地図,古代文化,43-9,1991
956. 松村潤,満文の木簡,しにか,2-5,1991
957. 松木民雄,左伝における商と賈,集刊東洋学,66,1991
958. 湯浅邦弘,銀雀山漢墓竹簡古逸兵書の研究—『王兵篇』の考察—,古代文化,43-12,1991
959. 藤田高夫,秦漢時代の簡牘資料,古代文化,43-9,1991
960. 藤田勝久,『史記』秦本紀の史料的性格,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24-1,1991
961. 藤田勝久,『史記』戦国四君列伝の史料的性格,古代文化,43-1,1991
962. 田中有,図説木簡出土地図・出土年表,墨,93,1991
963. 武内紹人,チベット・中央アジアの木簡,しにか,1991
964. 西川利文,漢代博士弟子制度の展開,鷹陵史学,17,1991
965. 相川佳予子,『帛書』とその周辺,古代文化,43-9,1991
966. 小川誠,中国古代国家成立のメカニズム,比較文明,7,1991,
967. 小林聡,後漢の軍事組織に関する一考察—郡国常備兵縮小後の代替兵力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9,1991
968. 小林聡,漢時代における中国周辺民族の内属について,東方学,82,1991
969. 謝桂華(吉村昌之譯),『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考釈,史泉(関西大),73,1991
970. 新井光風,《曾侯乙墓竹簡》—全貌が公になった現存最古の竹簡—,書道研究,5-3,1991
971. 徐世虹,西漢前期の詔書の草制者について,史泉(関西大),73,1991
972. 楊巨中,「日書」より見た秦人の神—の觀念とその占いの方法について—,古代探叢 早稲田大学考古学会創立40周年記念考古学論叢,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1
973. 伊藤倫厚,学易一得,中国哲学(北海道大学),19,1991
974. 伊藤敏雄,魏晉期楼蘭屯戍における水利開発と農業活動—魏晉期楼蘭屯戍の基礎的整理(三)—,歴史研究,28,1991
975. 永田英正,中国の木簡,しにか,2-5,1991
976. 永田英正,中央研究院訪問記,以文,34,京都大学以文会,1991
977. 遠藤祐子,前漢前半期の儒家の政術と地方社会,立命館史学,12,1991

978. 澤田多喜男,『馬王堆漢墓帛書』德篇・道篇考—原初の『老子』試探—,千葉大学人文研究,20,1991
979. 紙屋正和,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中央政界と郡・国,福岡大学総合研究所報(人文・社会科学編),136,1991
980. 中生勝美,婚姻贈与と婚姻連帯,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14,1991
981. 佐原康夫,居延漢簡に見える物資の輸送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50-1,1991
982. 濱田英作,前漢按劍考,静修短期大学研究紀要,23,1992
983. 薄井俊二,恵帝の即位(1),埼玉大学紀要(教育学部・教育科学),41-1,1992
984. 薄井俊二,恵帝の即位(2),埼玉大学紀要(教育学部・教育科学),41-2,1992
985. 大庭脩,90年代の漢簡研究(1),書道研究,50,1992
986. 大櫛敦弘,雲夢秦簡倉律より見た戦国秦の穀倉制度—「秦代国家の穀倉制度」補論—,海南史学,30,1992
987. 大櫛敦弘,漢代三輔制度の形制,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方書店,1992
988. 稲畑耕一郎,「楚辞」残簡小考—淮河水系流域における「楚辞」の流伝—,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文学・芸術学),37,1992
989. 東晋次,漢代の孤児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人文・社会科学),43,1992
990.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専制国家論,歴史評論,504,1992
991. 渡辺信一郎,漢代更卒制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1-1,1992
992. 飯尾秀幸,中国古代国家における在地支配機構成立の一側面,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方書店,1992
993. 福宿孝夫,道家的『導引図』に関する研究—文字解読と体操姿態—,宮崎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72,1992
994. 釜谷武志,漢武帝樂府創設の目的,東方学,84,1992
995. 冨谷至,王杖十簡,東方学報,64,1992
996. 冨田健之,漢代政治制度史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新潟大),創刊号,1992
997. 岡本光生,「墨子」における「財」の交換,東洋の思想と宗教,9,1992
998. 工藤元男,雲夢秦簡にみえる毒言(悪言)と共同体,東方,140,1992
999. 工藤元男,禹の変容と五祀,中国—社会と文化,7,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2
1000. 工藤元男,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に見える県・道嗇夫と大嗇夫について,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方書店,1992

1001. 鶴間和幸, 古代中華帝国の統一法と地域—秦帝国の法とその虚構性—, 史潮, 30, 1992
1002. 鶴間和幸, 秦帝国による道路網の統一と交通法, 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 東方書店, 1992
1003. 横畑茂明, 春秋公羊伝の復讐説, 九州中国学会報, 30, 1992
1004. 吉村昌之, 「敦煌漢簡」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木簡研究, 14, 1992
1005. 堀毅, 秦の法と社会, 愛と信頼 石本三郎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 丸善プラネット, 1992
1006. 笠川直樹, 先秦時代の湖北地方の歴史, 京都精華学園研究紀要, 30, 1992
1007. 林已奈夫, 文書・書物, 中国古代の生活史, 吉川弘文館, 1992
1008. 林英樹, 『三輔黃圖』研究序略, 青山学院大茅茨, 6, 1992
1009. 茂澤尚方, 『韓非子』所見「術数」考, 駒沢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 50, 1992
1010. 陳仲章(門田明譯), 『居延漢簡』救難記, 東洋史苑, 39, 1992
1011. 末永高康, 董仲舒陰陽刑德説について, 中国思想史研究(京大), 15, 1992
1012. 初山明, 爰書新探—漢簡訴訟論のために—, 東洋史研究, 51-3, 1992
1013. 平勢隆郎, 戦国紀年再構成に関する試論—君主在位の称元法からする古本『竹書紀年』の再評価—, 史学雑誌, 101-8, 1992
1014. 平勢隆郎, 今本『竹書紀年』の性格, 東洋史論集, 20, 1992
1015. 浅野哲弘, 前漢景帝の対諸侯王政策の一考察, 大学院年報(立正大), 9, 1992
1016. 若江賢三, 秦律における労役刑の刑期再論(上),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文学科編, 25, 1992
1017. 山田勝芳, 前漢末三公制の形成と新出漢簡—王莽政治史の一前提—, 集刊東洋学, 68, 1992
1018. 太田幸男, 湖北睡虎地出土秦律の倉律をめぐって・追補—大槲敦弘氏の批判に答えて—, 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社会科学), 43, 1992
1019. 湯浅邦弘, 軍神の変容,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 26, 1992
1020. 藤田勝久, 『史記』蘇秦・張儀列伝の史料的考察—戦国中期の合従と連横—, 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 25, 1992
1021. 畑井義隆, 中国の人口政策, 明治学院大学経済研究, 92・93, 1992
1022. 夏目文雄, 中国刑法における犯罪構成要件の理論, 愛知大学法経論集, 130, 1992
1023. 向井哲夫, 『老子』の成立時期と成書の経過について—新出土資料等をもとに—, 東方宗教, 79, 1992

1024. 向井哲夫,『春秋事語』と『経法』等四篇,東方学,84,1992
1025. 小沢利雄,東および東南アジアの塩田製塩法の地域差について,大阪成蹊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29,1992
1026. 小澤賢二,『古本竹書紀年』の出自を遡及する,汲古,21,1992
1027. 徐苹芳(岡村秀典譯),中国考古学の回顧と展望,古文化論叢,27,1992
1028. 岩野忠昭,西漢期の郊祭について,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28,1992
1029. 伊藤敏雄,魏晋期楼蘭屯戌の諸活動—魏晋期楼蘭屯戌の基礎的整理(四)—,東洋史論,8,1992
1030. 越智重明,後漢時代の豪族,東洋学報,73-3・4,1992
1031. 越智重明,前漢時代の商人,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紀要(国際文化学科編),創刊号,1992
1032. 澤田多喜男,『帛書老子』續考—乙本の文脈において見た—,中国研究集刊,盈号,1992
1033. 中村喬,中国酒令の一斑,立命館文学,523,1992
1034. 中村正人,東洋法制史,法律時報,795,1992
1035. 中善寺慎,漕運の側面より見た鄭国渠開鑿の意義について,青山学院大茅茨,6,1992
1036. 中生勝美,漢族の民俗生殖観とイトコ婚,史苑,52-2,1992
1037. 佐野公治,中国の郊祀と日本の大嘗祭,中国社会と文化,7,1992
1038. 佐竹靖彦,籍田新考,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汲古書院,1992
1039. 大川俊隆,手旁字の成立について,中国研究集刊,11,1992
1040. 坂出祥伸,災いを避ける歩行術=禹歩,氣と養生,人文書院,1993
1041. 濱田英作,前漢の擊劍・劍論・劍客—劍の用途小考—,静岡短期大学研究紀要,24,1993
1042. 長谷川淳子,木簡の書—隸書と八分の起源をめぐって—,書論,29,1993
1043. 陳仲璋(門田明譯),搶救『居延漢簡』歴驗記,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103 報告書,関西大学出版部,1993
1044. 池田雄一,戦国楚の法制—包山楚簡出土によせ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38,1993
1045. 池田知久,中国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の誕生,中国—社会と文化,8,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3
1046. 初世賓(曹偉琴譯),甲渠候官新出簡牘における律令詔制について,漢簡研究の



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47. 川勝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放生儀礼の文化史,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1,1993

1048. 大内田貞郎,東洋における書物装訂について,ビブリア,100,1993

1049. 東晋次,秦漢帝国論,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

1050. 渡辺義浩,憚考,東方学,85,1993

1051. 福井捷朗等,「火耕水耨」再考,史林,76-3,1993

1052. 福宿孝夫,漢代の漆器銘に関する考察,宮崎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74,1993

1053. 福田哲之,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後新獲敦煌漢簡に見出される小学書残漢,集刊東洋学,69,1993

1054. 富谷至,大英図書館所蔵の敦煌漢簡,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

1055. 富谷至,漢簡,中国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1056. 岡安勇,後漢時代の北辺防備官の任用政策について,史滴,14,1993

1057. 高橋純司,前漢酷吏の研究,中央大学大学院論究,25-1,1993

1058. 高橋庸一郎,「秦本紀」文公以前について,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編,28-4,1993

1059. 宮内伸人,秩「眞二千石」に就いて,立正大学大学院東洋史学論集,1,1993

1060. 谷川道雄,中国史上の古代と中世,古代文化,45-8,1993

1061. 関尾史郎,甘肅新出漢代曆様木簡の基礎的整理,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1993

1062. 何双全,敦煌懸泉置和漢簡文書的特徴,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63. 何双全(井上泰山譯),漢簡中の“符”“伝”及び“過所”,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64. 鶴間和幸,秦帝国の形成と東方世界,茨城大学教養部紀要,25,1993

1065. 胡平生,中国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概述,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66. 吉村昌之,漢代邊郡における田官組織,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67. 江村治樹,イギリス博物館所見の中国古代青銅武器,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7,1993

1068. 江村治樹,日本における先秦史の研究動向と課題,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39,1993
1069. 角谷常子,漢代居延における軍政系統と県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史林,76-1,1993
1070. 今野春樹,中国の狐について,立正大学大学院東洋史学論集,1,1993
1071. 金谷治,関于帛書《老子》—其資料性的初步探討—,道家文化研究,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72. 井ノ口泰淳,カローシュティー文字資料と仏教—,仏教史学研究,36-1,1993
1073. 李均明,簡牘文書“條”与“録”考述,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74. 李均明,居延新簡の法制史料,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75. 李均明,居延新簡概述,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76. 李学勤(曹偉琴譯),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漢律竹簡について,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77. 劉軍,漢簡“課”考述,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78. 馬淵久夫,東アジアの土器・青銅器の保存科学的研究,学術月報,46-2,1993
1079. 門田明,流沙墜簡版本考,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出版部,1993
1080. 舩山明,雲夢睡虎地秦簡,中国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1081. 倪正茂,中日科学技術立法比較研究,アジア太平洋研究,9,1993
1082. 彭浩(鳥井克之譯),湖北江陵出土前漢簡牘概説,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83. 浅野哲弘,漢代の対諸侯王政策の一考察,大学院年報(立正大),10,1993
1084. 三條彰久,馬王堆帛書『伊尹・九主』をめぐって—訳及び注—,史学(慶大),62-3,1993
1085. 山口洋,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踰年改元について,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文学研究科,22,1993
1086. 山田勝芳,中国の官僚制—東アジア官僚制比較研究序説—,東北大学大学院国

際文化研究科論集,創刊号,1993

1087. 山田勝芳,支配する時間—中国古代の政治と時間意識—,文化における時間意識,角川書店,1993

1088. 上田早苗,王莽政権と居成新簡,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

1089. 神矢法子,礼儀にみる夫権—夫権・妻=母の地位・子の義務—,歴史学研究,644,1993

1090. 石渡美江,甘肅省靖遠出土鑲金銀盤の図像と年代,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13,1993

1091. 石井仁,四征將軍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5-10,1993

1092. 松井嘉徳,「県」制遡及に関する議論及びその関連問題,泉屋博古館紀要,9,1993

1093. 松崎つね子,戦国秦漢の墓葬に見る地下世界の変遷—馬王堆漢墓を手がかりに—,古代文化,45-5,1993

1094. 湯浅邦弘,銀雀山漢墓竹簡『守法守令等十二篇』の思想史的意義,中国研究集刊,13,1993,

1095. 塘耕次,中国における書画の融合,愛知教育大学研究報告人文科学,42,1993

1096. 藤田高夫,漢簡中に見える軍功賞賜について,古代文化,45-7,1993

1097. 鶴飼昌男,漢簡に見られる書信様式簡の検討,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98. 吳弼驤(吾妻重二譯),敦煌馬圈湾漢簡の特色,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099. 小林聡,後漢の少数民族政策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生産と流通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国書店,1993,

1100. 小澤賢二,書き改められる中国古代史,本,18-2,1993

1101. 謝桂華,元康四年賜給民爵名籍残冊再釈,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102. 徐苹芳(西川和男譯),中国漢簡の発見と研究,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漢簡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92 報告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93

1103. 楊鴻勛,漢代の建築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80,1993

1104. 伊藤倫厚,読易私記,中国哲学(北海道大学),22,1993

1105. 永田英正,新居延漢簡の概観,東方学,85,1993

1106. 遠藤祐子,漢代における地方官学の政治的機能,立命館史学,14,1993

1107. 越智重明, 漢時代の家と家族, 久留米大比較文化研究科紀要, 14, 1993
1108. 越智重明, 漢時代の免官・削爵, 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紀要 国際文化学科編, 2, 1993
1109. 越智重明, 六朝の免官・削爵・除名, 東洋学報, 74-3・4, 1993
1110. 澤田多喜男, 『帛書古佚書』乙本考, 千葉大学人文研究, 22, 1993
1111. 斎木実郎, 秦漢における皇帝六璽, 史叢(日大), 51, 1993
1112. 紙屋正和, 前漢後半期以降の貨幣経済について,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生産と流通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 中国書店, 1993
1113. 中村圭爾, 黄紙雑考, 東洋史論叢, 10, 1993
1114. 中村喬, 羹について, 立命館文学, 530, 1993
1115. 猪飼祥夫, 中国医学史稿⑤ 経略の発見, 鍼灸 OSAKA, 9-4, 1993
1116. 林克, 「黄帝内経」における真気について, 中国研究集刊, 辰 13, 1993
1117. 阿辻哲次, 絹に書かれた書物—馬王堆帛書—, 漢字の文化史,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94
1118. 濱田英作, 居延辺境における一事件—「前漢における剣と争闘」補遺—, 静修女子大学紀要, 1, 1994
1119. 承載, 略論西漢の「五経博士」及び封建政治との関係, 東瀛求索, 6, 1994
1120. 池田知久,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23, 東京大学, 1994
1121. 川口幸也, 兵馬俑坑, 秦の始皇帝とその時代展, 日本放送協会・NHKプロモーション, 1994
1122. 大島誠二, 秦の起源をめぐる近年の研究動向, 中央大学附属高等学校紀要, 8, 1994
1123. 大山昌道, 「道原」考—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道原」に見る老子哲学の受容について—, 漢学研究(日本大学), 1994
1124. 渡邊義浩, 「徳治」から「寛治」へ, 中国史における教と国家: 筑波大学創立二十周年記念東洋史論集, 雄山閣出版, 1994
1125. 渡辺恵理, 前漢における蛮夷印制の形成, 古代文化, 46-2, 1994
1126. 飯島武次, 秦の起源と文化, 秦の始皇帝とその時代展, 日本放送協会・NHKプロモーション, 1994
1127. 飯尾秀幸,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をめぐって, 専修人文論集, 56, 1995
1128. 福田哲之, 阜陽漢簡『蒼頡篇』総索引(稿), 福島大学教育学部論集(人文科学部

門), 55, 1994

1129. 釜谷武志, 楽府設立年代考, 未名(神戸大), 11, 1994

1130. 工藤元男, 戦国の会盟と符一馬王堆漢墓帛書『戦国縦横家書』二〇章をめぐる一, 東洋史研究, 53-1, 1994

1131. 工藤元男, 睡虎地秦簡「日書」における病因論と鬼神の関係について, 東方学, 88, 1994

1132. 工藤元男, 禹歩・天罡, 「道教」の大事典—道教の世界を読む—, 新人物往来社, 1994,

1133. 谷豊信, 戦国秦漢時代の軒瓦製作技法, MUSEUM, 519, 1994

1134. 鶴間和幸, 秦始皇帝諸伝説の成立と史実, 茨城大学教養部紀要, 26, 1994

1135. 鶴間和幸, 秦帝国の統一と地域, 旧中国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特質, 1994

1136. 黄留珠, 近十多年大陸秦漢史研究述評, 中国史学, 4, 1994

1137. 黄曉芬, 漢墓の変容, 史林, 77-5, 1994

1138. 吉開将人, 曾侯乙墓出土戈・戟の研究, 東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 12, 1994

1139. 角谷常子, 居延漢簡に見える売買関係簡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東洋史研究, 52-4, 1994

1140. 近藤浩之,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研究概説(上)—帛書『周易』研究20年の動向—, 中国哲学研究, 8, 1994

1141. 井上泰也, 出土銭と貨幣史, 古代文化, 46-4, 1994

1142. 久保田宏次, 中国古代国家の変質と社会権力, 歴史学研究, 664, 1994

1143. 雷従雲, 始皇帝と秦文化およびその後世への影響について, 秦の始皇帝とその時代展, 日本放送協会・NHKプロモーション, 1994

1144. 廖伯源, 漢代官吏休暇・宿舍若干問題之辨析, 中国史学, 4, 1994

1145. 林英樹, 漢「甘泉宮」の所在について, 東アジア世界史の展開 青山学院大学東洋史論集, 汲古書院, 1994

1146. 劉軍, 屯戍遺簡人事管理文書所反映的幾個問題,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27, 1994

1147. 馬先醒, 台湾近年(1989-1993)簡牘研究述略, 中国史学, 4, 1994

1148. 門田明, 漢簡に見える「小府」について, 竜谷史壇, 103・104, 1994

1149. 初山明, 春秋・戦国の交, 古代文化, 46-11, 1994

1150. 平勢隆郎, 戦国紀年再構成に関する試論(続),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23, 1994

1151. 平勢隆郎,西周紀年に関する試論,中国史学,4,1994
1152. 平勢隆郎,度量衡の統一とは何か,秦の始皇帝とその時代展,日本放送協会・NHKプロモーション,1994
1153. 若江賢三,秦律における労役刑の刑期再論(下),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文学科編,27,1994
1154. 山田勝芳,秦・前漢時代貨幣史—東アジア貨幣史研究の基礎として—,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別巻,30,1994
1155. 山田勝芳,境界の官吏—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冥界への仲介者—,歴史,83,1994
1156. 山田勝芳,歴史書に記載されないもの—「守御器簿」をめぐる—,中国における歴史認識と歴史意識の展開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1994
1157. 杉本憲司,中国古代の城郭都市と古伝伝承,日中文化研究,6,1994
1158. 市瀬智紀,蛮夷の華夏起源伝承の研究,史学,63-3,1994
1159. 松崎つね子,「汭」について,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37,1994
1160. 藤田高夫,漢代の軍功と爵制,東洋史研究,53-2,1994
1161. 藤田勝久,『史記』魏世家の史料的考察,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27-1,1994
1162. 藤田勝久,『史記』と楚文化,「社会科」学研究,28,1994
1163. 藤田勝久,日本における戦国史研究の動向,中国史学,4,1994
1164. 藤田忠,秦の四時について,歴史と地理,465,1994
1165. 樋口隆康,秦始皇帝を発掘する,秦の始皇帝とその時代展,日本放送協会・NHKプロモーション,1994
1166. 吾妻重二,『易』の成立とその原理,しにか,1994-11,1994
1167. 小南一郎,漢代の祖霊観念,東方学報(京都),66,1994
1168. 新井光風,包山楚簡書法的考察,書法叢刊,3,1994
1169. 岩井茂樹,徭役と財政のあいだ,京都産業大経済経営論叢,29-3,1994
1170. 鷹取祐司,漢代三老の変化と教化,東洋史研究,53-2,1994
1171.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兵馬俑の発見・発掘とその意義,秦の始皇帝とその時代展,日本放送協会・NHKプロモーション,1994
1172. 越智重明,華夷思想の形成と展開,久留米大学比較文化年報,3,1994
1173. 斎藤実,秦漢魏における伝国璽,日本大学芸術学部紀要,23,1994
1174. 斎藤實郎,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分田”の問題,史叢(日大),52,1994
1175. 紙屋正和,両漢時代の商業と市,東洋史研究,52-4,1994
1176. 中村茂,南越国の印璽と「帝制」,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新潟大),3,1994

1177. 猪飼祥夫,中国医学史稿⑥ 薬物療法の起源,鍼灸 OSAKA,10-1,1994
1178. 猪飼祥夫,馬王堆『南方禹臧』図考,龍谷史壇,103・104,1994
1179. 佐原康夫,漢代貨幣經濟論の再検討,中国史学,4,1994
1180. 薄井俊二,漢の文帝について,埼玉大学紀要教育学部人文・社会科学,44-1,1995
1181. 池田雄一,漢代の讞制について—江陵張家山『奏讞書』の出土によせ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40,1995
1182. 池田雄一,江陵張家山『奏讞書』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183. 大川俊隆,雲夢秦簡『日書』「詰篇」初考,大阪産業大学論集(人文科学編),84,1995
1184. 大川俊隆,『周礼』における齋字について,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5
1185. 大庭脩,武威旱灘坡出土の王杖簡,史泉,82,1995
1186. 大形徹,「鬼」系の病因論,大阪府立大学紀要人文・社会科学,43,1995
1187. 大櫛敦弘,統一前夜,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9,1995
1188. 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故吏と故民,中国中世史研究統編,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5
1189. 渡辺信一郎,中華帝国・律令法・礼的秩序,シンポジウム歴史学と現在,柏書房,1995
1190. 范愉,権利の実現と裁判,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60,1995
1191. 飯尾秀幸,「アジア的専制」と戦後中国古代史研究,歴史評論,542,1995
1192. 肥後政紀,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地域別の人口変動,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193. 福井重雅,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博士制度の展開,東洋史研究,54-1,1995
1194. 岡田功,中国古代の「家約」の成立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195. 高浜秀,西周・東周時代における中国北辺の文化,文明学原論 江上波夫先生米寿記念論集,山川出版社,1995
1196. 工藤元男,禹の遺迹とその民族的伝承をめぐっ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12,1995
1197. 宮宅潔,漢令の起源とその編纂,中国史学,5,1995
1198. 鶴間和幸,秦始皇帝陵建設の時代—戦国・統一・対外戦争・内乱—,東洋史研



究,53-4,1995

1199. 鶴間和幸,秦楚の争覇と中国の統一,日中文化研究,7,1995

1200. 鶴間和幸,司馬遷の時代と始皇帝,東洋学報,77-1・2,1995

1201. 鶴間和幸,古代巴蜀の治水伝説の舞台とその背景,中国水利史の研究,国書刊行会,1995

1202. 横山裕,「道法」思想の成立について—『管子』を中心に—,町田三郎教授退官記念 中国思想史論叢,上巻,1995

1203. 吉本道雅,楚史研究序説,立命館文学,541,1995

1204. 吉本道雅,秦史研究序説,史林,78-3,1995

1205. 吉川忠夫,「却穀食氣篇」と「導引図」,古代中国人の不死幻想,東方書店,1995

1206. 加藤謙一,匈奴の社会構造に関する一考察,歴史評論,546,1995

1207. 久保田宏次,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家産相統一江蘇省儀徵県胥浦 101 号前漢墓出土「先令券書」を中心に—,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08. 茂澤方尚,韓非子の「先王」再考,駒沢史学,48,1995

1209. 末永高康,董仲舒春秋災異説の再検討,中国思想史研究,18,1995

1210. 初山明,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のために—,木簡研究,17,1995

1211. 初山明,秦漢刑罰制度研究の現状,中国史学,5,1995

1212. 初山明,居延新簡「駒罷老病死」冊書—漢簡訴訟論のために(続)—,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13. 平勢隆郎,中国古代の曆における「水」と「火」,文明学原論 江上波夫先生米寿記念論集,山川出版社,1995

1214. 齊藤秀昭,秦漢代の身体刑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15. 山田勝芳,王莽代貨幣史,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6,1995

1216. 石黒ひさ子,曾侯乙墓出土竹簡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駿台史学,95,1995

1217. 松崎つね子,墓葬より見た中国古代社会,駿台史学,93,1995

1218. 孫家洲,巫術の盛行と漢代社会,古代文化,47-8,1995

1219. 太田幸男,侯外廬の都市国家論をめぐって,中国の古代都市,汲古書院,1995

1220. 湯浅邦弘,秦帝国の吏観念—雲夢秦簡「語書」「爲吏之道」の思想史的意義—,日本中国学会報,47,1995

1221. 湯浅邦弘,秦帝国の吏観念,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6,1995

1222. 藤田勝久,湖北省の出土資料研究,中国出土資料研究会会報,1,1995

1223. 藤田勝久,『史記』戦国系譜と『世本』,愛媛大学教養学部紀要,28-1,1995
1224. 藤田勝久,『史記』項羽本紀と秦楚之際月表,東洋史研究,54-2,1995
1225. 藤田勝久,漢代関中の県と水利開発,中国水利史の研究,国書刊行会,1995
1226. 五井直弘,咸陽と成都,中国の古代都市,汲古書院,1995
1227. 小南一郎,射の儀礼化をめぐって,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5
1228. 新井儀平,戦国・包山楚簡—篆書中に見える忽卒の文字を中心として—,大東書道研究,2,1995
1229. 巽善信,東アジアの馬冑,古代文化,47-5,1995
1230. 伊藤倫厚,読易私記又続,中国哲学(北海道大学),24,1995
1231. 伊藤敏雄,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蛮夷支配の系譜—税役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32. 越智重明,戦国秦漢時代の集落(1),久留米大学比較文化年報,4,1995
1233. 沢田勲,匈奴における投降漢人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34. 澤田多喜男,『莊子』所見老聃考,汲古,27,1995
1235. 斎木哲郎,西漢後期の宗教意識と儒教,鳴門教育大学研究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10,1995
1236. 斎藤秀昭,秦代の身体刑について—「刑」と「完」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37. 志野敏夫,漢の都試,東方学,89,1995
1238. 重近啓樹,秦の内史をめぐる諸問題,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39. 竹浪隆良,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夫権と父母権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40. 佐藤達郎,尚書の銓衡の成立,史林(京大),78-4,1995
1241. 佐藤栄,瓠子の「河決」と武帝の抑商,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別冊・哲学・史学編,21,1995
1242. 佐竹靖彦,中国古代の数値主義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 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汲古書院,1995
1243. 坂出祥伸,さまざまな方術,「気」と道教・方術の世界,角川書店,1996
1244. 坂出祥伸,養生と中国医術,「気」と道教・方術の世界,角川書店,1996

1245. 柴田昇,『商君書』の歴史的位罫,史林,79-1,1996
1246. 柴田昇,『尉繚子』の世界,東方学,92,1996
1247. 陳力,漢長安城の建設プランの変遷とその思想的背景,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編,31-3,1996
1248. 池田雄一,『奏讞書』中国古代の裁判記録,中国の歴史と地理,1,1996
1249. 池田雄一,春秋時代の治獄について—魯・衛の新出土案例—,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制度と社会—アジア史研究第21号,刀水書房,1996
1250. 池田知久,『易伝』の道器論—帛書『易伝』繫辞篇と通行本『周易繫辞上傳』—,老莊思想,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6
1251. 大川裕子,秦の巴・蜀支配,史櫻,2,1996
1252. 大島誠二,秦の東進と陝東社会,アジアにおける制度と社会,刀水書房,1996
1253. 大庭脩等,居延地区の現状と新出漢簡情報,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29,1996
1254. 大西克也,楚の言語について,日中文化研究,10,1996
1255. 稲葉一郎,荀子の歴史観,関西学院大学人文論究,45-4,1996
1256.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1),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64,1996
1257.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2),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65,1996
1258.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3),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66,1996
1259. 飯島和俊,「解」字義覚え書き,中国の歴史と地理,1,1996
1260. 飯島和俊,秦漢交替期の亡人の発生とその追捕—秦律・奏讞書から見た社会変動,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制度と社会—アジア史研究第20号,刀水書房,1996
1261. 飯尾秀幸,戦後の「記録」としての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11,1996
1262. 飯尾秀幸,中国古代国家発生論のための前提,古代文化,48-2,1996
1263. 釜田啓市,『漢書』「五行志」災異理論の再検討,中国研究集刊,18,1996
1264. 富谷至,漢代穀倉制度—エチナ川流域の食料支給より—,東方学報,68,1996
1265. 富谷至,秦漢二十等爵制と刑罰の減免,前近代中国の刑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
1266. 工藤元男,簡帛資料からみた楚文化圏の鬼神信仰,日中文化研究,10,1996
1267. 工藤元男,四川岷江上流域における羌寨の調査,史観,135,1996
1268. 工藤元男,暦注占い,月刊しにか,1996-7,1996
1269. 宮宅潔,漢代請讞考,東洋史研究,55-1,1996
1270. 古賀登,古代長江流域文化と日本,史観,135,1996

1271. 谷口満, 楚国の都城, 日中文化研究, 10, 1996
1272. 鶴間和幸, 長江流域の地域史としての長江文明, 日中文化研究, 10, 1996
1273. 鶴間和幸, 秦始皇帝の東方巡狩刻石に見る虚構性, 茨城大学教養部紀要, 30, 1996,
1274. 鶴間和幸, 歴史研究と地域, 七瀬鉾田町史研究, 6, 1996
1275. 吉本道雅, 藤田氏の「疑問」に答える, 東方, 188, 1996
1276. 吉本道雅, 『史記』と戦国史, 史記を探る その成り立ちと中国史学の確立, 東方書店, 1996
1277. 吉村昌之, 前漢の大司馬—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政治上の諸問題について—, 史泉, 84, 1996
1278. 江村治樹, 戦国三晋諸国の刑法典の特質について, 前近代中国の刑罰,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6
1279. 角谷常子, 山東流台出土「刑罰図」について, 堺女子短期大学紀要, 31, 1996
1280. 角谷常子, 秦漢時代の簡牘研究, 東洋史研究, 55-1, 1996
1281. 角谷常子, 秦漢時代の贖刑, 前近代中国の刑罰,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6
1282. 景山輝国, 竹簡帛書雑感, 中国図書, 8-8, 内山書店, 1996
1283. 堀敏一, 時代区分特輯・前言, 古代文化, 48-2, 1996
1284. 堀毅, 秦漢法治攷, 慶応義塾大学法学研究, 69-1, 1996
1285. 鈴木直美, 前漢初期における奴婢と戸籍について, 中国の歴史と地理, 1, 1996
1286. 門田明, 江蘇省連雲港市尹湾漢墓出土の簡牘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会会報, 4, 1996
1287. 楠山修作, 漢代女性力役不課論, 追手門学院大学東洋文化学科年報, 11, 1996
1288. 平勢隆郎, 『史記』二千年の誤りを正す, UP, 281, 1996
1289. 清水和明, 東アジアの小札甲の展開, 古代文化, 48-4, 1996
1290. 若江賢三, 秦漢律における「不孝」罪, 東洋史研究, 55-2, 1996
1291. 山田勝芳, 中国古代の墳丘規定と新出漢簡, 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別巻, 32, 1996
1292. 杉山寛行, 項羽本紀を読む,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 42, 1996
1293. 申英秀, 加耶の建国伝説と長江文化, 史観, 135, 1996
1294. 矢澤悦子, 闘と賊, 中国の歴史と地理, 1, 1996
1295. 水出泰弘, 秦の半両銭について, アジアにおける制度と社会, 刀水書房, 1996
1296. 藤田高夫, 秦漢罰金考, 前近代中国の刑罰,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6

1297. 藤田勝久, 古代蜀の水利開発と社会, 日中文化研究, 10, 1996
1298. 鶴飼昌男, 建武初期の河西地域の政治動向, 古代文化, 48-12, 1996
1399. 田中有, 新出土漢簡『急就篇』考, 中村璋八博士古稀記念 東洋学論集, 汲古書院, 1996
1300. 小林一美, 中華世界における「華・夷」関係の歴史的展開, 中世における地域・民族の交流, 学生社, 1996
1301. 小澤賢二, 古抄本『史記』『秦本紀』の断簡について, 汲古, 29, 1996
1302. 小澤正人, 考古学から見た巴蜀文化, 日中文化研究, 10, 1996
1303. 小澤正人, 岷江上流域戦国時代石棺墓の一考察, 史観, 135, 1996
1304. 熊谷滋三, 前漢における属国制の形成, 史観, 134, 1996
1305. 伊藤倫厚, 読易私記続, 中村璋八博士古稀記念 東洋学論集, 1996
1306. 鷹取祐司, 居延漢簡劾状関係冊書の復原, 史林, 79-5, 1996
1307. 永田英正, 睡虎地秦簡秦律に見る隸臣妾について, 前近代中国の刑罰,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6
1308. 原宗子, 「農本」主義の採用過程と環境, 史潮, 新 40, 1996
1309. 越智重明, 戦国秦漢時代の集落(2), 久留米大学比較文化研究, 17, 1996
1310. 越智重明, 戦国秦漢時代の集落(3), 久留米大学比較文化研究, 18, 1996
1311. 斎藤道子, 春秋時代の支配権と時間, 東海大学紀要文学部, 66, 1996
1312. 張建国, 前漢文帝刑法改革とその展開の再検討, 古代文化, 48-10, 1996
1313. 足立啓二, 専制国家形成の歴史的な前提, 熊本大学文学部論叢, 53, 1996
1314. 足立啓二,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社会・文化構造の異化過程,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社会・文化構造の異化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1996
1315. 佐藤達郎, 漢代官吏の考課と昇進, 古代文化, 48-9, 1996,
1316. 佐藤達郎, 漢代察举制度の位置—特に考課との関連で—, 史林, 79-6, 1996
1317. 佐藤直人, 前漢時代の郡国の「倉」「庫」「府庫」をめぐって—国家による統制を中心—,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20, 1996
1318. 佐竹昭, 中国古代の帝位継承と恩赦・改元, 広島大学総合科学部紀要 I 地域文化研究, 22, 1996
1319. 薄井俊仁, 始皇帝の「郡県」「封建」論議をめぐって, 埼玉大学紀要教育学部人文・社会科学, 46-1, 1997
1320. 池田雄一, 秦代の律令について, 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 42, 1997
1321. 池田知久, 『老子』の道器論—馬王堆漢墓帛書本に基づいて—, 東方学会創立 50

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1997

1322. 池沢優,祭られる神と祭られぬ神—戦国時代の楚の「卜筮祭禱記録」竹簡に見る霊的存在の構造に関する覚書—,中国出土資料研究,1,1997
1323. 川村康,東洋法制史,法律時報,69-13,1997
1324. 大川裕子,戦国秦の領域と蜀徙民,黄土高原とオルドス中国西北路寧夏・陝北調査記,勉誠社,1997
1325. 渡辺大,帛書「経法」「十六経」「称」「道原」四篇の成立について,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55,1997
1326.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4),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67,1997
1327.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5),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68,1997
1328.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6),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70,1997
1329. 范愉,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7),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171,1997
1330. 冨谷至,長城はいかにして築かれたか,しにか,2,1997
1331. 高村武幸,二十等爵制の意味について,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1997,
1332. 高橋純司,秦律における共犯につい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21,1997
1333. 宮澤知之,中国貨幣経済論序説,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225,1997
1334. 宮宅潔,秦漢時代の裁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より見た—,史林,81-2,1997
1335. 林英樹,前漢高祖の商人支配,東洋学報,79-1,1997
1336. 鈴木直美,戦国秦の連坐と家族,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1997
1337. 茂澤方尚,『韓非子』にみえる所謂「参駭」と「参伍」について,駒沢史学,50,1997
1338. 楠山修作,女子百戸牛酒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東京大),133,1997
1339. 初山明,長城をめぐる攻防〔秦漢〕,しにか,2,1997
1340. 初山明,シンポジウム「古代国家とのろし」,烽の道—古代国家の通信システム,青木書店,1997
1341. 若江賢三,秦律における隸臣妾の特質とその刑期,古代文化,49-6,1997
1342. 若江賢三,秦律中の隸臣妾,愛媛大学人文学会編『愛媛大学人文学会創立二十周年記念論集』,1997
1343. 石川三佐男,出土資料から見た『楚辞』九歌の成立時期につい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1,1997
1344. 矢澤悦子,戦国秦の異民族支配と「属邦」,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1997
1345. 矢澤悦子,秦の統一過程における「臣邦」,駿台史学,101,1997

1346. 藤田高夫, 長城の防衛システム, しにか, 2, 1997
1347. 鶴飼昌男, 「始建国天鳳三年当食者案」冊書の考察—漢代の「案」の語義を中心に—, 東洋史研究, 56-3, 1997
1348. 土屋英明, 『十問』竹簡 中国の性愛文献(7), 東方, 201, 東方書店, 1997
1349. 土屋英明, 『合陰陽』竹簡/『雜療方』帛 中国の性愛文献(8), 東方, 202, 東方書店, 1997
1350. 五井直弘, 中国古代の人々の生活, 専修人文論集, 60, 1997
1351. 西川利文, 漢代における郡県の構造について—尹湾漢墓簡牘をてがかりとして—, 仏教大学学会文学部論集, 81, 1997
1352. 小嶋茂稔, 読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割記, アジア・アフリカ歴史社会研究, 2, 1997
1353. 辛賢, 『帛書周易』の卦序構成における「象」と「数」, 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 55, 1997
1354. 鷹取祐司, 漢代戍卒の徴発と就役地への移動, 古代文化, 49-10, 1997
1355. 鷹取祐司, 漢代の裁判文書「爰書」—戍卒による売買を手掛かりに—, 史林, 80-6, 1997
1356. 影山輝国, 漢代「順気行罰」考,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33, 1997
1357. 原宗子, 銀雀山出土《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の示す自然環境—王兵篇を中心に—,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 1997
1358. 紙屋正和, 尹湾漢墓簡牘と上計・考課制度, 福島大学人文論集, 29-2, 1997
1359. 佐川繭子,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郷飲酒の概念形成について, 日本中国学会報, 49, 1997
1360. 佐藤武敏, 『史記』に見える過秦論,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七, 研文出版, 1997
1361. 佐原康夫, 居延漢簡に見える官吏の処罰, 東洋史研究, 56-3, 1997
1362. 近藤浩之, 『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二三子篇の龍, 東方學, 96, 1997
1363. 才原明美, 秦の鉄官及び製鉄業—角谷定俊説に関連して—,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 3, 1998
1364. 池田知久, 出土資料による新たな中国史学の試み, 創文, 403, 1998
1365. 村上陽子, 穀物の良日・忌日,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 3, 1998
1366. 大川裕子, 古代巴の歴史, 史艸, 39, 1998
1367. 大庭脩, フィールドの木簡, 木簡古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 大修館書店, 1998
1368. 大庭脩, 墓葬の木簡, 木簡古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 大修館書店, 1998



1369. 大庭脩, 中国木簡の特殊性, 木簡古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 大修館書店, 1998
1370. 大庭脩, 中国木簡研究の今後, 木簡古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 大修館書店, 1998
1371. 大西克也, 「毆」「也」の交替—六国統一前後に於ける書面言語の一側面—,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2, 1998
1372. 稲葉一郎, 韓非子の歴史観, 関西学院大学人文論究, 47-4, 1998
1373. 范愉, 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8), 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 172, 1998
1374. 范愉, 中国裁判制度とその理念の研究(9), 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 174, 1998
1375. 飯尾秀幸,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5 帝国と支配古代の遺産, 岩波書店, 1998
1376. 肥後政紀, 『漢書』地理志記載の戸口統計の年代について,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 3, 1998
1377. 富谷至, 二一世紀の秦漢史研究—簡牘資料—,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3, 岩波書店, 1998
1378. 岡村秀典, 農耕社会と文明の形成,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 2 世紀, 岩波書店, 1998
1379. 高村武幸, 九店楚簡日書の性格について—睡虎地日書・放馬灘日書との比較を通じて—,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 3, 1998
1380. 工藤元男, 秦簡研究から浮上した禹の行方をめぐって, 創文, 401, 1998
1381. 工藤元男, 禹の伝承をめぐる中華世界と周縁,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 2 世紀, 岩波書店, 1998
1382. 宮澤知之, 中国専制国家財政の展開,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5 帝国と支配古代の遺産, 岩波書店, 1998
1383. 古賀登, 巴蜀古代文化探求, 唐代史研究, 1, 1998
1384. 谷中信一, 新出土資料の発見と疑古主義の行方(研究動向),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2, 1998
1385. 鶴間和幸,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 学習院史学, 36, 1998
1386. 鶴間和幸,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 2 世紀, 岩波書店, 1998
1387. 吉本道雅, 史記戦国紀年考, 立命館文学, 556, 1998
1388. 江村治樹, 春秋・戦国・秦漢時代の都市の規模と分布,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 44, 1998
1389. 江村治樹, 戦国時代における都市の発達と秦漢官僚制の形成, 岩波講座世界歴

史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2世紀,岩波書店,1998

1390. 井ノ口哲也,「経」とその解説,中国出土資料研究,2,1998
1391. 瀬川敬也,秦代刑罰の再検討,鷹陵史学,24,1998
1392. 李開元,前漢政權の成立と劉邦集団,東洋学報,80-3,1998
1393. 李開元,秦末漢初の盟誓,東方学,96,1998
1394. 鈴木直美,戦国秦の連坐,明大アジア史論集,3,1998
1395. 呂静,秦の『詛楚文』についての再検討,中国出土資料研究,2,1998
1396. 門田明,辺境防衛のなかでの生活,木簡古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大修館書店,1998
1397. 千原靖弘,秦上郡の性格と労役刑制度の発展,東海史学,32,1998
1398. 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の「家」と均分相続,東北アジア研究,2,1998
1499. 山田勝芳,秦漢代手工業の展開,東洋史研究,56-4,1998
1400. 杉本憲司,中国古代の都市生活に関する法慣習寸描,鷹陵史学,24,1998
1401. 石岡浩,秦時代の刑罰減免をめぐって,史滴,20,1998
1402. 矢野千載,中国古代の書体の変遷,東アジア地域研究,5,1998
1403. 松崎つね子,隠官と文帝の肉刑廃止,明大アジア史論集,3,1998
1404. 湯浅邦弘,中国軍事思想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中国研究集刊,23,1998
1405. 藤田勝久,漢代郡県制と水利開発,岩波講座世界歴史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2世紀,岩波書店,1998
1406. 鶴飼昌男,辺境警備の行政機構,木簡古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大修館書店,1998
1407. 土屋英明,『天下至道談』竹簡/『養生方』帛 中国の性愛文献(9),東方,203,東方書店,1998
1408. 土屋英明,『胎産書』帛 中国の性愛文献(10),東方,204,東方書店,1998
1409. 西川利文,尹湾漢墓簡牘三・四号木牘について—その復原を中心として—,鷹陵史学,24,1998
1410. 向井哲夫,竹簡『文子』につい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2,1998
1411. 小嶋茂稔,秦漢時代出土資料研究の近年の動向に関する覚書,歴史学研究,708,1998
1412. 永田英正,簡牘研究で思うこと(巻頭随想),中国出土資料研究,2,1998
1413. 原宗子,生産技術と環境,岩波講座世界歴史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2世紀,岩波書店,1998
1414. 齋木哲郎,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五行篇」新解—秦儒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2,1998

1415. 鄭澤善, 中国の歴代刑法における共犯論, 中京大学大学院生法学研究論集, 18, 1998
1416. 仲山茂, 漢代の掾史, 史林, 81-4, 1998
1417. 重近啓樹, 秦漢帝国と豪族,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5 帝国と支配古代の遺産, 岩波書店, 1998
1418. 佐原康夫, 中国古代の貨幣経済と社会,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3 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 2 世紀, 岩波書店, 1998
1419. 佐々木研太, 戦国期の「質」の機能, 史潮, 43, 1998
1420. 近藤浩之,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研究概説(中)—『帛書周易』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中国哲学研究, 11, 1998
1421. 近藤浩之,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研究概説(下)—『帛書周易』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中国哲学研究, 12, 1998
1422. Paulos Huang, European Sinology and the Excavated Chinese Materials Studies in Europe,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3, 1999
1423. 柴田昇, 墨家集団論序説,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23, 1999
1424. 池田雄一, 長江文明と尹湾漢簡・馬王堆「小城図」,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 刀水書房, 1999
1425. 大庭脩, 中国古代の武士の「家」, 公家と武家Ⅱ, 1999
1426. 大西克也, 試釈“是=”, 論集 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 汲古書院, 1999
1427. 大櫛敦弘, 秦邦, 論集 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 汲古書院, 1999
1428. 渡辺信一郎, 天下の領域構造, 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社会, 51, 1999
1429. 岡村秀典, 中国古代王権と祭祀, 考古学研究, 46-2, 1999
1430. 高村武幸, 前漢末属吏の出張と交際費について—尹湾漢墓簡牘『元延二年日記』と木牘七・八から—,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3, 1999
1431. 横田恭三, 包山楚簡の文字とその書風, 論集 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 汲古書院, 1999
1432. 江村治樹, 戦国新出土文字資料概述・補訂,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 45, 1999
1433. 李開元, 前漢初年における宮廷と政府, 史学雑誌, 108-10, 1999
1434. 李開元, 劉邦集団における楚人と秦人, 論集 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 汲古書院, 1999
1435. 柳澤聡子, 秦(始皇帝)の文字政策, NOVITAS(帝塚山学院大), 8, 1999

1436. 楠山修作, 商鞅の変法について, 阿頼耶・伊原両先生退休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1999
1437. 平勢隆郎, 戦国時代六国文字における「番」等の略化, 論集 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 汲古書院, 1999
1438. 松崎つね子, 楚・秦・漢墓の変遷より秦の統一をみる,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 刀水書房, 1999
1439. 藤田勝久, 包山楚簡よりみた戦国楚の縣と封邑,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3, 1999
1440. 西川利文, 尹湾漢墓簡牘の基礎的研究, 仏教大学学会文学部論集, 83, 1999
1441. 岩本篤志, コンピュータ利用による包山楚簡・楚系文字の研究,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3, 1999
1442. 原宗子, 東アジアの中の中国農業, 日中文化研究, 14, 1999
1443. 原宗子, 古代中国の農政と環境, 中国—社会と文化—, 14, 1999
1444. 原宗子, 環境史から見た「商鞅変法」, 流通経済大学論集, 34-2, 1999
1445. 直井晶子, 前漢初期の県令と門下・舎人, 史滴, 21, 1999
1446. 紙屋正和, 前漢列侯の封域と財政, 福岡大学人文論叢, 31-2, 1999
1447. 福田哲之, 吐魯番出土『急就篇』古注本校釈, 中国研究集刊, 蔵 25, 1999
1448. 阿部幸信, 漢代における朝位と授制について, 東洋学報, 82-3, 2000
1449. 阿部幸信, 綬制よりみた前漢末の中央・地方官制, 集刊東洋学, 84, 2000
1450. 長谷川清貴, 災異説の前漢期における政治的活用, 東洋文化, 319, 2000
1451. 池田雄一, 中国古代の法典編纂について, 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法と国家, 2000
1452. 飯島和俊, 秦漢時代の軍制, 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 24, 2000
1453. 飯島和俊, 秦漢交替期の雇用関係, 唐代史研究, 3, 2000
1454. 飯島和俊, 市に集まる人々, 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法と国家, 2000
1455. 富谷至, 秦漢の律と令,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1, 2000
1456. 富谷至, 晋泰始律令への道, 東方学報(京都), 72, 2000
1457. 高村武幸, 前漢西北辺境と関東の戍卒, 駿台史学, 110, 2000
1458. 高村武幸, 河西における漢と匈奴の攻防, 東洋学報, 82-3, 2000
1459. 宮宅潔, 秦漢時代の爵と刑罰, 東洋史研究, 58-4, 2000
1460. 谷中信一, 郭店『老子』関係著作五種,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4, 2000
1461. 吉本道雄, 商鞅変法研究序説, 史林, 83-4, 2000
1462. 米田健志, 日本における漢代官僚制研究, 中国史学, 10, 2000
1463. 楠山修作, 算と賦との研究, アジア文化学科年報, 1, 2000

1464. 平勢隆郎, 周家台三〇号墓木牘に記された「陳勝」暦日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4, 2000
1465. 浅野裕一, 郭店楚簡『太一生水』と『老子』の道, 中国研究集刊, 26, 2000
1466. 青山大介, 『呂氏春秋』の孝説, 東洋古典学研究, 10, 2000
1467. 石岡浩, 漢代刑罰制度における赦の効用, 史観, 143, 2000
1468. 松田稔, 『淮南子』の神話的記述と『山海経』, 国学院雑誌, 101-12, 2000
1469. 陶安あんど, 法典編纂史再考,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40, 2000
1470. 西川利文, 漢代における長吏の任用・補論, 鷹陵史学, 26, 2000
1471. 西川利文, 尹湾漢墓漢牘よりみた漢代の長吏,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4, 2000
1472. 小寺敦, 先秦時代婚姻史および隣接分野研究の展望, 中国史学, 10, 2000
1473. 小寺敦, 先秦時代の婚姻に関する一考察, 史学雑誌, 109-1, 2000
1474. 小寺敦, 列国金文にみえる祖先祭祀と女性,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4, 2000
1475. 鷹取祐司, 自証爰書の運用, 古代文化, 52-12, 2000
1476. 鷹取祐司, 「前言解」小考, 史林, 83-5, 2000
1477. 永田英正, 江蘇尹湾漢墓出土簡についての考察, 京都女子大学史窓, 57, 2000
1478. 直井晶子, 前漢における郡県財政と少府・小府・少内,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4, 2000
1479. 紙屋正和, 前漢列侯国の官制, 福岡大学人文論叢, 31-4, 2000
1480. 中村威也, 中国古代西南地域の異民族, 中国史学, 10, 2000
1481. 中島三知子, 雲夢睡虎地秦簡における「雜」について, 法学政治学論究, 46, 2000
1482. 佐藤達郎, 前漢の文帝, 古代文化, 52-8, 2000
1483. 佐藤達郎, 功次による昇進制度の形成, 東洋史研究, 58-4, 2000
1484. 佐藤直人, 秦漢期における郡・県関係について,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24, 2000
1485. 曹峰, 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における「刑」・「名」・「實」, 曙光, 11, 2000
1486. 浅野裕一, 『春秋』の成立時期—平勢説の再検討—, 中国研究集刊, 29, 2001
1487. 井上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本『孝経注疏』(繁体字版)初見, 中国研究集刊, 29, 2001
1488. 曹峰, 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に見える「道」・「名」・「法」の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 16, 2001
1489. 阿部幸信, 漢代における印授の追贈, 東方学, 101, 2001
1490. 浜川栄, 黄河変遷史から見た中国社会の一側面, 早稲田大学高等学院研究年誌,

45, 2001

- 1491. 柴田昇, 黄老・道家・諸子百家,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25, 2001
- 1492. 大川俊隆, 漢簡中の「大時」と「小時」と暦注書, 中国社会と文化, 16, 2001
- 1493. 大川俊隆, 「大時」「小時」考, 礼制, 2001
- 1494. 大澤勝茂, 秦・漢より三国に至る西南夷の世界, アジア文化研究, 8, 2001
- 1495. 大櫛敦弘, 齊王に見せた夢, (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科) 人文科学研究, 8, 2001
- 1496. 大櫛敦弘, 国制史,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 1497. 稲葉一朗, 秦始皇の思想統制について,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 1498. 渡辺信一郎, 漢代国家の社会的労働編成,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 1599. 冨谷至, 三世紀から四世紀にかけての書写材料の変遷, 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1
- 1500. 高村武幸, 漢代官吏生活史の一断面, 東方学, 101, 2001
- 1501. 工藤元男, 建除よりみた「日書」の成立過程試論, 中国社会と文化, 16, 2001
- 1502. 工藤元男, 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構造とシステム, 東洋史研究, 59-4, 2001
- 1503. 工藤元男, 中国古代の社会史研究と出土文字資料,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 1504. 宮宅潔, 「効」小考, 神女大史学, 18, 2001
- 1505. 古賀登, 戦国秦漢史総説,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 1506. 郭茵, 漢初の南北軍, 東洋学報, 82-4, 2001
- 1507. 吉本道雅, 国制史,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 1508. 吉村昌之, 漢代の暦制, 中国社会と文化, 16, 2001
- 1509. 江村治樹, 石鼓文, しにか, 12-3, 2001
- 1510. 井上亘,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情報処理の様態, 東洋文化研究, 3, 2001
- 1511. 初山明, 漢代エチナ=オアシスにおける開発と防衛線の展開, 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1
- 1512. 初山明, 魏晋楼蘭簡の形態, 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1
- 1513. 浅野裕一, 戦国楚簡『周易』について歳号, 中国研究集刊, 29, 2001
- 1514. 浅原達郎, 望山一号墓竹簡の復元, 礼制, 2001
- 1515. 森谷一樹, 戦国秦の相邦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60-1, 2001
- 1516. 山田勝芳, 秦漢時代の財政問題,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1517. 杉村伸二, 漢初の郎官, 史泉, 94, 2001
1518. 石岡浩, 漢代有期勞役刑制度における復作と弛刑, 法制史研究, 50, 2001
1519. 水間大輔, 戦国秦漢期の伍制における保証制度, 紀要(早大・院・文), 46, 2001
1520. 水間大輔, 戦国秦漢期の伍連坐制による民衆支配,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5, 2001
1521. 松崎つね子, 中国文明の継承性に果した文字の役割, 駿台史学, 111, 2001
1522. 藤井律之, 特進の起源と変遷, 東洋史研究, 59-4, 2001
1523. 藤田高夫, 大英図書館蔵スライン将来漢簡の現状報告,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2, 2001
1524. 藤田勝久, 中国古代社会と水利問題,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1525. 西川利文, 漢代における長吏の任用, 古代文化, 53-1, 2001
1526. 熊谷滋三, 前漢の典客・大行令・大鴻臚, 東洋史研究, 59-4, 2001
1527. 巖善昭, 馬王堆漢墓の房中養生の竹簡についての研究,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5, 2001
1528. 永田英正, 礼忠簡と徐宗簡研究の展開, 京都女子大学史窓, 58, 2001
1529. 永田英正, 文書行政,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1530. 原宗子, 簡牘素材の樹種初探,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2, 2001
1531. 紙屋正和, 漢時代における長吏の任用形態の変遷について・再論, 七隈史学, 2, 2001
1532. 仲山茂, 江蘇省連雲港市尹湾六号墓出土簡牘をめぐって,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25, 2001
1533. 仲山茂, 秦漢時代の「官」と「曹」, 東洋学報, 82-4, 2001
1534. 重近啓樹, 秦漢の兵制をめぐる諸問題,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1535. 佐藤直人, 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前後左右將軍について,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25, 2001
1536. 佐原康夫, 漢代貨幣史再考, 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汲古書院, 2001
1537. 佐々木研太, 出土秦律の書写形態の異同をめぐっ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5, 2001
1538. 龐樸, 《五行》補注, 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 汲古書院, 2002
1539. Donald Harper, 郭店楚簡『太一生水』における太一の性格, 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 汲古書院, 2002
1540. 白杉悦雄, 「虚」の体感と「虚」の病理学—古代養生説から医学理論が継承したもの



の一,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41. 曹峰,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有關“闡疋”的幾條竹簡,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42. 柴田昇,中国古代人の軍事的国家構想,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6,2002

1543. 陳松長,帛書《陰陽五行》甲篇的文字識讀與相關問題,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44. 池田知久,『老子』の二種類の「孝」と郭店楚簡『語叢』の「孝」,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45. 池澤優,宗教学理論における新出土資料—聖俗論と仲介者概念を中心に—,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46. 大庭脩,張家山二年律令簡中の津関令について,史料,179,2002

1547. 大庭脩,張家山 247 号漢墓出土の津関令について,近つ飛鳥博物館館報,7,2002

1548. 大西克也,戦国文字随想—系統論と統一の意義をめぐっ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49. 大西克也,「國」の誕生,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50. 福田一也,『老子』と儒家思想呂号,中国研究集刊,31,2002

1551. 福田哲之,楚墓出土簡牘文字における位相,中国研究集刊,31,2002

1552. 高村武幸,秦漢代地方官吏の『日記』について,古代文化,54-9,2002

1553. 高津純也,戦国秦漢の支配構造に関する一考察,日中律令制の諸相,東方書店,2002

1554. 宮宅潔,辺境出土簡研究の前提—敦煌の穀物関連簡より—,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55. 谷中信一,郭店楚簡『老子』及び「太一生水」から見た今本『老子』の成立,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56. 廣瀬薫雄,包山楚簡に見える證據制度について,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57. 鶴間和幸,秦の始皇帝はなぜ中国を統一できたのか?,しにか,13-4,2002

1558. 胡平生,郭店楚簡中の孝與忠,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59. 吉村昌之,漢代の時制について,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3,2002

1560. 吉田恵二,中国古代筆墨考,国学院雑誌,103,2002

1561. 姜廣輝,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62. 近藤浩之,王家臺秦墓竹簡『歸藏』の研究,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

院,2002,

1563. 井上亘,『冊書』の書誌学的考察,古代文化,54-3,2002

1564. 李成珪,簡牘資料と思想史研究の擴大,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65. 李承律(池澤優譯),郭店楚簡『唐虞之道』の社會的「利」思想について,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66. 楠山春樹,郭店楚簡から見た『老子』の形成,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67. 浅野裕一,戦国楚簡と古代中国思想史の再検討,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78. 山田勝芳,張家山第二四七号漢墓竹簡「二年律令」と秦漢史研究,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3,2002

1579. 山元貴高,戦国秦漢時代における秦嶺の交通路,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26,2002

1580. 福田一也,『老子』と儒家思想,中国研究集刊,31,2002

1581. 石川三佐男,よみがえる『楚辭』九歌の世界,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82. 石川三佐男,太一信仰の考古學的検討から見た『楚辭』の篇名問題,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83. 水間大輔,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未遂・予備・陰謀罪の処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を中心に—,史学雑誌,113-1,2002

1584. 水間大輔,秦律・漢律における共犯の処罰原理,法制史研究,51,2002

1585. 水間大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刑法雜考,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86. 太田幸男,商鞅の変法,しにか,13-1,2002

1587. 湯浅邦弘,郭店『六徳』について—全体構造と著作意図—,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88. 藤田勝久,「出土資料学」につい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89. 桐本東太,いわゆる「競射・采桑」図をめぐる一試論,中国出土資料研究,6,2002

1590. 西川利文,漢代の郡国文学,鷹陵史学,28,2002

1591. 影山輝國,秦代避諱初探,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

1592. 織田晃嘉,秦漢朝の変夷統治政策について,関西学院大学人文論究,51-4,2002,

1593. 仲山茂,漢代における長吏と属吏のあいだ,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3,2002

1594. 重近啓樹,『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の刊行によせて,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3,2002

1595. 佐原康夫, 江陵鳳凰山漢簡再考, 東洋史研究, 61-3, 2002
1596. 佐々木研太, 龍崗秦簡をめぐる研究動向, 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 68, 2002
1597. 阿部幸信, 漢代官僚機構の構造,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31, 2003
1598. 阿部幸信, 漢代における綬制と正統観, 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一分冊文科編, 52-2, 2003
1599. 柴生芳(藤井律之譯), 敦煌漢晋懸泉遺址,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00. 池田夏樹, 戦国秦漢期における贖刑制度, 中央大学文学研究科大学院研究年報, 32, 2003
1601. 大川俊隆, 「狃怵」考,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02. 大西克也, 古代漢語における地域的差異と相互交流,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2, 2003
1603. 大櫛敦弘, 歩行と乗車, 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研究, 10, 2003
1604. 東晋次, 漢代爵制論をめぐる諸問題,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4, 2003
1605. 飯尾秀幸, 中国国家史研究は進んだか, 歴史学研究, 782, 2003
1606. 福田哲之, 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子羔』の再検討, 中国研究集刊, 33, 2003
1607. 富谷至, 亭制に関する一考察,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08. 高木智見, 古代中国における三の象徴性, 東洋史研究, 62-3, 2003
1609. 工藤元男, 「秦の領土拡大と国際秩序の形成」再論,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2, 2003
1610. 伊藤敏雄, 三国呉の賬簿の計算ミス, 東アジア研究, 37, 2003
1611. 宮宅潔, 漢代の敦煌戦線と食糧管理,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12. 好并隆司, 張家山漢簡の律文における「宦皇帝」について, 別府大学大学院紀要, 5, 2003
1613. 横田恭三, 戦国および秦における簡牘文字の変遷とその特色,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2, 2003
1614. 吉本道雅, 墨子技巧諸篇小考, 東洋史研究, 62-2, 2003
1615. 吉村昌之, 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16. 吉野賢一, 前漢末における義和の設置につい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31, 2003
1617. 角谷常子, 簡牘の形状における意味,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18. 井波陵一, 王国維と二重証拠法, 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 2003
1619. 瀬川敬也, 秦漢時代の身体刑と労役刑,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7, 2003
1620. 鈴木和美, 後漢時代の土地経営における労働形態について, 中央大学アジア史

研究,27,2003

1621. 鈴木直美,博局紋と宴飲六博図,中国出土資料研究,7,2003

1622. 馬彪,竜崗秦簡第一簡の解釈及びその性格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2,2003

1623. 米田健志,漢代印章考,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2003

1624. 初山明,秦代公文書の海へ—湖南龍山里耶出土の簡牘を読む—,東方,268,2003

1625. 浅野裕一,『五行篇』の成立事情,中国出土資料研究,7,2003

1626. 秋山進午,秦始皇帝陵研究の成果と課題,古代文化,55-7,2003

1627. 森谷一樹,皇帝と百官のあいだ,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4,2003

1628. 山田雪乃,漢代の人口密度と県の性質,人文学報,335,2003

1629. 杉本憲司,漢代の武庫,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2003

1630. 矢野千載,張家山漢簡の書法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文学会誌,15,2003

1631. 水間大輔,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殺人罪の類型,史観,148,2003

1632. 水間大輔,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出土漢簡に見える漢律の賊律・盜律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2,2003

1633. 太田幸男,中国古代史論文における古典史料の引用方法について,東方,266,2003

1634. 陶安あんど,漢魏律目考,法制史研究,52,2003

1635. 陶安あんど,拙稿「法典編纂史再考漢篇:再び文献史料を中心に据えて」に関する富谷至氏の書評に対する反論,法制史研究,52,2003

1636. 藤田高夫,出土簡牘より見たD21 遺址の性格,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朋友書店,2003

1637. 藤田勝久,秦漢帝国の成立と秦・楚の社会,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15,2003

1638. 藤田勝久,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秦・巴蜀・楚,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2,2003

1639. 鶴飼昌男,漢代郡太守の持つ人事権について,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2003

1640. 田中亮之介,戦国後期から漢代初期における漆器手工業の背景とその変遷,人文学報,335,2003

1641. 小嶋茂稔,漢代の国家統治機構における亭の位置,史学雑誌,112-8,2003

1642. 鷹取祐司,漢代の裁判手続き「劾」につい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7,2003

1643. 鷹取祐司,漢簡所見文書考,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2003

1644. 影山輝國,漢代避諱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44, 2003
1645. 原宗子,中国環境史の方法・試論,東洋文化研究,5,2003
1646. 戦国楚簡研究会,戦国楚簡研究の現在,中国研究集刊,33,2003
1647. 紙屋正和,前漢末における地方官府の構成,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4,2003
1648. 紙屋正和,後漢時代における地方行政と三公制度,福岡大学人文論叢,34-4, 2003
1649. 仲山茂,兩漢功曹考,東洋史研究報告(名大),4,2003
1650. 竺沙雅章,居延漢簡中の社文書,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2003
1651. 佐藤達郎,馬圈湾出土の食糧支給関係簡,辺境出土木簡の研究,2003
1652. 佐藤直人,秦簡「法律答問」の文書的性格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SITES,1-2,2003
1653. 戦国楚簡研究会,郭店楚墓竹簡関係(総論・各篇解題)(戦国楚簡研究の現在), 中国研究集刊,33,2003
1654. 戦国楚簡研究会,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関係(総論・各篇解題)(戦国楚簡研究の現在),中国研究集刊,33,2003
1655. 戦国楚簡研究会,【附録】郭店楚簡・上博楚簡の字体と形制(戦国楚簡研究の現在),中国研究集刊,33,2003
1656. 戦国楚簡研究会,【附録】「書誌情報」用語解説(戦国楚簡研究の現在),中国研究集刊,33,2003
1657. エノ・ギーレ,「郵」制攷,東洋史研究,63-2,2004
1658. 阿部幸信,後漢時代の赤綬について,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一分冊文科編,53-2, 2004
1659. 阿部幸信,漢帝国の内臣,歴史学研究,784,2004
1660. 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国出土資料研究,8,2004
1661. 奥田尚,古代東アジアの歴史叙述に関する序説,アジア文化学年報(追手門学院大学),7,2004
1662. 浜川栄,徙民 70 万人と黄土高原,東洋文化研究,6,2004
1663. 保科季子,漢代の女性秩序,東方学,108,2004
1664. 草野靖,漢代における帝政の発展と選挙制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2,2004
1665. 陳鼓應,郭店簡本《老子》所呈現的重要哲學問題—由改寫哲學史的觀點談起—, 中国研究集刊,36,2004

1666. 池田夏樹, 戦国秦漢期における贖刑の方法と制度と運用, 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 28, 2004
1667. 池田雄一, 張家山『二年律令』に見える妻の地位, 响沫集, 11, 2004
1668. 大櫛敦弘, 韓暈との密約, 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研究, 11, 2004
1669. 飯田祥子, 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郡県民支配の変化, 東洋学報, 86-3, 2004
1670. 福田一也, 帛書系『老子』の成立事情—莊子後学との関係を中心に—, 中国研究集刊, 35, 2004
1671. 福田哲之, 附録2 上博楚簡形制一覽表,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72. 福田哲之, 上博楚簡『中弓』における説話の変容—『論語』子路篇「仲弓爲季氏宰」章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73. 冨谷至, 二年律令に見える法律用語(その一), 東方学報, 76, 2004
1674. 高村武幸, 漢代の材官・騎士の身分について,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5, 2004
1675. 高津純也, 戦国期における書篇の展開, 史料批判研究, 6, 2004
1676. 宮宅潔,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 東方学報, 76, 2004
1677. 顧史考, 古今文獻與史家之喜新守舊,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78. 郭梨華, 中國哲學的起源與本原之探求—「文」與「情」的哲學思惟—,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79. 黒田秀教, デジタル環境における出土文献の文字処理について,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0. 近藤浩之, 『戦国縦横家書』に見える蘇秦の活動に関する試論, 中国哲学(北海道中国哲学会), 32, 2004
1681. 李承律, 上海博楚簡『容成氏』の堯舜禹禪讓の歴史,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2. 林啓屏(上野洋子譯), 「民之父母」における〈五至〉について,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3. 林素英, 上博簡〈民之父母〉思想探微—兼論其與〈孔子問居〉的關係—,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4. 初山明, 『漢書』刑法志の錯誤と唐代文献,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9, 2004
1685. 平勢隆郎, 『日書』に見える楚の天方位について, 史料批判研究, 6, 2004
1686.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魯邦大旱』における刑徳論,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7.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容成氏』における禪讓と放伐,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8. 橋本昭典,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における「情」について,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9. 馬彪, 秦漢時代の「素封」についての考察(上), 東洋史苑(63), 26-48, 2004

1690. 若江賢三,睡虎地秦墓竹簡と張家山漢墓竹簡,史料学の方法を採る(3),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4
1691. 渋谷由紀,郭店楚簡《五行》考,中国古典研究,49,2004
1692. 渋谷由紀,「性」と「心」,中国出土資料研究,8,2004
1693. 森谷一樹,張家山漢簡・秩律初探,洛北史学,6,2004
1694. 森和,子孫庫楚帛書三篇の關係からみた資料的性格について,史滴,26,2004
1695. 山田智,漢代專制的皇帝権の形成過程,歴史学研究,794,2004
1696. 杉村伸二,景帝中五年王国改革と国制再編,古代文化,56-10,2004
1697. 杉村伸二,漢初人事考,史泉,99,2004
1698. 石岡浩,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にみる二十等爵制度,教育と研究早稲田大学本庄高等学院研究紀要,22,2004
1699. 石岡浩,戦国秦の「徭」と軍政,法史学研究会会報,9,2004
1670. 柿沼陽平,殷代宝貝の社会的機能について,歴史民俗,2,2004
1671. 水間大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による秦漢刑罰制度研究の動向,中国史学,14,2004
1672. 水間大輔,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殺人罪と身分關係,史滴,26,2004
1673. 水間大輔,前漢前半期の墓葬から出土した法制史料,東方,279,2004
1674. 水間大輔,秦律・漢律における傷害罪の類型,中国史研究,28,2004
1675. 太田幸男,出土法律文書に見える「盜」について,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5,2004
1676. 湯浅邦弘,出土竹簡の語る世界—特集号「戦国楚簡と中国思想史研究」の刊行—,中国研究集刊,36,2004
1677. 湯浅邦弘,附録1 戦国楚簡研究關係 HP 紹介,中国研究集刊,36,2004
1678. 湯浅邦弘,上博楚簡『徙政』と儒家の「徙政」,中国研究集刊,36,2004
1679. 湯浅邦弘,上博楚簡『徙政』の竹簡連接と分節について,中国研究集刊,36,2004
1680. 藤田勝久,『史記』の歴史観と叙述,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17,2004
1681. 藤田勝久,『史記』秦漢史像の復元,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5,2004
1682. 藤田勝久,長江流域の社会と張家山漢墓,史料学の方法を採る(3),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4
1683. 下田誠,鄭韓故城出土銅兵器の基礎的考察,学習院大学人文科学論集,13,2004
1684. 下田誠,戦国韓国の権力構造,史海,51,2004
1685. 小嶋茂稔,前漢における郡の変容と刺史の行政官化についての覚書,山形大学歴史・地理・人類学論集,5,2004



1686. 小寺敦, 上海博楚簡『子羔』の感生伝説について, 史料批判研究, 6, 2004
1687. 宇野順治・古泉圓順, 復元トルファン出土「二十八(七)宿占星書」, 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 43, 2004
1688. 袁國華,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字句考釋,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89. 周長山, 從“舍人”、“門下”到“諸曹”, 立命館文学, 58-5, 2004
1690. 竹田健二, 上博楚簡『恆先』における氣の思想,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91. 佐藤将之, 中国思想史研究における国際交流への覚書—『戦国楚簡と中国思想史研究』特集号によせて—, 中国研究集刊, 36, 2004
1692. 佐藤直人, 銀雀山漢簡「庫法」篇の生成, 名大 SITES, 2-2, 2004
1693. 工藤元男,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1) 楚王への忠誠を示す貞問記録——包山楚簡・江陵望山楚簡・江陵九店楚簡, 東方 (275), 11-15, 2004
1694. 李承律,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2) 先秦古佚書の宝庫——信陽楚簡・郭店楚簡・上海楚簡, 東方 (276), 12-16, 2004
1695. 鶴間和幸,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3) 始皇帝の時代の新出土資料——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里耶秦牘, 東方 (277), 13-17, 2004
1696. 森和,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4) 天水放馬灘秦簡・沙市周家台秦簡・江陵王家台秦簡・虎溪山漢簡・随州孔家坡漢簡, 東方 (278), 12-16, 2004
1697. 水間大輔,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5) 前漢前半期の墓葬から出土した法制史料——銀雀山漢簡・張家山漢簡, 東方 (279), 5-9, 2004
1698. 大櫛敦弘,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6) 漢代における書籍の「かたち」——馬王堆漢墓帛書・定州漢簡・阜陽漢簡・武威漢簡, 東方 (280), 6-10, 2004
1699. 西川利文,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7) 下級官吏の見た漢代の地方行政——江陵鳳凰山漢簡・尹湾漢簡, 東方 (281), 13-17, 2004
1700. 藤田高夫,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8) 漢代辺境の行政文書——敦煌漢簡・馬圈湾漢簡・懸泉漢簡・懸泉月令詔條, 東方 (282), 8-12, 2004
1701. 宮宅潔,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9) 居延簡が語るもの 居延旧簡・居延新簡, 東方 (283), 10-13, 2004
1702. 伊藤敏雄, 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10) 三国呉の地方行政をめぐる膨大な新史料(長沙走馬楼三国呉簡), 東方 (284), 18-21, 2004

1703. 大西克也,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11) 語学資料としての簡牘帛書——睡虎地秦簡・包山楚簡ほか語学資料の観点から全般的に,東方(285),22-25,2004
1704. 池田知久,地下からの贈り物——簡牘資料の価値と研究状況(12 最終回) 新出土資料研究の今後——総括簡帛研究の学際的広がり,東方(286),20-22,2004
1705. 佐藤将之、谷中信一、大西克也等,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出土資料と中国学研究(特集号「戦国楚簡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集刊(36),19-40,2004
1706. 關尾史郎,長沙呉簡研究会—魏晋時代簡牘研究の行方—,東方,306,2004
1707. 阿部幸信,「漢代における印授の追贈」付表訂補,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一分冊文科編,54-2,2005
1708. 坂出祥伸,馬王堆漢墓出土「52 病方」における呪術治療の一側面,東方宗教,106,2005
1709. 曹峰,「自生」から「自爲」へ,中国出土資料研究,9,2005
1710. 柴田昇,血族と歴史の原像,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9,2005
1711. 池田夏樹,戦国秦漢期における徒隸,帝京史学,20,2005
1712. 村上陽子,出土資料からみた漢代の食生活,中国出土資料研究,9,2005
1713. 大川裕子,中国古代史の視点から,史潮,新 58,2005
1714. 大野裕司,睡虎地秦簡『日書』における神霊と時の禁忌,中国出土資料研究,9,2005
1715. 大櫛敦弘,「機密」のゆくえ,史料学の方法を巡る(4),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5
1716. 飯島和俊,《鞠…審》の構図(奏讞書研究),アジア史における社会と国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
1717. 福田哲之,阜陽漢墓出土木牘章題考——一号・二号木牘を中心として——,中国研究集刊,37,2005
1718. 福田哲之,上博楚簡『内礼』の文献的性格,中国研究集刊,38,2005
1719. 福田哲之,阜陽漢墓一号木牘章題と定州漢墓竹簡『儒家者言』,中国研究集刊,39,2005
1720. 富谷至,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竹簡,木簡研究,27,2005
1721. 岡部美智子,『史記』『平準書』における批判考察,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41,2005
1722. 高村武幸,秦漢時代の都官,東洋学報,87-2,2005

1723. 高村武幸, 漢代官吏任用における財産資格の再検討, 史林, 88-2, 2005
1724. 高村武幸, 公文書の書記官署名,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9, 2005
1725. 工藤元男, 平夜君成楚簡「卜筮祭祷簡」初探,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3, 2005
1726. 工藤元男, 秦の遷刑覚書,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6, 2005
1727. 工藤元男, 望山楚簡「卜筮祭祷簡」の基礎的研究,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礼 福井文雅博士古希記念論集, 春秋社, 2005
1728. 谷口満, 戦国楚文化の淵源,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3, 2005
1729. 谷中信一, 上博簡『魯邦大旱』の思想とその成立,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9, 2005
1730. 廣瀬薫雄, 荊州地区出土戦国楚簡, 木簡研究, 27, 2005
1731. 好井隆司, 伝国璽再考, 史学研究, 249, 2005
1732. 金子修一, 即位儀礼から見た皇帝権力, 唐代史研究, 8, 2005
1733. 井上亘, 漢代の書府, 東洋学報, 87-1, 2005
1734. 鷲尾祐子, 更卒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史論叢 続集(立命館東洋史学会), 2005
1735. 鈴木直美, 里耶秦簡に見える隠官,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9, 2005
1736. 馬彪, 秦漢時代の「素封」についての考察(下), 東洋史苑, 64, 2005
1737. 馬彪, 「雲夢龍崗秦簡」についての実態考察, 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 9, 2005
1738. 末永高康, 出土文物とシノロジー, 中国 21, 23, 2005
1739. 片野竜太郎, 里耶秦簡に見える債務労役,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9, 2005
1740. 平勢隆郎, 戦国時代における天下の中の地域的特徴,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3, 2005
1741.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曹沫の陣』の兵学思想, 中国研究集刊, 38, 2005
1742. 浅野裕一, 新出土資料と諸子百家研究, 中国研究集刊, 38, 2005
1743. 浅野裕一, 上天・上帝信仰と砂漠の一神教, 中国研究集刊, 40, 2005
1744. 橋元純也, 『墨子』論説類諸篇の成り立ち, 東洋古典学研究, 20, 2005
1745. 青木俊介, 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県の部局組織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9, 2005
1746. 三峡大学三峡文化研究中心(岡本真則譯), 長江三峡地区考古文化綜述,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3, 2005
1747. 渋谷由紀, 郭店楚簡《五行》と『孟子』に見られる「道」の思想について, 後漢経学研究会論集, 2, 2005
1748. 森和, 祝融伝承の形成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 史滴, 27, 2005
1749. 森和, 子彈庫楚帛書の資料的性格について,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

報,3,2005

1750. 山元貴尚,秦代における江陵の位置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研究,12,2005
1751. 山元宣宏,隸書の「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人間・環境学(京都大学),14,2005
1752. 杉村伸二,郡国制の再検討,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6,2005
1753. 石岡浩,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にみる磔刑の役割,史学雑誌,114-11,2005
1754. 石岡浩,収制度の廃止にみる前漢文帝刑法改革の発端,歴史学研究,805,2005
1755. 石合香,律曆からみた五徳終始説の真相,東洋の思想と宗教,22,2005
1756. 石黒ひさ子,里耶秦簡 J1・52 記載の地名につい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9,2005
1757. 湯浅邦弘,上博楚簡『彭祖』における「長生」の思想,中国研究集刊,37,2005
1758. 湯浅邦弘,語り継がれる先王の故事—上博楚簡『昭王與龔之脾』の文献的性格,中国研究集刊,40,2005
1759. 藤田勝久,里耶秦簡と秦代郡県の社会,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19,2005
1760. 藤田勝久,包山楚簡と戦国の情報伝達,中国研究集刊,38,2005
1761. 藤田勝久,中国出土資料と古代社会,資料学の方法を巡る,4,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5
1762. 丸山雄,沛公以前の劉邦,早実研究紀要,39,2005
1763. 下倉渉,秦漢姦淫罪雑考,東北学院大学論集歴史学・地理学,39,2005
1764. 小林伸二,春秋時代の会盟傾向について,教育文化,1,2005
1765. 小澤賢二,平勢隆郎氏の歴史研究に見られる五つの致命的欠陥,中国研究集刊,40,2005
1766. 野村治宣,『秦会要訂補』輿志考釈,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9,2005
1767. 鷹取祐司,漢代の死刑奏請制度,史林,88-5,2005
1768. 原智昭,戦国期における自然意識をめぐって,信大史学,30,2005
1769. 戦国楚簡研究会,『上博楚簡』解題—『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三)(四)所収文献—,中国研究集刊,38,2005
1770. 戦国楚簡研究会,中国湖北省荊門・荊州学術調査報告,中国研究集刊,38,2005
1771. 紙屋正和,前漢前半期における県・道の吏員組織とその改変,福岡大学研究部論集 A 人文科学編,5-2,2005
1772. 中嶋隆藏,『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3)』所収「互先」小考,集刊東洋学,94,2005
1773. 重近啓樹,均輸法をめぐる諸問題,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6,2005

1774. 竹田健二,「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参加記,中国研究集刊,40, 2005
1775. 小林洋介,正倉院籍帳と長沙走馬楼呉簡,史観,153,2005
1776. 猪飼祥夫,〈長沙走馬楼三国呉簡・竹簡〉と〈傷寒論〉,日本醫史学雑誌,51-2, 2005
1777. 關尾史郎,史料群としての長沙呉簡・試論,木簡研究,27,2005
1778. 柏倉伸哉,秦による東方徙民の一側面,学習院史学,44,2006
1779. 保科季子,亡命小考,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
1780. 本郷隆盛,中国における「封建・郡県論」と公共性,「封建」・「郡県」再考 東アジア社会体制論の深層,思文閣出版,2006
1781. 草野友子,『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六)』について一形制一覽と所収文献概要一,中国研究集刊,44,2006
1782. 柴生芳,敦煌漢晋懸泉置遺址発掘記,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2,2006
1783. 陳波,漢初印章筭記,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
1784. 陳蘇鎮(谷川道雄譯),漢初の東方政策略述,研究論集(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 2006
1785. 陳偉(工藤元男譯),上博楚簡《昭王毀室》等三篇の作者と作品のスタイルをめぐって,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雄山閣,2006
1786. 池田夏樹,秦漢律における「老小廢疾婦人」と刑事責任,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7, 2006
1787. 大西克也,戦国時代の文字と言葉,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雄山閣,2006
1788. 飯島和俊,奏讞書文字異同,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51,2006
1789. 福田哲之,出土古文献復原における字体分析の意義,中国研究集刊,41,2006
1790. 福田哲之,上博楚簡『季康子問於孔子』の編聯と構成,中国研究集刊,41,2006
1791. 福田哲之,上博楚簡『弟子問』考釈(上)一失われた孔子言行録一,中国研究集刊, 43,2006
1792. 富谷至,生命の剥奪と屍体の処刑,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
1793. 岡田功,漢代の「取庸代戍」とそのしくみについて,さいたま市立大宮西高等学校研究紀要,6,2006
1794. 高村武幸,漢代地方少吏の任用と文字の知識について,東方学,111,2006
1795. 高村武幸,前漢河西地域の社会,史学雑誌,115-3,2006

1796. 高村武幸, 秦漢時代の県丞,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797. 工藤元男, 楚文化圏の卜筮祭祷習俗,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4, 2006
1798. 工藤元男, 長江流域の地域文化論をめぐって, 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 雄山閣, 2006
1799. 工藤元男,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百越世界, アジア地域文化学の発展, 雄山閣, 2006
1800. 工藤元男, 秦の巴蜀支配と法制・郡県制, アジア地域文化学の構築, 雄山閣, 2006
1801. 工藤元男等,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2005 年度夏期海外調査報告,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4, 2006
1803. 宮宅潔, 有期勞役刑体系の形成, 東方學報, 78, 2006
1804. 宮宅潔, 「二年律令」研究の射程, 史林, 89-1, 2006
1805. 宮宅潔, 漢初の二十等爵制,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06. 谷口満, 戦国楚文化の淵源, 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 雄山閣, 2006,
1807. 郭茵, 呂大后期の官僚任用政策につい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34, 2006
1808. 何双全, 漢・樓蘭・車師交渉史新証,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2, 2006
1809. 鶴間和幸, 秦始皇帝研究の最前線, 史境, 52, 2006
1810. 横田恭三, 中国古代の筆記文字と書写用具, 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 雄山閣, 2006
1811. 戸内俊介, 「寸」字成立の背景とその後の展開,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0, 2006
1812. 角谷常子, 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家族の連坐について,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13. 井波陵一, 寄る辺なき時代に,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14. 井上了, 中国古典への〈N-gram 分析〉応用に対する若干の疑問, 中国研究集刊, 42, 2006
1815. 鷺尾祐子, 「爲正」考, 中国古代史論叢, 3, 2006
1816. 鷺尾祐子, 漢初の戸について,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17. 渡辺明, 走馬楼三国呉簡を中心とする簡牘の書体上の位置づけ, 第17回書学書道史学会大会, 2006
1818. 伊藤敏雄, 嘉禾吏民田家莈における米納入状況と郷・丘, 歴史研究, 43, 2006
1819. 伊藤敏雄, 〈長沙走馬楼三国呉簡 竹簡〔壹〕〉釈文補注(稿), 歴史研究, 43, 2006
1820. 谷口建速, 長沙走馬楼呉簡よりみる孫呉政権の穀物搬出システム,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0, 2006
1821. 關尾史郎, 長沙呉簡中の名籍について—史料群としての長沙呉簡・試論2—, 唐代史研究, 9, 2006
1822. 關尾史郎, 長沙呉簡中の名籍について・補論—内訳簡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 人文科学研究, 119, 2006
1823. 黎虎, 漢唐時期的「軍吏」, 唐代史研究, 9, 2006
1824. 李承律,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の謙遜思想とその思想史的意義, 大東文化大学人文科学, 11, 2006
1825. 劉彬徽(上野洋子譯), 郭店楚簡の年代及びそれに関する問題の検討,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26. 劉樂賢(森和譯), 出土数術文献と日本の陰陽道文献,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4, 2006
1827. 劉祖信(佐野大介譯), 郭店楚簡発見の日に,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28. 馬場理恵子, 「主四時」と月令,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7, 2006,
1829. 牟弢松(室山留美子譯), 漢代三老考論, 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 別冊特集号, 2006
1830. 楠山修作, 算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7, 2006
1831. 初山明, 王杖木簡再考, 東洋史研究, 65-1, 2006
1832. 平林緑萌, 墨子救宋説話考, 中国古代史論叢, 3, 2006
1833.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鬼神之神』と『墨子』明鬼論,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34.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君子爲禮』と孔子素王説,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35. 若江賢三, 秦漢律における贖刑制度再考, 資料学の方法を拓く, 5, 2006
1836. 森谷一樹, 「二年律令」にみえる内史について,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37. 森和, 戦国楚における宜忌の論理, 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 雄山閣, 2006
1838. 杉村伸二, 東アジア海上交流と古代中国の「海」観念,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 1, 2006



1839. 杉村伸二,二年律令より見た漢初における漢朝と諸侯王国,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
1840. 石岡浩,北宋景祐刊『漢書』刑法志第十四葉の復原,東方学 111,2006
1841. 石岡浩,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二一の疑問と課題,法制史研究,55,2006
1842. 石岡浩,前漢初年の贖刑の特殊性,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7,2006
1843. 石岡浩,秦の城旦舂刑の特殊性,東洋学報,88-2,2006
1844. 石黒ひさ子,「五等爵」再考,駿台史学,129,2006
1845. 辻正博,遷刑・「徙遷刑」・流刑,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
1846. 柿沼陽平,秦漢時代における物価制度と貨幣經濟の構造,史観,155,2006
1847. 水間大輔,秦律から漢律への継承と変革,中国出土資料研究,10,2006
1848. 水林彪,歴史学的概念としての〈封建制〉と〈郡県制〉,「封建」・「郡県」再考 東アジア社会体制論の深層,思文閣出版,2006
1849. 楯身智志,前漢における民爵賜与の成立,史滴,28,2006
1850. 松島隆真,匈奴の出現と前漢高祖期の政治,中国古代史論叢 3,2006
1851. 松浦宥一郎,中国古代の漆製品,季刊考古学,95,2006
1852. 湯浅邦弘,上博楚簡『三徳』の全体構造と文献的性格,中国研究集刊,41,2006
1853. 湯浅邦弘,上博楚簡『三徳』の天人相關思想,中国研究集刊,41,2006
1854. 湯浅邦弘,戦国楚簡と儒家思想—「君子」の意味—,中国研究集刊,43,2006
1855. 藤井律之,罪の「加減」と性差,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
1856. 藤田高夫,官記謁識,関西大学文学部論集,56-2,2006,
1857. 藤田勝久,『史記』の素材と出土資料,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20,2006
1858. 藤田勝久,里耶秦簡の文書伝達と情報伝達,論集(愛媛大・法文),21,2006
1859. 藤田勝久,古代東アジアの石刻資料と情報伝達,史料学の方法を巡る(5),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6
1860. 藤田勝久,後漢時代の交通と情報伝達,史料学の方法を巡る(5),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6
1861. 藤田勝久,中国古代の秦と巴蜀・楚,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雄山閣,2006
1862. 桐本東太,春秋時代の降伏儀礼,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4,2006

1863. 下倉渉, 秦漢闘毆罪雑考,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7, 2006
1864. 下田誠, 戦国魏国における「県」制度の成立, 古代文化, 58, 2006
1865. 小林伸二, 春秋時代の婚姻と外交, 大正大学研究紀要人間学部・文学部, 91, 2006
1866. 小澤賢二, 汲冢竹書再考, 中国研究集刊, 42, 2006
1867. 小澤正人, 鳳凰山 168 号墓からみた前漢初の葬制, 成城大学社会イノベーション研究, 2-1, 2006
1868. 新井宏, 古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土地計量制度の変遷, 計量史研究, 28-1, 2006
1869. 徐少華(井上了譯), 郭店一号楚墓年代析論,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70. 閻步克(中田和宏譯),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の「宦皇帝」を論ず, 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論集, 1, 2006
1871. 鷹取祐司, 二年律令九三簡「診報辟故弗窺審」条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72. 永田英正,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の字体についての所感, 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4, 2006
1873. 斎藤道子, 社会規範としての「告」, 東海史学, 40, 2006
1874. 戦国楚簡研究会, 「新出楚簡国際學術研討会」参加記,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75. 戦国楚簡研究会, 中国湖南省長沙學術調査報告, 中国研究集刊, 41, 2006
1876. 戦国楚簡研究会, スコット・クック先生講演会報告, 中国研究集刊, 43, 2006
1877. 戦国楚簡研究会, 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簡「字書」に関する情報, 中国研究集刊, 43, 2006
1878. 張星久, 関与中国歴史上「封建」と「郡県」之争的再考察, 創大中国論集, 9, 2006
1879. 朱淵清(高木智見譯), 中国出土文献の世界, 創文社, 2006
1880. 椎名一雄,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にみえる爵制, 鴨台史学, 6, 2006
1881. 佐藤達郎, 応劭「漢官儀」の編纂, 関西学院史学 33, 2006
1882. 佐藤達郎, 二年律令に見える漢初の秩石制について,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朋友書店, 2006
1883. 李承律,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の謙遜思想とその思想史的意義, 人文科学, 11, 2006
1884. 西信康, 『孟子』萬章下篇「金聲而玉振之」考—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を手がかりに—,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論集(6), 55-71, 2006
1885. 大川俊隆, 張家山漢簡『算数書』中の「從」字について, 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綜

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86. 大川俊隆,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文字・用語について(1),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87. 岡山茂彦,『算数書』の誤答分析について,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88. 小寺裕,『算数書』における算木計算の考察,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89. 田村三郎,『算数書』中の数学用語と算術問題,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90. 田村誠,『算数書』中の3つの算題について—世界の『算数書』研究より—,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91. 張替俊夫,『算数書』と『九章算術』の数値比較(1),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92. 矢崎武人,『算数書』中の「・二尺七寸而一石」と『漢書』律曆志,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93. 大川俊隆、田村誠,張家山漢簡『算数書』「飲漆」解,張家山漢簡『算数書』の総合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共同研究～,大阪産業大学産業研究所,2006

1894. 近藤浩之,『日書』より見た『周易』封爻辞の用語・語法に関する考察,兩漢における易と三礼,汲古書院,2006

1895. 草野友子,上博楚簡『姑成家父』訳注,中国研究集刊,45,2007

1896. 池澤優,新蔡葛陵楚墓の卜筮祭祷簡の体例と祭祀につい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11,2007

1897. 村元健一,前漢皇帝陵の再検討,古代文化,59-2,2007

1898. 大川俊隆,『二年律令』の文字学,論集(大阪産業大),122,2007

1899. 大澤直人,戦国楚の政權構造,立命館東洋史学,30,2007

1900. 稲葉一郎,南郡の建設と戦国秦の貨幣制度,史林,90-2,2007

1901. 渡邊英幸,秦律の夏と臣邦,東洋史研究,66-2,2007

1902. 飯島和俊,「与廷尉雜治」と詔獄,人文研紀要,61,2007

1903. 飯尾秀幸,中国古代における人の移動とその規制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人文科学年報,37,2007

1904. 飯尾秀幸,秦・前漢初期における里の内と外,中国前近代史論集,汲古書院,2007

1905. 福田哲之, 上博楚簡『弟子問』の文献的性格—上博楚簡に見える孔子に対する呼称—,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06. 福田哲之, 上博楚簡『弟子問』考釈(下)—失われた孔子言行録—,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07. 富谷至, 儀禮と刑罰のはざま, 東洋史研究, 66-2, 2007
1908. 岡安勇,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二王の後」の成立, 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 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 2007
1909. 岡内三真, トルファン五銖錢と中原五銖錢, 中国シルクロードの変遷, 雄山閣, 2007
1910. 宮宅潔, 秦漢刑罰体系形成史への一試論, 東洋史研究, 66-3, 2007
1911. 谷中信一, 『恒先』宇宙論析議,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1, 2007
1912. 廣瀬薫雄, 王杖木簡新考, 東洋学報, 89-3, 2007
1913. 鶴間和幸, 秦兵馬俑が伝える始皇帝の世界, アジア遊学, 96, 2007
1914. 吉本道雅,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華夷思想の成立, 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7
1915. 吉田篤志, 五帝時代は史実か, 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 46, 2007
1916. 鷺尾祐子, 秦の「戸」「同居」「室人」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史論叢(立命館大), 4, 2007
1917. 鷺尾祐子, 秦漢の軍功爵と民爵,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8, 2007
1918. 李承律, 上博楚簡『子羔』の感生説と二重の受命論,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1, 2007
1919. 呂靜, 中国古代の盟書遺物に関する一考察, (東北大・院・教育)紀要, 150, 2007
1920. 落合悠紀, 『二年律令』から見る前漢初期の南郡の南界,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11, 2007
1921. 馬彪, 『算数書』の「租誤券」への再検討, 山口大学文学会志, 57, 2007
1922. 馬場理恵子, 時の法令, 京都女子大学史窓, 64, 2007
1923. 平勢隆郎, 游侠の「儒」化とは何か, 史料批判研究, 8, 2007
1924. 平勢隆郎, 中國古代における説話(故事)の成立とその展開, 史料批判研究, 8, 2007
1925. 平勢隆郎, 中国戦国時代の国家領域と山林藪沢論, 自然の資源化, 弘文堂, 2007
1926.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景公瘡』における爲政と祭祀呪術,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27.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天子建州』における北斗と日月,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28. 橋本健史, 統一秦における郷の機能, 中国前近代史論集, 汲古書院, 2007

1929. 森谷一樹, 黒河下流域の遺迹群, アジア遊学, 99, 2007
1930. 森谷一樹, 居延オアシスの遺迹分布とエチナ河, オアシス地域史論叢, 松香堂, 2007
1931. 森和, 子彈庫楚帛書の天人相関論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1, 2007
1932. 森和, 子彈庫楚帛書における五行説と宗教的職能者, 史観, 157, 2007
1933. 山田勝芳, 前漢武帝代の地域社会と女性徭役, 集刊東洋学, 97, 2007
1934. 伊藤敏雄, 新発見三国呉簡に見る三国時代, アジア遊学, 96, 2007
1935. 石岡浩, 戦国秦の盗罪にみる刑罰加重の法則,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1, 2007
1936. 石岡浩, 戦国秦の良民の「大」「小」区分と身長六尺,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11, 2007
1937. 石岡浩, 前漢時代の賣爵と刑罰免除, 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 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2007
1938. 柿沼陽平, 漢代における銭と黄金の機能的差異,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1, 2007
1939. 柿沼陽平, 文字よりみた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貨幣の展開, 史滴, 29, 2007
1940. 水間大輔, 戦国秦の盗罪にみる刑罰加重の法則,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1, 2007
1941. 水間大輔, 秦律・漢律における女子の犯罪に対する処罰, 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 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2007
1942. 水間大輔等, 居延漢代烽・城邑遺址等踏査記, 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 5, 2007
1943. 湯浅邦弘, 上博楚簡『莊王既成』の予言,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44. 湯浅邦弘, 太子の「知」—上博楚簡『平王與王子木』—,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45. 藤田勝久, 張家山漢簡《津関令》と漢墓簡牘,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 22, 2007
1946. 藤田勝久, 里耶秦簡の情報システム,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 23, 2007
1947. 土口史記, 春秋時代の領域支配, 東洋史研究, 65-4, 2007
1948. 下田誠, 相邦・守相監造青銅兵器の編年をめぐって,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35, 2007
1949. 下田誠, 戦国時代中原地域領域変遷図作成の試み, 東洋文化研究, 9, 2007
1950. 下田誠, 戦国韓の有銘青銅兵器について(補論), 中国前近代史論集, 汲古書院, 2007
1951. 下田誠, 戦国趙の邯鄲遷都と黄河下流域, 黄河下流域の歴史と環境, 東方書店, 2007
1952. 小林伸二, 婚姻をめぐる絆, 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論集, 13, 2007

1953. 小林伸二, 小国論の展開, 教育文化, 2, 2007,
1954. 小澤賢二, 春秋の暦法と戦国の暦法—『競建内之』に見られる日食表現とその史的背景—,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55. 徐冲, 漢唐間の君臣関係と「臣某」形式に関する一試論, 大阪教育大学歴史研究室歴史研究, 44, 2007
1956. 原宗子, 「海」の環境史的把握に成功したか?, 東方, 320, 2007
1957. 戦国楚簡研究会, 中国西安・上海学術調査報告,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58. 張衛星(村松弘一譯), 秦始皇帝陵陪葬坑に関する新研究, 東洋文化研究, 9, 2007
1959. 中林広一, 「穀」考, 上智史学, 52, 2007
1960. 中園尚也, 漢代「程」による「行」の速度規定, 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 11, 2007
1961. 竹田健二, 上博楚簡『慎子曰恭儉』の文献的性格, 中国研究集刊, 45, 2007
1962. 佐藤勝晴, 疏勒河下流部漢代亭障線の復原,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8, 2007
1963. 佐野光一, 長沙東牌樓簡牘の草法, 国学院雑誌, 108-10, 2007
1964. 穎川智, 上博楚簡『互先』の宇宙生成論—馬王堆漢墓帛書『道原』との関連を通して—, 日本中国学会報, 59, 2007
1965. 阿部幸信, 漢初「郡国制」再考,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9, 2008
1966. 板垣明, 前漢初期における「偽書」の性格とその論罪, 池田雄一教授古稀記念 アジア史論叢, 2008
1967. 陳偉(柿沼陽平譯), 秦と漢初の文書伝達システム, 古代東アジアの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08
1968. 村上陽子, 庖厨図を利用した図像解釈の試み,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2, 2008
1969. 島田翔太, 早魃の克服と君主の徳,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2, 2008
1970. 飯島和俊, 「以郵行」をめぐって, アジア史論叢(中央大), 32, 2008
1971. 福田一也, 張家山漢簡『蓋廬』にみえる義兵説, 中国研究集刊, 47, 2008
1972. 福田一也等,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号墓〕』解説, 中国研究集刊, 47, 2008
1973. 福田哲之, 別筆と篇題—『上博(六)』所収楚王故事四章の編成—, 中国研究集刊, 47, 2008
1974. 富谷至, 究極の肉刑から生命刑へ, 東アジアの死刑,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8
1975. 高木智見, 陳偉教授講演録「戦国楚簡に見える司法案例」, 山口大学文学会志, 58, 2008
1976. 工藤元男, 秦の巴蜀支配と移民, 史滴, 30, 2008
1977. 谷中信一,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の現在と展望, 中国—社会と文化, 23, 2008

1978. 吉川祐資, 漢代辺境における令史と尉史, 史泉, 107, 2008
1979. 吉開将人, 漢初の封建と長沙国,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9, 2008
1980. 吉田篤志, 禹の九州傳説の成立過程, 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 47, 2008
1981. 吉永慎二郎, 卜辞における「帝」の字義について, 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紀要, 63, 2008
1982. 角谷常子, 秦末社会の息づかいが蘇る, 東方, 324, 2008
1983. 鈴木直美, 里耶秦簡にみる秦の戸口把握, 東洋学報, 89-4, 2008
1984. 馬彪, 簡牘学研究的“三重証拠法”, 文学会志(山口大), 58, 2008
1985. 浅野裕一, 上海楚簡『東大王泊旱』の災異思想, 集刊東洋学, 100, 2008
1986. 森谷一樹, 皇帝に宦えるもの, 古代文化, 60-2, 2008
1987. 森和, 「日書」と中国古代史研究, 史滴, 30, 2008
1988. 石岡浩, 出土法律文書と秦漢法制史研究, 歴史評論, 669, 2008
1989. 矢沢忠之, 戦国期三晋における貨幣と都市, 古代文化, 60-3, 2008
1990. 柿沼陽平, 秦漢帝国による「半兩」銭の管理, 歴史学研究, 840, 2008
1991. 柿沼陽平, 戦国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布帛の流通と生産, 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 9, 2008
1992. 柿沼陽平, 前漢初期の盗铸銭と盗铸組織, 東洋学報, 90-1, 2008
1993. 楯身智志, 秦・漢代の「卿」, 東方学, 116, 2008
1994. 楯身智志, 前漢における「宦皇帝者」の制定,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2, 2008
1995. 藤田高夫, 漢代西北辺境の文書伝達, 古代東アジアの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08
1996. 藤田勝久, 秦漢時代の交通と情報伝達,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 24, 2008
1997. 藤田勝久, 里耶秦簡の記録簡と実務, 論集(愛媛大・法文), 25, 2008
1998. 藤田勝久, 『史記』の書信を読む, 歴史と文学の資料を読む, 創風社, 2008
1999. 藤田勝久, 中国古代の社会と情報伝達, 古代東アジアの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08
2000. 藤田忠, 秦・漢時代の「不孝」の量刑について, 国士舘東洋史学, 3, 2008
2001. 西山尚志, 『礼記』孔子問居篇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2, 2008
2002. 西山尚志, 上博楚簡『融師有成氏』における冒頭の一文について, 人文科学(大東文化大), 13, 2008
2003. 下田誠, 戦国期を中心とする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論, 歴史評論, 699, 2008
2004. 小澤賢二,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宇宙構造論の段階的発展[上], 中国研究集刊, 46,



2008

2005. 小澤賢二,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宇宙構造論の段階的発展〔下〕, 中国研究集刊, 47,

2008

2006. 楊振紅(萩野祐譯), 秦漢官僚システムにおける公卿大夫士の爵位体系とその意義, 東洋史論叢(大阪市大), 16, 2008

2007. 鷹取祐司, 秦漢時代公文書の下達形態, 立命館東洋史学, 31, 2008

2008. 鷹取祐司, 秦漢時代の刑罰と爵制的身分序列, 立命館文学, 608, 2008

2009. 友田真理, 漢代画像石に見られる禹の図像について,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53-3, 2008

2010. 趙建龍, 中国甘肅省の彩陶紹介と日本古代文化,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2, 2008

2011. 椎名一雄, 「庶人」の語義と漢代の身分秩序, 大正大学東洋史研究, 1, 2008

2012. 佐藤達郎, 漢代の扁書・壁書, 関西学院史学, 35, 2008

2013. 谷口建速, 長沙走馬楼呉簡にみえる「限米」, 三国志研究, 3, 2008

2014. 阿部幸信, 長沙走馬楼呉簡所見調納入簡初探, 立正史学, 103, 2008

2015. 池田雄一, 簡牘に書かれた律令, 白山史学, 45, 2009

2016. 大櫛敦弘, 三川郡のまもり, 人文科学研究(高知大), 15, 2009

2017. 多田麻希子, 秦・前漢初期における「室」「戸」「同居」をめぐる諸問題と家族, 専修史学, 47, 2009

2018. 飯島和俊, 「章」と「章奏」, 人文研紀要(中央大), 65, 2009

2019. 福田哲之, 上博楚簡『武王踐阼』簡6・簡8簡首缺字説, 中国研究集刊, 48, 2009

2020. 高村武幸, 「蘭台令」札記,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 13, 2009

2021. 高村武幸, 「発く」と「発る」, 古代文化, 60-4, 2009

2022. 高村武幸, 漢代文書行政における書信の位置付け, 東洋学報, 91-1, 2009

2023. 工藤元男, 中国古代の「日書」にみえる時間と占ト, 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 5, 2009

2024. 古屋昭弘, 上古音の開合と戦国楚簡の通仮例, 早稲田大学文学部研究科紀要, 54-2, 2009

2025. 胡平生, 里耶簡にみえる秦朝行政文書の製作と伝送, 資料学の方法を巡る, 8, 2009

2026. 吉富透, 『楚辞』天問篇研究序説,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27. 金秉駿, 古代中国南方地区の水運, 資料学の方法を巡る, 8, 2009

2028. 金城未来、竹村渉, 『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七)』所収文献概要(一), 中国研究集刊, 48, 2009

2029. 黎明釗、馬增榮, 試論漢簡所見的都吏及其与督郵的關係,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30. 李承律, 出土文字資料と中国古代思想史, 人文科学(大東文化大), 14, 2009
2031. 李広靖, 戦国秦時代の「盗律」について, 大東アジア学論集, 9, 2009
2032. 鈴木直美, 睡虎地秦簡「公室告」再論, 古代文化, 61-1, 2009
2033. 呂静、鄭卉, 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国境内簡帛出土之考察,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34. 馬彪, 龍崗秦代簡牘における古文字の特徴, 文学会志(山口大), 59, 2009
2035. 馬彪, 龍崗秦簡に見る「参辦(辨)券」について, 研究論集(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 7, 2009
2036. 浅野裕一,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の全体構成, 中国研究集刊, 48, 2009
2037. 若江賢三, 秦漢律における司寇について,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 53, 2009
2038. 山田崇仁, 書契考, 中国古代史論叢, 6, 2009
2039. 杉村伸二, 漢初郡国制と血縁的紐帶,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37, 2009
2040. 上野祥史, 漢代北方の地域社会と交通, 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 8, 2009
2041. 柿沼陽平, 中国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の諸潮流とその展開過程, 中国史学, 19, 2009
2042. 柿沼陽平, 後漢時代における貨幣經濟の展開とその特質, 史滴, 31, 2009
2043. 柿沼陽平, 殷周時代における宝貝文化とその「記憶」, 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 雄山閣, 2009
2044. 水間大輔, 秦・漢における郷の治安維持機能, 史滴, 31, 2009
2045. 水間大輔, 秦・漢の亭吏及び他官との関係,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46. 水間大輔, 秦・漢における亭の治安維持機能, 法の流通, 慈学社出版, 2009
2047. 水間大輔, 秦・漢の亭卒について, 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 雄山閣, 2009
2048. 太田麻衣子, 顎君啓節からみた楚の東漸, 東洋史研究, 68-2, 2009
2049. 藤田勝久, 訪中ノート 漢代西北の交通と懸泉置, 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 8, 2009
2050. 藤田勝久, 漢代の交通と伝言の機能, 愛媛大学文学部論集, 26, 2009
2051. 藤田勝久, 中国古代の簡牘と記録, 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 8, 2009
2052. 王子今, 中国古代交通システムの特徴, 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 8, 2009

2053. 西川利文, 張家山漢簡「史律」に見える任用規定について, 文学部論集(仏教大), 93, 2009
2054. 小林文治, 前漢初期における県の軍事組織について, 史観, 161, 2009
2055. 小林岳, 李賢の妃嬪・三子と章懷太子追諡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56. 邢義田, 漢代の『蒼頡篇』、八体と「史書」の問題について, 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 8, 2009
2057. 伊藤瞳, 長さから見た簡牘の規格の基礎的研究, 千里山文学論集, 82, 2009
2058. 尹龍九, 平壤出土「楽浪郡初元四年県別戸口簿」研究,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59. 鷹取祐司, 秦漢時代の司寇・隸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 中国史学, 19, 2009
2060. 友田真理, 山東省済寧市出土「風伯・胡漢交戦画像石」試釈,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3, 2009
2061. 戦国楚簡研究会, 中国山東省学術調査報告, 中国研究集刊, 48, 2009
2062. 椎名一雄, 漢代爵制的身分秩序の構造, 大正大学東洋史研究, 2, 2009
2063. 椎名一雄, 秦漢律令と爵制的秩序の關係, 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 40, 2009
2064. 谷口建速, 長沙走馬楼呉簡にみえる穀物財政システム, 工藤元男、李成市編, 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 雄山閣, 2009
2065. 草野友子, 上博楚簡『申公臣靈王』の全体構造, 中国研究集刊, 50, 2010
2066. 柴田昇, 劉向『列女伝』の世界像, 血縁關係・老人・女性, 名古屋中国古代史研究会, 2010
2067. 川村潮, 阜陽漢簡「周易」の史料性格について, 史滴, 32, 2010
2068. 村元健一, 後漢雒陽城の南宮と北宮の役割について, 大阪歴史博物館研究紀要, 8, 2010
2069. 大櫛敦弘, 新朝の統一支配, 人文科学研究, 16, 2010
2070. 大櫛敦弘, 日記前史, 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 2010
2071. 渡邊将智, 後漢洛陽城における皇帝・諸官の政治空間, 史学雑誌, 119-12, 2010
2072. 飯島和俊, 「元延二年日記」と吏の移動, 国学院大学紀要, 48, 2010
2073. 飯島和俊, 吏の移動と「宿」, 人文研紀要(中央大), 68, 2010
2074. 飯田祥子, 同産小考, 血縁關係・老人・女性, 名古屋中国古代史研究会, 2010
2075. 福島大我, 前漢代における「首都圏」と皇帝制度の変遷, 専修史学, 49, 2010

2076. 福田一也,『大戴礼記』武王踐祚篇の成立—上博楚簡『武王踐祚』を手掛かりとして—,中国研究集刊,50,2010
2077. 福田哲之,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簡の特異性—『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を中心に—,中国研究集刊,50,2010
2078. 富谷至,笞杖の変遷,東方学報,85,2010
2079. 富田美智江,戦国時代の后稷像,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2010
2080. 高戸聰,山川の神々の性格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104,2010
2081. 宮宅潔,秦漢時代の恩赦と労役刑,東方学報,85,2010
2082. 古澤義久,中国東北地方・韓半島西北部における戦国・秦・漢初代の方孔円銭の展開,古文化談叢,64,2010
2083. 谷口房男,叟人について,東洋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篇),63-35,2010
2084. 谷口満,先秦巴国の構造,歴史と文化,46,2010
2085. 海老根量介,戦国『日書』に反映された地域性と階層性,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2010
2086. 鶴間和幸,秦漢帝国と東アジア海海域,東アジア海をめぐる交流の歴史的展開,東方書店,2010
2087. 李学勤(大阪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譯),清華簡『保訓』の諸問題を論ず,中国研究集刊,51,2010
2088. 劉欣寧(太田麻衣子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一二一一一〇七一一〇八一一〇九簡釈読および漢律における量刑原則について,古代文化,62-3,2010
2089. 呂静,秦代における行政文書の管理に関す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東大),158,2010
2090. 落合悠紀,漢初の田制と阡陌についての一試論,法史学研究会会報,14,2010
2091. 米田健志,前漢の御史大夫小考,奈良史学,27,2010
2092. 内田宏美,漢長安城出土の骨簽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考古学,10,2010
2093. 平勢隆郎,街角で見つけた奇妙な表現2,史料批判研究,9,2010
2094. 浅野裕一,苗族創世歌と上博楚簡『凡物流形』《問物》—『楚辞』天問の淵源,中国研究集刊,50,2010
2095. 若江賢三,『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の和姦事件に関する法の適用,社会文化史学,53,2010
2096. 矢沢忠之,漢初における北方郡国の再編,東洋学報,92-1,2010

2097. 柿沼陽平, 戦国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塩鉄政策と国家的専制支配, 史学雑誌, 119-1, 2010
2098. 柿沼陽平, 戦国秦漢時代における王権と非農業民, 史観, 163, 2010
2099. 柿沼陽平, 三国時代の曹魏における税制改革と貨幣経済の質的变化, 東洋学報, 92-3, 2010
2100. 楯身智志, 漢初における郡国制の形成と展開, 古代文化, 62-1, 2010
2101. 松島隆真, 漢王朝の成立, 東洋史研究, 69-2, 2010
2102. 太田幸男, 中国出土資料雑感,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4, 2010
2103. 湯浅邦弘, 清華大学竹簡と先秦思想史研究, 中国研究集刊, 50, 2010
2104. 藤田勝久, 張家山漢簡「秩律」と漢王朝の領域,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 27, 2010
2105. 土口史記, 先秦期における「郡」の形成とその契機, 古代文化, 6-14, 2010
2106. 土口史記, 包山楚簡の邑と邑大夫, 史林, 93-4, 2010
2107. 武田時昌, 太白行度考, 東方学報, 85, 2010
2108. 西川利文, 張家山漢簡・史律に見える「史書」について, 鷹陵史学, 36, 2010
2109. 西山尚志, 上博楚簡『鬼神之神』に見える伍子胥の記述について, 人文科学(大東文化大), 15, 2010
2110. 下田誠, 日本武器型青銅器と中国戦国時期三晋青銅武器との接点を訪ねて, 東アジア海をめぐる交流の歴史的展開, 東方書店, 2010
2111. 小林春樹, 『漢書』帝紀の著述目的, 東洋研究, 176, 2010
2112. 小寺敦, 先秦時代「讓」考, 歴史学研究, 871, 2010
2113. 小澤賢二, 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県嚴倉楚墓穰子冢発掘概要, 中国研究集刊, 51, 2010
2114. 尹龍九、金慶浩、李成市, 平壤貞柏洞三六四号墳出土竹簡『論語』について,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4, 2010
2115. 仲山茂, 王杖簡の資料的性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34, 2010
2116. 仲山茂, 甘肅省武威出土の王杖簡をめぐる, 血縁関係・老人・女性, 名古屋中国古代史研究会, 2010
2117. 佐藤達郎, 漢六朝期の地方的教令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68-4, 2010
2118. 伊藤敏雄, 長沙呉簡における米納入状況再考, 歴史研究, 47, 2010

2119. 谷口建速, 長沙走馬楼呉簡にみえる「貸米」と「種粮」—孫呉政権初期における穀物貸与—, 史観, 162, 2010
2120. 石原遼平, 長江呉簡名籍考—書式と出土状況を中心に—,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4, 2010
2121. 草野友子, 清華簡『祭公之顧命』釈読, 中国研究集刊, 53, 2011
2122. 多数, 中国語学上古音研究の現在と展望, 中国語学, 2011
2123. 福田一也, 上博楚簡『鄭子家喪』にみえる天人相関思想, 中国研究集刊, 52, 2011
2124. 福田一也, 清華簡『皇門』解題, 中国研究集刊, 53, 2011
2125. 福田哲之, 『天子建州』甲乙本の系譜関係, 中国研究集刊, 52, 2011
2126. 福田哲之, 清華簡『尹誥』の思想史的意義, 中国研究集刊, 53, 2011
2127. 胡平生, 里耶秦簡からみる秦朝行政文書の製作と伝達, 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11
2128. 角谷常子, 漢・魏晉時代の謁と刺, 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11
2129. 金秉駿(小宮秀陵譯), 中国古代南方地域の水運, 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11
2130. 金城未来, 清華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の思想史的特質, 中国研究集刊, 53, 2011
2131. 鈴木直美, 「収帑諸相坐律令」撤廃考, 東方学, 121, 2011
2132. 劉国忠(大阪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譯), 周文王称王史事弁, 中国研究集刊, 52, 2011
2133. 馬彪, 龍崗秦簡にみる禁地「闌入」罪と関連律令, 東洋史苑, 76, 2011
2134. 浅野裕一, 再論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禅讓論の特色—, 中国研究集刊, 52, 2011
2135. 浅野裕一, 清華簡『楚居』初探, 中国研究集刊, 53, 2011
2136. 青木俊介, 秦から漢初における都官と県官, 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15, 2011
2137. 水間大輔, 秦・漢初における県の「士吏」, 史学雑誌, 120-2, 2011
2138. 湯浅邦弘, 銀雀山漢墓竹簡「論政論兵之類」について, 中国研究集刊, 52, 2011
2139. 湯浅邦弘, 太姒の夢と文王の訓戒, 中国研究集刊, 53, 2011
2140. 藤田勝久, 中国古代の文書伝達と情報処理, 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 汲古書院, 2011
2141. 王子今(菅野恵美譯), 中国古代交通システムの特徴, 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

伝達,汲古書院,2011

2142. 西山尚志,上博楚簡『鄭子家喪』に見える歴史改編,中国出土資料研究,15,2011

2143. 小澤賢二,清華簡『尚書』文体考,中国研究集刊,53,2011

2144. 邢義田(廣瀬薫雄譯),漢代の『蒼頡篇』、『急就篇』、八体と「史書」の問題,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汲古書院,2011

2145. 齋藤道子,鬼を哭かせたもの,東海史学,45,2011

2146. 中国出土文献研究会北京大学蔵西漢竹書について,中国研究集刊,52,2011

2147. 竹田健二,清華簡『耆夜』の文献的性格,中国研究集刊,53,2011

2148. 竹田健二譯,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簡報・総第一期,中国研究集刊,52, 2011



##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論著評論；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本刊只接受首發投稿。已在正式出版物和網絡上刊發者，均不視為首發。

四、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五、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信息。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六、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七、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八、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以便聯繫。

來函請寄：

北京建國門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

戴衛紅 凌文超 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126.com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煥學書



ISBN 978-7-5495-4431-8



9 787549 544318 >

定價:100.00元